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四十三輯
沈雲龍主編

潘公展(有猷)先生詩詞選集

言論詩詞

選集

陶百川
季顯編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陶百川編選

潘公展先生言論選集

潘公展題





京南在堂會大表代民國年四十三國民 (1)



說演會大表代民國年四十三國民 (2)



影合軍將遜德統與山香權鍾逢月二十年九四九一 (8)



with best wishes,
Richard A. ...

一九六四年
 十二月
 廿五日
 理查德·A·...

會酒宮白日三月八年四六九一 (4)

弁言

梅民

潘公展先生，吾國報壇宿老也。修德也純，講學也博。英年獻身輿論之場，彈指五十餘載於茲矣。靜言讜論，可法可則，其所爲文章，無待余言以爲輕重，而既有聲譽於當世。

顧先生心儀古哲，自隱無名，實若虛，有若無。既不自珍其錦心繡口之文，又未嘗有輯鴻篇而成巨構以傳諸世之想。此殆老子之遺意歟！豈不惜哉？

今歲仲春，如弟趙君偉文，欲編印先生文稿，就商於予。民雖不敏，焉敢弗從。復得先生之哲嗣維新君贊助，項社長定榮先生及如弟江楓之支持，精選先生所撰鴻文數百篇，由陶百川先生編次成冊。頤曰：「潘公展先生言論選集」。僕我同好，用廣流傳。固弗敢謂效關令尹喜之遺風，抑爲聊盡尊賢重道於萬一而已。

既付剞劂，謹綴數語，冠於卷首，以日出版是樂之旨云爾。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於花州

陳序

老友潘公展先生早歲參加革命
奮其如椽之筆撰寫時論為本黨
盡宣傳之功為人民盡喉舌之效蜚
聲海內外垂五十年今年十月為公展
兄暨冠玉夫人八秩雙慶旅美僑胞梅民
趙偉之兩先生及華美日報同仁項定榮江
楓等兄弟倡議集其論足以資祝賀由

陶百川先編次為言論選集其內容
以採自華美日報者為多。七昔年在
大陸之報之專端時評每慮千數百
篇以淪陷大陸恐早已散佚焚毀至
可惜也搜輯全集惟有俟之他年然
即此百二十篇亦可以窺見其忠愛愛
國之誠與愛世憐民之深矣茲當寄

公付印之時其令即維新世先函請
為序余以與公展先相交罕餘年
情誼深厚心儀而難以言頌因略書
數語聊表欽佩祝破之忱云爾中華
民國二十三年七月四日吳興序之於
北天母弘毅齋

董序

公展兄畢生獻身黨國，宣揚文化，久爲國內外有識人士所稱道。今屆望八之年，旅美僑領與故舊爲表景仰之忱，選錄其歷年言論，輯爲專集，謹責付印，而徵序於霖。叨在交末，義不容辭。茲將個人獲知公展經過，謹誌數端，雖屬一鱗半爪，亦可略窺潘氏一生之高風亮節。

按公展與霖締交已達四十餘載，初識於北伐軍奠定東南時期。公展在滬市新聞界早已卓著聲譽，當被黨國徵召，肩負上海黨政重任。一九三一年五月，中央在京召開國民會議，制訂訓政時期約法，公展與霖分別被選爲上海及北平兩特別市代表出席，且共同參加若干小組，接觸之機會較多。霖心儀其爲人謙沖，謀國忠貞。「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華益亟。北平爲華北重鎮，霖忝負該市黨務責任，追隨諸同志之後，籌劃抵制日貨，訓練義勇軍，及慰勞抗日將士等，經常與各省市聯繫。公展在滬對於抗日救國工作，極力支持，且曾一度自上海專程來平，視察前方情況，公私晤叙頻繁，益佩其處事虔誠，思慮周詳。

中國之和平統一向爲日本軍閥所忌，故阻撓破壞無所不用其極，北伐期間之「濟南慘案」乃其明證。政府頻年忍辱負重，積極充實國力，決心在最後關頭，抗戰禦侮。而如何訓練民衆，鞏固基層，尤在推行社會教育，實施地方自治，以期齊一心志，團結對外。上海爲全國第一大埠，商業金融中心，工廠

學校林立，加以華洋雜處，動關國際觀瞻。政府對於主持該市行政者，特別慎重遴選。公展先後被任爲農工部局長，教育局長，社會局長，並曾一度兼代市府秘書長，積極配合黨務，貫徹中央政策，深得各方信賴。是以戰後市議會成立，被舉爲議長有年，興利除弊，萬民悅服。湖自東北事變以還，中央爲博採衆議起見，除召開第四及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外，經常邀集各省市負責人在京會商要務。公展與霖每次均赴京參加，霖時並委辦北平特別市議會首任民選議長，因而彼此除交換國是意見外，兼及滬平兩市推行社教及自治之進展與困難。當時外侮日亟而內憂未弛，霖性燥急，對於黨政方面不盡如意的措施，每好指摘。而公展則閱世較久，涵養功深，言談之間，對霖頗多潛移默化，所謂「益友」之貴在此。

一九三五年夏，日本對於華北劍拔弩張，中央在河北省及北平天津兩特別市黨政軍負責人員被迫撤離。霖調職中央政治會議，但決意赴美研究，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後，卽舉家遷滬，準備出國事宜，時與公展過從。此後一別將近六載，直至珍珠港事變後，霖問關赴滬，方再晤面。公展時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對於抗戰宣傳，供獻良多。霖初在國防最高委員會襄贊王秘書長亮瑤修訂全國行政法規，甫經畢事，適值中央宣傳部易長，張道藩先生拜命之後，堅邀霖擔任該部主任秘書。道藩與霖雖相識甚久，意氣相投，但霖對於詞職一事頗感躊躇，最後乃勸霖兼任者乃爲公展。彼雖於中宣部改組後，另有要務，但因與道藩及霖私人友誼，經常保持聯繫，且時予輔導，俾免阻越。夫近代居要津者頗有在其位而不謀其政者，欲求不在其位而仍忠於其政者，直如鳳毛麟角耳！

一九四七年初，霖自駐荷大使任所奉調返國。時公展正主持上海申報，邀霖赴滬擔任該報總主筆，事聞於陳布雷先生。陳氏夙以黨中缺少外交人才爲慮，認爲培養不易，囑霖不應他務；但爲答謝公展盛

意，商一折中辦法，改就申報駐京主筆，不領薪酬。嗣霖因囿於外部事務，忙於美援談判，對於公展未能多所協助，愧對老友。

翌年多，時局日非，政府改組，孫哲生先生繼任行政院長，吳鐵城先生以副院長兼領外交部，霖改任外次，負責遷都廣州，常川駐穗，雖偶因往返南京漢口而道經上海，但爲時匆促，鮮克訪友傾談。既而京滬危殆，公展率眷南撤，喘息甫定，卽與交通銀行總經理趙棟華先生創辦刊物於香港。旋恐大陸終難久守，擬赴北美，謀設據點，俾便推廣海外宣傳。但公展兩袖清風，旅費無着，霖亦顛沛窮困，力莫能助。所幸諸友好深感其苦心孤詣，多方籌措，終得成行。

公展於一九四九年冬抵加拿大。翌年五月轉美。初在「紐約新報」主持筆政。霖自何敬之內閣改組後，決意擺脫政務。一九五〇年初辭職奉准後，先往菲列濱小住，考察東南亞僑情。是年秋重蒞美國，得與公展把晤，藉悉其希望另創一報，俾更展其所長，貫徹其致力海外宣傳之初衷。霖對於此議極表贊同。當卽與公展邀集旅紐友好陳立夫、徐可亭、薛光前、吳炳文先生等在舍商定籌款辦法。既由賴景瑚、陳裕清、項定榮先生等不辭勞瘁，頂購報館生財機器，正式發行「華美日報」。而綜其成者，實爲公展。二十餘年主持筆政，發抒宏論，闡揚正義，不因經費困難，待遇菲薄，而稍餒其志。但人之精力究屬有限，公而忘私，罔顧身體，終罹痼疾。近年報務由定榮兄主持，一仍舊貫。公展雖因病不能視事，但報館同仁因潘項二氏之精誠感召，皆能繼續努力，自強不息。

公展從事黨政工作，致力新聞事業，逾半世紀。待人和易，辦事認真，言必信，行必果。一生持躬清廉，安貧樂道，其操守誠足爲儕輩楷模。其治學則博古通今，爲文崇尚暢達，持論力求平正。但字裏

行間，隨在表露其憂時愛國之正氣。是以華美日報社論向爲中外所重。惟本集所刊之一百餘篇，並不限於華美社論，而兼及於其他報章雜誌所發表之文字。由陶百川先生校編分類。其內容詳見書目及陶氏「校讀綴語」，茲不贅述。公展得暇亦偶作詩詞，以淡泊自然爲其特有之風格，行將另出專集，以供同好。

所堪惋惜者，以公展之學驗德行，而於晚年未能爲國大用，徒使懷才莫展，老病海外。信筆至此，不禁萬念湧心，傷感無已！惟積善者未始無報，公展在紐既有夫人朝夕侍候，復得子媳孝順逾恆，可享家庭溫暖之福。至於望重士林，文垂後世，人生如此，亦足自慰矣。

董霖

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日
於紐約之葛勉崗

潘公展先生言論選集 目次

弁言	梅 氏	一	十、對中國文化會議的期望	二四
陳序	陳立夫	一	十一、敬賀于斌博士升任樞機	二七
董序	董 霖	一	十二、我對中華文化的管窺	二九
第一編 時 論			十三、讀蔣經國院長的談話	三一
文化類			十四、從兩方面看廣開言路	三三
一、比五四更偉大的時代		一	政治類	
二、青年之路——自由中國		四	(一) 新民國開始重建	
三、精神戰線與文化反攻		九	一、新民國開始重建	三五
四、敬悼布克曼博士		一	二、世界大局與海外僑胞的責任	三九
五、父親節論孝道		一三	三、新政局與新政綱	四五
六、喜聞美國中小學生學中文		一六	四、中國反共戰爭的轉機	五一
七、留學與報國		一八	五、對國民黨十大大會的期望	五四
八、中華文化萬歲		二〇	六、十大大會面對的世局	五六
九、華埠青年問題		二二	政治類 (二) 論民主政治	
			一、民主與法治	六一

二、言論自由	六三	一、「珍珠港」日的十二週年	九五
三、兩黨政制	六五	二、駐韓美軍的撤退與美國的新戰略	九八
四、反對黨	六七	三、空谷足音	一〇一
五、政黨之分裂	六九	四、俄毛分裂與美國	一〇三
六、民主與教育	七一	五、俄毛戰爭的可能性	一〇六
七、論「秘密調查」	七三	六、日本復興與亞洲的前途	一〇八
		七、美國與亞洲	一一二
		八、對今後亞洲局勢演變的看法	一一六

政治類 (二) 光復大陸問題

一、感慨話雙十	七五
二、十月一日話紅衛兵	七八
三、何時光復大陸	八一

政治類 (四) 中共內訌

一、中共行將爆發內戰	八五
二、再談中共「武漢事變」	八七
三、「討毛救國」不能坐待	八九
四、由「中共必亡」論說起	九一
五、林彪的報告與自由中國的對策	九三

國際類 (一) 亞洲問題

國際類 (二) 歐洲問題

一、新歐洲的氣象	一一九
二、英國加入歐洲共同市場問題(一)	一二四
三、英國加入歐洲共同市場問題(二)	一三一
四、英國加入歐洲共同市場問題(三)	一三三

國際類 (三) 古巴危機

一、古巴是蘇聯的新殖民地	一三五
二、古巴危機的重要因素	一三八
三、赫魯雪却的真正原因	一四〇

四、美國尚能再信蘇聯乎……………	一四二	三、美蘇軍備競賽問題……………	一九五
五、古巴問題撲朔迷離……………	一四四	四、「原子時代」的二十五週年……………	二〇一
六、制裁古巴問題……………	一四六		

國際類 四中東風雲

一、中東風雲與美俄冷戰……………	一四九	一、美國還可觀望嗎……………	二〇二
二、牽一髮而動全身的中東危機……………	一五二	二、美國全面外交中的亞洲政策……………	二〇七
三、中東以阿之戰的面面觀……………	一五五	三、杜勒斯辭職與美國外交政策……………	二一二
四、以阿戰爭將有第二回合……………	一六四	四、赫德繼任國務卿與美國外交……………	二一四
五、以阿停火非即和平……………	一六七	五、祝望艾森豪總統遠東之行……………	二一七
六、聯合國與以阿戰爭……………	一七〇	六、歡迎艾總統訪華……………	二二〇
		七、敬向陳副總統進一言……………	二二二

國際類 (五)美蘇關係

一、美蘇關係與世局……………	一七三	八、歡迎陳副總統蒞紐約……………	二二六
二、詹森的「探求和平」……………	一七六	九、陳副總統帶回者何……………	二二八
三、對美俄談判的兩種看法……………	一八一	十、美停止與外蒙建交……………	二三〇
		十一、讓詹森歡迎嚴副總統演詞……………	二三二

國際類 (六)軍備競爭

一、氫彈製成以後……………	一八三	十二、敬向嚴副總統進一言……………	二三四
二、英美法商談核子武器問題……………	一八九	十三、聽嚴副總統演詞以後……………	二三六

外交類

人物類

一、華盛頓之偉大……………	二二九	十、閒談美國政黨……………	三一九
二、儒將麥帥的不朽演說……………	二四一	十一、與胡適談政黨……………	三二八
三、當國者不可不慎……………	二四三	十二、我所見的吳國楨……………	三三六
四、應向林肯學習的是什麼……………	二四五	十三、從吳國楨想到張治中……………	三四五
五、華盛頓與林肯……………	二四七	十四、顧維鈞聲討吳國楨……………	三五三
六、華倫時代的美國大理院……………	二五〇	十五、原子時代珍珠港事變……………	三六二
七、讀董著「戰前之中國憲政制度」有感……………	二五二		
八、賴著「國際問題論叢」書後……………	二五六		

第三編 雜 纂

一、有涯室夢痕錄序……………	二五九	一、出版界趨向的過去與將來……………	三七一
二、與國難俱來的一生……………	二六五	二、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編輯旨趣……………	三七六
三、美日憲法之爭……………	二六九	三、英譯中國抗戰文學選集弁言……………	三八一
四、憲法起草的經過……………	二七四	四、抗戰期中的出版界……………	三八三
五、選舉劇痛談往……………	二八一	五、三民主義的民衆教育……………	三九三
六、副總統的人選……………	二八八	六、中國民主政治……………	三八九
七、李宗仁這個人……………	二九五	七、人力經濟學……………	四一一
八、說起毛邦初案……………	三〇三	八、論戰時經濟政策……………	四一八
九、民主政治根基……………	三一—	九、對美國政府遞交有關美國外交政策的建議書……………	四二三
		校讀綴語……………	陶百川 四二六
		作者的愧歎與感謝……………	潘公展 四二八

比五四更偉大的時代（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

二十年前的「五四」，是中國青年集體怒吼的一天，也是中國青年用民衆運動的方式發揮革命精神的一天。然而中國青年要認清：目前的時代是比五四更偉大，今日青年的使命亦比五四時代更偉大。

中國青年致力於民族獨立的偉大運動原不始於五四，而斷頭流血犧牲生命於國民革命的艱鉅過程中者更不始於五四，但是在中國青年運動史上五四所以能寫成光榮的一頁者，必有其不可磨滅的時代性在大要言之，姑舉兩點。

五四運動，能於軍閥政府壓力之下，號召青年，赤手空拳，以與賣國官僚作集體的奮鬥。這種轟轟烈烈的精神，實在是當時全國青年受了總理革命救國百折不回的精神所感應，所以能够繼續着先烈赴湯蹈火的氣概，誓爲國家民族生存獨立起而作肅清賣國賊的運動。故在政治史上，五四運動是中國青年參加政治革命的一個重要階段，充分表現着革命青年與賣國政府的對立。這是五四精神的時代性之一。

其次，五四運動大家承認爲新文化運動產兒，同時新文化運動也因五四的呼號而更推進更擴大。於是在這個潮泥裏面，因青年運動與新文化運動的相互推演，收到知識分子思想解放的效果，賽因斯和德謨克拉西成爲這個運動裏面的兩大主流，兩個臺柱。當時的論壇，比之於歐洲的文藝復興。以爲中國青年循此途徑邁進，當可使中國走上近代國家之大陸，故在文化史上，五四運動是中國青年致力於新文化

設建的一個猛烈的衝鋒，這是五四精神時代性之二。

五四時代的青年，既然實際上參加了政治革命，而影響所及又推進了文化革命，則在中國青年運動史上自有其地位，亦自有其價值，五四也就成了一個偉大的時代。然亦惟其五四運動有牠的時代性，故時代一經轉變，青年運動斷不能泥守成規；時代既已演進，青年運動尤須追上時代，庶幾不致落伍或竟與時代背道而馳。

紀念五四，我們應該發揮青年為國家民族而犧牲奮鬥的精神。但今日如何運用此種寶貴精神方能有益於當前的國家民族，則決無因襲二十年前陳法之必要。在往日，當權的是賣國官僚，自然應當不顧身，直接起來打倒他們。而在今日，則舉國一致在最高領袖領導之下，抗戰建國，青年們除了「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真切信仰三民主義，絕對服從國民政府，與敵人漢奸作殊死戰以外，試問更有何途可走？

紀念五四，我們固然應該繼續為尋求科學真理與建立民治制度而努力，但除了吸收西洋文化的優點以外，對於吾民族固有之道德，固有之文化，不但應當保存，抑且必須力求其發揚光大，然後民族的自尊心 and 民族的自信力，方可於此次民族國家生存獨立所繫的神聖戰爭中充分發揮出來，提高我們的民族意識，充實我們的民族精神，完成我們這一輩繼往開來千載一時的使命。如果我們還像五四時代的青年一般，祇認識我國固有的東西一切都不好，而不知道數千年來我國家的光榮歷史和我民族的偉大成就；則試問國家尚何可愛？民族尚何可親？縱然激於外寇而亦知國之當救，族之當保，但如果只知道思想解放而不了解意志集中和信仰唯一的必要，也決沒有發掉偉大力量的可能。惟其我們要認定「國家至上」、「民族至上」，所以這一個時代的青年，應該深切覺悟，不當再走個人自由主義的道路；或好高騖遠

，在此時此地來高唱國際主義。大家平平實實，確認「一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爲救國之道德，惟有不漠視這些民族固有的道德，一致身體力行，然後可以人人爲國家盡忠，爲民族盡孝，爲痛苦同胞盡仁愛，對一切的人和事重信義，還要盡一切的奮鬥力量，在這個紛擾黯淡的世界中求真實永久的和平。

青年同志們，我們紀念五四，大家要盡力發揚五四的青年精神，同時大家要使一切思想言論和行動，都適合於當前比五四更偉大千萬倍的時代！切莫辜負各位寶貴的青春，尤其切莫奄忽錯過了這千載一時的偉大時代！（原載五四運動與現階段青年運動）

青年之路——自由中國（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青年節為公祭戴季陶先生而作——

戴季陶先生獻身革命，文章報國，名垂不朽。抗戰期間，恒以勝利後中國之和平統一為慮。上月廿二日，戴先生逝世於廣州東園，當必以不及親見戰後有一獨立自由和平統一之新中國為憾事。

今天為黃花崗先烈成仁紀念，亦即為我國的青年節。京滬兩地同志友好，因為戴先生平生最愛護青年，故同時定於今天公祭這一位青年導師。

筆者獻身報業，尚在青年時期，自問於本黨報業先進中，平生文字道義之交，情誼在師友之間者，葉楚傖陳布雷兩先生而外，當以戴先生為最親密。勝利以還，楚傖先生以勞瘁謝世。去冬布雷先生積憂長眠。今又弔吾戴先生，誠不自知其涕泗之何從。回憶民國十年左右，筆者追隨布雷先生於役商報，望平街頭，每當午夜，戴先生輒相顧存，抵掌傾談，上下議論以為快，甚且宵深不去，直至筆者工作完畢始相借步往「四時春」點飢，繼續暢談，習為常事。由今思之，直同隔世！今值青年節日，勉抑悲懷，綴寫數語，以敬告吾親愛的青年同胞，不知能為戴先生在天之靈所默許否？

戴先生在民國十六年多，曾將他任中山大學校長時對同學們講演的筆記整理後，編成小冊，題名「青年之路」，前後十餘萬言，說明他當時對於國事黨事的觀察體驗。（此書現在中國文化服務社有印售

）。這本書與同時戴先生的另一著作「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都銷行得很廣，為一般青年所傳誦。今天筆者所以要討論「青年之路」者，還是想引伸戴先生的遺著，針對目前的大局，向青年朋友貢獻幾句肺腑之言。

戴先生在「青年之路」自序裏說：「革命是求生，不是求死，是做真實的工作，不是兒戲。兒戲革命的罪惡，比之帝國主義和軍閥還要大得多。因為帝國主義的一切施為，還可以有多少物質的建設，軍閥的地盤鞏固時，還可以保護若干苟且偷安的太平。惟有兒戲的革命，是沒有絲毫的良果，只有草菅人命，阻絕生機。……回頭是岸，努力俯持，確實用科學的知識經驗，建設心口如一公正的三民主義的國家社會，然後中國可以免却殘殺的浩劫，創造無限量的生機。」他又痛切自責並勉勵一般在政治上負領導責任的人們，他說：「看到今天中國的人民，這樣受苦，回想過去的言行，便不得不惶悚起來！」「如果踏足在政治上工作，就要把一切貪心恨心收拾起來，時時刻刻以人民和國家的利害為利害，才可以教人救己。」

我們今天讀了戴先生這幾句遺言，就算沒有細味他遺著的全文，已不勝感慨繫之。今天中國人民的受苦，較之民十六，何止千百倍！今天政治工作者憑藉了他們的貪心恨心，兒戲革命，塗炭生靈，較之民十六，又何止千百倍！戴先生以一位革命先進，這樣悲天憫人，勸導青年，在我們這些後死的工作者，更應以大公至正的心胸，引導青年走上康莊的大道，萬勿走入錯路。在今天看來，這一條大道，無疑的還應該是一條用三民主義的磚石鋪築起來的「自由中國」的大道。

大家正在嚷和平，和平正成爲絕頂時髦名詞的時候，筆者爲什麼偏要向青年喊出「自由中國」的大

道來呢？理由很簡單。因為我們所以要和平，是爲了要生存，要生活；而我們人類生存時候的生活假使一旦失去了自由，那就成了奴隸牛馬，與死亡無異！所以「不自由，毋寧死！」一句話，早已成爲西哲的名言。也許有人以爲今天人民救死不遑，但求苟安偷生，於願已足，自由不自由，顧不得了。不見從前一些自由主義者，口頭掛着民主自由招牌的人們，今天在報館被封，報紙停刊的中共區域內，都絕口不談自由了嗎？假定這是正確的說法，那麼十二年前日本軍閥侵略中國，我們就不必堅持抗戰到八年之久。日人宰制下的中國，人民也還是可以生存的呀！而且，羅斯福總統當年所標榜的四大自由，（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所以能成爲大西洋憲章的骨幹，所以能爲二次世界大戰中一切民主國家共同奮鬥的目標，所以能號召全世界愛好和平民主的人們一致起來打倒德義日法西斯集團者，也正爲了自由乃人生所必需的緣故。因此，中國今天談和平，一切條件儘可斟酌討論，惟有全國人民合理的自由生活，絕對不許任何人在和平的煙幕之下輕輕斷送了去！誰在人不知鬼不覺的期間，出賣了人民的自由，以換取虛偽的和平，這和平一定是青年們所受不了的。惟其如此，中國今天的青年，應該下決心，永遠爲一個「自由中國」的建設而奮鬥，不達目的，決不中止。

假定四月一日在北平開始的和談，雙方代表都眞能如戴先生所說，痛切自責，「把一切貪心恨心收拾起來，時時刻刻以人民和國家的利害爲利害」，那麼他們自然會想到如何維護人民應享的自由權利。否則，人民如平的糖衣裏，嘗到了喪失自由的毒藥，遲早一定會起來爭取他們的自由的；果爾，這和平不過是爭自由的戰爭的間歇而已。

青年同胞們，放眼看看全地球的現狀，你們正面對着兩個世界的分野：——一個是民主自由的世界

，另一個是極權專制的世界。中國人民，無疑的是愛好民主自由，而厭惡極權專制的。故中國不論和談的前途如何，是否光明，是否成功，而青年們之必須為「自由中國」而奮鬥，應該是指針確定的道路。因為，筆者深信，沒有一個青年願意在極權專制之政體下做奴隸的。

記得兩年以前，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杜魯門總統對美國兩院聯席會議作獅子吼，請求貸款希土，支援自由民族。他說：「幾乎所有國家必須在兩種生活方式中挑選一種。我相信美國政策必是支持自由人民，抵抗少數武裝力量或外力的統治企圖」。他更堅決的表示：「自由制度之摧毀，獨立之喪失，不僅對他們（指希土）有所危害，對整個世界而言，亦復如是。……世界各地自由民族，均期望我們的支持，以維持他們的自由。我們若果畏縮不前，則我們可能危害世界的和平，也必然將危及我們自身的福利」。這一次有名的演說，就是舉世所傳「杜魯門主義」的精髓。總說一句話，富於自由的傳統精神的美國人民與政府，是當今一切自由民族自由國家的支援者。最近大西洋公約的簽訂，和美國國會十六億貸款援助自由國家法案的提議，都是自由世界團結的號鐘。中國自推翻滿清王朝以來，人民在三十餘年中，忍受一切痛苦的和犧牲，無非為求一個「自由中國」的創造與保持，以躋於自由國家之林，故在今天世界潮流的激盪中，愛國家愛人類的中國青年，當然要盡其全力，向着「自由中國」的大道邁進，而不容徘徊於歧途。

爭取自由，不當僅是國民黨黨員之事，而是全國人民共同的責任。故今天我們的青年同胞，不問是國民黨黨員也好，青年黨黨員也好，民社黨黨員也好，甚至於共產黨黨員也好，或者無黨無派也好，時至今日，都應回念過去，痛自懺悔，大家洗心革面，一致來為「自由中國」而奮鬥。只要誰不願做奴

諒的，誰都就該團結起來，爲爭自由而奮鬥。老實說，今天仔細思量，此二三十年中，各黨派間只知互攻互訐，而把共同體認的三民主義丟在腦後，把國家弄到如此糟，如此亂，究竟誰是誰非，不能一句斷定。但總可以說，這是因緣和合所使然，過去種此因，現在得此果。共產黨今天不必因勝利而笑，國民黨今天更不必因戰敗而恨，須知荼毒生靈，都已造了惡業，此二三十年中的糾紛，離合悲歡，變幻莫測，決不會是某黨全是某黨全非，也不會是某人全是某人全非，今天欲評判細賬，在和平談判裏來決定一個全是全非，於理於事，都不可能。我們所希望的，還是大家不必文過飾非，趕快從頭做起，給全國青年以一個「自由中國」的新希望，讓他們好在「自由中國」的大道上安詳前進。

假使雙方的和談代表，不明白上述一點的根本義，只爲了求取「和平」的美妙名詞的實現，而漠視了「自由中國」前途的障礙，不爲它披荆斬棘，或甚至反而牽着中國人民的鼻子走到極權專政的營幕裏去，則中國的青年們，終有一天會用他們自己的力量來爭回自由的基本人權的。到那時，和平不又落了空嗎？所以，和平必得建架在自由的基礎上，纔是穩固。讓我們在青年節高呼「自由中國」！「中國自由」！以安慰戴先生在天之靈！（上海申報）

精神戰線與文化反攻（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日）

陽明山第二期會談今方在進行中，海內外文化教育界人士不遠千里而集合於一堂，吾人不但希望其確能對於反共復國之大業有所貢獻，亦誠意祝禱政府當局袞袞諸公具有接納善言之雅量，而擇其切實可行之建議付諸實施。否則徒費與會諸君之寶貴光陰，徒耗國家庫帑之鉅額經費，不亦太辜負乎？臺灣各報均對會談一致寄予殷切期望，而紛紛以展開文化反攻，強化精神戰線方面之力量爲言，足見輿論界莫不願會談諸君致力於文化反攻工作之推進。

以言精神戰線，其重要本不下於軍事戰線。「一枝筆等於三千毛瑟」；「文字成功日，全球革命潮」。任何戰爭，不能漠視宣傳，亦即不容忽略文化工作者之任務。自由中國朝野人士今日最主要之急務，無過於光復大陸，解救同胞。此項任務之達成，不但對國內同胞（包括大陸同胞）須加強各種切實有效之宣傳，而對於海外僑胞及國際友人亦應進行積極而持久之解釋工作。故民間之國際宣傳應有其重要地位。

即以美國而言，美國今雖爲中華民國最密切之盟邦，而一般美國人民對於中國情況之不了解，幾乎至於可驚之程度，即美國官吏議員，亦頗多誤解或具有偏見者。以近年中國旅美學人教授之地位，中國留美學生之衆多，若能團結鼓舞，共趨一的，隨時隨地，盡其國民使節之任務，增加美國人何以必須援

華反共之認識，則其有助於我國反共工作之進行者至大。且美國朝野今方苦於共產勢力向全球進逼，而似以不能深諳共黨本質及其戰略為憾事，故吾中國知識份子更當本其親身經歷之體驗，盡其忠告善導之責任。吾人應可集合其財力智力，在美國籌辦一種內容豐富，圖文優美，性質獨立，印刷精良，確能介紹中國真相之英文權威刊物，週刊固可，日報更佳，使友邦人士之欲瞭解中國者，得以是為媒介，而不致為此邦少數自命為「中國通」者所欺瞞。初創之時，雖未必即有何種影響，但日浸月蝕，潛移默化，多少必可轉移美國友人以往錯誤之視聽。何況此種報刊，即使為在美生長之僑胞子弟未能盡讀中文者計，亦實有其必要。吾人固願彼等俱能對中國文化有所瞭解，然當其未諳中國文字之前，苟能先藉英文為階梯，引之入勝，油然而生愛慕之心，則其對於祖國之向往，願予祖國以助力可必也。

抑尤有進者：今世界之擾攘，至矣極矣。共產主義之兇鋒幾乎到處蔓延，核子武器之威力已近人類末日，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之如何對抗赤化潮流，更須在思想陣地上，尋求其文化反攻之重要工具，不能徒恃軍事力量與新式武器，識者殆盡能言之。然為自由世界計，在思想上，固不能盲從英哲羅素所倡「寧亦勿死」之說，以為非降不可，則其勢非於西方文化之外，求其藥石於中國文化不可。中國傳統之學說，富於人文主義之精神，其重視人與人之倫理關係，確可療治西方科工發展下唯物主義文化之病根。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皆由唯物思想為出發點，中國文化因為其補偏救弊之良藥。然則在美國創辦闡揚中國文化之學術性刊物，尤富有其時代意義，固不待贅述矣。（紐約華美日報）

敬悼布克曼博士（一九六一年八月廿一日）

世界道德重整運動導師布克曼博士，八月八日在德國南部福祿登斯坦城逝世，其遺體已於昨十八日安葬於其故鄉賓省安倫城。各國之道德重整運動會代表參加其葬禮者不下數百人。來自各國之總統、元首、總理、閣員、外交使節、及社會名流之弔唁電報，無一不痛惜失此導師。其尤足驚異者，布克曼博士逝世之地，適為其二十三年前（一九三八）發願推動此道德重整運動之發祥地。當其逝世之前一週，布克曼博士曾重遊其發動此項運動之場所，慨然語其從遊之士，勗勉繼續推進此一適合挽救世界危機之哲理思想，相信必能使各國人民向黃金時代邁進，以迎接基督十字架之精神所予此世界之最大革命。職是之故，吾人深信布克曼博士雖與世長辭，而其絕對不與邪惡妥協之道義的力量，亦即道德重整運動所標舉之四大信條——絕對誠實、絕對純潔、絕對無私、絕對仁愛——必能發揚光大，永為此濁世放射無比之光芒，而拯救世人於赤潮苦海之中。

猶憶本月十一日福祿登斯坦城之教堂舉行布克曼博士殯禮時，代表參加柯峯道德重整運動大會之中華民國四十八人代表團致詞之何應欽將軍曾稱：「布克曼博士之謝世，乃人類之最大損失。彼所倡導之道得重整之最高意識型態，將拯救此世界使之免於毀滅。余與中國代表團誓願為此理念之勝利而奮鬥」云云。誠然，布克曼博士之所倡導者，為目前赤禍逐漸蔓延，人性瀕於滅絕之世界所最急需之對症良藥

。苟世人鑒於核子大戰之無窮慘禍，而欲消弭之於無形，非從根本上糾正人心不可。共產主義雖崇拜唯物思想，而實則爲一毒害人心之意識型態，其本身卽爲一種「攻心」之攻具。故欲與共產主義相抗，而拯救人心於洪流陷溺之中，不能僅恃武器，徒仗金錢，卽彼致力於改善人民生活以爲衣食足卽可以知禮義者，亦未免隔靴搔癢，必也單刀直入，糾正詐欺、邪惡、自私、嫉恨之人心，而藥之以誠實、純潔、無私、與仁愛，尤其須本忠恕之道，從自身做起，己立立人，己達達人，然後至誠感物，可望由一傳十，十傳百，而盈千累萬之人類，胥涵泳於道德重整運動之理想生活之中，相親相愛，相諒相助，日日向改過遷善之長途，爲寸積尺累之進步。彼共產主義縱欲售其邪說詭計，又烏得而遂其願哉？吾人之所以尊敬布克曼博士，而深悼其謝此塵世者，良有以也。然而，不爲之先，雖美不彰；不爲之後，雖善莫傳。是則布克曼雖離世人而去，而道不遠人，道德重整運動之「大道一」，必仍能宏揚於天地之間也無疑。蔣總統之慰唁電中有云：吾人誠望而且深信布克曼博士之遺教將繼續對全世界人類之尊嚴與自由有其貢獻。此個人人之所共信也。

間或思之：道德重整運動之基本關鍵在於確信個人品性之可以改造。所有社會之改造，經濟之改造，國家之改造，乃至國際關係之改造，無不奠基於人心之改造，而人心之改造尤須先從自己改造始。改造之方則重在力行。吾人敬悼布克曼博士之餘，深望人人力行改造自己，以達其改造世界之崇高目的。必如此，庶幾無負於布克曼博士之苦海慈航。（紐約華美日報）

父親節論孝道（一九六二年六月十六日）

——爲紐約孔學研究會成立而作——

紐約孔學研究會定於今日（六月十六日）舉行成立典禮，恰巧明天是美國習俗的「父親節」，我們願乘此機會略論中國傳統文化中之孝道，作爲孔學研究會成立的獻詞。

中國傳統文化，處於今日的新時代，固然容或不免有其缺陷，但這不是文化本質的痼疾，而是食古不化的流弊。須知中國文化，內容豐富燦爛，而大要以儒家學說爲陶冶民族性格的骨幹。故無論釋迦耶回之教化，在中國無不因儒學之影響而多少變異其面目；反之儒家之學說亦未嘗不因外來文化之傳入，而與時俱進，一新其內容。孔子雖自稱「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又謂「述而不作」；但儒家自以孔子爲集大成的萬世師表。孟子稱孔子爲「聖之時者」；假使孔子生於今日的時代，他的學說也必有萬古常新的演化。我們今天來研究孔學，尤其在西方文化昌盛而尚待演變的美國社會來研究孔學，自然不應重蹈以前抱殘守闕之士，徒知尊奉國教，提倡讀經的覆轍。我們要站在「學術自由」的立場上，鼓勵青年於求學工作之餘，把孔學——也就是儒學——作爲古今中外寶貴學說的一種，來加以鑽研深究，求其微言大義之所在，至德要道之所示，身體力行作爲楷模，藉爲溝通中西文化，挽救世道人心之一助。這大概應該是孔學研究會今後工作方針之一吧。

記載孔子言行最豐富的是論語，發揮孔子思想最精微的是大學中庸，探討孔子教訓最切實的是孝經

。我們試把這幾部書裏面所講到的「孝」，稍加翻閱，不難發見這「孝」字乃與一切道德有關的根本道德。固然，孔子只講「仁」，孟子才講「仁義」；但論語第一章就記孔子的弟子有子的話：「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孔子又說：「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子夏更說：「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這些都是把孝作爲做人的第一件事；甚至即使「未學」，或未嘗「學文」，只要能從孝父母做起，推而至於其他待人接物的躬行實踐上做功夫，便可不失爲堂堂的一個「人」。

孝經一書，闡發孝的理論，更認爲治國平天下的「至德要道」，「始於事親，中於事君（按，指社會之長），終於立身」。大學說：「自天子（國家之長）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而中庸却又說：「思修身不可不以事親。」換言之，卽無論那一種人，不能不從「孝」作爲修身的起點。

然則怎樣算得是孝呢？我們試從這些書裏摘錄幾點出來，以見卽使在現代，也可希望大家做到的幾件事：①敬而和。惟其要敬，故孔子以爲不能以「有養」而自滿。惟其要和，故孔子答子夏之問，首列「色難」，而子夏也說：「賢賢易色」。②誠而愛。中庸說：「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又說：「敬其所尊，愛其所親。」所以凡能够誠誠實實的愛護父母，便是孝。③立身揚名。孝經說：「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所謂立身，卽道德無虧；所謂揚名，卽事功昭著。④幾諫補規。一般人以爲孝必須對父母百依百順，其實也不盡然。論語記孔子說：「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孝經亦記孔子說：「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

而且我們必須知道，孔子凡說到父子（包括母子）的關係，往往是對舉的。父子爲五倫之一。「倫」便是人與人之間的對等關係。論語記孔子對齊景公問政時說：「父父，子子。」大學裏也說：「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這便是父子都要「止於至善」的道理。故儒家所講的孝，並不是單方面的要求爲子女者的盡義務，尤其不能算是在專制封建時代所行得通的道德。因爲父子是人類天性的關係，父母之教養子女，與子女之敬愛父母，乃是整個人類社會所以能蘇廷蕃衍的天然紐帶；時代縱有變遷，天性何能滅絕？共產黨徒的邪說，必欲以破壞家庭，斷傷倫常爲快，誘騙子女，視父母爲「包袱」，而惟望其早入死亡之域，於是形成大陸上的「人間地獄」。奈何西方若干「不通的學人」，妄談中國文化，以爲毛澤東思想也是由中國傳統文化所產生，此種荒誕不經的怪論，何能搖撼中國文化的毫末。今於紐約孔學會成立之日，因論孝道，又烏可無詞以關之？！（紐約華美日報）

喜聞美國中小學生學中文（一九六二年六月十八日）

美國當局發動學習外國語文運動以來，中國語文已被列為重要語文之一。不但有不少大學添設中國語文一科，鼓勵學生選修，且在東西兩岸成立兩個中國語文中心，加速造就中國語文的師資。東岸中心紐澤西州西東大學遠東學院，在院長祖炳民博士努力推動之下，已有良好的發展。先後有多處中小學設立中文班，雖草創伊始，而首開風氣的魏懷義中學，其成績頗已可觀。此在我們僑居海外，竊嘗切望發揚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溝通交流者聽來，自是一件大可欣慰的喜事。

魏懷義（Weekuhik）中學，久以教授外國語文著名，獨中文班則方於日前舉行其第一班第一學期的結業禮。校長愛斯旦（Erstein）先生雅慕中國文化，得西東大學遠東學院的輔導，延聘名師任教。因之受業的中學生，以成績優良稱者，一學期間竟有十六人之多。學生不但能華語會話，華語致謝，且在大庭廣眾之間，居然表演漢字書法，得心應手，使家長來賓，瞠目咋舌，歎其子女之成就為奇蹟，引其子女之學業而自豪。我們得此佳音，豈僅為該校師生賀，且為中國文化在美東之播種。愛校長、組博士、與諸教師之功，誠足多者！

近聞紐澤西州之紐特城一帶，各學校且有學習中文之風氣。例如「好景」鎮上天主教會設立的聖若望小學，亦特設中文班，每星期教授一次，七八百小學生中竟有一百十人左右願意學習。先取材於「說

文」，用象形文字教授好奇的兒童，使之視文字若圖畫，而因圖識字，因字辨音，興趣盎然，別有風味。他們幼小的心靈中，乃恍然於中國文字有其特長的優點，固不待拼音而識字，尤不致隨音而變形，與英文迥異其途，而愛學之願以起。何況中國文字之所以能成爲中國數千年來之統一工具，其道即在於不用拼音爲造字之法。或譏象形文字爲落伍，必以拼音爲進步。其實中國文字亦何嘗限於象形？乃有妄人必欲以羅馬化的漢字教人學習中文，更欲使漢字拉丁化而炫其新奇，吾恐其結果將使他們所教所寫的漢字，連中國人都不能識不能讀。如此，則又何必稱爲學習中國語文？

抑吾更不禁重有感者：我自流亡來美，十餘年來，一方面固欣見旅美華僑前輩創設華僑學校，教授其子女以中國語文，絕不使「數典忘祖」。此風至今相沿勿替，而家教之純良，使華裔青年循規蹈矩者多，作奸犯科者少，獲得美國朝野的稱譽。獨怪年來一部份播遷來美之所謂「高等華人」的家庭，以慕效美國習尚爲得計，惟恐其子女之不「洋化」。於是家庭日常不講華語，子女課餘不習中文，視中國畫報若敝屣，以爲不值一顧，目中國古訓爲腐朽，決難適應時潮。其心理似祇恨其膚之太白，髮之不紅。今使彼等聽到美國中小學生爭相願學中國語文，不知有何感想。一旦此輩通曉中國語文的美國學生，晤談之頃，使用華語，達意之信，使用中文，他們恐將不知所答，而自慚形穢了。須知中國人口六七萬萬，佔全人類四分之一，中國語文在今後世界之影響必不渺小。美國朝野近來之所以倡導學習外國語文而亦以中國語文列爲重要的科目者，其故卽爲準備更能瞭解中國情況，更能研討中國文化。尙望我旅美僑居的中國青年子女，慎勿蔑視其「家珍」；卽使作爲「外國語文」之一而學習，實在亦是千應萬該的！

（紐約華美日報）

留學與報國（一九六三年八月廿四日）

最近因爲一羣在美國留學多年的學人，組團回到自由祖國訪問，引起了國內朝野人士表示由衷歡迎之外，更令我們在臺灣寄來的報紙上讀到許多歡迎的演詞和記者的評論，他們不但對留學政策有所指陳，且對於留學生如何學成之後完成其報國的心願，提出熱切的期望。站在美國僑報的立場，我們也感到不能不說幾句話了。

第一，我們在國家遭逢空前的苦難期間，政府還能每年繼續不斷的在鼓勵留學，好讓有志上進的青年，在有適當的機會時出國留學，無論是公費或自費，無寧是值得稱許的。只要這些留學的青年，確以追求增益學問技能爲職志，而不辜負國家、社會、家庭培植的好意，則縱使目前因環境關係，只能暫時「楚材晉用」，無由完成其報國之宏願，但儲備復國建國的人才於適當的園地內使它成長，亦未始不是一種「因時制宜」的過渡辦法。我們國內目前既無足以盡量充分培植所有優秀人才的环境與工具，則培植和儲存人才於國外，不但無可厚非，而且應予以適當的推動與鼓勵。

第二，我們不贊成一部份具有偏狹觀念的論調，詆責政府對留學政策的放任，以致多數已出國的留學生都變成了「留」而「不返」的學生。其實祇要留學生真能「留」而「學」，至少一面做工一面求學，絕非「留」而「不學」，則無論如何，他總可望到學有所成的一天，至少能學有一技之長，實實在在

並不孤負了「留學生」的大好名義，也就好了。至於「返」與「不返」，却要看我們國內的環境與需要的情況而定，自不能以平時的尺度來衡量非常時期青年的抱負。姑不論目前在他國的留學生，即僅以美國的一兩萬中國留學生一古腦兒立即願意返國服務而言，政府和社會上的各種事業是否都能盡量容納，而使他們得以各盡其才？如其不能，則何如讓這些「身在海外，心在祖國」的留學生，暫時仍在美國繼續求學深造或尋求適宜的工作以資歷練呢？

第三，反過來我們也要向留學業已成年的青年貢獻一些淺見：○假使留學生所學的智識技能，並非居留國家所急切需要而不能缺少，反之又恰好是自由祖國當前所迫切需求而尚無適當人才以供其所需，則權衡輕重，自當一本其學成報國之志願，應召返國，貢獻智能，蔚為國用，大可不必因國外待遇優厚，就長此樂而忘返。萬一此時，同祖國社會目前尚無此項人才之需要，不得不託足異邦，寄人籬下，但一旦時勢轉變，國家對他們所需要時，就該有「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的精神，響應祖國的呼喚，立即有所行動。這才是「留學不忘報國」的真義。○至於一時不能返國服務的學人，鑒於當前的世局，不必說，一定都有無限的感慨，但也有其隨分報國之道。須知黃膚黑髮的中國人，不問其是否歸化居留地的國籍，總不能不分擔中華民族榮辱的一部份責任，休戚相關。祖國與個人是分不開的。這些學人留在美國，不但不該盲目附和若干美國人任意詆毀自由中國的論調，而且相反的應當多做一些對國家民族有益的國民外交工作。至少他們可以著書立說，宣揚中國文化中極有價值的一部分，以期與西方學人相互切磋，取獲文化交流之實效，或者可以推動華僑教育，使祖國文化能在海外保存一部份，發展於他日，此亦是報國之道。（紐約華美日報）

中華文化萬歲（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今年的十一月十二日爲國父孫中山先生的百歲暨一誕辰。臺北的中山樓中華文化堂，卽於是日舉行盛大的落成典禮。蔣總統特於紀念文告中勉勵國人，操危慮患，莊敬自強，益堅其消滅赤禍，重光大陸之信念。他又明白指出：三民主義乃我民族所託命，我文化所從聚，當相與實踐而振德之。我們也深信，愈是毛共在大陸上搞其所謂「文化大革命」，使「紅衛兵」的無知青少年如火如荼的「造反」，則中華文化的光輝愈將發揚光大，與西方文化交流融會，而普使人類全體受其福澤。

中華文化的精義，可以「盡性」兩字綜括之。更簡言之，不妨以「誠」字提示之，中庸所謂「不誠無物」，以及「惟天下之至誠爲能盡其性」，乃直探人類文明之根源而得的結論。如能盡己之性，盡人之性，乃至盡物之性，則「可與天地參，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又豈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已？

西方文化，溯源於希臘、羅馬，而輔之以希伯來的宗教思想，固自有其價值。但自工業革命以後，功利主義抬頭，唯物思想普及，雖科學發明，日新月異，而人爲物役之流弊，已爲有識者所深憂。使無中華文化之宣揚，以補偏而救弊，則物欲愈高，而人性愈墮，其爲禍殆難於究詰，故中華文化正是針治西方文化偏頗之藥石。凡屬中國人，都有宣揚中華文化之責任，使之爲構成世界新文化之一種主要源泉，不能祇是「抱殘守闕」而自限其藩籬。換言之，居今日的交通發達時代，中華文化不應僅作爲中國人

的寶藏，而當與天下人共之，惟有這樣，可大可久的中華文化，纔可成爲人類文化的重要支柱之一，澤流萬世而無窮。

不少學人認爲中華文化是人文主義的文化，其實便是「人性的文化」。所謂人性的文化者，即指其文化的精神所在，是以「人」爲本位，而非以「物」爲本位的。前美國國務卿史汀生曾在其遠東危機一書中明言：「中國文化非常健全穩固，爲世界和平的象徵，亞洲安定的基力。」可惜有一個時期，在「新文化運動」號召之下，若干中國學人震驚的「新」字，而必欲拋棄中華文化的固有美德以爲快。於是中國人的思想陷於「真空」的苦境，而自惟物主義發展出來的共產主義乃乘虛而入。今天中國大陸淪於赤化的鐵幕中，即是當年一部份學人揚棄中華文化所釀成的苦果。所以我們如果要達到反對共產主義和光復大陸的目的，不僅要注意政治、經濟、和軍事各方面的準備工作，而且要努力於宏揚以人性爲本的中華文化，以克制共產主義根源的唯物思想。我們自然應當精研科學，以收「利用、厚生」之效，但同時我們切不可忘記「正德」。必攝取科學進步的業績，納入於人性文化的道德範圍之內，然後人類始能飽受科學技術之益，而不致構成人類自戕的大禍。尤其是在核子武器可以屠殺世界人類的時代，我們尤有闡發中華文化的仁愛精神之必要。

因此，我們欣聞中山樓中華文化堂在臺北落成的喜訊，渴望吾自由祖國的文教當局，趕速敦聘一流學者，用各國語文選譯中華文化寶典，灌輸於傾向唯物思想的國際社會，喚醒世界人類從物慾火坑中覺悟而解脫出來，其造福人羣，可以斷言的。最後，願以幾句老話，祝中華文化萬歲！「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紐約華美日報）

華埠青年問題（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

六月廿八日的紐約時報刊出一篇關於紐約華埠的報導。據採訪此項新聞的記者霍福曼的報告，大概認爲由於移民法的修正，近年以來，由香港、臺灣、星加坡，或其他地區來美國的華人，包括婦女和少年，較從前爲多，因之產生了若干新的問題。從前一般人認爲少年犯罪行爲，在僑居美國的華人家中，乃絕無僅有之事，而現在却似乎也常有了。他訪問各方所得，對於華僑社會新的趨勢，指出有下列幾點值得注意：

①華埠的範圍正在逐漸擴展，從前只是指堅尼街與東百老匯路之間的地區，今已不復局限於這些街道了。

②在美國生長的華裔子女。跟那些新近移民來美的青少年，由於文化和社會環境的不同，產生新的緊張情勢。青年問題及少年犯罪問題，遂引起人們的注意。

③華埠現有車衣廠七十多家，此爲新發展的企業。婦女在車衣廠工作的亦日漸增多。

④華裔人口在近廿年來約增加一倍。華人社會除自助互助以外，也要求在政治上有所表現。（民主黨共和黨都在華埠設有分部，且有湯鴻業律師曾代表共和黨出而競選公職。）

⑤今年估計移民來美的華人當超過三萬五千人，大多集中於三港市和紐約，其擠入紐約華僑社會的

每週約有一百至一百五十人之多。在華埠或其附近義大利人的商店，都在四家中文日報上刊登廣告。

從上面的敘述，有些可以令我們欣慰，也有些要令我們警惕。譬如中國餐館和車衣廠的增多，開拓我們僑胞在美的職業範圍；以及美國兩大政黨和退伍軍人會都在華埠設有分部或分會，表示對華人的重視。這些都是可引為欣喜的事。但另一方面，青少年問題的發生，不得不注意研討其原因，同時謀求補救改善的方法。

按華埠青年問題之所以逐漸發生，其原因不外下列數種：①父母都忙於工作，無暇注意對於子女的教導工作，以致中國固有社會的傳統道德觀念，在青少年的頭腦中失去其作為修養南針的功用。②一部份青少年因使用英國國語的程度似乎不夠，影響他們求職的機會。③他們在課餘或業餘的時間，無法排遣其生活，而其家庭所住的柏文則十分擁擠，無休閒活動的餘地。公衆方面，又缺少足以鼓勵青少年作有益身心活動的機構或場所，如體育場、游泳池、圖書館、公園等等設備，即有之亦不夠用，於是他們不自覺的成為游手好閒的份子。④受到附近波多黎各青年組織的威脅，迫使華裔青少年也尋求結合自衛的方法，於是間或產生雙方械鬥的不幸事故。

我們如要華裔青年的生活行為仍然保持其有良好軌範的美譽，自當針對病根，羣策羣力，予以救治。自然，首先應由良好家教做起。作父母的千萬要循循善誘，隨時指導子女們過新生活仍要以舊道德為基礎，同時策勉他們從速補習英國國語文，俾能易於求職，開闢其自力謀生的道路。中華公所及其所屬的各團體應合作互助，在華埠及附近地區，增設各種可供青年作課餘或業餘正當活動的場所。如民衆教育館之類。此種設備，非常需要。必要時當可向市政府或社會福利主管機構有所呼籲，獲致對於這些新設施予以應有的補助。（紐約華美日報）

對中國文化會議的期望（一九六八年三月九日）

今天三月九日，中國文化協會在紐約召開「中國文化會議」，其全日討論的主題是：中國文化復興運動與「無產階級文化革命」。這是一件很值得重視的事。

中國文化協會早先係設在東京，去春遷其會址於紐約市，其會員包括中西學者及關心中國文化的人士；設立的宗旨原為促進中美兩國的文化關係，並策動雙方文化交流的工作。兩年前，毛澤東的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大搞所謂「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無非企圖毀滅中國傳統的優良文化，以便推行其毒化中國人民尤其中國青少年的詭計，近更利用其散佈於美國境內的「第五縱隊」，經售所謂「毛澤東語錄」等赤色小冊，甚至譯成英文，從而麻醉好奇的美國人，用心之險惡毒，無以復加。凡屬愛好自由的知識份子，無論中國人和西方人，負有相互提携，肅清毒餌的神聖責任。故這次中國文化協會召開中國文化會議，針對着毛酋的「無產階級文化革命」，力求推廣中國文化復興運動於海外，實在應該獲得旅美僑胞的普遍讚揚。

據協會代理會長程其保博士（會長為于斌總主教，現方在臺北）稱：此次會議，盛況空前，登記參加者不下五百人，允作講演或主持討論的中西名流及學者，有梅貽寶教授、朱蘭成教授、鄭友良參議員、華格教授、克理斯伯博士、陳榮捷教授、德來格教授、伊薩克教授、以及潘朝英博士、薛光前博士

、賴建博士等。即此可見中外學人出席參與討論的踴躍。他們所要討論的題目，不出下列幾種範圍：①中國文化復興運動——其目的和任務；②所謂「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意義與發動的導因；③中國文化屢經外寇的侵入和內部的革命而能屹立不搖的力量何在；④所謂「無產階級文化革命」對於文化、政治、與社會的影響；⑤新中國文化復興運動的科學發展；⑥中國大陸上及中華民國境內的宗教地位和現勢。從這裏，我們可以體味到這次會議的主要任務，便是要讓學者儘量用自由討論的方式，評定毛共的所謂「無產階級文化革命」實係一種違反中國文化的毒計。這些年來，美國有少數自命為「中國通」的學者，立意要為毛酋辯護，竟然胡說「毛澤東思想」乃脫胎於中國傳統的文化，其意似乎要把毛酋捧上「中國文化繼承人」的寶座。我們希望這次會議的結論，能給這些人以「迎頭痛擊」，不讓惡毒無比的「毛澤東思想」在美國生根發芽！敬祝會議的成功！

書至此，恰好讀到李克斌先生所贈給我的一冊「什麼是毛澤東思想」。他在這冊新著裏，開首就論定毛澤東是「社會主義的奸臣」，「獨裁主義的暴君」。他又說毛澤東蓄意要「消滅中國傳統文化」，「改變文人意識形態」，所以整個中國大陸上，「知識份子難逃劫運」，「無知青年烙下火印」。李先生根據毛酋及中共頭目自己的話，作此斬釘截鐵的判斷，因此可知毛澤東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凡任何愛好自由的知識份子，絕對不會被毛酋洗腦而即改變其意識形態的。毛酋以「暴」制人，我們得以「仁」育人；毛澤東以一恨「奢」人，我們得以「愛」撫人。中國文化的復興運動，應植其基礎於「仁」。「愛」兩字之上，大家身體力行，保存中國文化的優點，吸收西方文化之所長，然後可望結成「新生」的燦爛果實。文化復興，不是單純的「復古」運動，而是與時俱進的「新生」運動。中西雙方的學者

大家努力吧！中國文化的「新生」對整個世界是有益的，而首先要拔除的便是「毛澤東思想」這根「毒草」！（紐約華美日報）

敬賀于斌博士升任樞機

(一九六九年五月七日)

天主教我國南京區總主教于斌博士，陞任樞機主教，日前業已在梵蒂岡教廷參加陞新的隆重典禮了。這是于樞機的光榮，也是中華民國的光榮。我們謹敬在此致其誠摯的祝賀。

盡人皆知，于樞機一向抱定愛國家同胞的宗旨，從事文教工作，不遺餘力，尤其在抗日戰爭期間，乃至戰後中共叛亂迄今，對國家的貢獻之大，非筆墨所能盡言，據一般人的測度，教宗保祿六世之所以陞于斌總主教為樞機，大概不外乎下列幾點理由：

① 中國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天主教在中國的教徒也非常之多，而自中共竊國以後，大陸上的教徒備受暴政壓迫。教宗因為田耕莘樞機於五年前逝世以後，特陞任于總主教為樞機，所以表示對於他們的懷念，意欲使他更負責推進工作，鼓舞大陸上及國內外所有教胞團結起來，跟那些「無神論者」的共產黨徒奮鬥，直至赤禍消滅而後已。

② 樞機主教，在天主教的組織上，地位是很高的。他有選舉教宗之權，也有被選舉為新教宗的機會。換句話說，他等於教宗的「儲貳」。故于斌總主教的陞任顯然要他更努力在國際方面，幫助策動各國教徒的反共工作。在教宗看來，這不祇是增進他的地位，而且是增重他應盡的義務。

③ 于斌樞機以農家子而篤信天主教，幾十年來，擇善固執，拳拳服膺，對於溝通中西文化，有豐富

的經驗。目前，又在臺灣繼續創辦原來在北平的輔仁大學。孟子說過，「鷄鳴而起，孳孳爲義者，舜之徒也」。于樞機一方面體認了中國傳統的儒家學說，一方面又發揮了天主普愛世人的精神，可說得確是一位「舜之徒也」的人物。教宗保祿六世以爲田樞機病逝以後，中國尚無樞機。而東方如日本、菲律賓、及印度都有樞機。如中國獨無，却是一種缺憾。乃選拔這樣一位熱心從事溝通中西文化的工作者，升任樞機，彌補此一缺憾，實是至當不易的應有舉措。按之于樞機以往的事功，他完全可以受之而無愧。

回溯天主教在中國傳道的歷史，自耶穌會士利瑪竇（義大利人）於一五八二年到澳門，一六〇一年到北京見了明神宗，纔發展起來。他一方面介紹西洋的科學藝術到中國來，一方面又將中國「四書」譯成拉丁文，使西方哲學家能吸收中國的儒家思想，從而影響到西洋哲人領略了中國古代的「民爲邦本」及人民可以革命（孟子：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的精義，的確開創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新局面。我們所希望於于樞機的，他繼承了利瑪竇等的工作，負起溝通中西文化的責任。以天主教人才之衆，團結之固，如果能集合學人專家，從事譯述事業，則今後他所領導而可有成就的貢獻，當可與唐代玄奘大師翻譯佛經相媲美，而爲後人所稱道了。

我們在這裏，再對於樞機致其崇高的敬意！（紐約華美日報）

我對中華文化的管窺（一九七〇年五月九日）

——第三屆中華文化會議獻詞——

美國中華文化協會五月九日在紐約舉行第三屆中國文化會議，羣賢畢至，濟濟一堂。且有南美烏拉圭孟都中山文化學院創辦人兼院長愛蘭娜教授應邀訪美，「不遠千里而來」參加。益以業餘平劇社的國劇公演，誠屬盛事。惜我病足，不克躬與其盛，率書數行，藉以獻曝。倘荷進而教之，不勝幸甚。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歷代相傳，與時俱進。其內涵決非短文所能盡。特就個人的管窺蠡測，略舉其要義如左：

①天人合一的「人本主義」。中華文化的主流，當然是儒家的學說。孔子是上古學術思想的集大成者，且曾問禮於老聃，故道家學說亦可包含於其中。老子教人要法天，法自然，旨在「無爲而無不爲」。孔子則引而申之，以爲「天何言哉！四時行也，百物生也。天何言哉！」教人要效法天之不言而教，即所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他是要將天道與人道貫通起來，而特別注重以人爲本之修養功夫。此即「大學」一書中所謂「一是皆以修身爲本」之要旨所在。中華文化之重點，在於精研「人與人之關係」，而闡發其如何和平相處之道。故儒道兩家之學說，雖非宗教，而實具有宗教之精神。一切既以人爲本，自然淡泊寧靜，不爲物蔽，與唯物主義的思想，格格不相入。共魯毛澤東所以要喊出「文化大革命」的口號，妄想剷除中華文化的老根，其故即在此；而共產黨在中國之所以終必失敗，其故亦即在

此。

②兼容並蓄的「時中主義」。中華人文既以天人合一論爲基本要義，故向來主張對各派學說「兼容並蓄」，期以逐漸演化，去蕪存菁，而自然合流。所謂「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以此之故，外來的佛教、景教（基督教）、回教等等，傳入中國後，並不發生類似在歐洲出現宗教戰爭的殘酷事實。尤其可貴的，孔子倡導「時中」。他不但把古聖心傳的「允執厥中」，認爲做人處世的守則，而且加上「時」字，以求適合當前的時代，所以說「君子而時中」。惟其兼容並蓄，故能成其「大」；惟其時中，故能成其「久」。這是中華文化能有「可大可久」的收穫的總因素。蔣總統在五四文藝節特勗勉文藝界人士要「熔鑄民族風格，表現時代精神」，更可見文化復興運動並非意味着狹義的復古。

③平等自由的「和平主義」，若干醉心崇洋的「全盤西化」論者，不明白歷史上利用「尊孔」以圖鞏固王權的專制帝王，及若干腐儒，其所作所爲原與孔孟學說並不相干，而唱出「打倒孔家店」的調子，把一切專制毒素都歸咎於中國固有的文化。殊不知古代最提倡平等自由的應該是孔孟學說。孔門的倫理學說，最重「絜矩之道」。所謂君（領袖）臣（部屬）、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的五倫，都是對等的。孟子曾說：「聞誅一夫弑矣，未聞弑君也」；又說「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孔孟所揭櫫的「仁義」二字，在易經裏就有「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是兩人平等相處所應遵行的守則；義是個人約束自己如何做合理之事而不侵犯他人自由的守則。

國父孫中山先生爲現代中外思想學說的集大成者。故三民主義的文化，是現代中華文化的結晶。希望大家共同致力於中華文化的復興運動，必能完成建國大業。（紐約華美日報）

讀蔣經國院長的談話（一九七二年六月七日）

自蔣總統五月二十日就行憲後第五任總統後，中華民國已躍入一個開創新局的時代。迨蔣經國先生奉命爲行政院長，宣誓就職，海內外更一致寄以殷切的期望，無不認爲此乃我國家剝極而復的新機運之開始。他所選擇的新閣人選，一般人認爲人才鼎盛，確有中興復國的氣象，當不負人民之所期。尤其他於五月廿六日所發表的談話，誓必以身許國，誠懇親切，頗獲輿論的讚揚。今試一述記者個人讀後的感想：

●蔣院長認識時代的重要，及其所負責任的艱巨。他說：「現在正是我們爲民族自由，國家復興，與共匪決存亡，爭生死的重要關頭。此後所將遭遇到的，絕不是風平浪靜的行程，而必是驚濤駭浪的衝擊。……深信只要政府和民衆同舟一命，患難與共，萬衆一心，肝膽相照，服從總統的領導，貫徹反共的國策，堅持復國的目標，我們就必能克服一切困難，衝破一切危險，獲致反共復國的最後勝利。」在這裏，我要特別指出的，便是他強調「政府和民衆同舟一命，患難與共」。的確，政府一切行動，不能不求其和民衆的共同協力。這是爭取最後勝利的基本要點。中樞負責當局，如能始終抱持重視民衆的態度，則掌握民心的歸向，卽等於掌握勝利的左券。

○蔣院長表示他願「腳踏實地，埋頭苦幹」，誓必排除萬難，盡其職責，「爲維護中華民國的尊嚴

，消滅叛逆匪共的暴政，實現三民主義理想，而犧牲奮鬥」。他說：「此時此地，我們如再不盡心盡力，做好自己應作的工作，試問將再等待何時，亦且將置身何地？」他願以「守法紀，負責任，推進廉能政治，來和全體行政人員，互相勉勵，共同踐履。」這一段話，他已說出他的懷抱，及其所欲必達的目的，不在徒托空言，而在力行。古人有云：「爲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蔣氏固深知之。

⑤蔣院長在上述前提之下，懇切希望大家讓他度德量力，少說些話，也讓他面對現象，多做些事。他更切盼大家「經常指出我的缺點，糾正我的錯誤。如果對行政興革有任何建議，也請毫無保留地提供出來。」他因爲深修「只有爲國家爲民衆做事的政府，才能得到民衆的支持，亦只有得到民衆支持的政府，才能發揮充份的力量。」他的確在盼望他所主持的新內閣能與民衆打成一片，俾可發揮偉大的動力，完成總統所昭示的「國民革命再北伐，中華民國再統一」的時代使命。

讀了蔣院長這篇談話，我們深感他已瞭解而且深信政府的基礎是建立在人民的信仰上。這是民主政治的精髓。政府中樞當局既有此寶貴的認識，我們更期望其領導各級政府都能廣開言路，不再阻塞民意上達，則整個自由中國必將有一番嶄新的氣象。易經有云：「窮則變，變則通」。今天我國家創新的局面，正是走上窮而須變的階段，「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開言路，即是上下交通的關鍵，不但可以促進廉能政治的實現，而且爲一切行政改革新的酵母。新氣象的來源繫乎此。（紐約華美日

從兩方面看廣開言路（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二日）

日前我寫了一篇「讀蔣經國院長的談話」，因為很受感動，最後說及希望他廣開言路，當更能促進新機運的開展。由於蔣院長表示極盼多聽取全國同胞的意見，所以我提及這一個建議，希望他能力行。現在我想從兩方面說暢開言路的好處。

本來中國歷史上政治修明的時代，大抵都是政府當局願意聽取人民意見的時代。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就是勤求民隱的表現。古代政府派人到各地採「詩」，也是要知道人民所好所惡的是什麼，以供施政的參考。所謂「詩亡而後春秋作」，不過指出人民的一心鬱「不可得而知以後，乃有史官的紀錄，作為事後褒貶的準繩。孟子是儒家中最重視民意的人。他說：『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焉。』從蔣院長的政治經驗，及其施政的談話，我們可以深信他一貫認識清楚，政府的功能即在為民衆服務，故無時無地不關心到人民之好惡。他之所以亟盼與民衆打成一片，就是要使人民所期望於政府之事，次第見之於事實。要真正做到這一點，自非廣開言路不可。

現代的民主政治，在制度上有各級的議會。我中央政府有立法院，監察院及國民大會；在地方政府則有省市縣的議會，都是代表民意的場所，政府當局自可向他們聽取人民的意見。然而還是不夠，不能

不直接求之於來自人民的陳述。輿論之所以被重視者，其故在此。美國建國先賢傑佛遜曾說，其與無報紙，不如無議會，其故在此。這不是說報紙的論調全無謬誤，而是要讓他們自己負責說出其所要說的話，不致變成「腹誹」。如是，政府可以表示有容納批評的雅量，人民亦可有率直傾吐意見的自由，而自能克制其放言高論的流弊。於是政府與人民雙方的意見可以溝通而無隔閡，政府的受益，不言而喻。

其在人民方面，則他們的「心聲」得以發洩，必有暢快之感，即使對政府有所抗議，亦不致張脈憤興，而化為暴戾之氣。況中國歷史上高明之士，往往有其特立獨行的氣節，所謂「高尚其志，不事王侯」的作風。政府當局能讓他們有一條可以在野，本着良心說老實話的自由之路，他們會自覺其仍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尊嚴，而並不喪失。今日此種以「讀書人」自負的智識份子，在國內海外，相信仍然不少。政府能對這些智識份子，多保全一個，而養成其自尊心，則社會上便可減少一個因偏激而走上的歧途的「讀書種子」。這對於國家、社會、及個人，都是好的。同時，我也要勸目前一些憤激的智識份子，切不可因一時對某些現象或有不滿，而即消極厭世，或拋棄其所應負「建立民主、開創科學」的責任，蔑視中國的傳統文化，以為業已腐朽而不可救藥，置復興中國文化之責任於不顧。為他們計，為中國計，他們也該一面乘祖國政府廣開言路的機會，把認為切要的事，向政府作扼要的建議，一面致力於復興中國文化的工作，庶幾不辜負這一個大時代所賦予他們的使命。蔣院長既已表示輿論對他讚多許少，深感惶恐不安，我們更不能辜負他勤求民隱的苦心。（紐約華美日報）

新民國開始重建（一九五〇年元旦）

今年是一九五〇年，也是中華民國的三十九年。一九五〇年是二十世紀前後半的蛻變年代，三十九年也該是中華民國在多難中重建的年代。

中華民國從辛亥革命初建以還，三十八年來幾無時不在多災多難中過的。初有袁世凱盜國，溥儀復辟，繼有北洋軍閥竊柄，內戰頻仍。民國十五年國民革命軍北伐，中途即有日本侵華的濟南慘案。迨統一全國，正欲從事建設，二十年（一九三一）九一八即有瀋陽事變，而滿洲偽國隨之潛號割據。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七蘆溝橋事變既起，日本發動全面侵略，中華民國遂在中國國民黨領袖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堅決抗戰至八年之久，含辛茹苦，卒賴軍民團結，盟邦援助，而獲得最後的勝利。不幸復員以後，國民政府與中共的和平協商，終於絕望，干戈遍地，民不聊生，釀成今日赤色竹幕籠罩祖國原野的景象。民國的命運，不絕如縷。要說中華民國的災難，恐怕沒有更大於今天所遭受的。

然而，前人說得好，「多難興邦」。只要遭逢着災難的國民與政府能够懲前毖後，革故鼎新，以克服這荆棘滿途的難關，則復興大業，依然可望。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國民黨同志正視現實，檢討錯誤之餘，倘能從頭做起，重建新邦，則今日的黑暗與災厄，未始不是光明與幸福的前奏。老子著的道德經裏說過：「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今天國民黨的失敗，中華民國

的災禍，原不是今天所造成，而是抗戰勝利前後數年間若干用人行政不符理想所招致。加以國際風雲，變化劇烈，外在的力量影響於中國。抗戰八年，民生凋敝，流毒及於政治，遂釀成今日的滔天大禍。但是，假使我們一切愛好民主自由的中國人民，真能大澈大悟，改絃易轍，在三民主義的號召下團結起來，而主持政務的國民黨當局，鑒於以往的得失利弊，也都能從善如流，虛己容物，完全以衛國保民為職志，則區區之愚，敢斷言「塞翁失馬，安知非福」。這險惡局勢的今天或者竟是新民國重建的最好機會呢。故今天的國民黨同志，與其只是詆責中共，實不如切實改造自己之為愈。因為每人改造自己，正是重建民國的起點。

中共在延安時期，利用其宣傳政策，使中外一部分人士誤信其為農村土地改革主義者而非真正的共產黨，誤信其領袖毛澤東可以做中國的鐵托。於是大家對於中共都根據一種錯覺而懷抱一種幻想。加以國民政府在勝利復員以後的三四年間，容有若干不符人望的措施和少數可以授人口實的腐敗官僚，遂為中共乘隙而入，形成今日之局。然而今天中共表面上的成功，也未始不是牠實際上失敗的開始。因為牠的政治顯然是共產專政的極權政制，完全受莫斯科太上政府的控制，與各國共產黨並無二致。而毛澤東的宣稱欲使中國人民與蘇聯站在一起來作戰，更使全世界人士，明瞭他決不是鐵托第二。（最近毛已赴莫斯科請示，更可證明。）加以中共在其轄區內的橫徵暴斂，迫使人民生活痛苦更深，令他們本來仰望着「後來其蘇」的幻想完全落空。於是昔日之抱怨國民黨者，今竟逐漸轉變為懷恨共產黨，而寄其希望於國軍之早日反攻。這可見重建新民國的歷史使命，依然將負荷在中國國民黨同志和一般愛好民主自由的國民的肩頭。

假使中共只是信仰共產主義或所謂新民主主義的一個政黨，並不仰承蘇聯或共產國際情報局之鼻息，而又確能予全國人民以衣食飽暖，自由幸福的平等待遇，則一功成不必自我，國民黨原可讓賢，退而在野，使新民國在中共主持下建設起來。無如中共政府是先天性的國際共產政權之一環，故必割斷中華民國之歷史以爲快，則中華民國重建的責任，國民黨的開明同志和一切愛好民主自由的中國國民，自必當仁不讓，義不容辭了。

或者以爲今天中共幾已奄有中國本土，國府僅偏處臺灣瓊崖兩島及川康一隅，欲圖光復失土，重建民國，談何容易。其實，老子早已說過：「難易相成」。事之難易，不過程度比較的不同，原無絕對的界限。當年國父革命和蔣委員長率師北伐，其所憑藉，何嘗較勝於今日，而何以終底於成？況當年中共伏處陝北一隅，其窮蹙情況，以視今日的國民政府，更遠過之，又何以數年而後，居然稱霸中原？此又可見有志則難者亦易，無志則易者亦難。國府既遷臺灣，人才自可集中。苟能慎用賢能，集中精力，革新庶政，收拾人心，節省國帑，簡鍊事實，則近悅遠來，民心向往，如水就下，莫之能禦。內力既固，外援自至，剝極而復，會有其時，重建民國，易如反掌。老子說，「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今天中共一時雖能勝人，尙難自勝（因爲牠不能自外於共產國際）。

假使國民黨同志，激上激下，能够「自勝」，（自除其弱點，自泯其分裂，自改其錯誤，自重其使命，均自勝之道），而絕不自暴自棄，則自勝者強，終可達成重建新民國的使命。

上面所說中華民國的重建，其重點自在臺灣。領導人物當非蔣總裁莫屬。至其影響不但爲中國四萬萬人民自由幸福之所繫，而且是亞洲各國乃至全世界人類安危禍福之所關。須知倘無中國國民黨二十餘

年來之堅決反共，則共產紅潮早已遍及全亞。而今後倘無國民黨之反共堡壘，始終建築於中國，則中共控制全中國的結果，菲律賓、印度、朝鮮、安南、緬甸、暹羅、荷印、馬來亞等地，甚至盟軍佔領的日本，遲早亦將為共產紅潮所席捲而去。太平洋東岸的大國亦未必可以安枕。也許有人以為中國事已無可為，退而求其次，只求中共之不越過國界為綏靖妥協之條件，這無異於英相張伯倫在慕尼黑對希特勒所演之故事，其結果不但徒成夢想，且將自食其果。故中華民國之重建，不但為中國國民黨同志以及中國國民之職責，亦應為全世界民主國家所普遍關心，而予以道義的與實質的援助。（三藩市國民日報及加拿大維多利亞新民國報）

世界大局與海外僑胞的責任（一九五〇年二月五日）

國父孫中山先生說過：「華僑爲革命之母」華僑是可以當之而無愧的。一則因推翻滿清的中國同盟會是在海外成立。首先加盟的是一批熱心愛國的僑胞。再則因爲發動祖國革命的經費都首先從海外僑胞踴躍輸將而來。今天祖國又臨到空前的危難。而這種危難又是世界性的。海外僑胞不忍見紅潮泛濫。祖國沉淪。必能發揮當年推翻滿清，贊助北伐，以及擁護抗日同樣熱烈的精神，羣策羣力，挽救祖國的危亡。

今年元旦筆者在新民國報新年增刊上發表過一篇論文。說新民國正待我們努力開始重建。而這重建的工作，不但是中國四萬萬人民自由幸福之所繫，並且是亞洲各國乃至全世界人類安危禍福之所關。同時指出，如果不能固守臺灣反共的堡壘，「則中共控制全中國的結果，菲律賓、印度、朝鮮、安南、緬甸、暹羅、馬來亞等地，甚至盟軍佔領的日本，遲早亦將爲共產紅潮所席捲而去。太平洋東岸的大國，亦未必可以安枕」。現在又隔了一個月，這篇論文裏的話，已經逐漸有形象顯露出來。倘使我們和各民族國家的朝野上下，還不趕快覺醒，急起直追，共同携手，挽回大局，恐有噬臍無及的一天。

在中共去夏渡江南進，國府遷往廣州的時候，美國國務卿艾奇遜有幾句話，暗示美國可以不管中國的事，只要中共軍隊不越過國界。當時他的意思，彷彿以爲中國已無可爲。美國也不願再援助國府。但

美國可以鼓勵東南亞許多國家，在中國國境之外，築起一道防共的堤防來，阻遏紅潮泛濫。於是有印度總理尼赫魯訪問美加之行。有英屬各邦的哥倫布會議。有美國遠東外交使節將在曼谷舉行的會議。他們似乎在想像，不妨丟開了中國，另在其外圍阻擋共黨勢力的擴展。以爲「亡羊補牢，猶未晚也」。甚而至於有些「天真得太可愛」的國家，如印度和英國之類，以爲東方也許可再出現一個狄托。故不妨一面防共，一面承認中共與毛澤東打交道，求其苟安一時。殊不知那些想法，都完全錯了。

這一個半月，自毛澤東十二月十六日到莫斯科，周恩來一月二十日繼續前往，與蘇聯史太林密商以來，世界局勢天天在急變之中。美國杜魯門總統和艾其遜國務卿雖不主張軍事援助臺灣的國府，但已擬議加強經濟援助的辦法。而同時艾其遜更宣布了獲得的確證「內幕文件」證明蘇聯正在步步進迫，陰謀囊括外蒙古、東北九省（即俗稱滿洲）、內蒙三省、和新疆等地。

換言之，即將攫奪中國的北部而去。其實何止於此？而這些事，也何必等到今天才如夢初醒的感覺着？史毛密商的内容雖不可知，但據一鱗半爪所得的報道，由於未來的賣國條約，毛澤東必將整個中國土地奉獻於蘇聯主子的掌握而聽史太林的支配。不但此也，一旦世界再有戰事，毛澤東必更強令我國上百千萬的青年同胞，爲其外國太上皇流血而做炮灰。他所換得的條件，不外：一、由蘇聯幫助中共進攻臺灣海南。希望拔去共黨在亞洲擴大革命的最大障礙。二、由蘇聯鼓勵和幫助中共，再向東南亞各地如安南、緬甸、暹羅、印度、巴基斯坦、香港、星嘉坡、馬來亞，以及印度尼西亞等處積極發展，以完成共產黨世界革命在遠東方面的一環。目前中共當局和蘇聯政府承認安南胡志明的共產政府而反對法國所扶持的保大政府。以及中共的痛詆暹羅政府，新疆共軍的陳兵於巴基斯坦和印度的邊境，廣西共軍的滲

入安南北部暗助胡志明的共軍等等一連串的行爲，都是中共受到蘇聯鼓勵，向東南亞發展躍躍欲試的象徵。也就是中國北部大陸實際已允割讓於蘇聯的暗示。艾期遜從前希望中共的軍隊以中國國界爲止境的想法，當可逐漸證明其爲無知的幻想了。

恰當此時，艾期遜又爲了辯護援助臺灣的價值問題而發表聲明。只說美國在太平洋方面自有其由日本而沖繩島而菲律賓的一條堅固防線。連南韓都沒有提到。臺灣更不必說。而安南、緬甸、暹羅、印度、巴基斯坦、香港、星嘉坡、馬來亞、以及印度尼西亞等等，也置之於不論不議之列。似乎無形中取消了他從前對中共所發不容許超越國界的警告。這彷彿艾期遜對共產黨又作一步大大的退讓。在有意無意間暗示了蘇聯和中共。上述一條防線以西的地方，美國都可認爲無關痛癢。難怪蘇聯和中共自然格外趾高氣揚。躍躍欲試。反更進而駁斥艾其遜。日本並不是美國的領土，何以能強劃爲美國的國防線。由此說來，民主國家在遠東防共工作。似乎因當局的認識不足，或挾有偏見與意氣。從而其努力不能與在西歐方面相比。到今天，太平洋防共聯盟或遠東防共聯盟，或東南亞防共聯盟等等，還是「只聽樓梯响，不見人下來」。就是由於英美等國或者懷有躲避心理，或者謬採綏靖政策所形成。

那麼。這個世界是否將演變而爲共產黨紅色鐵幕所籠罩的世界呢？我却又敢斷言，必不如此。不但如此，而且紅色鐵幕最後必爲愛好自由的人類所打破。因爲天下事，決不能只就一時一地的局部情形來看。必須考察其前因後果，然後可以推斷世局的演變。世界不論怎樣演變，歷史自有一條定例：民主自由無不勝，極權專制無不敗。這正符合中國人一句老話：「得道者多助」。希特勒的德國和東條軍閥所控制的日本，在二次大戰初期，何嘗不飛揚跋扈，不可一世。然其結束亦如拿破倫的一敗塗地，而慘

尤過之。可知天演公例，人羣進化，自有其不可移易的路線。海外僑胞不論曾否加盟於黨而其曾釀資出力，貢獻革命，則因己有口皆碑。今天從家鄉來的消息，從祖國來的報告，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奴役人民，剝削人民，宰割人民的殘暴面目。而其出賣祖國以投入蘇聯的魔掌，更已彰明較著。則無論為救家鄉，為救祖國，為救人類，都只有更加服膺三民主義，團結一致，為祖國的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而奮鬥到底。不問環境如何險惡，阻力如何頑強，不達目的，奮鬥決不中止。

目前祖國遷到臺灣的國民政府。已到了「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地位了，我們看到臺灣同胞踴躍從軍的壯士，看到海陸空士氣的旺盛，看到一般民氣的奮發，看到菲律賓僑胞慰勞團的跋涉千里，熱烈鼓勵，使我們雖在嚴寒大雪的隆冬季節，也為之熱血沸騰。

相信在這種內外一致，上下一心的力量支持之下，臺灣縱無外援，也可以安然確保的。只要這個臺灣寶島，在國府軍政配合，文武協力，政府與人民打成一片的反共堡壘屹然矗立的期間，就可阻遏中共對於東南亞悍然無忌的野心，更進而削弱其力量。如果我們在臺灣有半年一載三四回合的英勇戰績，使中共渡海攻臺的妄想趨於幻滅，則不但祖國大陸原野上的反共游擊隊更會得到鼓勵而集結，而壯大，而準備大規模的反攻。並且可使各國朝野刮目相看，重復認識中國國民黨員和其他共同奮鬥的各黨派人士乃至自由中國的廣大民衆，反共意志之堅強，不容他們輕視，而紛紛自動地予以源源不斷的援助。到那時，或且更因中共與蘇聯向東南亞各國的無理挑釁，而迫使這些國家與歐美民主國家不能不重復與反共的自由中國加緊團結，以抵禦此危害世界和平剝奪人民自由的人類公敵。大家切莫以為這是我的奢望，事實上未必可能。其實，只要回想當年我國抗日戰爭最艱難的時候，英國竟封鎖滇緬路，後來日本打

了英國·英國又重開滇緬路這一段往事，就可知道這些專打算盤的市儈國家，今天這樣，明天那樣，是不算一回事的。我們不必理會他們的舉動，而一時沮喪，又一時高興。我們只須埋頭苦幹，以全心全力來打這一場反共抗暴的戰爭。最後勝利終必屬於我們。

海外僑胞比較國內同胞與友邦人士接觸機會為多。其中更有不少是生長海外的友邦公民，對於世界大局自然看得格外清楚。雖然民主國家都在想避免戰爭，但鑒於蘇聯共產集團的勢力膨脹，漫無止境，尤其共黨勢力深入亞洲，威脅世界和平的危機，一天一天的加增，因而也急起直追的努力備戰。最近美國杜魯門總統宣佈決定製造輕氣彈或超原子彈，就是一個顯明的實證。在這樣反共產反極權反侵略的戰爭氣氛中，海外僑胞應負的責任，不外兩點：

一、對祖國：用種種方法，鼓勵自由中國的政府與人民，繼續與出賣祖國的共產黨作殊死戰。所謂種種方法，就是說，不論是精神的、物質的、體力的、財力的，只要對臺灣的國民政府和一切奮鬥的軍民，以及祖國淪陷區裏力爭自由的人民，予以熱烈同情的支援，都是對民主的貢獻、對自由的貢獻、對祖國的貢獻、對世界的貢獻。

二、對友邦：用種種方法，使友邦的政府和人民，明瞭自由中國反共的奮鬥有關世界安危如何重大，解釋他們被欺瞞的誤會，改變他們只打小算盤的眼光，延緩他們或打消他們承認中共政權這一類落井下石以求苟安的行動。更進而積極援助自由中國，繼續和他們共同致力於防堵太平洋和遠東的赤禍。

上面所說的兩點，目前菲律賓僑胞都正在努力。他們一方面推派代表，組織慰勞團，到臺灣、金門、島以及舟山羣島等反共戰爭基地上，慰勞我們忠勇的海陸空軍將士。一方面在馬尼拉和菲島各地，展開

熱烈的反對英國承認中共的運動，讓英國這類「利令智昏」而利未必能得的市儉國家，認識中國真正民意之所在。而痛悔他承認蘇聯傀儡的中共政權，實無異於與中國人民為敵。菲律賓僑胞的智慧與勇敢，在反共抗暴的革命戰爭中，是值得欽佩的。我相信旅美旅加的僑胞，以及南洋各國之僑胞，回顧以往貢獻革命的光榮歷史，再然想着家鄉親友同胞，遭受中共橫征暴斂清算屠殺的慘狀，一定奮起而擔當重大的任務，不讓菲律賓僑胞專美於前。英語有句成語：「需要時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我們現在也可以說：「需要時的同志。才是真正的同志。」（加拿大維多利亞新民國報及三藩市國民日報）

新政局與新政綱（一九五〇年三月三日）

——對蔣總統復行視事後的期望——

中華民國蔣總統，因李代總統飛美療疾，遲不歸國，而國事緊急如此，不可一日無人主持，乃應各方的迫切請求，已於三月一日宣告重復視事。據新民國報二月二十八日香港專電，謂上海工商界人士聞此消息，大感振奮，希望政治、軍事、外交、財經各方面能有全面徹底的革新；並應有新政綱與新作風。筆者在上海有數十年的工作歷史，深知上海市民對國事的一般心理。目前雖在國外旅行，依然懷念在苦難中的上海人民，看見這條電訊，感想萬千，不能自己。因將年來蘊蓄着的一些雜感，乘此寫供政府當局與海內外同胞的參考。

一、蔣總統去年因有好些人主張與中共和談而引退。（注意：並非辭職）。此番因和談早已失敗，戰事又至最後關頭，乃重復視事，宣稱誓必光復大陸，消弭赤禍而後已。這可以說中國的政局，又翻開了一新頁。我們盼望這一新頁，的確將記載着中國政局一新耳目的事實。中國反抗暴的自衛戰爭，為民族爭自由，為國家爭獨立的自衛戰爭，經過兩三年來的亦和亦戰，既敗且退的波濤，紅潮已經泛濫了中國大陸。最近毛澤東周恩來之流，更不感將四萬萬五千萬黃帝子孫的生命，奉獻於蘇聯而聽史太林的主宰。自由中國的民主堡壘，只剩下了臺灣為司令臺的基地。真如昔人所謂「山窮水盡疑無路」了。然而「柳暗花明又一村」，新局面的來臨，無論國內與國際，都是遲早必至的情勢。上海人民，認識了中

共的真面目，受了慘痛的教訓以後，一定衷誠地希望蔣總統此次重復視事，將以嶄新的作風，蕩滌往日政府「舊染之污」，開創一個與民更始的新政局，來迎接那不久行將湧現的反抗獨裁權權的國際新局面。

二、或以爲蔣總統既宣告引退於前，不啻已退爲平民。此次未經選舉，重復視事，疑其未盡合法。殊不知中華民國憲法上根本沒有總統「辭職」的明文規定。依照憲法：一。總統如「缺位」，則由副總統繼任總統，至原任期屆滿之時爲止。二、其次，總統「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總統代行其職權。去年一月二十一日蔣總統的引退以及李副總統的代行總統職權，就是根據上述第二點辦理。故總統非「辭職」，更非「缺位」。在李副總統代行總統職務期間，亦只能正其名曰「代總統」。決不能與美國約翰孫總統繼林肯總統之任，杜魯門總統繼羅斯福總統之任，相提並論。況蔣總統之引退，乃「因故不能視事」。此事故即爲與中共要和談之故。後來和談失敗，中共揮兵渡江，重啓戰端，這「因故」的「故」早已消滅。亦即蔣總統早無「不能視事」之必要了。何況現在代行職權的李代總統又因療疾滯留美國，是則「代行」總統職權者已感不能代行，而總統本人反仍與國民黨政府同在臺灣，那麼親自重復視事，不必再由副總統代行職權，乃順理成章之事。揆諸憲法，毫未抵觸。若謂未經選舉，復行職權，於法不合，則去年引退，未經罷免，更何能自由辭去總統名義？故平心而論，去年蔣總統不用辭職而用「引退」，就是因爲表示憲法上不許總統辭職的。職既未辭，僅是不能視事而由副總統代行職權罷了。則一旦可以視事時，就不必再需交副總統代行職權，何必更經一度選舉？又況去年蔣總統之引退與李副總統之代行，不過經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會的通過，李副總統也未嘗認爲非法而拒不「代行」。則今年因

國民黨中央常會的決議與各民意機關代表的敦促，蔣總統宣告復行視事，更何能說是與憲法不合呢？

三、今日中國之大患，乃在中共投入蘇聯的懷抱，效法其極權獨裁的手法，箝制人民的口舌，剝奪人民的自由，虐殺人民的生命。故凡為自由中國而奮鬥者，應大澈大悟，團結一致，在國民政府領導之下，與共產極權的暴力，作生死存亡的鬭爭。而對於個人的職務名位，應不再有所計較。何況李副總統素以國事為重，政躬康復，自必仍回祖國，以副總統的責望，翊贊蔣總統，輔理國政，收拾大局，一掃兩年以來「人和」不足之痼疾。豈不致如外傳所謂仍要行使總統職權，引起政爭。昔宋人議論未定而金兵渡河。去年國民政府之對中共，確亦蹈此覆轍。人事則派系相爭。議論則和戰相扼。疆場則將領彼此不救。社會則官民上下不和。以如此相傾相軋之局，受中共挑撥離間之毒，疲敝應戰，如何能望其不一敗塗地？然而「失敗為成功之母」。受此空前失敗的大教訓，理當覺悟懺悔，回頭是岸，方有「新」機。故塞翁失馬，安知非福？今天國府當局，滿朝文武，眼看大陸沉淪，人民塗炭，大家都要抱頭痛哭，歎血為盟。乘祖遜開雞起舞的精神，具魯連蹈海而死的氣魄，則風聲所至，頑廉儒立，軍威所及，箠食壺漿。不但臺灣基地可以永保，而中國大陸亦可早日重見光明。上海人民所切望於蔣總統與李副總統所領導之國民政府者，殆必如此。李副總統在國外療疾，一言一動，尤須慎重，毋為親者所痛仇者所快！

四、如果有了一新耳目的新作風，吸收了忠貞耿介氣節凜然的新人才，然後可以談到新政綱。政綱是死的，執行政綱的纔是活的。有新政綱而沒有新人才去認真負責實施，則皇皇政綱，豈非仍等紙上談兵？譬如要建設一個廉潔的政府，偏偏用了一批貪官污吏，豈非南轅北轍？故今日要中國得救，新政綱固然重要，可以使人民有新希望，但新人才尤其重要。美國羅斯福總統假使不能發掘許多新人才，他就

很難推行他的「新政」。英國工黨假使沒有一批新的幹部人才，則亞德禮首相在職後四年半中也不能順利地實施他的社會福利政策。目前中國大局，無論國內國外，大家都熱烈地期望着當局能徹底革新庶政。蔣總統視事文告也說「補過去之缺失，策未來之成效」。當然，在這個迫切的要求下，真正有志節有抱負的新人才，應該可以發掘出來，寄以重任。一變往日「土崩瓦解」，「魚爛物腐」的惡劣氣象，而樹立循名覈實，信賞必罰的新作風。

五、如果有了新作風，那末我們所深切期待的新政綱，該是些甚麼呢？首先須知：在重建三民主義，「民有」「民治」「民享」的中華民國之大原則下，我們應斷然採取符合世界先進民主國家目前所走的「中間偏左」路線。（美國自羅斯福總統推行新政以來的路線是如此。英國自工黨執政以來的路線也是如此）。我們所以要反共，是反對中共的極權獨裁；反對中共的採取極端政策；反對中共的剝奪人民自由；反對中共的依附蘇聯出賣國家。至於中共所號召的扶植農工、改革土地、裁抑豪強、禁止奢侈等等，不管他是真是假，我們不能因為曾經中共說過，我們就不去做。更不能因為中共極左，我們就偏要向右。相反的，却應該格外比中共做得好，做得通，做得合理，做得有成效。然後可以在一面軍事反攻，一面政治競賽之下，收拾過去已失的人心，達成共同努力的任務。姑就筆者個人的管見，將中國目前最急切需要的新政綱，寫在下面，請教於海內外賢達。

甲、軍事——革新軍政，爭取反共勝利。一、絕對提高官兵待遇。二、嚴格核實糧餉。三、刷新軍事訓練。四、注重政治教育。五、厲行提拔人才。六、嚴懲貪污瀆職。七、杜絕干涉民政。八、嚴禁兼營商業。九、鞏固國軍基地。十、佔領大陸據點。

乙、外交——維護主權，保障國家獨立。一、國家主權的獨立行使與領土的完整，必須全力維護，不容任何外國侵犯。二、擁護主持正義促進和平的聯合國，並推動遠東有關各國防共盟約的早日締結，使侵略國家知所戒懼。三、絕對否認中共偽府與蘇聯所訂賣國條約為有效。同時廢棄民國卅四年八月所訂的中蘇同盟友好條約，並反對一切損害國家主權與人民利益的任何條約。四、與平等待我之各友邦，維持睦鄰邦交，發展互惠貿易。五、對於承認中共偽政權之國家，重行考慮將來所應採取之國策。六、在合理的條件下，促成對日和約的提早簽訂，俾民主的日本有機會參加聯合國，並共同防止共產勢力在東亞之蔓延。

丙、政治——崇尚法治，確保人民自由。一、在法律之下，國民一律平等，絕無性別、種族、階級、宗教、地域、職業、黨派等等區別。權利義務，絕對均等。二、尊重司法獨立。任何人或機關不得干預審判。三、憲法上所賦予人民的一切基本權利，包括身體自由、居住自由、通信自由、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等等，絕對維護。四、任何政黨或個人如用和平方式，經合法程序，對政府某種政策或設施表示異議時，政府應尊重其自由，傾聽其理由。五、簡化政府一切機構。同時提高公務人員待遇，俾能安心供職。六、充分培養地方自治能力，中央不得任意侵越各省市縣的地方權限。七、對西藏新疆內蒙東北及臺灣各省有特殊情形的地區，酌許予以高度自治的權力。

丁、經濟——增加生產。達成公平享受。一、厲行農村土地改革及佃農減租。並協助佃農獲得耕地，使成自耕農，以達到平均地權之目的。二、發動移民墾荒，並實施農業改良。三、劃定工礦企業及金融事業公營與民營的範圍。其由政府公營者，應以大規模之重工業、水電交通事業、及其他有全國一致

性質的工礦企業與金融事業爲主，以收發達國家資本之效。但凡非列舉只許公營之企業，均應准許民營。政府亦應予以鼓勵與保護。四、無論公營民營，一切企業均應同等納稅，並遵守一切勞工法規。五、各種勞工法規，應由全國性的工商團體與勞工團體，各推代表，依法會議，共同擬訂草案，再由政府採納，提交立法機關通過，成爲法案。俾能雙方兼顧，勞資協調，勞工可得保障，生產不受阻碍。六、在合法經營的範圍內，一切企業的財團法人或個人的私有財產，均保障其所有權。七、賦稅制度，應注重於累進的直接稅（包括遺產稅所得稅等），及奢侈品的消費稅，務使賦稅負擔依據財富能力而遞增，以收節制私人資本之效。八、在法律範圍內及不妨害國家主權的原則下，絕對歡迎外國資本、技術、及管理人才，參加中國經濟建設事業。不論獨營或合作經營，均可依法獲得許可。九、在政府財力及社會富力所許可範圍內，逐漸推行社會福利政策，辦理各種保險，保障人民的生存與生活。十、斟酌地方情形，用合理的方法，處理糧食及主要日用品的物價及房租，使人民有比較安定的生活。

戊、文化——普及教育。推廣文化建設。一、普及國民教育。二、推廣社會教育。掃除成年文盲。三、推廣廣播事業及教育電影。四、鼓勵自由講學。並敦聘民主國家學者至中國講學。五、酌派專家學者至海外，向友邦及華僑，宣揚中國文化。六、保護一切足以促進道德的宗教。並尊重其信仰自由。七、獎勵一切科學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如教育家、科學家、藝術家、著作家、醫師、工程師、新聞記者等各種自由職業份子，充份予以自由與便利。（加拿大維多利亞新民國報及三藩市漢民日報）

中國反共戰爭的轉機（一九五〇年三月廿八日）

——對蔣總統與陳院長的期望並敬告同胞——

中國的反共戰爭，現在已有了轉機。這轉機就是轉敗為勝的曙光。此一曙光，從何而來？就從蔣總統復行視事與陳將軍的奉命組閣而來。

何以故？其理由有四：

（一）政治的。國府從前的挫敗，與其說是由於軍事，毋寧說是種因於政治。一則政府對中共的態度，舉棋不定，邊打邊談，忽和忽戰，何能望其士有鬪志？再則貪污腐敗，積垢未除，共黨乘機鼓煽，人心逐漸離散，更何能望其民無二心？但現在則不然了。蔣總統是認識中共最清，而又最早指出中共勢必賣國的人。他此次復行視事，更說「補過去之缺失，策未來之成效」，則其堅決領導反共抗俄，毫無疑義。故以往第一類的病根必可拔除。陳院長向以清廉自持，苦幹實幹著稱。其疾惡如仇，絕不徇私，尤屬口碑載道。而此次上臺，復以「人民至上，民生第一」為施政的最大準繩，又能網羅各方人才團結一致。可見探囊得珠，已獲為政的寶笈。只要陳院長與他的同僚能够時時秉着「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的精神去幹，則中共以「暴」制民，國府以「仁」保民；中共以「極權」專政，國府以「民主」施政，兩相競賽的結果，必能在實行三民主義的政治之下，挽回已失的民心，重奠民國的礎石。

（二）軍事的。自前年秋冬之交起，國軍只是在既敗且退，既潰又降的階段中。這個階段，幾乎可

說近於土崩瓦解。但在大陸沉淪的末期，有了去年十月底及十一月初金門登步兩島的大捷，一挫中共趾高氣揚的兇鋒而後，國軍已站定了腳跟，不再後退。現在正是相持階段的開始。在此期間，相信新生的力量不斷增長，三軍的配合更形加強，而國防機構中激上激下的腐敗份子也必可望一掃而空。過去落伍不可復用的軍官也勢必自然淘汰。去腐生新，必然是軍事勝利的先決條件。

加以大陸上的人民，憤於中共的橫暴，紛起抗共。游擊部隊，日益壯大。國軍一旦反攻，則搗竿而起，相爲呼應者，將遍大江南北。而人民之箠食壺漿，以迎國軍者，更必到處皆是。

(三) 經濟的。從前國府機構龐大，兵額過多，收支相差甚鉅。財政不得不乞鑿於發行，於是通貨貶值，經濟崩潰。今則地小政簡，勵精圖治。去秋臺幣改革以後，物價相當安定。吳主席主持省政，蕭規曹隨，經濟設施，已收成效。而在中共方面，則偽鈔濫發，幣值大跌，「人民幣」變成了「人民幣」，大失民心。加以強迫征糧與誘騙「參軍」之故，使市無蓋藏，農無擔石，地有荒土，野有餓殍。大陸上的同胞在饑饉的死亡線上者已有二千萬人以上。在此兩種相反的情形下，昔日人民之受欺而寄妄想於中共者，今後自必馨香禱祝，日盼國府在於旦夕之間，解其倒懸。

(四) 外交的。毛澤東周恩來朝拜莫斯科，簽訂條約，出賣祖國，使全國同胞與全世界友邦從此認清了中共的眞面目，無形中幫了國府將來反攻的大忙。雖然英國這一類市儈國家，利令智昏，承認中共偽政權。可是至今還遭受冷淡，徒自取辱。而另一方面，則美國與其他民主國家，在遠東方面，有逐漸聯合加強防共的趨勢。他們已漸覺到，要使中共不插足於東南亞而擴張其勢力，最好的方法莫過於援助國府反攻大陸。過去美國政府常說不願再問中國的事，現在已可將援華款項，延長至明年六月。只要國

府能在各方面有革新振作的氣象，國軍將士有堅強的作戰意志，人民有澈底擁護政府反共的決心，外援自會源源而至。在蔣總統堅苦卓絕的領導下，有陳院長的新作風，重用新人才，必可一新國際視聽的耳目。得道多助，勢所必至。最後勝利，可勝左券。

總之，中國戰局演變到了現階段，國府已經由退守而轉到可以堅守相持的時期，再經過若干時日反共新生力量的培養，與共方士氣低落民心厭惡的情況相配合，就可更進一步而入於反攻大陸的階段了。日前浙東松門一帶國軍之登陸，還不過負有接濟游擊隊伍任務之一種試探性的登陸戰，並非真正的反攻大陸。但我們也可認此為蔣總統復位與陳誠將軍組閣以後反共戰爭轉機的象徵。海外僑胞，要救中國人民，使他們早日脫離饑饉的威脅，使他們免於被共黨牽去為蘇聯作世界大戰的炮灰，則除了乘反共戰爭轉機之時，力助國府，為其後盾，以加速其勝利之到來而外，別無他路。若欲自命為第三者，與中共講理性，那可說對共黨依然毫無認識的了。（三藩市國民日報及加拿大維多利亞新民國報）

對國民黨十全大會的期望（一九六九年三月廿七日）

中國國民黨定於三月廿九日召開第十屆全國代表大會，討論當前的重大問題。這是海內外的中國人所一致注意的大事，也可以說中國乃至世界今後如何演變的契機所繫。散播全球的一千數百萬華僑所期望於十全大會的非常殷切，非一言一語所能盡。今姑就目前世局演變之動向，窺測十全大會使命之所在，並略述我們的期望。

不久以前，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張寶樹，在總理紀念週上，根據蔣總統的指示，指出大家應該身體力行總裁所號召的「擴大全面革新的行動」。析言之，不論在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等等，任何一方面，黨的幹部都應本着革新的基本精神，由自身及本黨先行自動振作起來，當必能鼓動風潮，造成時勢，使整個社會發出煥然一新的光輝，使世人對中華民國「刮目相看」。

當前的世局，其最顯著的動向可得而言者，約有下列兩端：

(一)中共竊據大陸，殆二十年。由於殘暴統治，民怨沸騰。毛魯澤東除將召開共黨的九全大會，準備排除異己外，更在東北地區，挑起對蘇聯的邊界衝突，硬說「蘇修」與「美帝」勾結，企圖包圍中國大陸。不問毛共的指控是否確實有據，但其恐懼的心理，業已「情見乎詞」。不僅蘇聯正在準備舉行「世界共黨代表大會」，攢拒毛共於「赤圈」之外，即使美國內部的姑息主義者，竭力鼓吹美國應設法拉攏

中共，如今也不得不承認此非其時。故中共在國際間的孤立，日益顯著。例如加拿大和義大利政府很想承認中共，也因之而遲未實現。以世界上反共最有經驗，了解毛共最爲深切的中國國民黨和中國人民，在此時機，正好加倍努力，達成復國建國的重大任務。這次十大大會對此一任務，必須「一心一德，貫徹始終」，表現其劃時代的意義。

(二)美國尼克森總統曾說「對抗的時代業已過去，談判的時代繼之而起」。而蘇聯共營鑒於軍費負荷之沉重，渴望與美國消除隔閡，從而攜手。它們兩個超級強國，勢將進入可能秘密談判的階段。它們不但可以協謀對付中共，甚至也可能計劃如何支配世界，使國際藉強權均勢而勉強保持和平。否則軍備競賽的末路，必將導致世界性的核子大戰。它們兩國當局目前所最感疑懼的，便是中共一旦有了足夠的核子武器，可以闖下滔天大禍的共同敵人。而蘇聯與法國的戴高樂，更不惜重彈「黃禍」的老調，希望藉此鼓動一次種族戰爭，其用心非常深刻而惡毒。因此，我們中華民國政府及全中國的人民，應該加速準備，由我們自己奮起，承擔消滅毛共的偽政權，以及解除其核子武器的責任。我們只需要革新我們的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的一切設施，發出和平的光輝。則得道多助，必能掌握機運，達成「和平解放」中國大陸共區的使命。

總之，世局天天在變動。中我們期望在國民黨的十大大會中，出席的代表都能說老實話，直言無隱。秉承總裁的指示，對內革新我們的一切，對外加強盟國間的團結。如能把握契機，締結亞太地區自由國家的聯防條約，遏阻毛共的侵略。同時鼓動大陸上對毛共不滿的軍民，起而制裁獨夫的工作，相信自由必能克服殘暴的。(紐約華美日報)

十全大會面對的世局（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二日）

美國民主黨參議員甘愛華，亦即前總統甘迺迪的幼弟愛德華甘迺迪，最近發表演說，主張不必等待臺灣問題的解決，美國當不再反對中共政權的進入聯合國。不但承認它可以代表中國參加聯合國大會，且可參加安全理事會及其他機構。同時與聯合國商酌，如何使國民政府或一個獨立的「臺灣國」出席聯合國大會。

從上面所引述的甘愛華信口雌黃的話語中，我們當可瞭解其姑息中共討好中共之意圖，非常殷切。亦即表示媚共逆流在美國之洶湧，已到了如何的程度。因為甘愛華有競選下屆總統的野心，尤其值得重視。這些費正清之流，包括若干大學教授及左傾政客如前駐日大使芮噶佛，前駐聯合國大使高德柏，及哥大教授巴乃德等等，無一不是捧甘愛華的場，讚美他有勇氣提出此問題來討論。雖然在會議席上也有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教授及國家評論週刊發行人羅希爾等駁斥上述左派人士的謬論，但是敵不過他們左仔的聲勢。我們國人，尤其國民黨同志對此應該警惕。在此動盪紛亂的世局中，各方所蘊藏而潛伏着的媚共暗流，是將來可能影響美國改變對華政策的力量，其陰謀亦將不讓於二次世界大戰後期「太平洋學會」之影響羅斯福與杜魯門政府的改變對華政策。換言之，由哥大教授巴乃德所領導的「全國研討美華關係委員會」，也可能演變為今日乃至以後的「太平洋學會」！

我們在了解美國及若干自由國家姑息份子的意圖後，然後可以窺測十大大會所面對的世局，如何險惡，因而決定我們所應採取的對策。目前談世局，扼要來說，不外左列的幾種趨勢：

(一) 遠東方面，亞太地區的不安，全係中共匪幫控制中國大陸所釀成。要根治這個不安的局面，非剷除中共偽政權尤其毛澤東指揮集團的根株不可。自倡導所謂「文化大革命」以來，毛共匪幫的內訌，日甚一日，業已到了家破親離，日暮途窮的末路了，只是等待外來的一擊，即可自行崩潰的。可惜還不能堅強團結，以達到剷除禍根的目的。因之，我們自己必須從各方面加倍努力，按照總裁所指示的途徑，完成我們中國人所義不容辭的神聖任務。

(二) 整個世界，目前顯然為美蘇兩個超級強國對峙的局面。雖然法國戴高樂政府蓄意構造所謂第三勢力，但究竟不成氣候。由於軍備競賽的經濟負荷太重，以及一般人對核子大戰的恐懼心理太濃，美蘇兩國當局近來都渴望談判如何弭戰之道。尤其因為尼克森曾有「對抗時代業已消逝，談判時代即將開始」的表示，引起蘇聯共會對美談判的興趣。雖然此非一蹴可幾之事，但除非有意外事故發生，否則這兩個「歡喜冤家」最後可能走上此一途徑。因而中共匪幫非常焦急，狂喊「美帝蘇修協同包圍」的口號，並且製造烏蘇里江中的珍寶島事件，醞釀俄毛衝突的氣氛。向來高喊「一面倒」的毛曾現在却以美蘇兩國為敵，自掘墳墓，等待埋葬。所可惜的，美國雖為自由世界的盟主，不但漠視這個絕好機會，却反而有不少政客和「專家」多方鼓吹應該圖謀與中共親暱論交。美國當局一方面既想緩和對蘇的冷戰，另一方面却又想跟中共匪幫論交，其矛盾如此！

甚至如甘愛華之流，公然昌言不惜出賣其忠貞盟友中華民國，以為媚毛的「賀禮」。我們中國朝野

此時不僅要對「良友」美國進一忠告，而且應設法消解蘇聯從前對我們的誤會，使它也能相信，只有中華民國政府光復大陸，方可期望中蘇之間不以兵戎相見。世界和平的契機，即在於此。美蘇兩個超級強國，如能深明頓悟，只有中華民國政府在祖國大陸上作為美蘇的緩衝，世界和平才可保持。祇要他們不阻止或干涉我們光復大陸的行動，世界和平便可湧現。我們今後的工作，應集中力量，用一切方法，說服美蘇二國重視我們的看法，同情我們的做法。這該是十全大會決定外交政策時的根本方針。否則如讓美蘇二國各自根據其立場，那便是美國希望蘇聯對中共作戰而其自身袖手旁觀，或蘇聯希望美國對中共作戰而其自己則置身局外。結果，我們中華民國眼見對此事無分，即使大陸解放了，而祖國仍難獲得獨立自由的地位。

(三) 目前可以由星星之火而進於燎原的危機，不外三個地區：①越南，②中東，③中歐。

越南之戰，由於美國以前用兵政策錯誤，不求速戰速決之道，而拖延太久，以及美國當局如今的優柔寡斷，遂至和既無望，戰又難決，將使東南亞仍然是一個混亂的地區。美國近年來所想像的，以扶植日本及印度為剋制中共擴展勢力的基礎，而缺少重視中華民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的力量，其觀點顯然錯而又錯。其貽禍於未來，更將不可想像。於此，我們中國朝野必須自己振作起來，擔當解救亞洲人民的重大責任，決不可自己置身於局外的。

中東方面以阿之爭，一時恐仍難以和平解決。所謂「四強」會議共同提出一個方案的想法，如今尚難實現。我中華民國政府對此固然鞭長莫及，只能站在局外，但道義上應該支持對我友好的阿拉伯國家的立場，同時主張國際航道的公開使用，而不必顧慮以色列的勝敗得失。

至於中歐方面的德國問題，毫無疑義，我們理當贊助西德的立場，以期將來可用和平方法獲致德國的統一。德國問題，拖了二十年，仍然不能出現和平統一的局面，不啻對於各有關國家政治家的一大諷刺。我們只有希望他們堅定的保持正義立場，促成此一重要問題的正當解決。

要而言之，國民黨十大大會所決定的謀略，應在視察環球情勢之下，特別顧及亞太地區自由國家的如何團結，以及光復大陸的國策如何完成。至於我們的農耕隊以及技術援助專家，對非洲國家及中南美洲若干國家，已有良好的成效，自應繼續努力，無待煩言。若夫美國內部姑息份子的花樣百出，其主旨不外幫助中共匪幫宣傳，打擊甚至消滅中華民國，顯係「太平洋學會」的靈魂。我們尤其需要致力於國
民外交，予以無情的反擊，不能再蹈曩昔縱容「太平洋學會」共謀份子幫張跋扈，而隱忍不言的覆轍。

（紐約華美日報）

民主與法治（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客有自臺灣來者，欣欣然相告曰：今而後吾臺灣之祖國政府，將有更大之革新。民主政治之推行，人民權利之保障，必有勇猛精進之表現，當可以慰海外僑胞之期望。願民主政治非口頭禪，亦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濟也。苟真欲民主政治在中國開燦爛之花，結甘旨之果，宜合吾全國朝野上下之力，以濯溉而培植之，不能僅視此為政府之事，而吾人可以袖手旁觀，坐享其成。因願本野人獻曝之義，不避淺薄之識；論民主政治之果為何物。

國父孫中山先生嘗謂『余維歐美之進化，凡以三大主義，曰民族、曰民權、曰民生。……是三大主義，皆基本於民。』旨哉言乎！談民主政治者，何嘗可須臾忘此「基本於民」之訓示哉？國家之法律，人民制定之；政府之權力，人民授與之。政府必須建立於得被治人民同意之基礎之上，為民主政治顛撲不破之原則。故人民先國家而存在，政府為人民而設立。此乃民主國家政府顯要所當朝夕勿忘之座右銘，在平時然，即在戰時亦然。是則民主政治之心理基礎，必先人人各自養成尊重人民之習性，而萬弗以百姓為獨狗也。

夫民主者，既以民為主矣，則此林林總總者，無一而非民，亦即無一而非主也。治於人者既為主，則充其義，彼實即治人者也。人人既各為主，則將何以為治？曰有法律在焉。故實行民主政治者，無有

不重法治。所謂法治者，非謂可以不假手於人也，特人人須受法律之約束而無可外耳。引車賣漿者之言行固不能違乎法，卽執法施政者亦何嘗超乎法之上？法律固由人民或人民代表制定之，而不能以命令代，則人民受治於法律，卽無異受治於自己，此民主之精義也。法律不因親愛者而寬；亦不因憎惡者而嚴。法律不因名流顯宦而可放鬆，亦不因窮民小子而可加酷。故民主之程度當以法治成績如何以爲斷。（紐約華美日報）

言論自由（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言論自由為民主國家之人民所享有基本權利之一。故言民主政治者，無不重視言論自由。昔美國傑佛遜總統嘗謂，議會與報紙乃民主政治之重要柱石，如二者不可得兼，則寧願有報紙而無議會。可見其心目中之言論自由，其價值且過於代表民意之機構。

惟有報紙能自由採訪新聞，自由披露新聞，自由批評一切所載之新聞，然後政府當局施政發令，官吏議員之議論行動，社會風氣之趨勢動向，均無所逃於人民之耳目。十手所指，十目所視，縱有貪污，不患其不能揭發，縱有秕政，不患其不能糾正。政治之修明，官常之整飭，不期然而自至。政府果欲尋求民意之歸趨，而為施政之準繩者，舍求之於自由發揮之言論，更有何道哉？

或曰：新聞記者未必悉有充分之知識，更未必全有完滿之道德。如不肖者廁身於其間，或誇張為幻，播弄是非，或洩漏機密，影響國防，或道聽塗說，毀人名譽，其流弊所及，不無損害國家全體之安全，社會公衆之福利，是不可不有以限制之者。則應之曰，此固有法律在焉。國防保密法，人人所當守；毀人名譽，涉及刑法之誹謗範圍。苟有抵觸之者，政府或被害之個人均可依法進行訴訟，報社與記者自不得超乎法外，無足慮者。惟民主國家所不當有者，即不經法律之程序，而無故逮捕記者，封閉報館，或勒令停刊。蓋此種淫威之所加，必使記者噤若寒蟬，報紙盡為歌頌，清議既無所聞，民意無由而顯，

此民主政治之大忌也。

抑言論自由，不能僅恃憲法條文之保障，而必有賴於報紙與記者自身之警覺與維護。若受法外之侵害，立即羣起而抗爭，則雖有欲以強力剝奪之者，亦將有所憚而不敢發。不然，則視他人之受迫害，無關己身之痛癢，隱忍而不言，腹誹而不辯，又何能期其得享言論自由之權利乎？（紐約華美日報）

兩黨政制（一九五四年四月三十日）

世人之好談民主政治者，莫不重視政黨制度，而尤寄其希望於兩大黨之交迭執政，以爲必如此庶幾其民主矣，不然，則猶有憾焉。語重心長，誠不勝其欽佩。

雖然，民主國家政黨政治之運行，固以成效卓著之英美兩黨政制爲最足效法。惟此又何嘗可以一蹴而幾？中南美各國無論矣，卽歐洲大陸諸國，無論戰前戰後，非爲大權獨攬之一黨專政，卽爲政局震擾之多黨角逐。欲求其兩大政黨，在朝在野，相反相成，遞嬗執政，取決於選票，而閭閻不驚，行所無事，一如今日之英美者，誠不多觀。故學步民主正求上進，而又面臨共魔威脅，如自由中國今日之環境者，希冀其取法乎上則可，而謂卽欲責其一躍登天，造成莊嚴燦爛之七寶樓臺，吾不信如是其易也。

吾以爲今日自由中國尙不能形成類似英美之兩黨政制，雖爲憾事，而實不必過分引爲隱憂。今日中國之所渴求者，厥爲全國朝野上下具有竭力學習民主之誠意，養成人人法律前一律平等之習性，使庶政公諸輿論，民意得爲主宰，人民之基本權利獲有保障，官吏之法定職權不受侵越。誠能如是，無兩大政黨之對峙，雖欲謂之「不民主」，一，不可得也。反是，而苟以徒襲皮毛爲貴，亦步亦趨，爲東施之效顰，儼然有所謂兩大黨矣，而形骸粗具，精神全乖，則亦何貴有此粉飾門面之黨爲哉？

吾爲此言，非反對兩黨政制，而毋寧心儀甚切也，特以爲兩黨政制之運行，非可拔苗而助長耳。英

美大選，競選者固亦多黨而不限於二大黨。且昔日英國爲保守黨與自由黨，今日爲保守黨與工黨，其爲二黨同而所以爲二黨者異。美國立國之初，未嘗有兩黨，而無碍於華盛頓政府之民主。是可見兩大黨之形成，有其歷史背景與民族習性，不能求之於一朝一夕之間，明矣。（紐約華美日報）

「反對黨」(一九五四年五月一日)

兩黨政制之不能一蹴而幾，昨已言之。今請更一論反對黨之如何形成。蓋吾人所不可不知者，凡政治制度之演進，均有其歷史因素在。試以美國言之。在獨立戰爭以前，無所謂政黨也，惟有接近十三州之總督者號為王黨，主張殖民地立法自治者號為民權黨耳。迨戰爭結束，共和初建，所謂王黨者，風流雲散，消聲匿跡。而革命建國之領袖，自俱為民權黨之人物，並無對峙之他黨，然亦無害於華盛頓政府之民主。且美國憲法規定由選舉團以選舉總統。其初意固在使總統超於黨爭之外，而不為其一黨私見之所左右。是可見美國建國先賢固無意禁止組黨之自由也。然終華盛頓之任，美國竟無所謂反對黨。

迨華盛頓兩任總統而退休，美國始有聯邦黨與共和黨，(此非現在之共和黨而實為現在民主黨之前身)之分。後者之領袖為傑佛遜。一八〇〇年當選總統，翌年就職，版圖擴張。其所領導之共和黨政權異常鞏固。二十年間，聯邦黨漸趨於名存實亡之境。故一八二〇年並一總統候選人而幾無法推出，美國又成爲一黨主政之局。美國史家所稱爲「好感時期」，即指此並無反對黨存在之一段史實。直至一八四四年共和黨又裂而爲二，始又成兩黨對峙之局。迨黑奴問題起，而美國政黨又有新的分野。今之共和黨乃由林肯之領導，脫穎而出。於是吾人所習聞之共和民主兩黨，遂交替活躍於美國之政治舞臺。

據上所云，可知反對黨之形成，殆爲各種因素相激相盪之產物，而不能僅「依樣畫葫蘆」以泡製之

者。夫中國非不有多黨也，顧共產黨必欲挾兵叛國，而青年黨與民社黨則惜乎黨內糾紛迭起。且在大敵當前之環境中，是否可以分裂國民黨，而使之自作政爭，以標榜其有「反對黨」乎？似又不能無疑。（前約華美日報）

政黨之分裂（一九五四年五月三日）

夫以欲使中國實行兩黨政制之故，而有倡議國民黨分而為二之說，吾聞之殆數年矣。而近者空穴來風，一若竟在計劃中者。吾不知傳說之確否，更莫明其計劃之如何。惟心所謂危而不能不一吐其喉間之骨鯁者，誠以政黨之分合，固不可以生吞活剝之態度出之耳。

中國國民黨似可分裂為二之議，前聞倡之於胡適博士。胡先生嘗引土耳其國民黨之後來分為國民黨與民主黨，以證明事之可行。近則吳國楨氏亦拾此牙慧以爲其建議之一。意者胡先生期望中國之有兩大政黨者甚切。而鑒於目前民青兩黨似無併成一個大反對黨之可能，乃不得已而求其次，遂寄其希望於國民黨之自爲分裂，而爲朝野之對峙，以促使中國政治之更能進於修明。其苦心孤詣，要爲吾人所共諒。然而天下事欲求其能行，行之而能有效，似非徒恃其理論之可通，而尤當計其環境之相合。否則橋逾淮而爲枳，形雖同而味已殊矣。

中國國民黨之發展至於今日，雖名稱數易，而仍能成一整體者，自有其歷史因素在。三民主義包容性之廣一也；內外環境之艱難，使不能不團結，二也；負有革命責任之黨，不能抹煞其自身之歷史，三也；黨員對政治信仰而外，其相互間兼有道德的維繫，四也。故國民黨自民國十二年改組以還，雖以人事或政策之爭，而曾有或大或小之畛域，然究其極則依然殊途同歸，棄嫌修好，而無損於黨之團結。今

以共黨大敵當前，反攻任務待盡，時流方倡海內外大團結之說，反共救國會議之聲又甚囂塵上，而謂國民黨反應於此時，自裂爲二，吾不知其影響於人民之視聽者將如何。作始也簡，將畢也鉅。故一事之行，不能不慎其始。假使國民黨今日可以命令方式分爲二，則他日又何能阻其分而爲四？一分再分之不已，是兩黨政制之利未見，而多黨紛擾之害已形。謀國者不可不深長思也！（紐約華美日報）

民主與教育（一九五四年五月十一日）

日前蔣廷黻博士在華美協進社教育座談會席上致詞，討論民主政治，謂民主政治之理論時代業已過去，今當注意實際問題。因而提出實行兩黨制度，尊重司法獨立，及維護言論自由三要項，以為此乃民主政治之起碼條件。探聽得珠，誠為的論，關於此三者，余近已有所論列，茲姑不贅。惟管見以為民主也者，不但為一種政治型態，而應視為一種生活方式。且此種生活方式不僅為一部分人所當學習，而且為全國大多數人所共同浸潤於其間。必全國人民，無分朝野，不論智愚、修己安人，以此為鵠。涵泳陶冶之結果，終身由之而習焉不察，然後民主政治庶幾能根深蒂固而不拔。故質言之，民主政治之績效，實有待於民主生活之養成。民主生活之養成，實為教育家之最大任務。移風易俗，宜非異人任也。

旅美中國教育人士座談會，顧名思義，自悉為有志文教工作之時賢。其對於推進中國民主政治之期望必甚切。苟能就教育宗旨與方法有深入之研究，敢信對吾國今後之政治當有甚大之貢獻。愚不自諒，拋磚引玉，願為前驅。

余以為民主主義之教育，首當在人民習性上建立「異中求同」之心理基礎。申言之，即當使吾全國人民，盡知民主生活之要義，在於尊重各個人之意見，而使之有自由發揮之機會，然後在討論辯難之中，可由互異而求「大同」。所謂「大同」者，不諱言其小異，亦不必禁止其小異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

道並行而不相悖。」此原爲自然界與人生之真理。惜乎有往往昧於此義者，以爲必求「一道同風」而後方可謂之盛世。殊不知無「多」卽無「一」，無「異」又何嘗有「同」？

今之人每好黨同而伐異，一若求全國人民之俯首聽命而後快。故剷除獨裁之根本，自非養成全民族能容忍「異見」之習性不可。此誠教育家之最大任務矣。（紐約華美日報）

論「秘密調查」(一九五四年五月十二日)

今之言民主者，每以所謂「特務」者為詬病。夫特務者非他，秘密調查之工作耳。假使特務之職權祇限於對罪行之秘密調查，而不及其他，則又何害於民主？是可知極權國家之特務，其所以為人民所痛心疾首者，其原因當別有所在。

試以美國之聯邦調查局言之，其現任局長胡佛，任職迄今方周三十年，而受國人之愛戴，幾乎有口皆碑。歷經七位總統十三位司法部長之上司，而久於其職，可見其所獲信任之專。同一秘密調查也，彼胡佛先生果何為而能致此？彼所主持之機構，除偵查一切罪行外，更於二次大戰期間，肅清間諜並進行反間工作，使軸心國家不能施其技。大戰以後，則更注意於共黨在美國之滲透陰謀。向使在上者能早重視其調查報告而從事預防，則共黨之不能影響於美國政策，可斷言也。功績若此，國家之治安繫焉，又誰得而輕蔑之哉？

尤可注意者，聯邦調查局之所不同於納粹之「格殺打撲」，蘇聯之「格逼污」，其要點有三：該局為司法部之附屬機構，受司法部長之節制與監督，而不能擅自有所行動。一也。該局之分支機構與工作人員雖遍佈於全國，但絕無警察之權力。無法院之命令者，絕不能擅自捕人。二也。服務於該局之工作人員，必須具有律師或會計師之資格，而又須經過訓練，對國家能絕對效忠而嚴守機密者，方能充任。

人品既整齊，流弊遂杜絕。三也。

由此言之，秘密調查不足患，特務不足患，所患者從事於秘密調查之「特務」，自居於法律之上，而不惜以法外之手段，視人民如草芥耳。向使吾能學步民主先進之國家，制訂法規，納粹特務於法律範圍之內，慎選人員，守本分於秘密調查之時，則爲人民者，方幸賴有奉公守法之特務，而過其安居樂業之生活。崇敬之不暇，又何怨之有？（紐約華美日報）

（公展按）：最近美國報上紛紛發現有抨擊胡佛局長之文字，尤其自所謂「水門案件」轟傳以後。則其咎乃由於在上者一念之私使然，以爲彼可以起乎法律之外耳。（一九七三年十二月註。）

感慨話雙十（一九六五年十月十一日）

近十幾年來，每年達到雙十節，我們大家應該歡天喜地，熱烈慶祝的「大日子」，却總免不了令散處全世界每一角落的炎黃子孫，在歡欣之餘，帶着幾分感慨，似乎有不少的光明前途，還待我們共同努力奮鬥前進，開關起來。

第一、我們如果聯想到今年正是國父孫中山先生的百年誕辰紀念之一年，而他所手創締造的中華民國，竟成爲殘缺的金甌，沉淪靡掌的中國大陸錦繡河山，歷十五、六年而尙未光復。備受荼毒茹苦含辛的數萬萬同胞，在水深火熱中，歷十五、六年而猶未拯救。我們怎麼對得起國父與諸先烈在天之靈？怎麼對得起窮而無告，亟盼援手的大陸同胞？我們無論在自由中國或海外，在慶祝雙十節為司時，不能不懷然於自己責任之未嘗盡到。

第二、慶祝雙十，既應首先達成光復大陸，還我河山的目的，則不能不着力於愛好自由的中國人民的大團結。無論在朝在野，國內海外，即使以往或有彼此缺乏瞭解，個人容或難以恩怨，當此同胞沉淪，河山待復之際，實應將往日胸中塊壘，一筆鈎消，秉同舟共濟之義，效廉蔣互諒之行，絕不再持絲毫黨氣之爭，而相與携手團結，從元惡大憝的手裏，解放大陸上億萬待援的同胞。在這一點上，祖國政府所倡導的籌組「反共建國聯盟」，無論朝野，都應盡其至誠，互諒互助，以底於成。俾能昭示內外，中

國人民無分黨派職業，已完全團結於一個共同目標之下。如此，方不辜負此雙十節。

第三、中國今日之事，已非僅有關中國一國之事，而實與整個亞洲整個世界局勢，劃分不開。中國事固須由中國人自己來解決，但解決之道，不能不謀爭取多助之法。最近，美國讀者文摘曾刊出一篇重要文章，暢論亞洲危機。而其重點，即在提醒世人，必須重視中共偽政權的窮兵黷武，因為它已在開始其在太平洋地區的挑戰。這論文的作者於是主張美國應及時鼓勵太平洋地區所有自由國家實行聯合，組成「太平洋聯盟」。此種主張，確與蔣總統月前所號召的自由亞洲的反共聯盟不謀而合。我們站在中國人力求解放中國大陸的立場，更應配合這個時代思潮，從各方面加強努力，促成亞洲反共聯盟的誕生。這比之僅僅舉杯祝賀，歌舞狂歡，作為雙十的點綴者，更有意義得多。

第四、正當我們歡度五十四年國慶時，國際之姑息主義者鼓吹承認中共或甚至容許中共混入聯合國之呼聲日高，以為擁有六、七億人口的中共偽政權，不能始終予以漠視。並且他們故意曲解教宗保祿六世十月四日在聯大會演講詞中之一段文字，一若教宗也在暗示應讓中共進入聯合國。其實中共是中共，中國人民是中國人民，中共偽政權絕對代表不了中國人民。我們必須讓這些姑息份子澈底明白：中國大陸上每年抗暴事件至少大大小小十萬宗，而韓戰的中國戰俘一萬四千義士都志願投奔自由，以及十多年來川流不息的大批難民由大陸逃亡港澳，更是顯示中共不能代表人民的鐵證。我們散處全球的僑胞，應乘慶祝雙十節的機會，正告普天下愛好自由的人士，中國人民絕對反共，絕對反對中共混入聯合國。

第五、最後我們當不會忘記，今年（一九六五）正是中國革命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一九〇五乙

(三年)，正是革命志士創建中華民國的大團結的具體象徵。我們希望在同盟會慶祝「花甲」之年的今年，也能有「同盟會」精神復活的奇蹟，以海內外革命志士的大團結，光復祖國大陸的河山！（紐約華美日報）

十月一日話紅衛兵（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

中共偽國慶的十月一日，如今因大陸上「紅衛兵」的狂妄騷擾，搞得天翻地覆，真正要變成中共的「國傾」了！

紅衛兵的組織，原本是毛澤東、林彪別出心裁的計劃。他們感覺到中共黨的幹部，由中央而至地方，已經發現有許多靠不住的了，深恐他們的政權不能由這輩不足信賴的幹部繼承下去維持了，於是異想天開，要利用那批十六、七歲青年小夥子的盲目沖勁，發動一種「文化大革命」的「造反運動」。捧着「毛澤東的言論」當他們的「新聖經」，嚇唬着凡是所有和毛澤東思想不同路線的人。他們以為如此波濤洶湧的在大陸上搞下去，定可將所有共黨內部以及共黨周圍的反毛份子一起搞垮。打的打，殺的殺，下鄉的下鄉，勞改的勞改，自盡的自盡，奔逃的奔逃，斬草除根，不留餘地。然後毛澤東儘管一旦「嗚呼哀哉」，而毛共的政權仍可萬世一系的安如泰山。殊不知毛共政權崩潰的導火線，就在紅衛兵這個組織之下埋好了的。紅衛兵也可說得是毛共政權敲喪鐘的吹鼓手！

紅衛兵瘋狂打擊的對象，①是知識份子，②是生產份子，③是稍有傳統習俗的老百姓，④是多少帶有學習洋化的時髦人物，⑤是相信各種宗教的信徒，⑥是歷來在中國傳教的僧侶教士和修女，⑦最後而亦是最先最重要的是共黨內部所謂抱有「修正主義」傾向的反毛幹部……。總之，凡一切毛澤東、林彪

所看不慣而疑忌的人，不論男女老少，不論中國人或外國人，都在清除消滅之列。這簡直是要使用紅衛兵這把刀，與天下人爲敵。當初，毛澤東一心想要打倒國民政府，乃有所謂「新民主主義」，所謂「統一戰線」等等，無非想把所有人都拉攏在一起，而使國民黨形成「孤立」。如今的作法，恰恰跟一九四九年中共霸佔大陸前後的一套魔術相反。騙人的假面具，一旦自己揭破了，其結果不但衆叛親離，走入自掘的墳墓中去，即使共黨內部的「從龍」之士這批「新貴」也都人人自危，有朝不保暮之感。其不亡何待？！

或者以爲這批十六、七歲的紅衛兵份子，都是毛共奪取政權霸佔大陸時新生嬰兒長成起來的，他們所受的教育都是毛澤東思想的產物，他們一無所知，只知道崇拜毛澤東。毛曾有了這批虔誠的信徒擁護他，他就無慮其政權之不保了。可是要知道人是活的，年齡大起來，思想也會多起來。天下最不可能控制的是人們的思想；愈是控制得厲害，反抗因素也種得愈深。紅衛兵的份子，誰能保證他們永遠是毛澤東思想的奴隸？而況他們是毛澤東所認爲最可靠的「五紅」種子，利用將來保送升學的誘惑手段，裹脅他們加入這個紅得發紫的新組織。誰又能保證這批「五紅」的小專家，不是利用這個機會，投毛曾之好，攬取升學的「特權」，等到他們升入所謂「大專」學校以後，再來跟毛共翻臉呢？

不但此也，有人認爲毛曾所以攬出紅衛兵，乃是準備跟美國打核子戰爭的，這更是離奇透頂了！中共有的是解放軍幾百萬人，更有民兵上千萬人，難道還怕不能造成「人海」來淹沒美軍？即此可知毛曾已自知紅軍與民兵之不可靠。然則新編組起來的紅衛兵，反會比「訓練有素」的紅軍與民兵更可靠嗎？秦始皇收盡天下的兵器，鑄成金人，而陳涉吳廣揭竿而起，卒使秦亡。紅衛兵一旦被授以兵器，他們能

不乘機倒戈嗎？

要而言之，紅衛兵確已為中共掘好了墳墓。現在所要問的：向以討共救民為號召的中華民國政府尚待何時大張撻伐，使偽國慶正式成為中共走入墳墓的「國傾」耳？（紐約華美日報）

（公展按）：「紅衛兵」在中國大陸上扮演的「文化大革命」鬧劇，最近又花樣翻新，鑼鼓登場了。以前是林彪被毛曾派充主角，只是利用他所掌握的槍桿子，打倒那時的當政派劉少奇一幫人。劉少奇既經趕下了臺，林彪雖曾受寵一時，被封為「最親愛的戰友」似乎有穩做「接班人」的模樣。乃曾幾何時而風雲變色，林彪却由高高在上的地位，突然翻落下來，儼似昏頭昏腦，大夢一場，蒙上了通敵叛國的罪名，被迫只好偷駕一只飛機，私奔蘇聯，而在昏暗中跌落蒙古境內。他的戲劇性故事，由周恩來向十全大會中報告了。可是紅衛兵的鬧劇，並未結束，大陸上儘有翻雲覆雨的連臺好戲。最近，毛曾在號召「反潮流」，鼓動共匪盲目的青年，必須繼續攪下去，照着他所指示的「批孔揚秦」的大方針勇敢前進，他自己誇稱比秦始皇要厲害不知多少倍。他所要坑的儒，也決不止於數百人。他目前的矛頭似乎指向周恩來。周恩來原是一個能夠觀風識竅的紅色政客。他雖藉着拉攏尼克森、季辛吉的功勞而力謀自保，但究竟也有惶恐不安的感覺。毛婆江青所控制的一派激進份子，在未來中共內訌中，將如何表演，以及毛曾最近所玩的一套調整各軍區的駐防人物，是否能收到「強幹弱枝」的效果。不會釀成藩鎮之禍，都在未來可知之數。但有一點可肯定的，那便是紅衛兵實在是毛共所自造「大亂的種子」。

何時光復大陸（一九六六年十月十日）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雙十節國慶感言——

我們相信：凡屬中國人，不問現在淪陷於共區中國大陸，或卜居於臺澎金馬港澳，或遠適異域而散處於全球的天之涯，地之角，當今天欣逢中華民國五十五年雙十國慶的良辰，一定在心上或口頭不約而同，有一個迫切的大問題，便是：「我們何時光復大陸，使全國同胞重見光明？」

尤其今年爲蔣總統膺選蟬聯四任的一年，而海內外同胞現方準備恭祝蔣公八秩華誕的時候，我們更覺得這一個大問題的含義特別嚴重。許多人常說：「惟有仰望總統蔣公領導我們光復大陸」。而總統今已八秩高齡了，我們又豈能長此坐待光復，而祇年復一年的暗問「何時」？

況自最近共區「紅衛兵」奉命大搞「文化大革命」以來，祖國文化，不絕如縷，大陸同胞動輒得咎，幾乎無處逃生。我自自由祖國政府「弔民伐罪」之誓節，自然更是刻不容緩。因此，我們更信：舉凡在各地參加慶祝雙十節以及兩旬後在臺灣恭祝總統蔣公八秩華誕的同胞，實際上沒有一個不在仰望復國收京的早日到來，而不能不切實詢問將待至「何時」了。

在今天我們來慶祝雙十節，一切善領善禱的話，似乎都不及老老實實的說一句：「但願我政府統率三軍即日兌現其復國救民的諾言。」一切歌功頌德的話，也似乎都不如全國上下，國內海外，齊心協力，一致向光復大陸和解救同胞的目的著鞭猛進，方可贖滅前愆。一切對於國父和革命先烈的追恭懷念與

形式上的頂禮崇拜，更似乎不及大家重行歃血爲盟，立即不惜以破釜沉舟的勇氣，赴湯蹈火的精神，達成我們光復大陸的壯志，庶幾可告無罪於國父和諸先烈在天之靈！

光復大陸的責任，是中國人所自行負擔的。任何外國人不論對我們中國如何友好，至多祇能予我們以相當的助力，而並不直接負其責任。如果將不能於此時實踐光復大陸的原因推諉於國際友邦之掣肘，祇是中國人輕視自己的通詞。

光復大陸的責任，是凡屬中國人都應有其自己的一分，而並不是總統蔣公一個人的。誠然，蔣總統有其領導羣倫，復國救民的大責重任。但如將坐待十七年而至今日仍祇好詢問「何時」可以光復大陸的一切責任，都推在總統蔣公一人的身上，似乎不公道的。我們而且敢相信，今日最熱切而最誠摯期望立即光復大陸的人，莫如總統蔣公。但是，政治風氣如不够振作；外交週旋如無多成效；作戰力量如不够充實；反攻準備如不够齊全；運輸後勤如不够運用；乃至臺灣的社會習尚假使絲毫不够像戰時的國家；海內外的中國人到此生死存亡的關頭，假使還不能大家站在一條線上，團結合作；而官員則推諉拖宕，阿諛取容，抱定不做不錯的宗旨；人民則無關痛癢，袖手旁觀，抱着得過且過的態度；甚至所謂民意代表，也依勢營私，知法犯法，而恬不爲怪。試問：如何可仰望總統蔣公一人能光復大陸？難怪等待了十七年而今天仍不能不暗問「何時光復」了！

我們如要將光復大陸的「何時」兩字一變而爲「即日」，必先全國人民，國內海外，痛改前非，斷然行動，一聲反攻號角吹響，全球華人響應，則明年的雙十國慶，我們當可在祖國大陸上舉行紀念大典了。

全球的中國人起來吧！領導的政府覺悟吧！我們不要再問何時光復大陸，而應自動自發的改爲「卽日」。然後慶祝國慶才有真正意義。（紐約華美日報）

中共行將爆發內戰！（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一日）

據日本記者發自北平的電訊：毛林派正在調遣傘兵部隊降落武漢地區。此訊如果屬實，可見中共內部的奪權鬭爭，圖窮匕見，業已到了爆發內戰的邊緣了。毛林派認為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所策動的反毛行動，使他們不能不用全力來撲滅它，因為這是有關他們生死存亡的鬭爭。中共內部的奪權鬭爭，現已到了紅軍可能自相水火的地步，正是我自由祖國可以發動伐亂救民的大好時機了。

陳再道的反毛，決非除再道一人之事。所以林彪控制的「解放軍報」先在社論中揭發陳再道對「文化大革命」的「抗命」行爲，號召所謂「受騙的武漢解放軍弟兄們」，必須爲了保衛「毛澤東思想」而鬭爭到底；更利用中共電臺，將這篇社論廣播到整個大陸共區的各省市，要各地的「解放軍」官兵，和效忠於毛林的共幹與人民結合起來，跟着北平一致起來遊行示威，打擊像陳再道道類的反毛份子，在北平天安門的擁毛羣衆示威，由林彪親自出來主持，並且導演羣衆高喊「消滅陳再道」的口號，自可證明陳再道雖然目前因爲周恩來的親往游說而釋放了謝富治和王力，可是並沒有向毛林屈服。

爲什麼毛林兩營這樣重視陳再道所搞起來的「武漢事變」呢？因爲陳酋之所以如此露骨來幹，他不背後有劉少奇的支持，而且與新疆司令員王恩茂、昆明軍區司令員秦基偉、和成都軍區司令員黃新廷聯絡起來，共同反對毛林。這四個西北、西南與華中的軍區，如果傳說已建立了統一領導的機構，由中

共前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負責處理日常事務云云，確是事實的話，當然毛林派不能藐視，而必竭力要打垮他們的結合。

中共一年以來所搞的「文化大革命」，初則「整肅」文化界，繼則打擊所謂「當權派」的黨幹部，最後不能不讓「槍桿子」的紅軍自己分裂起來而演出公開的相互鬭爭，那便是中共政權的末日已近了。

以中共紅軍的歷史系統來說，陳再道、王恩茂、秦基偉、黃新廷這幾個反對毛林的軍區司令員，不是彭德懷與賀龍的老幹部，便是與徐向前、劉伯承有過深切的關係，毛林所以要派偽公安部長謝富治前往武漢遊說，也就是想利用謝曾與徐向前四方面軍的關係，藉以籠絡前四方面軍的幹部。但謝富治到武漢以後，被陳再道演了一齣「捉放」，雖幸免於禍，而其未必能達成任務，情勢固已顯然。毛林所以要在北平及各省市再度掀起「消滅陳再道」的高潮，骨子裏實在要斬斷劉少奇在北平以外的手足。

其實，反毛林派的勢力也並不限於上述四個軍區範圍以內。只要看莫斯科電臺的廣播，共區罷工浪潮業已席捲南京、上海、西安、廣州、重慶、南昌、青島等各大城市。另一方面大陸農民也普遍鬧着飢荒。農工不約而同，掀起全面反毛的騷動。而各地因受「武關」影響，水陸交通及電訊常常中斷，長沙、廣州、南寧等地都有新的武關發生。例如不久以前的廣九鐵路中斷，即為衆目昭彰的事實。

願我自由祖國政府當局迅即乘此大好時機，發表簡單明瞭的政治綱領，團結全民，建立討毛救國的聯合戰線，作為反攻復國的前奏。（《新華美日報》）

再談中共『武漢事變』（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

我們前已指出中共奪權鬭爭中的「武漢事變」，決非武漢軍區師令員陳再道一人之事，而適足以暴露中共紅軍內部的分裂，非到爆發內戰的地步，不會停止的。根據合衆國際社的香港電，中共的「紅旗」雜誌最近刊載一篇報導，供認共軍正在進行大規模的「整肅」，甚至說由於毛澤東與劉少奇兩營的鬭爭，可能使中共的黨不能再行控制二百五十萬的紅軍了。這篇報導，透過北平電臺的廣播，雖然說華中經濟中心的武漢事變已被控制了，但局勢並不能保證毛營的勝利。這更可證明共軍內部整肅「反毛林派」的運動尚在展開中。中共由內戰而崩潰的火種，正在各軍區潛伏而蔓延。中共宣傳機構對此，業已公開承認。紅旗這篇報導，明白承認「武漢事變」並非一種「孤立的」與「偶發的」意外事件。所以奪權鬭爭距離結束還相當「遼遠」。彭德懷（前偽國防部長）和羅瑞卿（前偽參謀總長及偽公安部長）的串謀反毛，已在紅軍中發展組織，而且在武漢地區，這一「小撮」黨幹部和紅軍幹部的當權派，早已採取資本主義的路線，聯合起來「鎮壓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因此，這篇文章要求大家必須「把這些黨和軍中反動的當權派掃除到垃圾堆裏去」。誰都知道，自從毛自號召「文化大革命」以來，一切宣傳都以打倒劉少奇為中心，說他是走資本主義路線的當權派中天字第一號人物。可見紅旗此次指控彭羅兩營在紅軍中的串謀反毛運動，無非要坐實他們助劉反毛的罪名，亦即認為彭羅祇是劉營在紅軍中的代表，

「要把軍隊作爲反革命的工具。」假使紅旗的話都是事實，我們應可據此推斷，這股紅軍中的反毛力量，一定不只局限於武漢軍區之一隅。毛林派所以不能不視此爲「心腹之患」了。

毛魯澤東一向認爲「槍桿子上出政權」。他之所以拉捧林彪出來幫他對付劉少奇、彭德懷、羅瑞卿這些人，原是利用林彪在紅軍中的地位，替他掌握「槍桿子」。但目前顯已露出了馬脚，林彪並不能掌握全部紅軍，使他們大家「效忠」於毛魯了。紅軍既不能全部可靠，於是在軍隊中的大事「整肅」乃成爲必然的趨勢，而整肅的成敗，即爲毛魯政權的命運是否再能延續的關鍵。

即使一向號稱自由而袒護中共的紐約時報主筆先生也不能不在其七月卅一日的社論中，承認中共內部現已到了危機嚴重的階段。因爲毛魯這些年來把統治權抓得很緊，而今竟有武漢軍區司令員可以扣留謝富治和王力的行動，不能不令人有驚異之感。不問謝王兩人的釋放，是因爲周魯恩來的勸說，抑是林彪派傘兵降落的威脅使然，但對陳再道沒有懲處，即足表示毛魯政權的更趨衰落。而且該報的社論也認爲紅旗的報導，透露着紅軍有倒毛的可能，政權也「可能落入敵人之手」。的確，毛魯如果還不能把劉少奇、彭德懷、羅瑞卿、及他們所屬的一羣反毛林派人物「驅逐」出去，則毛魯以往在共黨和紅軍的「領袖威望」一定要垮下來了。從前西方國家一批誇贊中共業已有效控制中國大陸的淺見之徒，不妨等候看中共的「內潰」吧。但是，作爲領導討毛復國司令臺的中華民國政府，究不能僅以「等候」毛共垮臺爲盡其能事。（紐約華美日報）

『討毛救國』不能坐待（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

最近返國觀光的青年黨元老左舜生教授，在臺北曾向人表示，大意是說：毛共的失敗並非即是我們的成功。自由祖國必須達成準備反攻的任務。至於何時最適宜於實施反攻，大家應該信託蔣總統明智的決定。這些都是左氏的老實話。不過，我們即認為尙需補充一句話，那便是「討毛救國不能坐待」。

當然，我們深知時乘勢乃是勝利的要素。毛曾澤東尙且自稱「不打沒有把握的仗」。何況我們自由祖國的領袖蔣總統仁民愛物，非萬不得已，決不輕易用兵。但是，討毛救國已成爲政府十八年來所拳服膺的國策，問題只是在於應該把握即可到來的時機。而蔣總統對此必定時時注意國內外種種演進變化的時事，不會讓大好機會再行溜逝。

中共政權從掀起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一年多了，其內訌的劇烈，顯然日甚一日，自然不容我們否認此乃自由祖國政府討毛的大好時機了。史太林之死，我們未向祖國大陸共區反攻，失掉了一個「伐喪」的機會；大陸共區大鬧飢荒，造成了「五月逃亡潮」的時候，我們也失去了一個「伐災」的機會。現在，「紅衛兵」出現，造成中共內部黨政軍民的分裂，互相衝突，紛紜擾攘，至「武漢事變」而達於高潮。我們似乎不能再度讓此「伐變」「伐亂」的良機，悄悄的溜走了。

從前，我們因爲西方國家尤其美國向來「重歐輕亞」，乃身受其害，但自美國介入越戰以後，美國

願非墨守成規，視亞洲爲無足輕重了。不問他國今後如何想法，甚至英國工黨渴望由遠東撤退，以及美國部份政客夢想如何方可促成越局的和談，而站在自由中國朝野人士的立場，總不能不承認今天正是實踐國策的良機。海外華僑雖然不能完全知道我們自由祖國政府對於誓師反攻的大計，業已準備到如何程度，但總是相信蔣總統必能實踐其諾言，而非在臺灣坐待的。國家安全會議的設置，中華文化與運動的展開，便是決非坐待的明證。

共區大陸的武漢事變，迄今誰都不能預料其演變結果如何。但其內訌勢必要搞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則許多觀察家都持此看法。有一點必須認清的：不問毛林派或反毛林的劉鄧派之間的勝負如何，總之還都是「共產黨」。所謂「一丘之貉」。儘管武漢事變而外，可能再有其他省市中共內部的「武關」會顯現出來。如果只讓他們「窠裏反」，仍然反不出一個「反共政權」來的。因此，我們自由中國朝野上下，包括海外僑胞，必須把握此一時機，確實向着團結一致，作實施討毛救國的行動。毛林派匪偽政權崩潰的命運，固然已計日可待，但毛林派之失敗倒臺，並非便是我們自由中國之勝利成功。如果我們不能運用各種方法，因利乘便，轉化大陸中共內訌的反毛鬪爭，而使之變爲整個大陸人民的反共革命，則將來中共內戰後，如毛林派勝利，固必加重其殘暴統治。即使反毛林派武關成功，或將標榜和平共存的一套，以誘取蘇聯的支持，甚至導致西方國家對於中共謀取改善關係的濃厚幻想，豈非更將不利於我自由祖國的政府與人民？

也許有人認爲我們介入中共的內訌，反將促成共匪的團結，不如待反毛林派要求我們援助時，自由中國的軍隊立可予以實力的支援。這還仍舊是坐待「塵埃落定」的旁觀作風，應爲吾人所不取。而況主動權操於共黨中的一派之手，更非所宜。（紐約華美日報）

由『中共必亡』論說起（一九六七年八月廿五日）

——費正清也認為毛共將接近末日了——

鑒於中共霸佔十七年得的中國大陸混亂現象，即使一向袒護中共的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氏，也不能不於第廿七屆東方學者國際會議作出結論後，發表其新觀點。認為「中國歷史證明一代惡行與暴政，已足夠顛覆不可一世之征服者，北平政權即將接近一代的終點」。可見中共最近一年來所搞出來的紅衛兵暴亂行動，實已到了天怒人怨的境地，它的暴政影響所及，終使東方學者的國際會議產生一項理論，即「中共一如歷史上秦、隋、新莽朝代，可能不久即「絕其天命」了。」此種理論，早在十多年前中共劫奪之初，即有學者發表過。可惜若干存心為中共文飾辯護的美國學人如費正清氏之流，定為將毛魯澤東所領導的寇盜政權說得如何的活躍而有生氣，誇稱它們已在大陸上成爲有效控制的政權，因而影響到美國的外交政策。甚至今日尚存有能與毛共政權棄嫌修好的幻想。如今他們看到毛魯自己的殘暴作風，必然走到「多行不義必自斃」的埋葬之路，所以也不得不承認「中共必亡」說的可能正確了。

但是，我們仍願爲此種說法更進一步。中共之必亡，中共之必自斃，固然爲研究中國歷史者所確信。但其崩潰滅亡的爆發因素，仍在反暴政的民衆能夠揭竿而起，或者有號召力的人物挺身而出，公開主持反暴政的革命行動。否則暴政當局決不會自己願意崩潰滅亡的。故「中共必亡」之說，只是說對了一半，而尚有一半即中華民國政府的救民復國運動，仍須待海內外愛國同胞的自己起來與政府協同努力。

所應努力的要點有二：

①我們全國上下，必須乘此良機，萬衆一心，成立「討毛救國聯合陣線」，明定各方面參加此一運動者所應共同恪守的政治綱領，本着蔣總統所昭示的「不是敵人，便是同志」的宗旨，實現全國軍民空前的大團結。蔣總統乃可憑藉這個大團結的無比力量，一舉而摧毀那個史無前例的毛共殘暴政權。現在盡心竭力輔弼蔣總統的大人先生，是否對於上述大團結的工作已有具體努力的成果，可向大家報告？這是值得好好檢討的。

②國際上成爲我們反攻復國運動的絆腳石，當莫過於中美共同防禦協定。在這個經過杜勒斯與葉公超兩氏所簽訂的共同防禦協定及換文之中，中華民國在臺澎地區內的任何使用武力，除行使自衛權的緊急行動而外，必須爲雙方共同協議的事項。換言之，我們如要爲了反攻大陸而調兵遣將，必須事先徵得美國同意。十多年來，我們不能發動反攻大陸的壯舉，除了物質上的若干缺憾外，實在由於精神上受了這個協定的約束。但是，我們認爲時勢業已大有轉變，大陸上的極端混亂，已非毛共從前嚴密控制時所可同日而語。條約這個東西本來是應隨時可以修的，並非一成不變。我們應多運用外交力量，促使美國當局明白覺悟，即日與我國磋商因應大陸上的新情勢，而廢止該協定中的這種片面束縛。我們記得當年訂約時的葉公超外長曾經說過，救民復國乃是我們的自衛行動，當不在協定限制之列。而事實上這個協定束縛了我們的手足，是有目共睹的。故修改協定而解除上述的束縛，乃是我們必須急切努力達成的重大任務。（紐約華美日報）

林彪的報告與自由中國的對策（一九六九年五月五日）

中共的九全大會中，最值得注意的事，與其說是中共頭目人物的沉浮，不如說是林彪（毛曾澤東指定的繼承人）所作的政治報告。這份報告既由大會通過，當然就是中共今後所應遵循的政治路線。林彪的報告雖然冗長，但大要除了誇張中共的「成就」而外，同時譴責「美帝」「蘇修」勾結，企圖包圍中共，進行對中共作戰。因而呼籲大家團結起來，準備應付未來的戰爭，甚至核子大戰。他認為中共不怕戰爭，因為「革命可以遏阻戰爭，而戰爭也可促使更多國家的革命」。

他這篇報告的主旨，在欺騙中國大陸上被愚弄受壓迫的人民，盲從這批共酋，願為他們去充砲灰；另一方面也如怕鬼的人行夜路，自己吶喊壯膽，並且對「美帝」和「蘇修」警告，諷刺它們兩個都是「紙老虎」。如果爆發戰爭，結果必為中共所擊敗而走上埋葬之路。他要求亞、非、及拉丁美洲各國的無產階級民衆，與中共相呼應，共同摧毀「美帝和蘇修」。我們當不會忘記，前些時林彪曾把毛酋的游擊方略，「取得鄉村，包圍城市」，擴而大之，運用在「世界革命」方面。即是團結後進國家，擊潰這蘇美兩個「超級強權」。此次的政治報告，就是發揮這套「理論」而準備見之而行事。毛澤東和林彪既已明目張膽，以美蘇為其敵人，作為世界革命的對象，而美國及自由世界的一部份姑息主義者還在「自欺欺人」，妄想跟中共拉交情，其愚真不可及了！當此時際，中共毛林諸酋，高喊要加緊推進其世界革命

工作，也正是我們反攻大陸拯救同胞的良機。四月廿四日國防部長蔣經國將軍，向立法院國防委員會報告國防施政時，他曾分述五項要點：①強化復興基地，②擴大大陸抗暴，③掌握臺海優勢，④加強軍事建設，⑤提早反攻大陸。我們相信他所說的都是實話。最後他更勉勵全國軍民，共同努力做到①立不敗之地，②策必勝之謀，③存戒懼之心，④行冒險之實等四點，他更在結束報告時說了一句很重要的話，他說：「必死則生，倖生則死」的道理，大家應該認清楚，因為「策萬全者無一全」，惟有行冒險之實，則無不可成之事，無不可敗之敵。蔣部長所說的，正是國內外一般人所懇切期望於當局的。但願有一天蔣總統下令番師，海外一千五六百萬的僑胞，以及大陸上備受苦難的幾億同胞，必能與現居臺灣的一千三百萬同胞呼應結合，完成中興復國的大願。（紐約華美日報）

『珍珠港』日的十二週年（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十二月七日（在東方，是十二月八日）是美國十二年來的慘痛紀念日。提及『珍珠港』，幾乎沒有一個美國人不驚歎着的。的確，誰也料不到那無石油，無原料的日本，居然會由其軍閥們闖下這場大禍！而今，回顧一九四一年的十二月七日，倏已過了十二年了。此十二年中，有什麼變化沒有？

說無變化，變化却大極了。希特勒墨索里尼東條等都死了。勝利的羅斯福史太林也先後物故了。德國分裂爲二。意大利再入西方的陣營。日本也儼然有了一部民主式的憲法。四大盟國之一的中國，大陸不幸而淪入共黨之手，竟搬遷其政府於臺灣的一隅。美國已由民主黨而變爲共和黨執政。英國雖然又逢着邱吉爾老翁做首相，可是他已經倒過一次臺，往日大英帝國的寶物『印度』却已遠走高飛了。這些，那些，無一而非重大的變化。

說有變化嗎？從骨子裏一看，依然是一個強權鬭爭的世界，依然是一個緊張相持的大局。卽就珍珠港事變發生的太平洋局勢而論，今天（一九五三）的十二月七日，我們打開報紙一看，仍然是越南方面的戰事（總算韓戰在暫停中）。所與一九四一年不同者，不過彼時的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而此時的敵人却是共產帝國主義。不幸的是，共產帝國主義的胃口遠比日本帝國主義還要大，狼吞虎嚥，簡直要征服全世界。還有，更奇怪的，解除武裝而作無條件投降的德國與日本，目前都被他們從前的勝利者催逼

着，要他們重整軍備咧，這，還可以說有變化嗎？

可是有一重大不同之點，我們須得注意：十二年前，在珍珠港事變爆發之前，美國輿論正在爭辯着一個大問題，即：美國究應不管歐亞兩洲之事而置身局外呢？還是美國不當而且不能置身事外呢？但是目前，除了極少數死硬的孤立派份子而外，美國再沒有人公然唱着閉關政策的了。美國的陸海空和陸戰隊現已駐遍了四十多個國家。就噴氣機的速度而論，美國與歐亞非三洲的距離，已不是『遠在天邊』，而變為『近在目前』了。不但此也，人類且已在此十二年間，發明製造了一種武器，祇用二三顆炸彈，就可毀滅一個最大的城市了。因此，十二年前，美國國會裏很可能因一二票之差，打消了徵兵法案。而目前則徵兵之在美國，幾已成了『家常便飯』，與美國人的生活不可分割了。美國現已擁有一般巨大的國防力量，全球的防衛基地；每年支出的國防經費有四五萬億美元之多，為平時所未有。在如此一種較十二年前緊張萬倍的局面下，美國已知所戒備了。敵人除非愚蠢萬分，再也不敢貿然來一個『珍珠港第二』。

就美國而論，其三軍實力，自較十二年前大為進步。陸軍：十二年前有三十七師（包括菲軍一師），官兵凡一六五萬人（其中含有空軍官兵三十五萬四千人）。目前則有二十六師（空軍不計在內），凡一四〇萬人。不過美國目前的一師，其人力與火力遠非十二年前的一師所可比。海軍：十二年前有官兵三十二萬五千人，戰艦船隻三四〇艘，飛機三千四百架。目前則有官兵七十八萬五千人，戰艦四百艘，九千九百多架飛機。空軍：十二年前尚未獨立，隸屬於陸軍的祇有官兵三十五萬四千人，一萬二千架飛機。目前則有官兵九十四萬人，飛機一萬七千架。而飛機的性能又遠勝於十二年前者。美國的聯合參謀

本部，現正編造來年度的國防預算，大約估計要達到四百三十億元之鉅，在承平時期的可說是登峯造極的軍事預算了。可知美國朝野目前決不在夢想什麼可以安然到手的和平！

美國現在所感煩惱的是：目前的敵人，遠較以前的德日意軸心為厲害，為強有力。而同時，美國目前的盟邦，力量却較十二年前者為遠弱。德日意，雖已由敵而為友，但除意國有些象徵性的軍隊外，德已至今尚未實行重整軍備。英國雖仍為美之盟友，但兩次大戰已把英國打得精疲力盡。中國能為美國助者，只剩了臺灣的八百萬軍民，而大陸上衆多的人民却被迫着「反美」。與美為敵的蘇聯，如今已擁有世界大陸的四分之一，和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二億四千萬人）了。而且，最須重視者，德日意所唱的是「國家主義」的調兒，別的國家不易上當。可是蘇聯所挾持的是共產主義，沒有國界的，所以共產主義者的滲透工作，造成了空前的第五縱隊。美國在珍珠港日十二年的今天，最頭痛的就是這一問題。（
檳城光華日報）

駐韓美軍撤退與美國的新戰略 (一九五四年一月六日)

艾森豪總統昨日携眷飛赴喬其亞州奧古斯塔城，度其聖誕假期；今天就在該處宣佈，他已決定先自動撤退駐韓美軍兩師。這從表面看，似是一驚人之筆。但如果從兩三個月以來五角大廈的空氣測探，應知此乃艾森豪政府預定之事。他的國防部長威爾遜曾說過美國準備減少其駐紮國外的陸軍人數，並因此引起西歐國家尤其法國的顧慮與恐懼。讀者當還憶及，後來杜勒斯趕緊聲明，美國無意削減其駐歐軍隊的數目，方平息了西歐方面的議論。可是美國現因迫於國內來年度預算案編製，決定要大減支出，勢不能不核減其陸軍人數總額十分之一。而美國的戰略新觀念，彷彿也決定把握「火力重於人力」的方針，傾向於注重空軍與新武器（原子武器當然為其主要新武器之大宗）。由於這兩個基本觀念，美國的削減駐外軍隊，自為題中應有之義，無足奇也。或許有人以為韓國戰事是否重啓，尚無把握，而美國出此部分班師之舉，無乃不智？但艾森豪總統的文告，明明警告共方決定膺懲侵略而毫無退縮之象。艾總統指出其所以有此先撤兵兩師的決定，乃由於（一）韓戰已停了五個月，而大韓民國軍隊又在日益壯大中，加以（二）美國空軍已有空前的機動性和攻擊力，故美國不必如戰時一樣駐有許多地面部隊在韓國。撤兵兩師乃第一步，以後將視情勢許可而陸續撤返美國。他更直接聲明，此事並不妨礙美國隨時阻止侵略的決心，如果竟有侵略情事發生，美國自必用效力更大的方法對付之。他並且引證在韓共同作戰各國的

宣言，透露意思，如果韓戰再啓，聯合國軍隊的反擊將不復以韓境爲限。同時，美國在遠東仍維持相當龐大的海軍空軍和兩棲部隊的武力，以維護該一地區的和平。可知艾總統此舉，除了表示美國絕無任何侵略野心，並顯以事實顯示願意促成減輕軍備競爭的重負，以推進和平空氣之外，絕對不是對侵略者意存姑息，放任共方在遠東再逞野心。然而，在美國正式公布此一決定之前，要不能不有若干因素促成艾總統作此英明的決斷。第一，美國預料共方不敢再犯，自討苦吃。據最近周遊遠東中東近東而返美的尼克遜副總統，與方由韓國談判政治會議的預備問題毫無結果而回的狄恩，向艾總統與杜勒斯的報告，都認爲北韓境內的共方，似無重行發動的模樣，他們一致判斷韓國不會再有戰事。其觀察的根據，則謂中共已因三年韓戰而精疲力竭，正想休息，從事所謂五年計劃。其在北韓，他們也意在重建其殘破的工業。加以蘇聯現正進行和平攻勢，故共方未必會因美國的撤兵兩師，而卽自蹈錯誤，再行悍然進犯南韓。

第二，即使共方果眞狂妄如故，再來一次侵略，美國應付的戰略，亦決不願再走過去三年韓戰僵持於卅八度上下的老路，自必採用極度機動性的戰略，爭取在何地作戰的主動權，故亦不必再需要與從前韓戰劇烈時期相等的陸軍人數，於南韓一隅之地。換言之，美國今後的新戰略，將是一種活用其部隊的手法。大概他們與其注重於陸軍的人數，不如注重於陸空配合與海空配合的行動，再益以跳傘部隊的突擊，務使敵方不勝其招架之苦，而鴨綠江以北，更將不是替中共保險的安全地帶，自不待言。至於未來韓戰是否用原子彈這一問題，美戰略家及與軍事有關人員，都不願在此時有所提及。因爲一則深恐蘇聯將藉此故事宣傳，硬說美國將以新武器屠殺亞洲人，二則美國亦不願使若干自命爲中立的亞洲國家對美國有所誤會。美國當局認爲韓國政治會議既無開成之象，大概聯合國大會在來年（一九五四）二月間再行開

會時，勢必重行辯論韓國問題。故美國不願因所謂原子砲問題而喪失若干政治上的亞洲朋友。照目前情況判斷，美國政府已經瞭然於韓國之和平統一，絕非共方所能同意，而共方亦未必再事冒失，在最近期間南侵，從事於武力統一。因此美國料定韓國南北分裂之局，勢必無限延長。同時美國也決不願改變態度，贊成李承晚總統的「北伐統一」政策。美國在作此觀察之後，其唯一的出路，自然只有姑且容忍韓國分裂的現狀，而用積極訓練裝備南韓軍隊，以代替美國駐韓陸軍，暫維高麗半島的苟安之局。在這樣拖宕政策下，一面仍開着與中共談判之門，讓英印等國從中可作肩客，作黑市買賣，一面可以陸續抽調美軍回國，既能獲得人民對政府的信賴，又能準備留此陸軍力量，作為他處一旦有事，收穫機動使用之便利。我們且看，共方是否甘心在遠東放手，讓美國打成他的如意算盤？（橫城光華日報）

空谷足音（一九五四年一月八日）

——美國國務院遠東司長羅勃臣的遠見——

一九五三年的歲暮，華盛頓與紐約之間，謠言滿天飛。不是說馬立克僕僕風塵於倫敦與莫斯科之間，奔走接洽什麼秘密，即是說波倫大使在莫斯科，代表美國，與莫洛托夫密談什麼問題，而艾森豪總統宣告駐韓美軍先撤兩師，更被人引為亞洲將再無戰事的佐證。甚至報上還載着英印等國人士如何在紐約活動，進行黑市談判，要蘇聯同意日本，西德，西班牙等國的加入聯合國，作為美國承認中共進聯合國的交換條件。更奇怪的，且有謂美國可能考慮承認中共，而以保障臺灣，力助其另成一個獨立國家，使中國硬分為二，以圖東南亞的苟安一時。當然我們相信這些都是國際軟骨頭的人們，配合一部份美國商人的胃口，在故弄玄虛，並不一定有什麼事實根據。但就過去若干月間，杜勒斯常常有衝口而出的談話，譬如考慮臺灣託管呀，美國並未說過永不承認中共呀……這一類淆亂聽聞的話，加以推蔽，則空穴來風，我們也不可太過大意，以為萬無此事。

可喜的，在這烏煙瘴氣的謠言攻勢中，記者今天得在來年一月一日將出版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週刊中，拜讀了美國國務院遠東司長羅勃臣所第一次發表的一封舊信，——一九四九年十月八日，他答覆當時赫赫有名的無任所大使吉索普的一封信，除深覺其字裏行間，義正詞嚴，堅決反對承認中共偽政權，大有喜聞空谷足音之感。記者縱非好飲之徒，如果有酒在手頭，亦當不惜拼醉，浮一大白。

羅勃臣，這幾天正偕同雷德韜上將訪問遠東，由日而韓而臺而菲，明天（卅日）參加菲律賓新總統麥賽賽就職典禮。在他們會晤蔣總統時候，我相信他們一定會談到中國的未來問題。於對外面種種搖言，當有雲霧一掃之望。我在扼要介紹羅氏這封舊信內容之前，對羅氏個人經歷有一述之必要。他在韓國停戰簽字前的一個時期內，與李承晚總統的耐性晤談，使李老先生終於同意美國的忍讓停戰政策，是他最近在外交上成功的一件大事。他本來是佛傑尼亞州列治蒙城的一個商人，可是一入外交界，即對中國很有密切關係。一九四五年中國尚在抗戰期間，他以公民資格，供職於重慶美國大使館。在赫爾利大使去職（一九四五年）與司徒雷登大使繼任（一九四六年）之間，且曾任美國駐華大使館代辦。前後凡一年半。馬歇爾將軍奉命調停國共爭議期間，他又出任北平軍調部主任凡十個月。所以他自己承認，憑他的外交經驗，知道最清楚的是中國的實情。他最初曾向馬歇爾將軍建議過，美國試與中共談判，必招致無比的禍害。可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後來到了一九四八年之初，中共尚未控制關內，他又向國會供證，力謂美國對華，不可無堅定政策。美國如不幸因搖擺不定而失去友好的中國，則在東方取日本而代之者將為蘇聯。美國的太平洋戰爭可算白打。但是當時杜魯門政府始終不悟，且準備在國府軍隊撤出大陸前後發表白皮書，以為落井下石之舉。而此有名的白皮書起草者，即為羅勃臣寫信給他的吉索普。

在答覆吉索普的長信中，羅勃臣首先替蔣總統叫冤屈。他說，在八年抗戰，民窮財盡之境，蔣總統成爲中國自己錯誤和美國政策錯誤的雙重犧牲者。大家都把一切罪過歸責於蔣總統一人之身。而美國當時若干外交官員的報告，紛紛攻擊國民黨的腐敗，甚至估計錯誤，竟認爲中共乃民主革命者，或農村改良主義者，遂使美國執政當局走上歧途。他更追溯抗戰時期中國政府艱苦支持，從不爲日本和談所誘，

拖住了日本百萬軍隊的泥足於大陸之上，間接有功於美國的對日作戰。可是美國在菲島戰爭已獲勝利之後，爲了要拉蘇聯參戰，而在雅爾達會議中秘密斷送了中國東北的權益。不僅此也，當一九四五年中國財經狀況萬分艱窘時，美國理應如一九四二年之貸與鉅款，乃竟掉頭不顧而改變其一貫政策必欲強令國府容納中共，改組所謂聯合政府，然後予以借款，否則免開尊口。於是在中國最危急之時，卽爲美國斷絕援助之時。故中國之喪失大陸，美國問諸良心，應負相當責任。

至於目前（在一九四八年十月寫信時）美國應如何補救呢？羅勃臣堅決反對承認中共政權。（按那時英國已在秘密策動承認）。他說中共的暴政終必激起中國人民的反感，久而久之，其所遇困難愈多，而最後難逃其崩潰的命運。假使美國承認中共，無異替暴力政權撐腰，而使中國人民喪失其解除枷鎖的希望。（續城光華日報）

俄毛分裂與美國（一九六四年九月三日）

中共最近答覆蘇聯的信，拒絕參加蘇聯共黨準備十二月十五日在莫斯科召集的國際共黨預備會議，商討明年舉行的國際共黨全體代表大會。就它的措詞嚴厲來看，無怪西方記者認為這是中蘇共黨正式分裂，亦即國際共產陣營正式分裂之開始。

例如說：「當你們走向反共、反民衆、反革命路線之際，馬列主義者豈能與你們達到協議或採取共同行動？」又說：「假使中共參加你們所召開的國際共黨分裂會議，便等於承認蘇聯的非法行動爲合法，接受蘇聯共黨爲父母黨了。」總之，這些話，表示着中共只承認它與蘇聯共黨的關係有如兄弟而非父母之與子女。此在毛酋澤東，似乎他已忘記了十幾年前居心叛國時大喊其「一面倒」那回醜事了。而中共所使用的「反共、反民衆、反革命」這一套爛熟的詞彙，從前都是用來反對中國國民黨，反抗國民政府，以及反對「美帝」的，現在都加到蘇聯共黨的身上了。這難道還不能說明兩者之間的分裂現象，已到了無可彌縫的地步嗎？

實際上，中蘇共黨的分道揚鑣，是由雙方利害衝突而出發的，無關於所謂理論的鬭爭。早從赫魯曉夫割斷或減少對中共的援助，並拒絕幫助中共發展核子武器的時候，雙方已經形成分裂了，不自今日始。不過，我們自由世界對於這種貌合神離的國際共產陣營，千萬不可誤認爲不妨坐在那裏觀變，必有便

宜可討。尤其不可過於天真，以為我們應該左右吊勝，一面想討好蘇聯，一面又想安撫中共，如此方能既免核子大戰，又可潛消世界未來的赤化大患。須深切體認馬列主義信徒們的惟一目的在使整個世界赤化，中蘇共黨之所爭只在於如何達成目的之技術，而絕無最後目的之歧異。所謂「殊途同歸」一語，正是他們雙方運用策略的寫照。我們從前曾說他們在唱雙簧，便是指出這一點。

根據若干西方外交家的看法，他們以為中共的拒絕蘇聯邀請並非意外，而且中共可能策動北韓、北越、日本、印尼、紐西蘭、以及阿爾巴尼亞的共黨，附和中共，另外舉行一次「分庭抗禮」的國際共黨會議，向蘇聯表示其不甘屈服。所以紐約時報的社論，猜想中共可能開始製造其「第五國際」。但我們必得始終認識清楚，不管第三國際也好，第五國際也好，他們的假想敵人同是帝國主義者，同是資本主義者，同是殖民主義者，而且他們都以美國為此一個「反對」陣營的領導國家。站在美國人的立場來說，並無可以跟蘇聯，或中共，或他們所結成的任何一個集團携手合作之理。

惟蘇聯和中共的分裂，總比不分裂為好。敵人方面的分裂，多少可使自由世界的決策者有隙可乘。我們如果稍稍懂得縱橫家的策略與技術，斷不會坐視俄毛之分裂而毫不作主動的策劃。就美國目前對全球所負的責任而論，牽涉之處過廣，似乎不能不下一下輕重緩急。果爾，美國自當首先解除東南亞所受中共的威脅，而其主要敵人當然是中共了。

美國居於自由世界的盟主地位，不能不首先在捍衛東南亞的自由安全方面樹立其威信，自更不應使中共享其「保險地帶」的特權而南向進行其滲透覆顛。美國只膠着於南越境內的局部戰，而不乘俄毛分裂之際，拔除中共的禍根，則亞洲終不能得和平、安全與自由！（紐約華美日報）

俄毛戰爭的可能性（一九六九年八月十六日）

俄毛之間，由所謂「理論鬭爭」而發展到「邊界衝突」，其交惡的程度早已進入新階段。而八月十三日雙方宣佈在新疆邊界的武裝衝突，則其情勢似較前尤為嚴重。根據俄毛互相抗議的指責，雙方軍隊不但均有死傷，而且都是指責對方啓釁。北平電臺更宣傳預料俄軍將大批增援，隨後亦將有更多衝突。五天以前，俄毛代表方達成所謂「界河談判」的協議。一般人認為俄毛在西伯利亞與東北數省間的邊界緊張情況宜乎可以鬆弛。乃一轉瞬間忽又在我中國大陸西北邊界爆發新的戰火，遂使雙方的關係更形惡化。大家不免要問：俄毛之間的「武鬭」，果將因星星之火而燎原否？

不久以前，據美國新聞週刊的報導，美國防部估計俄毛大戰的可能性為五對一。而一位日本的中共問題專家則認為最近幾年間俄毛大戰的可能性為十對一。不問他們所估計戰火爆發機會的或多或少，總之是不能判斷其絕對不會釀成大戰。何以故？因為莫斯科與北平這兩個共產政權——尤其是共曾毛澤東——一定要爭取共產陣營的領導權，已有騎虎難下之勢。此其一。俄國與中國大陸之間，由西而東的邊界有四千哩之長。其中的外蒙，名為獨立，而實已成爲蘇俄的「外府」，並不能作爲俄毛的緩衝地帶。故雙方「武鬭」隨時可發生。此其二。俄國在歷史上久爲構成中國北方邊患的侵略者，蘇聯雖一度曾經標榜廢棄沙皇時代所壓迫清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但絕未放棄沙皇所獲得的中國土地。這便使「偏不信

「邪」的毛澤東，可藉「民族主義」的招牌，號召「外禦其侮」，而減少「內訌」的威脅。此其三。自毛共有了原子彈以後，蘇聯深恐其勢力日張，終將為俄國東方之禍源，渴欲乘機以摧毀其製造核子武器的基地和設備。此其四。新疆是向來民族雜居的地區，亂源火種，潛伏待發，可供蘇聯利用之空隙，俯拾即是。由蘇聯看，新疆地區爆發的戰火，比較在黑龍江烏蘇里江邊界爆發，有利於蘇聯者為多。況自中共「內訌」以後，蘇聯顯然在一面暗助及毛林派的共營，作為顛覆毛共政權的工具，一面企圖由侵略新疆入手，部署另一個「傀儡政權」，與毛共「分庭抗禮」。故新疆方面的邊界衝突，其嚴重性較東北方面者為大。此其五。

我們誠然不能臆斷俄毛之間終將不免發生大戰，也並不存有「幸災樂禍」的心理，希望俄毛大戰的早日爆發。但就王明、彭德懷、乃至最近賈龍奔投蘇聯的報導來看，蘇聯步步為營的顛覆毛共活動，正在日益加強。而同時又在外交方面，企圖乘英美先後退出遠東的間隙，鼓勵亞洲國家締結圍堵中共的組織。可知蘇俄今後的鬭爭目標，其重點已由歐洲而轉移亞洲。另一方面，毛共為了加強控制大陸人民，使其殘暴政權能夠苟延殘喘，也正在針鋒相對，高喊蘇聯跟着美國包圍中共，以準備對美聯作戰為號召。在雙方相激盪的情勢下，演變到俄毛大戰的爆發，並非絕不可能。

我們回想毛曾二十年前大喊「一面倒」，仗着史太林的撐腰而竊奪中國大陸，曾幾何時。而今天似以蘇俄為其大敵。毛曾是詭計多端的傢伙，自稱不打無把握的仗。此番為什麼要高喊「蘇聯跟着美國包圍中共」呢？說不定他蓄意要誘致美國支持他，以免兩面作戰。美國要千萬小心，不可墜入其圈套中！

（紐約華美日報）

日本復興與亞洲的前途（一九七四年四月八日）

日本爲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但經過二十五年，今日已一躍而爲寰球第三個富有的國家，僅次於美國與蘇聯。最近在大阪揭幕的萬國博覽會，便是它經濟復興而且蒸蒸日上之象徵。今天亞洲的自由國家，目覩日本戰後復興之速，竟使美國懇切提携而希望它成爲其合作的「夥伴」，共同致力於亞洲的開發，不禁既羨慕而又疑懼。日本昔年在侵略中國以後，發動太平洋戰爭，以所謂「東亞共榮圈」相號召，其經濟侵略的印象至今猶留存於亞洲人的心目中。所以日本今後如何展開其援助亞洲國家的工作，對於亞洲未來的前途所關甚鉅。

日本戰後經濟復興的奇蹟，由下列數字可以見之。當一九五五年時，其國家總生產額約爲二百四十億美元，居於世界工業國家之第八位，到一九六二年却已躍進爲六百八十億美元。且據專家估計，今年日本的國家總生產額約可達到二千億美元，雖尚只等於美國的五分之一，但如它的經濟滋長之速度能繼續維持過去十年間的平均數，即每年滋長百分之十二（去年爲百分之十四），而美國則仍爲百分之四。則距今卅年後，即二〇〇〇年時，日本的國家生產總額當可凌駕美國而上之。果爾，日本將「大躍進」而成爲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甚至有人認爲「七十年代」乃是「日本的十年」，而廿一世紀可能就是「日本的世紀」，宜乎日本人颯然有顧盼自豪，志得意滿之概了。但是，世運興衰，循環往復，老子所謂

「福兮禍所倚」，亦往往出乎意料之外者。日本今後之所爲，如重蹈其明治維新後，一戰勝清，再戰勝俄，即步上侵略中國，妄圖席捲亞洲之覆轍，則今日之經濟復興，亦來始非他日再遭禍殃之伏線。易經所謂「亢龍有悔」，所謂「滿招損，謙受益」，日本人能不引以爲戒嗎？

就目前的情況而言，日本對美的貿易額業已超過八十億美元，打破兩國間的紀錄。而其生產力的增長方興未艾。例如它的造船工業，已冠全球，去年所造新船的噸位，幾佔全球總額的半數；汽車產量已躍居世界的第三位，且能行銷於美國而爭取其市場；其鋼鐵產量到一九七五年時可能超越美蘇，而達一億六千萬噸的鉅額；日本工商企業已進入使用電腦的時代，除美國與西德外，爲任何國家所不及。到一九八五年時，其使用電腦的數量，如以人口平均計，可能與美國相頡頏。日本貨品現已遍銷全球各國，與各大工業國家相競爭。甚至美國人願買其汽車，西德人願購其照相機，其他更無論了。

或者以爲日本工資低廉，佔了便宜；但其他亞非國家的工資更低於日本，其所產工業原料則多於日本，而何以它們的生產力望塵莫及？日本是一個島國，既無鐵，又少煤，許多原料更須仰賴由他國輸入。日本在今日，彷彿十九世紀的英國，它是要靠輸入原料，加工製成工業品再輸出以獲利。它的援助開發亞洲以及非洲拉丁美洲的計劃，其主旨在吸取它們的土產原料，銷售日本的工業品。如果它只向此目標進行。豈不等於希望所有開發中的國家都成爲日本的原料供給地和成品的銷售場，自將難免招致所謂「經濟侵略」的反感。

至於日本何以能於戰敗後經濟復興如是之速？我們很客觀的說，可有下列幾種因素：

○日本可說是受了戰敗之福，而賜福於它的是中美兩國。就中國言，蔣總統對日本採取「以德報怨

「寬大政策，絕對放棄賠償戰時損失的要求，而且主張保持其傳統的天皇制度，使它獲致戰後社會的安定，同時宣佈中國不派兵駐日作為佔領軍，藉以杜絕蘇聯派兵參加佔領日本本土的妄念，因而日本不致蒙類如德國的割袋為二的惡果。就美國言，則在盟軍統帥麥克阿瑟將軍的督導之下，使日本不但不必賠償損失，而日大量援助日本，使它獲得最新的機器，學得最高的技術，並指導實施土地改革計劃，使其工農業能齊頭並進，欣欣向榮，較之英法諸國後來居上，可謂「因禍得福」。

② 麥克阿瑟將軍指導日本制訂新憲法，規定不許建軍以防其侵略，因之日本人民不必負擔鉅額的國防經費，卅多年來，一直託庇於美國「核子傘」保護之下，安心致力於工農各業的經濟復興工作。

③ 一九五〇年韓戰爆發以及後來越戰的繼續，都使日本成為軍需供給的後方基地。所以能於極短期間成為「暴發戶」。

④ 我們自然不能抹煞日本全國上下自奮自強的精神。他們在二次大戰失敗以後，茹苦含辛，埋頭猛幹。農業機械化，使農民人數減少從而使工業所需的人力得以大量供應，加速其工業的成長。日本的總工會，雖在左派掌握之中，但對於生產工作大都能配合政府的指導，各行各業尋求勞資協調的方案，各種企業得以突飛猛進。在企業家方面，亦復如是，大體都能在政府督導的大方針之下，相互配合，儼然成為一整個有機體，加速其生產能力的發展。教育方面的注重數理與科技，則更符合工農各業發展的需。甚至家庭工業式的小工廠，及在家製工作的婦女，亦都能從事手工藝品的製作，爭取外銷市場。其在金融業方面，則在國家銀行支助之下，以全力從事信用貸款，幫助有希望的企業更求發展。有人認為日本社會宛如一架大機器，在政府有計劃的管制競賽的集體主義之下，分頭前進，達成其為國家爭取世

界市場的最高目的。

總之，日本人在美國扶植之下，憑其對內競爭，對外團結的精神，已使其復興的經濟寔寔有與美國爭雄之勢。而猶不以爲滿足，更希冀藉「政經分離」的掩飾口號，進而使毛共控制下的中國大陸亦成爲其採購原料推銷成品的場所。甚至妄圖與毛共作政治的接觸，即使損害對中華民國的邦交，亦或有所不顧。而具經濟勢力之擴展，不僅促使自由亞洲各國疑懼，寔假而使美國亦不能不有所戒備。最不可恕的，便是日本一方面對國際要求自由貿易，好讓日本貨品源源輸出，而對國內則實行保護關稅政策，以高度的關稅壁壘，除其所需的原料而外，阻遏外國貨輸入的競爭。這種「有我無人」的作風，如何能長久作他國的「夥伴」？加以經濟繁榮之後，國家主義的思想已在抬頭：當局透露有重建軍備，稱霸亞洲的雄心。設日本經濟復興以後，走回戰前的老路，可能重蹈危害亞洲的覆轍；爲日本人計，亦非計之得也。（紐約華美日報）

美國與亞洲（一九七〇年十月八日）

從羅斯陶的短文說起

美國是一個介乎兩洋（大西洋與太平洋）之間的大陸國家。所以它不止是一個陸權國家而且同時應該是一個海權國家。不僅此也，它的建國歷史，由大西洋沿岸的東北部十三州於獨立戰爭後組成聯邦起，其主要趨勢是向西開拓發展，直達太平洋沿岸，與亞洲隔岸相望。正如它隔大西洋與歐洲及非洲相望，其形勢並無二致。早在二十世紀的初葉，修奧都，羅斯福總統即曾提醒大家，今後將為太平洋時代。美國不能不注意到亞洲未來的發展。雖然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在戰略上有重歐輕亞的決策，但事實上決不容許美國置亞洲於度外，則盡人皆知。

自尼克森總統去年在關島發表宣言，透露其要求亞洲國家今後應增強其自衛聯防的實力，美國只能予以軍經援助，而不再派兵直接參加在亞洲的地面作戰。世人乃都認為美國將從亞洲撤退。但我們相信，美國朝野縱使渴望如此，而外來環境的形勢逼人，仍將使美國政府未必能如願以償。

最近，我們在九月廿一日至廿三日的紐約時報上，讀到曾任詹森總統外交顧問的羅斯陶所寫的「美國與亞洲」三篇專欄短文，不禁對此問題也想一述吾人之所感。

羅斯陶自稱，他欲解答下列三個問題：①美國在轉移使用其資源於內政方面的同時，是否仍能持續履行其在亞洲方面的承諾？②從亞洲撤退的結果，能否證明這雙方兼籌並顧的政策是正當的？③未來的

亞洲對美國究將有何影響？

對於第一點，羅氏先說本世紀以來，在五十年代以前，威爾遜、羅斯福、與杜魯門總統均能內外兼顧，未感捉襟見肘。直到甘迺迪總統任內，同時面對對內對外的重大問題，他希望能逐步解決，避免危機的發生，不幸因遭狙擊而未克如其所願。詹森總統繼任時，由於國內「民權運動」的狂潮業已發端，南越吳廷琰總統的被刺，美國內外的危機日增。迨尼克森總統執政，而此項內外交迫的危機更形熾烈。於是有人呼籲從速解決對外承諾的枷鎖，以便全力從事於內政方面的革新。他們彷彿集矢於美國的介入越戰，以為國內的種種擾攘，例如學潮、黑權、環境污染、罪案激增等等，無一不歸咎於越戰。實則並不盡然。越戰的費用，佔國民總生產額的百分比不及百分之二。即使東南亞確保和平，而此項經費全部停支，固可希望對內政有所裨益，然為數亦屬有限。而況美國內政方面所感到的困擾問題，其發生的原因非常複雜，決非僅賴政府增撥若干經費所即能解決。

羅氏列舉十年來政府各項目的支出，所佔國民總生產額百分比的數字如左表：

項目	一九五九年	一九六八年
國防	一一·〇	一〇·七
社會服務	九·七	一四·二
國債利息	一·四	一·四
政務及治安	二·二	二·五
經濟及環境	四·四	四·六

按照上表，可見自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八年的十年之間，用於全部國防的經費（越戰包括在內）所佔百分比只有減少，而用於其他方面的內政如教育及社會福利事業者則加多。羅氏並且以為政府增撥若干經費，雖可有助於尋求如何實踐民權平等的方法，但並不即能助長黑人所欲力爭平等的自尊心，更與履行對亞承諾無關。

羅斯陶對於第二點的問題，其意見約如下述：他認為美國目前有一部份人，因為感到內政問題迫切需要妥善的應付，便主張不妨拋棄其對亞洲所作的承諾。不管如何，只好讓亞洲自己去料理，戰爭也好，和平也好，反正美國不必插足其間。這種想法，實在危險。其結果則美國從越南匆遽的退出，可能促發亞洲地區的核子競賽。第一，美國此種政策，將使目前中國大陸上的毛共內部原來在相互鬭爭的，一變而乘機南侵。以正在趨向發展核子武器的毛共，加以擁有龐大的陸軍，它決不會坐失此一良機。第二，東南亞各國，遠至星加坡或印尼為止，它們本可在美國蔭庇之下從事經濟的社會的改進，却因不得不分其一部份力量用於軍事方面，否則或將喪失其獨立。第三，緬甸不是為中共所控制，即為中共與印度鬭爭之場所。第四，日本與印度可能急起直追，自己努力製造核子武器，因而破壞了以前簽訂的禁阻核子擴散條約。這是由於它們對美國的信心動搖，可能不再視美國是可靠的友邦或盟邦。舉凡以前信賴美國的國家均將有此感想。第五，美國人一旦看到此種事情發生，他們能否坐視亞洲的混亂，或世界性的核子競賽，而只顧關起門來從事於那清水與空氣的污染，及解決國內種族問題的爭執等工作？莫斯科與開羅的當局，以及他國人民，會不會懷疑美國仍將重演以前的故事，即美軍可能於某一時期由外國撤退，而另一時期重復被迫插足，援助外國？

關於第三問題，則羅斯陶以爲未來的亞洲如何演變，不容許美國淡漠視之。全世界人口，亞洲佔百分之六十，再過三十年到公元二千年時，亞洲將有三十七億人，等於美國之十倍。而且亞洲人今後正在努力向前邁進中。以日本爲例，現已爲世界上第三個工業國，追及蘇聯，可能進而追上美國。他如南韓、中華民國（臺灣）、泰國、星島、馬來西亞、以及印度、巴基斯坦、印尼等等，都在力求進步，趨向現代化。中共的中國大陸地區，雖受了「大躍進」及「文化大革命」的兩次打擊，經濟發展停滯了幾年，但可能也改變政策而圖使其經濟正常化。亞洲各國的人口膨脹誠然是一個難題，但各國因爲都想在一個現代世界上獲得其平等地位，故努力前進是必然的趨勢。如以每人所得的入息而言，則亞洲各國的人固然仍屬比較窮困（每人全年所得平均約爲三五〇美元），但因其人口之多，故亞洲在二千年時將爲權力爭霸之焦點。尤其美國目前對東南亞的承諾，如有改變，急劇後撤，則對於亞洲未來的影響勢必甚大。假使美國有妥善的步驟與佈置，則可以造成亞洲未來平衡的局勢，不致讓中共對外作無限的擴張，亦不致形成被其他某一強國所獨霸。否則美國如舉步一錯，可能釀成太平洋上未來的危局。總之，美國決不能置亞洲於不顧，亦不可片面的作急劇的撤退，以貽無窮的後患。故美國儘可善用其資源，一方面致力於內政的改進，而另一方面，仍不遺棄亞洲，這才是正當的辦法。

羅斯陶的立論雖然實獲我心，但他建議要待中共坐大而與它和平共存，並望亞洲各國自己能構成一種制衡中共的勢力，則不免陷於幻想。（紐約華美日報）

對今後亞洲局勢演變的看法（一九七〇年十月十四日）

讀了羅斯陶的論「美國與亞洲」三篇文章以後（見本報八、九兩日社論），我們以為對今後亞洲演變的看法，不能不有左列幾點認識，從而策劃自由世界各民主國家尤其是美國的應付方略。

①亞洲的未來趨向，將為世局演變的重心所在。而亞洲的禍源，即在於中國大陸上的中共殘暴政權。故如任毛共政權持續下去，則亞洲難望和平，亦即世局不得安定。

②美國為要減少對於維護自由亞洲所負的責任，則至少應該積極盡力，促成亞太地區各自由國家聯防體系的實現。亦即必須說服日本、南韓、中華民國（臺灣）、菲律賓、南越、寮國、柬埔寨、印度、巴基斯坦、星島、馬來西亞、緬甸、澳洲、紐西蘭等國，使大家能領悟中共政權的存在終將為亞洲之大患，而相互合作。在美國核子大力掩護之下，結成真正足以反共防毛的聯防組織。

③日本今天的經濟躍進，似已使其國民總收入（G.N.P.）可達二千億美元之鉅額，居於世界第三個工業國家之地位。今後如仍祇以國民總收入的百分之三用於軍備，而大力發展經濟，則至公元二千年時其工業能力可能超過美國。但假如自目前起，因美國擬從亞洲撤退，而使日本再武裝，或甚至從事核子武器的研製，則又可能釀成其軍國主義的復起，招致亞太地區各國的危懼。故美國應用種種方法，務納日本於亞洲聯防體系之內，正如西德之納入「北約」之內一般，方無後患。

④中共目前雖能從「大躍進」及「文化大革命」兩次打擊中恢復過來，但內部奪權鬭爭未息，對外又與蘇聯衝突未已。且狂呼要人民「備戰」，以反「美帝」、「蘇修」為號召，則毛共可能走向從事軍備競賽的途徑。加以中共自恃人口衆多，毛曾又「不信邪」，即使冒核子大戰的危險亦在所不惜。毛曾前曾發言「美帝為紙老虎」。且說縱使在核子大戰中，大陸上死傷一半人口，尚有三四億人口生存，何必畏懼。美國對如此狂妄的獨夫，而尚要期望與之和平共存，真無異所謂「活見鬼」！

⑤中共最近想積極恢復其外交方面的活動，其主要意義穩定內部，分化敵人。對美國則力圖製造美國的「內亂」，拆散美國的盟邦，並加強支援國際間的「反美」力量。它不但力事支援中南半島（越南、柬埔寨）的共黨反美戰爭，而且破壞美國所策劃的以阿停戰，鼓吹巴勒斯坦游擊隊在中東繼續騷擾。甚至力助古巴，作為滲透顛覆拉丁美洲各國政府的基地。一方面固然反美，另一方面又可與蘇聯爭取共黨集團的領導權。與此同時，中共在現階段，正在使用其陰謀詭計，企圖拉攏日本，擴展其對日貿易，引誘日本不跟着美國走。對蘇聯則因邊界問題始終無法解決，雖俄毛最近恢復互派大使，但距和平解決有關邊界的爭執，為時尚遠。何況俄毛之間，尚有經濟的鬭爭，與意識型態的理論鬭爭，使雙方都以對方為「假想敵」。中共一時未必能釋然於懷，而重復且尊稱蘇聯為「老大哥」的往昔親暱的口號。我們因此不難想像，在毛曾未倒以前，中共內外的困擾問題，重疊複雜，它如何能安渡難關！

⑥中共更有兩個最大的焦慮之點：①為大陸上六七億人民「敢怒而不敢言」的怨恨，其「予及汝偕亡」的心理，實是遍地埋下未來起義反毛的火種。②是播遷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為海內外愛好自由的中國人所歸向的中心力量，對毛共政權不啻有如胸口所插的利刃。

綜合上述種種情勢，我們可以斷言，美國如有遠大眼光的政治家，果真要有一個和平安定的亞洲，只有一條可走的路，即是幫助亞太地區的各國結成聯合陣線，支持中華民國及其海內外歸向的人民，光復中國大陸，推翻毛共殘暴政權。舍此正路而不由，徒然夢想與毛共握手，和平共存，則時日愈長，禍患愈大！（紐約華美日報）

新歐洲的氣象（一九六三年一月七日）

歐洲共同市場，自發起組織及成立以來，爲時不過五年。西歐六國經濟之繁榮，已使世人刮目相看。首先倡議之法人莫迺（Jean Monnet）稱之爲「第二個美國」，誠可當之無愧。但此未來之「新歐洲」，其將爲美國之合作夥伴乎？抑爲美國之強大勁敵？則全視美國與西歐盟國之間，在今後數年之間如何開誠布公，和衷共濟以爲斷。其在蘇聯，則已視之爲「西歐壟斷的帝國主義集團」，而苦無方法以相競爭。縱欲結合共產集團諸國而構成一個經濟單元以抗之，亦屬有名無實。究極言之，歐洲共同市場，尙僅爲新歐洲雛形之一部耳。其終極目的固不祇限於經濟，而將以歐洲各國之政治團結爲目的。所謂「歐羅巴合衆國」（或可用華文簡譯爲「歐國」）之建立，庶幾近之。自羅馬帝國崩潰以來，民族國家之興起使歐洲分崩離析而不免於戰爭者殆千年矣。設歐洲共同市場果能於西歐建立政治統一之基礎，則在世界史上當然爲一大事。目前雖距目的實現之日爲時尚遠，但其必爲談國際政治者所深切注意，無可否認。

根據報章雜誌關於此「新歐洲」之報導，吾人就其目前組織之輪廓以及成就之事業而觀，自不難測度其未來之發展。

「歐洲共同市場」之正式名稱爲「歐洲經濟社會委員會」，係根據一九五七年羅馬條約，由法、西

德、義、比、荷、盧森堡六國共同組成。在此項合作機構成立以前，早於一九五二年即有歐洲煤鋼聯營之組織獲得卓越之成績。而與共同市場同時成立者，尚有歐洲原子能和平使用之聯合組織。故就目前西歐六國之經濟合作事業而言，所謂「歐洲經濟社團」之執行部，實包含上述三種機構，而以共同市場為其核心。其主旨在使此西歐六國之經濟於一九七〇年先行達到經濟統一之目的。然此亦僅其初步。共同市場總經理（即歐洲經濟社會委員會之委員長）何爾斯登教授（Prof. Walter Hallstein）曾明白聲言：「吾人之事業不止於商業，而乃涉及政治」。彼嘗喻共同市場為三級的火箭：其第一級即六國之「關稅聯合」，目前正在順利進行。第二級為會員國間之「經濟聯合」，務使農業、工業、銀行、財政等政策均能統一；此似可望於一九六七年完成。第三級為「商業聯合」，則尚有待於將來之促進。當法國戴高樂總統存在及英國尚未加入共同市場時，此「新歐洲」至多祇能成為「邦聯」而已。

但儘管歐洲共同市場尚在其第一階段期中，西歐六國之聯合組織已有其類乎一個國家之行政、立法、司法三項機構。前述執行部之三個機構（共同市場、煤鋼聯營、歐洲原子能委員會）以多數票取決一切之事項，仍須經六個會員國推舉組成之「閣員會議」所核准。此即形同「新歐洲」之行政機構。另有由歐洲六國選派一百四十二名議員，組成「歐洲議會」，雖無立法權力，因其有權商議有關預算及若干其他重要事宜，足以顯示共同市場之影響確已涉及政治。此外，更有法院，由七名法官組成，可以有權裁判執行部門之某種決定性的行動應否有拘束各會員國政府、公司、及個人之權力，此則又儼然成為「新歐洲」之司法機關。假定今後英國及其夥伴的「七國組織」之各會員亦逐一加入共同市場，則此新歐洲將有十餘國參加，擁有二億五千萬人口，且超過美國了。

就大體言之，過去五年間共同市場之成就，已使各會員國間資本勞力可以自由往來，其相互間之關稅已削減半數（今後四年中將全部免稅）。當然尚有待決之問題甚多。例如農產品保護政策之取消、及工商企業之標準化等等，似非可一蹴而幾。但西歐人士確已感有六國傾向統一之勢。最近民意測驗之結果，除盧森堡小國外，五國人民對於歐洲統一之贊否，其百分比如下表：

國家	贊可	反對	無表示
西德	八一	四	一五
法	七二	八	二〇
義	六〇	四	三六
比	六五	五	三〇
荷	八七	四	九

為何六國人民如此贊成統一呢？因素是很現實的。自一九五八年共同市場組成迄今，人民之生活程度，西德提高百分之二七，荷提高百分之一五，義提高百分之一六。此其一。共同市場之總生產額已增百分之二一·五；各會員國間之貿易已增百分之七三；各國之工資提高百分之二六。一般估計，自目前以至一九七〇年之間，六國之每年生產增額當可增一千零七十億美元之多。共同市場所予六國人民之良好印象，已使彼等深感歐洲統一之有利而無害。

最顯著之實例，足以表示西歐各國商人之觀念中，已先歐洲而後國家的，即他們所製的成品和所開的商號，都喜歡用「歐羅」(Euro)冠其名稱，作為時髦，各大城市的電話簿上往往有此種新牌號出

現。試舉一例：一家西德公司在巴黎市場上介紹一種四扇車門的新汽車，名稱爲「歐羅巴」，卽爲共同市場之製成品。其引擎是義大利造的，車身是西德裝配的，出售是在法國市場上。再如在荷蘭餐館喝的啤酒是「歐羅啤酒」，在北京買的雨衣是「歐羅雨衣」；報紙上登出一家股票經紀商的廣告，名稱：就叫「歐羅聯合」。

由於關稅與旅行障礙之解除，確使西歐六國人民的國家觀念漸趨淡薄，而代之以起的，他們以「歐洲人」自許了。有位比國教授，目前任煤鋼聯營的副總經理，名叫古柏 (Albert Copper) 的，他說：『最有罪的是歷史學者。我們在十五歲時，他們給我們一種指導：只有我們自己的國家是對的，他國都是錯的。現在我們已無此種感覺了。我們要拋棄過去的錯覺。』一位西德的十五歲馮列雲 (Wuva Von Lewin) 說：『我不覺得只像一個德國人。在我看來，英國人、法國人也像我們一樣，住在同一個大洲之上。』類似這些抱着先歐洲而後國家的新觀念的歐洲新青年，例子不勝枚舉。而起着領導作用的，便是共同市場的「寫字樓」。

共同市場總經理何爾斯登教授所主持的委員會有九名委員。法、義、西德三國各兩名，比、荷、盧三國各一名。此九人委員會卽爲共同市場之核心。每星期三開圓桌會議一次。經數年之歷練，彼此都能以「歐洲」爲考慮每一問題之立場，用能完成其使命。故共同市場之有今日，「新歐洲」之所以有其前途，可謂莫迺創造之，何爾斯登推動之。莫爲之先，雖美不彰；莫爲之後，雖善勿傳。

然則何爾斯登所主持之共同市場，對於美國之態度如何？他表示：

「我們希望美國在政治上經濟上與新歐洲逐漸走近。我們正站在大西洋兩岸合作的新時代的大門口

「。不過他同時有一句值得注意的話：「合作夥伴祇有平等才能做到。」換言之，他希望美國與新歐洲在平等地位競賽，以求合作夥伴的共同壯大。（紐約華美日報）

英國加入歐洲共同市場問題(一) (一九六二年六月六日)

英相麥米蘭夫婦六月二日已抵法國，週末即在巴黎郊外與戴高樂總統夫婦會談；不久美國國務卿魯斯克便將飛往歐洲，分別與英、法、西德三國首長商討各種複雜問題，以期消除西方盟國的歧見。故英、法首長會談，不啻即係魯卿訪歐交換意見之前奏曲。英、法首長所談及的問題自必異常廣泛，但最重要的當是英國要求加入西歐共同市場的所謂條件問題。英國加入的談判，早在比京進行半年之久，其將來能否順利加入，不但為美國所關切，且為蘇聯所注視。

姑且暫置西方盟國之間有關此一問題的歧見於不談，若就東西冷戰的觀點言之，西歐共同市場之成功，確為蘇聯共魯魯曉夫最感頭痛的一件事。赫魯曉夫上週由於農產之不足，既不能不提高肉類價格百分之三十，牛油價格百分之二十，歸咎於美國不肯放棄軍備競賽，迫使蘇聯不能削減國防經費，祇有藉農產品加價的收入，作為改進農業現代化的投資；同時又指責西歐共同市場的組成，劃分國際貿易的畛域，更進而高唱東西各國之間的貿易有無，應絕對無所歧視。這可看出蘇聯共魯對於西歐共同市場所作的經濟和平競爭，內心實已非常恐懼。

如所周知，赫魯在一九五八年曾誇下海口，說到了一九六二年蘇聯所生產的肉類、牛乳、牛油，足以每人的消費量論，當可超過美國。詎知大言不慚的結果，不但距事實太遠，無法兌現，反而因貨少加

價。蘇聯在農業上的失敗，迄今還要用過半數的人口去務農，自然對於工業發展也不能不受影響。乃於此時，西歐共同市場的法、義、西德、荷、比、盧森堡六國，經過數年的合作，其經濟成長率超過蘇聯，欣欣向榮，連美國都視為「勁敵」而極想與之合作。英國及其他西歐國家，甚至東歐共產陣營內的國家也不免心動，而希望加入或合作，怎麼能不使赫魯雪夫心驚？

早在一九四九年一月，蘇聯固已先組成所謂「經濟互助理事會」，將蘇聯及其東歐七個附庸國家東德、波蘭、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包括在內，成爲一個「經濟單位」，標榜社會主義國家的通力合作，站在各國平等的地位，調劑資本勢力的運用，以求各國的經濟開發，得以充分發揮其能力，有圓滿的收穫。可見劃分貿易畛域乃由蘇聯首倡。只是可惜這組織根本不符理想，絕非與後起的西歐共同市場相頡頏。鐵幕國家的工業雖似尚能活躍前進，但生產的效率，成品的素質，均不堪聞問。農業則除了波蘭放棄「集體農場」制度比較稍好之外，其餘無一不感到生產不足。我們放眼一看所有實施共產制度的國家，無不在農業上大大碰壁。就連續四十四年之經驗的「共產祖國」蘇聯的人民，至今也還在愁歎肉類牛乳漲價。則他似中共境內人民的啼饑號寒，更何足數？而同一歐洲，東西對照，却有一個後來居上的西歐共同市場，與東歐鐵幕一比，榮枯之判顯然。同是圓顛方趾，東歐人民豈有不「臨淵羨魚」之理？蘇聯現已決定要召開它的東歐的「經濟互助理事會」八國共會會議，商量如何應付西歐的經濟「勁敵」了。然而又有何用？赫魯狂言的「埋葬資本主義」，在這裏不免自露其「狐狸尾巴」！

英國加入西歐共同市場與否，不獨引起蘇聯之重視，急謀召集東歐共產集團國家所謂互助經濟協會

，以謀應付之策，即美國亦未嘗不密切注意，並探討其將來如何適應此西歐共同市場日益發展之途徑，而以大西洋兩岸擴大其自由貿易區域為其遠大目標。換言之，英國加入之談判，不啻為未來美國能否與共同市場充分合作的試驗。聞魯卿月內訪歐，其重要任務之一，即係力勸亞登諾，憑其與法國總統戴高樂的友誼，放鬆允許英國參加共同市場之條件。但是，儘管亞登諾重視美國對於西歐安全聯防所處的重要地位，不一定支持戴高樂所持的西歐獨立不再事事聽受美國支配的幻想，但要望他無條件站在美國立場，用其全心全力，說服戴高樂順利的讓英國加入共同市場，亦未免視事太易。

就德國方面說，亞登諾的心目中至少有兩件事與戴高樂同樣希望美國應該顧及西歐盟國的期望的：(一)對於西柏林自由的堅決維護，不輕易對蘇聯讓步，使不致釀成事實上承認東德共產政權的惡果。譬如月前盛傳美國與蘇聯談判德國問題時，準備由一個容許東德參加的國際機構管制西柏林對外的出入通道，這種辦法西德政府曾一再反對，而另提其他不許東德參預的計劃以代之。故美國不必為柏林問題過於遷就蘇聯；乃為西德與法國之共同想法。(二)法國政府固極盼能自建其核子武力，西德雖不如法國之過份想擺脫美國在核子武器上之控制，但亦久已希望美國應該同意贊助北大西洋公約盟軍組織建立一個共同自衛的核子部隊。換言之，使北約盟軍在事實上成為美蘇英而外的第四個核子武力。美國雖迄現在止願意把五艘裝配核子飛彈的原子潛艇給北約盟軍組織，但命令發射核子飛彈之權仍操諸美國總統之手，其距西德之希望猶差一間。假使美國對於柏林談判之遷就態度始終傾向於接近英國之觀點，而對於有關製造核子武器之機密又只許與英國共有，不願讓西歐大陸六國能自行製造而掌握其核子武器，則西德之亞登諾亦將多少不免同情於法國之戴高樂。雖然前者不像後者之幻想美國勢力退出西歐以及西歐之成為第

三勢力。

至於美國對西歐共同市場之立場，所謂一則以喜，一則以懼。西歐共同市場在過去之成就，幾已追及美國，例如年產鋼鐵七千三百萬噸，業已超過蘇聯而接近美國九千七百萬噸之數額。每年經濟成長率百分之五業已倍於美國之速度。如果今後再由英國領導所謂「外七國」共同加入，則此一西歐的經濟社團，其經濟力量之雄厚，殊可驚人。黃金美元之儲備將倍於美國之所有；其國民生產總額至少可達三千億元；而其可使用於新工廠設備之投資更將令美國瞠乎其後。蘇聯更不必論。此種現象，一方面美國固將自詡其戰後馬歇爾計劃之恢復西歐瘡痍，奠立歐洲復興基礎之功，而另一方面則不能不深憂美國農工商業之產品在世界市場上多一勁敵。因是之故，美國當局不得不大聲疾呼，主張擴大自由貿易範圍，改訂關稅法案，以謀將來與西歐共同市場切取合作，相互減低某種貨品之關稅，俾收兩利之效。然而，如果不在西柏林問題上顧及西德之意見，不供給核子武器資料上顧及法國之願望，則美國是否能打通其如意算盤，猶為未知之數。

一般人所謂共同市場，其正式名稱爲「歐洲經濟社團」(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原係根據一九五七年三月廿五日西歐六國(法、義、西德、比、荷、盧森堡)在羅馬所簽訂的條約而組成的經濟社團。其主旨在逐漸使此六國所屬的西歐境內構成一個經濟單位，期在十二年間形成堅強的組織。對內則減低關稅，相互自由貿易；對外則採取共同的商業政策。它的機構有議會，由各國國會代表組成；有理事會，由各國政府代表組成；有執行部，由各國政府同意派定九人組成；有法庭，則爲裁決各國間爭議的機構。因此，它雖是一個經濟社團，但對於處理有關經濟事項，儼然有若超國家的權力

，一經多數通過的事項可以約束各會員國家共守共行。

我們都知道，在此共同市場之前，上述的西歐六國，早於一九五二年六月有所謂「歐洲煤鐵社區」(European Coal & Steel Community)的組織，表面上雖係當時的法國外長許門所公開發說，但實際主張而推動的是莫迺。它後來因為煤鐵聯營的計劃，試驗大著成效，乃更進一步主張，西歐六國應更廣泛的從事整個經濟的合作，方可提高西歐人民的生活水準。於是五年之後醞釀成熟，而有西歐共同市場之構成。此一西歐經濟合作機構成立之後，五、六年間，已使西歐六國農工商業突飛猛晉，其生產成長速率，凌駕美國蘇聯而上之。不但共產集團鐵幕內人民的生活不能望其項背，甚且有與美國及英國國協頡頏爭雄於國際市場之勢。英國為求競爭國際市場計，初則要求此一經濟組織應擴大成爲一個自由貿易區域。繼則於一九六〇年初，另行結合七國，組成「歐洲自由貿易協會」，乃形成所謂「外七國」(英、瑞典、丹麥、挪威、奧地利、瑞士、葡萄牙)與共同市場之「內六國」相抗衡。而終以相形見絀，遂自去年起即有要求加入共同市場之呼聲。而「外七國」之其餘國家，其勢亦必追隨英國，以期達成歐洲自由國家成爲一個經濟單位之願望。

從西歐共同市場的成效來看，一九六〇年時各會員國之內部關稅已減少三成，到今年一九六二，可能減少四成甚至五成。六國的總生產額，一九五九年增加百分之五，一九六〇年增加百分之七，去年一九六一年增加百分之五。自一九五五年至今，西歐六國生產額已增加百分之四十，貿易額增加百分之五十八。這些都是超過美國經濟成長率的成績。以西歐六年的人口、資源與技術爲基礎，經過美國馬歇爾計劃的經援扶植，其經濟欣欣向榮，顯然已非戰後瘡痍滿目時可比擬。而況再加以通力合作的結合，自

足使英美兩國都具戒心，而不得不進一步謀求大西洋兩岸自由國家的貿易大團結，作為和平抵抗共產主義侵略最有效的工具。故英國之加入西歐共同市場，不但為英國當局所急切期望，而同時亦為美國多年來所欲努力促成之事。在蘇聯一方面，鑒於鐵幕國家之農產不足，深感自由世界經濟團結後所加於共產陣營之威脅，赫魯之惶惑不安，急欲召開東歐八國之經濟互助理事會說，亦在情理之中。東西冷戰形勢，目前自以英國能否加入西歐共同市場為最重要的關鍵。

然英國加入西歐共同市場一事，自非一蹴可幾。英國所派代表，在共同市場總部所在地比京談判，已歷七月，最近方知祇有兩項成就：(一)至一九六九年即共同市場規定各會員一律完全適用對外稅則時，英國須將自加拿大、澳洲輸入的工業品（例如加國之紙與澳洲之皮革製品），按對外稅則征收進口稅；(二)英國須接受共同市場各會員國間之資金勞力得自由往來之原則，同時推行「反托辣斯」的共同政策。關於前者，貿易數額不鉅，影響於英國與國協間之貿易關係者固屬尙不甚重。但英國的根本難關，在於一面既希望加入共同市場，一面又想多方保持其與英國國協各國之間的特種互惠關係，如何能獲共同市場各國的完全允諾？英國之所以須如此，自亦有其苦衷。因為英國本土是一個島國，其所需糧食百分之三八·八來自國協各國，而其輸出工業品則幾乎一半銷售於國協各國。聽說法國戴高樂總統以往堅持英國不能「魚與熊掌兼而有之」，如要加入便須放棄對國協各國的互惠條件。但英國自「大英帝國」解體以來，所賴以維繫其與舊屬殖民地的關係者，僅此「國協」組織的運用；而此次要求加入西歐共同市場以來，業已引起國協各國如澳洲等的抗議，則要英國一旦決絕放棄國協，加入歐洲大陸的經濟單位，談何容易？

英相麥米蘭上週末飛往巴黎，與戴高樂總統商談兩天的結果，根據發表的報告，似可對雙方以前的疑雲，有澄清一部份的功効。兩國首長表示，他們共同認為兩國之間有「共同利益」存在，決心對各主要問題作繼續談判。法國方面且傳說麥相，暗示決定無保留條件而加入共同市場；同時戴高樂總統亦向麥相澄清法國反對英國加入之疑慮。然麥戴兩氏之匆匆談判，似乎並不能完全消除英國加入共同市場之障礙；其前途恐仍多迂迴曲折。

英國加入共同市場一事所可能遭遇之障礙，最大者有二：早先外傳戴高樂總統對於美國當局不肯將有關核子武器之機密，告知法國，一如其告知英國者然，深表不滿，認為美國在對待盟邦英法之間顯存偏見。且明知美國力贊英國加入共同市場，故深疑英國加入以後，勢將隱然為美國在共同市場作內線，而法國所佔之主要地位不免轉移而為英國所取代。乃擬將來於繼續談判之際，對英國提出更高的條件為代價。例如要求英國供給法國以核子機密，俾能有助於法國核子武器部隊之建立。果爾，則美國以往所不願對法國讓步而滿足戴高樂之願望者，英國是否可以不顧美國之友誼而毅然為之？此其一。

英國及其國協內部反對此大事，意見亦並不一致。保守黨固將以此事的成功作為下次大選的政治視本，但勞工黨亦未始不可引此事的英國放棄國協關係作為抨擊其政敵的口實。而將來除非國協以內幾個比較重要的國家亦都能獲允准加入共同市場，或仍保留其優惠條件，否則反對英倫政府的聲浪，或不免甚囂塵上。此其二。

然而為自由世界整個的「經濟戰」計，英國在千迴百折之後，恐仍終將與共同市場合流。（紐約華美日報）

英國加入歐洲共同市場問題(二) (一九六二年八月八日)

據八月五日北京電，英國代表團與西歐共同市場的六國代表，連日商議英國加入的問題，直至是日上午八時，尚未獲有具體協議，決定展緩至十月間再行續商。但此並非即為英國加入的談判業已失敗，不過表示英國所能為其「國協」國家如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等農產輸入仍能享受免稅或低稅的權利一點，未能即為共同市場六國所接受，有待從長計議而已。

本來，英國加入西歐共同市場，其進行過程中定有種種困難，為人人所預料；但英國保守黨政府切望此舉之成功，則上星期三外長休謨在下院中之聲明，已情見乎詞。他說，如果英國竟被孤立於此市場中心之外，則實不退處於一個「外島」之地位，而其經濟勢必非靜止即削弱。不但英國自身希望加入，即美國甘迺迪政府亦一再透露其希望，且不惜力促此事之實現；因美國頗想在英國加入之後，進而與此西歐各國之龐大經濟集團合作，使自由世界之市場打成一片，俾可與共產集團各國作經濟方面之和平競賽。反之，在共產集團方面，則蘇聯之赫魯對於西歐共同市場五年來蓬勃進步之氣象早懷戒懼，當然力圖破壞。故英國最後能否達成加入之願望，所關於整個世界之經濟戰者至為重大。

英國內部對此問題，所見亦並不完全一致。不但工黨最表示與其急急加入西歐共同市場，寧可不拋棄「國協」各國者，即保守黨內部亦有少數人士不贊同麥米蘭首相力主加入之政見。其在「國協」各國

，爲其本身利益計，當更期望其產品之輸入英國，不致因英國之加入共同市場而蒙受犧牲。英國政府定於九月十日召集「國協」各國總理會說，勢必商討及此，故特於上週在比京續作談判之努力，向共同市場各國提出其建議。但經與六國洽商之結果，對於印度、巴基斯坦、錫蘭之產品輸英者，因與歐洲大陸產品競爭較少，易獲協議。惟對於加拿大、澳洲、紐西蘭之農產糧食輸英免稅之權利，則六國代表仍主如英國加入共同市場，在一九七〇年後，此三國之農產即不得沿襲舊例，享受免稅之特權，否則將無以保障共同市場各國之農民。職是之故，雙方迄未能有所協議，而姑俟秋季再行繼續會商。我們站在自由世界整個的共同利害着想，當然深願英國加入問題之談判將來終有成功之一日。

今試假想，萬一談判成功，其利益可有四項：(一)就美國言，這是益格魯·薩克遜國家對於大西洋兩岸國家經濟結盟貢獻之初步。至少在近來歐洲大陸希望減少美國影響之空氣中，獲一轉機；(二)甘總統屢次倡導修訂法律，擴大自由貿易之志願，將因此而得一向前進行之鼓勵；(三)可使美國與西歐經濟成長之速率不致後退；(四)對共產黨之信念，以爲資本主義國家因競爭市場而終將不能合作或甚至出於戰爭者，不啻予以嚴重之打擊。反之，如英國加入談判而將來終於失敗，則其結果將爲：①可能引起同共市場六國內部之渙散；②削弱西方國家政治性的團結，有助於共黨之侵略；③英國保守黨政府之前途爲之黯淡；④甘總統之新貿易法案在國會中將遭遇阻力；⑤英鎊甚至至美元在實際之價值將不免遭逢新的壓力（紐約華美日報）

英國加入歐洲共同市場問題(三) (一九六七年三月廿二日)

英國要求加入歐洲共同市場之事，一九六三年一月間曾為法國總統戴高樂所「否決」；此一問題乃懸而未決。雖然共同市場的其他五會員國（比、荷、義、西德、盧森堡）早經表示歡迎，但法國政府態度未變。而近三、四年間，又因英國政府之當局由保守黨轉為勞工黨，故此事暫遭擱置。假定英工黨首相威爾森舊事重提，其要求加入共同市場的問題，情況有否較前順利，似仍未許率爾臆斷。關鍵仍須視今後法國政府的政策如何。

當一九六七年初，威爾森曾向共同市場提及此事時，法國代表雖曾傾聽其陳述，却未作任何承諾。推觀法國官方以前所以梗阻之理由為：①是英國目前有其面臨的通貨問題，如果容許英加入市場，則恐將損及會員國的市面繁榮與經濟穩定；②是英鎊在國際貨幣基金中的地位如何先需審定。而戴高樂最感不滿的事，則以為英國過去以至現在，一直似作美國的「臣屬」，如果加入歐洲共同市場，勢將不免在市場機構內發生為美國作「內應」的作用。所以威爾森如不能表示其無意再受美國的羈勒，則仍不能滿足戴高樂的意願。也就是說，英國的加入仍未必一蹴即幾，而達其目的。祇要看到威爾森訪法以後，法國政府絕未對此問題表示意見，可知其態度依然如故。

也許有人以為法國經過最近的國會議員改選，戴高樂派的議席急劇減少，祇以一席之差而勉強掌握

了多數黨的地位，戴高樂政府可能酌量修改其對於外交政策所持的態度。但據閱歷較深的觀察家則以為此種看法，祇能適用於通常一般的人物，而戴高樂之行動往往非常情所能觀度。戴高樂所表現於外的，不是他的「說服」的力量，而是他的堅強的「決定」。故即使英國輿論界，關於戴高樂今後對此問題的動向如何，也有兩種不同的揣測。其一、認為他因最近國會改選後並不能控制到絕對多數，勢力漸減，如果其他五國重提英國加入共同市場的話，或較易於獲得法國的同意；其二、則恰巧相反，惟其戴高樂在國會改選中失勢，他雖然對此問題勢必慎重考慮，但恐反將較前更形固執，未必會輕易改變其舊有的立場。同時，在北京共同市場總部內各位專家的意見，多數以為英國加入的希望可較從前有所改進，但也仍有少數以為戴高樂的外交政策未必有多大的變動。

惟關於此一問題，最近有一項新的發展：三月十六日西歐六國（包括法國在內）的政府官員和政黨領袖簽署發表宣言，略謂「西歐聯邦行動委員會」，不及等候六月一日的閉會，業已一致贊成英國的加入共同市場，與原有六個會員國享同等的權利，盡同等的義務。這個宣言，其用意顯在加強英相威爾森的力量，因為英國內閣最近已達於是否積極要求加入共同市場的決定階段。威爾森得此宣言，可以作為他的支持，而使他的主張易於通過。簽署這個宣言的法國政要，以共同市場的始創人莫德德為首，認為威爾森只要堅決要求加入共同市場，聲明願意接受一九五七年羅馬條約（即規定共同市場制度的條約）全部條件而無所保留時，則歐洲大陸上的會員國便不能再說「否」字。因此，我們也不妨假定，英國加入歐洲共同市場的機運現似近乎成熟了。（紐約華美日報）

古巴是蘇聯的新殖民地（一九六二年八月廿八日）

古巴從卡斯楚崛起握權以來，三年有半，已經向第二個中共大陸之途前進。不但古巴農民被卡斯楚欺騙出賣，農地已全歸國有，農場都改國營，使農民變成了共產政權之下的農奴，而且蘇聯現已大批運入所謂專家技術人員，控制卡斯楚政權的政治經濟各部門，並秘密供給武器及軍需物資。甚至傳說俄兵已有一萬六千人在古巴登陸，十足可使古巴成爲蘇聯侵略中南美洲的大門據點。等到中南美洲各國逐一或大半入其牢籠以後，則蘇聯包圍美國後門的迂迴戰略，自然可以大慶成功。故今天的古巴，在短短三年半的期間，已變成蘇聯的外府；換言之，古巴便是蘇聯在美洲所建立的「新殖民地」。是否有飛彈基地猶在其次。

當卡斯楚初上臺時，我們雖一再警告美國，不可忽視此一變局，應該當機立斷，根據門羅主義，退大禍於未萌。可是艾森豪總統一再因循遷延，直到任期瀕於告終時，方被迫宣佈對古絕交；迨甘總統上台，雖曾一度支持古巴流亡志士在其祖國登陸，中途拔梯抽腿，任其失敗，反在事後暗允縱容薩爾斯款項票，助長那匪的氣焰。我們對於美國當局的外交政策，真正莫測高深。擱置了一百四十年前膾炙人口的門羅主義，任其腐朽。自然赫魯曉夫要得寸進尺，建立其在西半球的侵略基地了，而此一基地却僅靠美國本土九十哩。「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美國當局「高枕無憂」的氣度，着實足以驚人！

據國務院所得最近有關蘇聯在古巴的活動的報告，大要有如下述各項：①自七月廿七日至卅一日的五天之間，有五艘蘇聯輪船載運約三千至五千人到古巴。②同時期內，另有十一艘貨船分別在夏灣拿及其他港口共五處卸貨，都在夜間經過嚴密戒備中進行。③此種卸貨工作都由蘇聯人經辦。④據目觀者說，大批空貨車吊上各貨船，然後由俄人裝滿貨物，蓋上防水油布，吊回碼頭，再由俄人駕車駛往秘密處所。⑤又據報，不少坦克、大貨車、及拖車，都裝上許多四十呎長的板條箱，表示大量軍火及交通器材正由蘇聯運交古巴。⑥五艘客輪中，只有一艘的乘客，經古巴官員歡迎登岸，大概有四百名的農業專家及技術人員，由俄國派來協助古巴發展農業。另外四艘客輪都是晚間秘密停泊，所載運的都是蘇聯軍事人員。⑦確息，至少尚有十五艘蘇聯船隻的載運同等人員貨物陸續到古巴。上述事實，甘總統也承認知道，所以他在上星期三的記者招待會中也提到，並且說這些人員和貨物乃從共產集團國家來的。新聞記者問他此事是否重要。他說，我們正在注意研究。實際上，此又何待研究？蘇聯既經試探美國並無真正執行門羅主義之決心，經過赫魯數次蘇聯將以火箭援助卡斯特古巴後，美國即不敢動卡斯特一根汗毛，則赫魯又何所憚而不下手製造一個在西半球包圍美國的侵略基地，亦即蘇聯的「新殖民地」呢？

西方自由國家的領導者，在心理戰爭上，先已被蘇聯繳了械。他們彷彿承認殖民主義只是西方帝國主義者自己的罪惡，所以祇知逐一放棄其舊日的殖民地，而絕不敢問蘇聯共產帝國所囊括的新殖民地。他們又彷彿以為解放戰爭只有讓共產國家來「專利壟斷」，一聽蘇聯中共藉口民族解放，進行他們的「神聖戰爭」，而絕不敢計劃並實施在鐵幕裏去搞一套解放無辜人民的戰爭，「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因此之故，在十多年的冷戰中，只見共產鐵幕愈張愈大，而自由世界地區則愈縮愈小。到現在，

連距離美國近在咫尺的古巴，也已變成了蘇聯的十足「新殖民地」。而甘總統還只是說「注意研究」。我們不知道他是研究古巴未來的趨向嗎？還是要研究美國怎樣自動宣佈放棄門羅主義，可以保全堂堂的面子嗎？我們謹貢獻一句話！美國如果連西半球的古巴都可聽任赤化而袖手旁觀，怎麼能領導他州的國家阻遏共產勢力的侵略？（紐約華美日報）

古巴危機的重要因素（一九六二年十月廿七日）

截至此文起草時爲止，甘迺迪總統決定局部封鎖古巴的宣告，至少有下列數項收穫：①赤色古巴的武裝力量，因將不能獲蘇聯的繼續供應核子飛彈、噴射轟炸機、及助其建築完成飛彈基地，而可望暫時不致壯大；②蘇聯赫魯雪夫以核子飛彈作威脅的勒索行爲，被迫攤牌而表示退縮，一面令其一部分船隻改道或緩駛，避免與美國封鎖艦隊相遭遇（可能此部分船隻所運者即爲攻擊性武器），一面令一艘油輪接受美艦檢查，交出運貨單，表示其所運者並非攻擊性武器。藉此俄船接受檢查之舉，爲其不願觸發戰爭之證明，企圖國際促成美蘇高峯會議之速開；③在美國內部接近選舉之期間，因古巴危機而促成全國之團結，避免再以古巴問題作爲選舉之論爭題目。但就古巴危機之性質言之，蘇聯雖表示願意談判，聯合國代理秘書長字譚雖在呼籲有關各方緩和兩三週以便從容商討解決辦法，而真正古巴赤化所加於西半球乃至整個世界之危機並未絲毫消除。故儘管股票市場可因赫魯雪夫答覆英哲羅素一函之口臉緩和而市價回漲，我們仍不能即謂大局可有鬆弛之望。

須知甘迺迪總統所以認爲美國似已大禍臨頭而不能不「乾綱獨斷」，作封鎖古巴之決定者，其重要因素有三：

①古巴彈道飛彈基地之建築不久即可完成，將供短程中程飛彈之用，而此項飛彈又都可發射核子彈

頭，南北美洲國家均將爲其射擊之目標；同時古巴境內已有高速的噴射轟炸機在裝配中，此項飛機又可發射有核子彈頭的火箭。凡此證明古巴業已成爲蘇聯在西半球使用核子武器之前哨基地。所以甘總統在封鎖宣告中要求此項基地及機場必須廢棄，飛彈及超聲噴射轟炸機必須撤離古巴，否則美國爲自衛及保護西半球各國的安全計，將採取任何方法予以執行。

◎古巴卡斯楚政權業已出賣古巴人民，而使其以前所號召推翻極權的革命變質，自身成爲共產極權制度在西半球的實驗場。在事實上它更經常輸出其赤化之宣傳，向中南美洲各國滲透，煽動各國內部人民顛覆其政府，使之逐漸陷於共產陣營之魔掌。故古巴卡斯楚政權赤化以後，實已成爲拉丁美洲各國人民之公敵。古巴人民不獲自由，卡斯楚政權不推翻，則西半球之「毒癌」終將因不早剷治而潰瀾爲患。

◎古巴危機所以釀成的原本由於自由世界的各國盟主誤信國際共黨頭目願望和平共存，一直在希望由談判中解決爭端。於是蘇聯利用此項弱點，特在美洲用滲透顛覆手段，佈置飛彈作爲向美國勒索對西柏林、德國、核子試驗、全面裁軍等等大問題的讓步。故美國的局部封鎖古巴只是第一步，尤其不能因聞及可以談判而即放棄封鎖。否則古巴問題仍將留爲與蘇聯在其他方面講價還價的把柄。美國又勢必墜蘇聯「以退爲進」的陷阱中。

總而言之，甘迺迪總統前既聲明此次「隔離」僅是第一步，則爲貫徹其解除古巴對於美國及西半球之威脅計，萬不能聽所謂「不結盟國家」之喧嚷而即中途退却。必須「打鐵趁熱」，而先摧毀古巴之飛彈基地及噴射轟炸機等等武器。（紐約華美日報）

赫魯退却的真正原因（一九六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此次古巴危機的攤牌，乃美蘇兩國二次大戰以後準備直接衝突之第一次，故赫魯曉夫十月廿八日上午之突然宣佈退却，確為蘇聯前所未有的事，而且勢必可以影響將來之外交局面，其所以值得特別重視者在此。

誠然，在史太林時代，蘇聯集團亦曾有退却之舉，例如封鎖西柏林之終於取消，北韓南侵戰事之終於結束，又在赫魯握權以後，亦未嘗無退却之事。例如金門砲戰，聲勢甚大，而終於停止砲轟，中共不再高唱武力「解放臺灣」。但此均不過停止其侵略前進之步伐，而並未吐出其所業已獲得之食物。此次則不然。蘇聯確已秘密運輸中程核子飛彈及噴射核子轟炸機於古巴，且積極佈置飛彈基地。赫魯心目中認為此項在西半球建築飛彈基地的工作正如去年建築東柏林圍牆一般，並不會招致美國之反對。而甘迺迪自九月以來採取「袖手旁觀」政策。且誤信赫魯之言，向其國人解釋此乃「防禦武器」，不足為患。更使赫魯怡然自得，不但明目張膽進行，甚至告知美國訪客，美國自由人士甚多，決不願有戰爭。似乎中共送給美國之雅號「紙老虎」，赫魯或竟亦以為然。故即使甘迺迪總統廿二日廣播宣告封鎖古巴以後，蘇聯最初反應依然非常強硬，謂蘇聯船隻決定拒絕美艦之檢查云云，其後在行動上，亦祇命令其部份船隻暫時改道他航，而一面仍否認古巴已有進攻性的武器。到了廿六日晚，赫魯始致私人電報於甘總

統，願意在聯國派員視察之下拆毀古巴的攻擊武器及停止建築飛彈基地。但廿七日晨即又提出以美國放棄土耳其基地相交換。此又可見克里姆宮內，對於是否向美國表示「屈服」一層，當必經過爭執，而絕非易獲結論之事。然則赫魯廿八日晨何以終於決定退却，其真正原因何在？

我們以為其重要關鍵，在於美國國防部宣佈徵召空軍運輸大隊後備兵一萬四千人的服役，準備空運軍隊之一舉。因為這是顯示美國已有決心轟炸或進攻古巴，俾可自動強制毀棄古巴飛彈基地及核子武器。如果俄曾還想使用以前慣技，將土耳其基地問題提出交換，拖長談判時期，勢必迫令美國斷然採取軍事行動以達其宣告封鎖之目的。果爾，則蘇聯除了甘冒大險以與美國作戰以外，只有「見機而作」，自動找一個「退却」方法。甘總統聲明中「保證不進攻古巴」一語，遂被利用作為其遮羞的口實。實則俄曾並非真正歡迎此一保證，而乃恐懼美國空運大隊徵召後備兵示威背後所隱藏的一種行動。質言之，俄曾不得不向實力低頭，只好拋棄其在西半球的飛彈基地了。

也許有人揣度，以為在古巴陸上、空中、或洋面，蘇聯如與美國攤牌，對蘇聯為不利，故俄曾不得不退。安知其不退於此而進於彼？未來柏林的危機，可能比以前更為嚴重。因為西柏林在東德境內包圍之中，在彼處攤牌，利於蘇聯者較西方為多。殊不知問題關鍵在乎有否決心。假使美國與西方盟國，始終團結，表示捍衛西柏林自由到底的決心，而明白警告蘇聯，不得在西柏林製造新的危機。相信赫魯此時未必即敢再挑釁的了。（紐約華美日報）

美國尚能再信蘇聯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七日）

古巴危機迄今並未真正完全解除，而電訊傳來，美京官方空氣似已由緊張而鬆弛。揆諸「安不忘危」之古訓，不禁深為美國懼。豈美國朝野，尤其身受蘇聯共會欺騙已不止一次的甘迺迪總統，今仍能相信十月廿七日與廿八日之閃與赫魯往來之電報中赫魯所作之「保證」乎？

赫魯之保證，明言蘇聯願意拆除已在古巴之飛彈及噴射轟炸機，並毀棄建築中之飛彈基地，將一切進攻武器之材料運回蘇聯。而且此種拆除、毀棄、及運回之工作，均願由聯合國派員視察進行。甘總統則以美國保證不攻古巴為交換條件。現在時越十日，所謂聯合國派員視察一節，雖經字譚代理秘書長飛往古巴磋商，而迄為卡斯基所駁拒。乃更有米高揚奉命飛來美古兩國，另行提議由萬國紅十字會委員會派員視察，以代替聯合國應該擔任之工作。在卡斯基尚未公開承諾之前，急不暇擇的美國承諾竟欣然接納，而不再考慮其利害得失。即令美蘇古三方面都允由萬國紅十字會派員視察，其問題仍多。乃美國當局竟又公佈偵察機所攝得之古巴照片，藉以表示飛彈設備已在拆卸裝箱，一若蘇聯履行諾言殆可信任者然，美國誠為「可欺以其方」之君子！

拆卸之飛彈何嘗不可移運而潛藏於叢林之內山洞之中？在古巴裝置已竣及未竣之飛彈究有多少？拆卸者有若干？噴射轟炸機可以發射核子武器者，運到古巴裝配者及準備運回者各有若干？諸如此類，非

親身實地勘驗，編歷古巴全境調查，將無從「證實」。至於進出古巴之蘇聯集團船隻，不論其為自有或租用者，苟欲在海上或古巴港口登船，檢查其有否再可裝運核子武器至古巴或由古巴運回飛彈，自亦須具有軍事專門知識和技術者，方能勝任。但如萬國紅十字會原有之人員，其任務僅為救死扶傷之慈善隊伍，能否代替聯合國所當選派徵調之專家，不負美國保障安全所繫之期望，固大有問題。乃美國當局初則對此危機似乎非常重視，而一經蘇魯作此「緩兵之計」，卽內心鬆弛，精神舒泰，一若只要有一個不論什麼性質的國際組織，願意出來擔任視察，便可乘此下臺，而絕不顧慮萬一受欺之後患。其果過信蘇聯乎？抑自我陶醉於所謂古巴攤牌勝利乎？

就我們的普通見解來看，與其大意疏忽，不如謹慎小心。今天既經赫魯公開承諾於前，必欲促其十足兌現於後。十足兌現者，至少限度，須迅速召開聯合國安理會，將赫魯承諾報告後，立即由聯合國組織有資格的視察團分任兩種工作：○在古巴陸上檢查蘇聯一切核子武器之拆卸裝箱及上船，務使此種武器勿有稀少遺留隱藏於古巴全境任何處所。同時檢查所有飛彈基地之工程，完全監視其毀壞。○在古巴港口加里濱海區域及大西洋公海上檢查開入古巴之船隻，勿令再有此種威脅西半球和平安全之武器運到古巴。在上述工作未能完滿做到，並經聯合國有長久保證之聲明，美國不但不應解除對古巴之局部封鎖及取消對古巴之空中監視，而且應更加強對於古巴之嚴密封鎖。凡屬武器（不限於攻擊性的）及有助作戰的其他商品都不得運入古巴。否則「虎頭蛇尾」後患無窮。（紐約華美日報）

古巴問題撲朔迷離（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日）

據蓋洛普民意測驗，甘迺迪總統因處理古巴危機而在民間之聲望增高。這是大槪不錯的。其理由有二：①當赫魯曉夫突然允諾撤回在古巴裝置的彈道飛彈時，一般論調都認為美國「勝利」，蘇聯丟臉；②人民感覺已從核子大戰邊緣回復到正常狀態，再也用不着擔驚受怕。然則古巴危機果真已經在美國「勝利」之下解決了麼？如果古巴問題確已完全解決，而解決又是完全有利於美國，則譬如一宗案件理應可以結束，而何以甘總統與魯赫前週先後與米高揚晤談以後，美蘇雙方當局又說未了的問題還要在聯合國內繼續談判呢？所要談判的又是些什麼事呢？

我們似乎可以從聯合國秘書長宇譚在正式當選以後所作的一次演說詞中，約略窺見一些端倪，即古巴危機的解決，並不為外界人士初時的一般想像，「勝利」完全在於美國方面。宇譚稱讚美蘇兩國對古巴問題能用「調和折衷」的互讓辦法來解決，正可作為將來東西雙方解決其他爭端的典型；他並且進而責備西方國家將近十年來的錯誤。他說，赫魯曉夫的和乎共存政策早已不同於史太林的「戰爭不可避免」論調，於是他深惜美國乃至西方國家不能把握赫魯曉夫執政的時機來對蘇聯遷就讓步。我們姑且不去管他責備的話對或不對，而他所透露的古巴問題雙方互讓故能解決這一點，倒是一件值得推敲的事。

雙方互讓些什麼呢？雙方所承認的條件是什麼呢？就蘇聯言，赫魯諾在聯合國派員監視證實之下拆

卸所有在古巴境內的進攻武器，並且監視不再運入古巴；就美國言，則甘總統承諾如果蘇聯辦到履行其諾言，美國可以撤消封鎖並與拉丁美洲各國共同保證不進攻古巴。目前如何？蘇聯雖表示拆卸其彈道飛彈及噴射轟炸飛機，但究竟拆回若干，是否全數拆盡運回，是否如外間密報尚有隱藏古巴山洞之中等情。因爲聯合國始終未能派員就地視察，連萬國紅十字會視察海上蘇聯駛古之船隻一節，亦未見其實現。則就赫魯之承諾言，等於沒有履行。只要古巴境內尚有幾個蘇製中程飛彈或幾架蘇製噴射轟炸機遺留，則美國城市或基地卽有可被核彈轟炸之危險，何能謂爲危機消除？然而美國則甘總統業已急不暇待，宣佈取消封鎖了。至於不攻古巴一層，美國雖尙未宜告明白保證，而日前花省十三名反卡同情者的逮捕，被控彼等企圖襲攻古巴，有違美國的中立法，則又似乎美國政府已在執行保證不攻古巴的諾言了。故卽使根據所謂美蘇「互讓」之文而言，我們以爲美國所讓者過多，而蘇聯所讓者極少。何以故？蘇聯之拆回進攻武器，並無國際機構派員就地視察爲之證實，一也。卽使完全證實，於蘇聯何損毫髮？古巴之卡斯楚政權變橫自若，而且反獲美國事實上之不攻保證，二也。

於此，我們更不禁聯想到這幾天內的所謂「史蒂文生事件」。姑且不問史蒂文生是否曾在白宮的國家安全會議席上單獨反對鎖封古巴，而史氏曾反對進攻古巴則已爲自己承認之事實。且就星期六晚郵報所載兩位記者之報導，及論壇報約瑟夫·亞索普之專欄加以玩味，則所謂將美國撤廢某種海外基地與蘇聯從古巴撤回核子武器作交換條件，未必無因吧。（紐約華美日報）

制裁古巴問題（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泛美組織各國第九次外長會議，自七月廿一日起在美京舉行，將於今日（廿四日）結束，其目的在討論制裁古巴問題。根據委內瑞拉外長的指控，古巴曾私運軍火進入委國，陰謀顛覆委國政府，要求泛美組織制裁古巴。卡斯楚政權之侵略。此事早經泛美組織三國調查委員會於二月間建議，應由泛美各國共同制裁古巴，斷絕對卡斯楚政權之關係，並停止對古巴之貿易。

美國務卿魯斯克已於廿二日向會議致詞，表示目前已至明白宣告制裁卡斯楚政權之時，不復再能容忍共黨輸出革命，顛覆鄰邦之行動。但泛美組織各國是否能全體一致或大多數通過此項硬性制裁之決議，猶待此次會議之最後決定。

雖然東南亞局勢的險惡，事實上現已成為美國朝野所關切的問題。如何獲得最好的解決，或將演變為今年兩黨競選時的論爭焦點之一，但就美國最感切身利益有關的外交問題，當無過於古巴共產政權之存在於西半球。因為這不但顯然是美國政府等於放棄傳統的門羅主義之象徵，容許極權的蘇聯共產帝國乃至毛共政權的特務，可以插足於西半球，而且將予世人以一種印象，認為美國對相距祇在九十哩外的一個共產政權，尚無如之何，則其當局所云將在其他各洲為他國而援助抗共，究竟有幾分可信？這無疑是對於美國在自由世界的聲望給予一種重大的打擊。所以，美國對於如何處置古巴，亦即如何制裁古巴，

這些年來，一直是一個頭痛的問題。

美國最大的錯誤：①在於卡斯楚起革命打游擊時，當局誤認他是民族主義的民主革命者而予以助力。等他登臺握權，沒收美商財產，絕不予以補償，業已暴露其共產黨的猙獰面目後，猶要跟他的虛舉委蛇，養癰貽患。②在於古巴流亡志士豬灣登陸之時，美國明明事前有所策劃，而竟誤於估計，中途抽腿，置身事外，妄想不捲入古巴人民的反共抗暴鬥爭中，事後反用「贖票」的方法。用美國政府和人民所捐助的糧食藥品乃至車輛去交換被俘的古巴志士。此風一開，又如何能阻止他國政府的容許商人與古巴貿易？③迨蘇聯暗運中程飛彈在古巴裝置，目的顯在助古抗美，經美國發覺以後，始有所謂一九六二年九、十月間的古巴飛彈危機的對蘇攤牌。當時甘迺迪總統調兵遣將，似乎執行海空封鎖，明言必須經過就地視察，證實蘇聯飛彈撤退，蘇軍離古，方能解除封鎖。當時泛美各國甚至西歐盟邦，對美國之緊張表示亦無間言。乃忽又不待古巴容許派員實地視察，祇憑蘇聯共曾的聲明可以撤回中程飛彈，即自動宣告撤消封鎖，而以仍行維持派機空中偵察為自我解嘲之詞。其後甚且壓迫古巴流亡志士，不得在美國境內為策劃反共復國之工作。於是美國現政府不願為解放古巴而斷然有所行動，已為天下人所共見。

本週內的泛美組織會議，委內瑞拉要求泛美各國根據一九四七年里約熱內盧公約，予古巴以制裁。這本來是順理成章之事。無如泛美組織各盟國中，墨西哥、智利、烏拉圭、玻利維亞四國，一直到現在還與古巴維持邦交，當然反對制裁。而阿根廷也有表示反對的傾向。於是若干國家企圖有所折衝，尤其巴西外長賴道尚在力謀緩和。一面支持委國的譴責古巴，一面却避免採取堅強的制裁行動，以為如此可望保全這一個泛美組織不致破裂。殊不知此種敷水膏藥的辦法，只是堵塞耳目，而實際上無異宣告此

一 集體安全組織的破產，難怪委國總統李翁尼日前宣稱，如泛美組織不能予古巴以制裁，則此組織即等於消滅了。因為名存實亡，等於屍居餘氣，其結果未有不蹈國際聯盟的覆轍的。我們等着看吧。（紐約華美日報）

中東風雲與美俄冷戰（一九六七年五月卅一日）

這時正是世界多事之秋。越戰不但未了，且有升級之勢。港九彈丸之地，又因「紅衛兵」運動「輸出」，而擾攘不寧者多日。如今中東這個「潛伏的火藥庫」，却又因以色列與敘利亞和阿聯（即埃及）之間的「磨刀霍霍」，觸發戰火。「告朔餼羊」的聯合國，其秘書長宇坦經不起阿聯納塞的一嚇，即乖的允諾撤出其負責巡邏加薩走廊及西奈半島以埃兩國邊界已有十年久的「和平部隊」（亦稱緊急部隊），甚至還要移樽就教，飛往開羅，向納塞作說客，希望和平部隊撤離以後，仍能容許聯合國派出若干觀察人員前往幫助維持和平。於是情勢演變得非常緊張。宇坦在數天前向安全理事會提出報告，即明言其危險程度為以往十年來所未有。然則中東戰火一旦重復燃起，可能牽一髮而動全身，觸發三次世界大戰嗎？照常情推測，如果美蘇兩國不願發生核子大戰，則中東即使有星星之火，一時未必燎原。美蘇之間的冷戰，近來原有逐漸溶化之象，如今是否為此反而變成熱戰呢？這是世人最關心的問題。

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間之相互敵視，隨着二次世界大戰後，以色列這個國家之誕生，與之俱來。十年以前，因為英法聯軍進攻蘇彝運河地區，以色列也進兵西奈半島，埃及岌岌可危。其時美蘇兩國殊途同歸，運用聯合國，迫使英、法、以色列撤兵。事後乃由印度等七國派兵組成聯合國維持和平的緊急部隊駐在加薩走廊及西奈半島消滯，防止埃及雙方的衝突。現在，阿聯的納塞要求聯合國部隊從速撤離，而即

由埃及軍隊及所謂巴勒斯坦流亡人士所組成的志願兵填防。他方面則以色列亦即有調兵遣將的反應，同時敘利亞在以色列的北方也躍躍欲試。任何一個角落都有發生接觸小戰之可能。不久以前，蘇聯外長葛羅米科曾訪開羅，是否放過野火，固不得而知，但納塞之行動也許只是虛張聲勢，為敘利亞打氣，並非真正有意挑起牽動各國的大戰。除非因任何一方估計錯誤而使情勢急劇惡化，外交家都認為美蘇兩國正在努力說服互爭的雙方，不可輕易用武，以免局勢不可收拾。在納塞想來，如果因為他的要求聯國部隊撤退，擺出不借助敘攻以的姿態，而使以色列不敢冒大不韙向敘利亞用兵，以報復其人民在以色列邊界進行其恐怖行動。則他在阿拉伯國家集團之間，便可隱然居於領袖地位。故無論戰與不戰，納塞以為計出萬全，他必有所得的了。

聯合國今已成爲「自身難保」的「過江」泥菩薩。對於熊熊戰火在燃燒中的越局，自知無能爲力，只好袖手旁觀，以前爲了派兵協助剛果維持和平所支用的經費，蘇聯法國等都拒絕繳納所攤派的款額，以致負債累累，如今連這個十年以來總算勉強有效的中東「緊急部隊」，也一旦被追而撤出埃及國境，則此後何能再組部隊阻遏他處的戰火？故真正能預爲撲滅中東戰火的，只有看美蘇兩國的協調行動了。美國在地中海的第六艦隊，至少有兵艦五六十艘巡戈其間，而蘇聯也有幾十艘艦艇（包括潛水艇）在附近。雙方的兵力，可以協同動作，分別向阿聯、敘利亞及以色列加以壓力，即可收維持均勢和平之效；反之，如果不能祛除相互懷疑之心，則萬一估計錯誤，亦可能觸發大戰。出入之間，關係很大。

依照最近美國力圖對蘇修好的趨勢看來，美蘇冷戰應可漸趨融解。例如：（一）同意開關紐約—莫斯科間的直達航空線，（二）簽訂兩國增設領事館協定，（三）批准外太空禁作軍用的條約，都似露出

彼此不妨携手的跡象。但從另布里茲涅夫的幾次演說和談話看來，蘇聯仍有其念念不忘的幾件事：（一）希望「北約」解體，（二）各國的軍隊都撤回本國（如是，則美軍須由西歐回美，有三千五百哩之遙，而蘇聯則由東德等國撤回，只距五百哩而已），（三）爲戴高樂打氣，阻止英國的加入歐洲共同市場，（四）阻止歐洲任何方式的統一運動，（五）訂立歐洲安全協定，不許美國參加。……在此種如意算盤之下，其長期目的自是不要美國預聞歐洲之事。美國又何能爲了與蘇聯修好而支付如此重大之代價？故此番中東風雲之是否擴大，正是足以試驗美蘇能否改善關係的新試金石。（菲律賓新聞日報）

牽一髮而動全身的中東危機（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日）

越戰雖爲一年來世人所注目的危機所在，但這旬日以來，大家却轉而關切中東的危機了。因爲以色列與埃及之爭執，尤其關於埃及納塞所宣佈封鎖狄蘭海峽這一舉動，不但促成以國與阿拉伯國家之間的難牌，甚至至於可能迫使東西雙方四大強國（尤其蘇美兩國）捲入戰爭的漩渦。所以，這幾天美國朝野，以及英法蘇三國的當局，雖意見各殊，似乎也在考慮如何消弭戰禍的方法。深恐牽一髮而動全身，中東危機之易於釀成世界三次大戰，其潛伏的危機，遠比越戰爲大。

我們且先看埃及和以色列兩國的立場。

埃及方面，納塞總統久以阿拉伯集團的領袖自居，但所謂阿拉伯國家的集團，內部也有矛盾。沙烏地阿拉伯與埃及（即阿聯）爲了也門這個小國，互爭不讓。而約旦與敘利亞之間，且已絕交，確有不甚融洽之慮。納塞乃乘此機會，以支持敘利亞準備抵抗以國爲藉口，從而號召阿拉伯國家團結對付以國。他的調兵遣將，增防與以國接壤的邊境，尤其是宣告狄蘭海峽業已置放水雷，威脅進出亞加巴灣的船隻，特別是不許懸掛以色列國旗的船隻通航，勢將迫使以國及他國於必要時用武力衝破封鎖線。戰火爆發自是意料中事。

埃及之所以出此，其所持理由，認爲狄蘭海峽是它的「領水」，它有權封鎖。但以國及美國等的看

法不如此，都認為國際通航的水道，不容阻塞。戰事能否不致擴大，要看納塞是否「一意孤行」到底。納塞最近宣稱，今日局勢已非一九五六年蘇彝士河之役時的可比，埃及的力量現已超過以色列。戰機一開，阿拉伯國家團結在一起，定必以「消滅以色列」為終極目的。埃及除恨以色列外，最不滿意美國的支持以色列。

以色列除在邊境增兵外，並派其外長伊班飛向巴黎、倫敦、華府與法英美三國當局商量危局的應付方法，探測西方三國的態度。以國兵力，如全部動員可達廿五萬至卅萬人。但其阿拉伯的鄰邦，北方的敘利亞有兵力七萬人，南方的埃及已動員八萬人，東方的約旦有軍隊五萬五千人，任何一處開了火，都可引起三線環攻以國的形勢。以色列未始不顧審慎從事，以期仍維持和平。但無論如何，它是不能忍受狄蘭海峽的被埃及封鎖，因為這是它的南方港口伊拉特在亞加巴灣唯一的出路，不容許為埃及橫加阻截的。一九五六年以前，這個狄蘭海峽原來曾被埃及封鎖的，直到那年以埃之戰的結果，埃軍大敗，以軍佔有西奈半島，埃及在海峽口的沙姆雪克炮台被毀後，封鎖始告解除。後來以國軍隊允諾撤退，由聯國派和平部隊填防，維持現狀者十一年。如今聯國部隊既經撤退，埃及又宣告封鎖海峽。以國為爭取此航道的開放自不惜再度用兵呢？西方國家雖勸它自行克制，暫勿令其船隻進入此一海峽，且候國際調解，尋求和平解決之方，但以國認為愈等候得久，愈將對以國不利。然而，的確今年的中東局勢，誠如納塞所言，不比十年以前。納塞已有蘇聯製造的戰鬥機和轟炸機，一旦作戰，埃及的空軍可能轟炸以國的首都及重要港口。以國果願冒此險否，這是和戰關鍵之所在（記者按：以國空軍已先發制人大炸開羅）。

美國當局，因越戰中的泥足尚未拔出，自然不願單槍匹馬，跳下火坑去幫助以色列，而與阿拉伯國

家爲敵。但爲了對於維持國際自由航道的承諾，必須兌現，只有希望與他國聯合行動或最好能在聯合國範圍內共同動作。故聯合國安理會在宇坦秘書長回美報告後重行開會時，美國勢必盡力促成維持中東和平的決議案之得以通過。但縱使能通過一種空洞的議案，而無法保證其實行，則對事仍然無補。幸而美英法三國似已同意舉行東西四強會議，謀求維持中東和平之途徑，大家所等特的祇是蘇聯究將如何表示，從前中東問題，蘇聯似無發言權，今已不然，由此可見蘇聯勢力已在膨脹。

阿拉伯國家的武力，就軍隊人數言，合起來對以色列兵力爲十與一之比。其武器則埃及敘利亞係由蘇聯供給，約旦與沙烏地阿拉伯則由美英供給。它們果真聯合起來協同對付以色列，以國未必再有類似一九五六年的大敗埃及之把握。埃及的納塞雖然自知阿拉伯國家內部有矛盾，但他相信可把握適當的時機，對以色列作致命的打擊。然而西方國家願袖手旁觀，一任以國之被消滅嗎？西方國家如果袒助以色列，蘇聯和中共能不爲埃及與其他阿拉伯國家壯聲勢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其嚴重的危機即伏於此！（菲列濱新聞日報）

中東以阿之戰的面面觀（一九六七年六月廿五日）

中東（亦稱近東）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之間，最近的一次戰爭，自六月五日起，經過六天，總算全部停火了。二十年來以阿之間的第三次戰爭，（第一次爲一九四八—四九的巴勒斯坦戰爭，第二次爲一九五六的英法以三國攻埃及的蘇彝士運河的戰爭。）幸而沒有因此爆發三次世界大戰，一方面不能不認爲由於美蘇兩大強國相互自行克制之故，戰火乃不擴大，但另一方面也因為阿拉伯國家集團自稱領袖的納塞太不中用，言過其實，軍隊一擊而潰，竟讓以色列軍隊勢如破竹，而以色列軍的戰略，先掌握了制空權，遂有出奇制勝，速戰速決的收穫。但是停火以後，雙方爭執而有待循外交途徑以求解決的問題仍然甚多。中東危機雖一時減輕，而難題懸案依然存在，以阿雙方並非卽此可以相安無事。由於此次突發的戰爭，世人當可體驗到幾種重要事實的教訓。記者現在姑作如下的分析：

（一）以阿積不相容的回溯

中東局面的絕不穩定，乃二次世界大戰後猶太人「復國」的自然結果，也可說是戰後大國政治家人謀不臧之所賜。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恰好可借來形容中東危機之種因經過。中東地區的紛擾，自古已然，但就現代史實而言，則種因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時。

當一九一四年首次世界大戰發生，土耳其的奧托曼帝國乃是德國與奧匈帝國的盟邦，對英法俄作戰

。此一地區，希伯來人稱爲迦南，羅馬人稱爲巴勒斯坦，原爲奧托曼帝國所統治。土耳其的勢力，西起巴爾幹半島，經過小亞細亞，而達於阿拉伯半島的尖端，有五六百年之久。此一地帶可稱爲古代西方文明的搖籃。基督教，猶太教，及回教（伊斯蘭教）的「聖地」，均在於此。

當時進視全球的英國政府，爲鼓勵阿拉伯人起來推翻土耳其其皇朝的政權，曾允許戰勝後讓阿拉伯人獨立建國，自巴格達，經耶路撒冷，到大馬士革，阿拉伯人乃紛起打擊土耳其。同時英國外相鮑爾福發表宣言，又許諾猶太人，在其祖居的故鄉即所謂巴勒斯坦地方，也可以獨立建國。其實，巴勒斯坦在當時尚非英國所有的保護地。迨第一次大戰結果，德奧土戰敗，奧托曼帝國瓦解，國際聯盟將巴勒斯坦，伊拉克，約旦委託英國代管，敘利亞和黎巴嫩則委託法國代管。沙烏地阿拉伯則爲獨立國。當一九一八年英國佔有巴勒斯坦時，該地區有人口約七十萬，其中回教徒五十七萬四千人，基督教徒七萬人，猶太人僅五萬六千而已。所以二次大戰後，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復建國家以前，巴勒斯坦地區內的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經常有相互仇視的緊張情形。他們雖自稱在三千五百年前同是「一家人」，均爲阿巴拉罕的後裔，但由於民族主義的潮流所激盪，英國皇家委員會於一九三七年建議將巴勒斯坦劃分爲兩個國家，其一爲阿拉伯人的，其二爲猶太人的，這便是十年以後，由聯合國通過分治（以色列與約旦）議案的根源。

同時，猶太人的復國運動，年甚一年。於是一九四五年全世界猶太人會議，要求開放巴勒斯坦，遷後一百萬猶太人回到那裏去建一個新國。他們又與阿拉伯人互作游擊戰。英國乃放棄執行託管的責任，於一九四八年撤回駐軍。阿拉伯人當時已作警告，如果創建一個猶太國，勢必引起戰爭。但聯合國並不理會，終於通過設立以色列這個新國家。以色列即於同年五月十五日宣告成立，美國首先予以承認，蘇

聯次之。而阿拉伯國家對此新國的戰爭即行爆發。

以色列受到三方面的環攻，敘利亞和黎巴嫩攻於北，約旦和伊拉克攻於東，沙烏地阿拉伯，葉門，和埃及攻於南。此即以阿之間的第一次戰爭，直到一九四九年方接受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而停戰。在停戰協定中，劃了六百哩的停戰分界線。雖由聯合國派出人員並由停戰雙方國家各派委員，組成停戰委員會，但實際在邊界上常有接觸的。

當停戰時，以色列所得的地方，較原來由聯合國劃給它的多了三分之一，埃及則分得迦薩走廊，約旦兼併了約旦河西岸土地，並佔有耶路撒冷的老城。而從以色列領土內出奔流亡的九十萬阿拉伯難民無家可歸，則由聯合國負責救濟，分開在鄰近的阿拉伯國家內設置巴勒斯坦難民營以收容之。這便是所謂以阿停戰後的「國界」，及二十年來久懸未決的阿拉伯難民問題。在此第一次戰爭中，阿拉伯國家並不能消滅以色列。

(二) 一九五六年蘇彝士之役

中東以阿之戰，其醞釀由來已久。自以色列一九四八年宣佈建國時起，即爆發所謂巴勒斯坦的戰爭。「初生之犢不畏虎」，以色列竟能擊退三面環攻的阿拉伯諸國的軍隊，遂有一九四九年經聯合國調解而成立的停戰協定，並劃定以色列與埃及（阿聯）、約旦、敘利亞之間約六百哩的停火界線。其所未能解決的只是九十萬的阿拉伯難民（由以色列境內出奔到約旦和埃及的難民）問題，只好暫時由聯合國予以安置與救濟。由於以阿雙方始終懷有仇視心理，終於一九五六年爆發第二次戰爭，此即所謂蘇彝士之役。

因爲美國最初允許援助埃及建築阿斯旺水閘。後來又取消，激怒了納塞。他遂於一九五六年七月廿六日片面宣告，將原由國際性公司管理的蘇彝士運河收歸國有，並不許以色列的船隻得以通過運河。於是以色列出其不意，突於十月廿九日出兵，攻入埃及的西奈半島；同時英法兩國亦於十一月卅一日採取聯合行動，空襲埃及的飛機場，並派傘兵部隊降落在運河區域。事前美國毫不知情。艾森豪總統聲明美國將不參戰。而蘇聯則警告，準備派「志願兵」援助埃及，必要時且將向倫敦巴黎發射火箭，壓迫英法以三國退兵。美國更聲明支持聯合國採取任何行動。聯合國大會通過兩項議決案：其一爲促令英法自埃及撤兵，同時令以色列軍隊退回至一九四九年的停戰界線；其二爲派遣一支聯合國緊急部隊前往巡邏以埃及的邊界。以色列軍隊乃由迦塞走廊及亞喀巴灣地區撤回本國，而由聯合國的六千名部隊巡邏於埃及方面的一百七十哩邊界。這第二次戰爭，總算由美蘇兩國的「平行」行動，而結束了英法以對埃及的圍攻。事後，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於一九五七年二月間宣佈三點：（一）亞喀巴灣爲國際水道，任何國家無權阻止各國商船的自由航行。（二）埃及不能藉口「戰爭狀態」存在，禁止以色列船隻通過蘇彝士運河。（三）埃及不能片面武斷取消前所同意的允諾聯合國部隊巡邏埃及之間的邊界。可是埃及始終不讓以國船隻使用蘇彝士運河。而此第三次戰爭所以爆發的主要因素，便是埃及納塞要求聯合國維持和平的部隊立即撤離埃及，並宣佈封鎖狄蘭海峽及亞喀巴灣，不許以國船隻及供給以國物資的他國商船通過此上述的海峽，進出於亞喀巴灣。這顯然表示他已抹煞了蘇彝士之役的停戰協定了。

（三）西方三強與蘇聯之冷戰

這個糾紛多事的中東局面，其所以釀成，因爲阿拉伯國家始終不肯承認有以色列這個國家存在於巴

勒斯坦。而以色列則認定其復回故土而建國，乃根據聖經所指示的猶太人將在迦南的土地上建國，而且爲安置在「納粹」虎口餘生的猶太人計，應該許他們有此一塊土地爲身安立命之所。但阿拉伯國家則說巴勒斯坦屬於阿拉伯，已有兩千年的歷史，誰都不能從他們手中奪去此一方土地。並且說以色列之所謂復國，乃是美國政府受了國內六百萬猶太後裔的公民所壓迫，故幫助他們在中東建此新國。於是他們既恨猶太人，也恨美國幫助以色列。

美國對於中東的政策，只是抱定如何維護中東諸國的和平，期望以國的一百九十萬猶太人，能與西自北非起，東迄波斯灣止，這一片地帶上的六千萬阿拉伯人，雙方和平相處。美英法三國外長，於一九五零年曾發表宣言，主張在中東地區不得用武或威脅用兵，並相約同意控制輸入中東各國的軍火，只限於維持內部安全與自衛之用。換言之，西方三強希望在中東地區能够使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維持一個均勢之局。當時，此三強並沒有想到蘇聯正在處心積慮，必欲使其勢力插足中東。而蘇彝士之役，三強之中，自相分裂，行動兩歧，乃授蘇聯可乘之隙。

蘇彝士之役以後，蘇聯在十年之間，對中東阿拉伯國家內部的所謂「革命勢力」，如埃及、敘利亞、伊拉克等國的當局，予以鉅額的軍事經濟的援助，推進其心目中的「解放戰爭」，以便籠絡這些阿拉伯國家，使它們在事實上作爲蘇聯的外圍附庸。美國當局乃有警覺，爲了對共產集團採取圍堵政策，杜魯門總統於一九四六年既援助希臘土耳其於前，遏阻了共黨的滲透顛覆；艾森豪復於一九五八年應黎巴嫩政府之請，派軍在黎國登陸，阻遏了敘利亞援助共黨團在黎國發動的叛亂。但是阿拉伯國家所謂革命派當權的政府，如伊拉克於一九五九年接受蘇聯大量的坦克，埃及及則於一九六一年接受蘇聯的大批米

格機和其他軍火。埃及乃先用這批軍火，支援葉門國內的左傾份子發動叛變。以色列鑒於此種情勢；遂亦向西方三個國家要求予以軍援，包括飛機坦克等等，作為對付阿拉伯國家的準備。美國自艾森豪以來，經過甘迺迪和詹森總統，政府一直主張維持中東諸國的安全與領土完整。即使現在，仍然如此。在這次（第三次）中東戰爭爆發以前，詹森總統曾於五月廿三日發表聲明，謂美國堅持承諾，維持中東地區內各國的政治獨立與領土完整，反對任何一國的侵略行動。而此第三次戰爭究竟誰為侵略者，誰為挑釁者，以阿難方各執一詞，令人無可捉摸，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遂亦無從決定譴責某一方面了。

（四）六天戰爭後的聯合國

此次不到六天的以阿之戰（實際祇一百卅小時的戰爭），由六月五日起至十日，阿聯（埃及），敘利亞，約旦三國跟以色列作戰的結果，以色列的閃電戰略顯然獲得極大成功。以色列掌握戰勝的果實，列舉如下：（一）佔領了以埃之間屬於埃及的迦塞走廊。（二）幾乎攻佔了埃及的西奈半島全部。其最可注意的是以軍控制了蘇彝士運河的東岸，並且佔有狄蘭海峽口的沙美爾雪克要塞，使納塞所宣佈的封鎖海峽，退阻以國船隻進出亞喀巴灣的政策，歸於無效。（三）攻佔約旦所有的耶路撒冷老城，及約旦河西岸的土地。（四）攻佔了敘利亞境內面臨加利利海的高地使敘國不能再據此地威脅以國。

阿拉伯國家雖因此次戰事而表現較前團結，但其失敗（尤其埃及納塞的失敗）實屬空前，間接亦為蘇聯的失敗。因為這十年以來，蘇聯所予阿拉伯國家的經濟軍事的援助，約計有二十億美元之多，並且埃及的軍官都由蘇聯訓練。乃竟然一敗塗地，出乎世人的意外，亦為蘇聯當局所未料。當戰爭進行時，阿聯（埃及）原望蘇聯會補足其間，介入戰爭。乃蘇聯克宮竟用美蘇之間的「熱線」，與美國白宮直接

電報往返，相約彼此不介入戰爭，藉以避免核子大戰的爆發。蘇聯與美國同意在安全理事會內通過要求雙方停戰的議案。蘇聯此舉無異袖手旁觀阿拉伯國家的失敗，乃引起它們對蘇聯的怨懟。於是蘇聯大放馬後砲，要求聯合國舉行代表大會的特別會議，讓它在安理會內應未能通過的議案，能在聯合國特別大會內作補救，而通過它爲阿拉伯撐腰的議案。即（一）譴責以色列「侵略」；（二）要求以軍立即無條件的撤退至六月五日以前的原來界線，歸還在阿拉伯三國境內所攻佔的土地；（三）要求以色列賠償阿拉伯三國的戰事損失。蘇聯總理柯錫金並親率外長葛羅米科等數十位官員前來紐約，在聯大會議中正式提案。並於六月十九日發表演講，指責以國並及美國。截至此文寄出時止，辯論尚在展開。蘇聯提案能否照章獲得三分之二票數的通過，尙難臆斷。縱使經過冗長辯論，該案居然幸獲通過，使蘇聯如願以償，事實上亦無足以解決中東難題的把握。因爲聯大會議祇有建議性質，若要在實際上有所行動，仍將候安理理事會的決定。而安理會內五個常任理事國有否決權。假使美國爲支持以色列之故，居然使用否決權，蘇聯又加之何？

美國方面，當局爲了希望真正獲致中東的久遠和平，認爲徒然以相互譴責的方案，在壇站上爭勝，只有更煽動作戰雙方國家的仇恨，並不能達到中東和平的目的。故詹森總統特於十九日上午柯錫金在聯大演說之前一小時，在東京國務院作重要演說，提出所謂「五原則」，作爲磋商中東和平方案的基礎：

- （一）中東國家應承認任何一國的國家生存的權利，
- （二）以公正態度處理難民問題，
- （三）承認任何國家的船隻有在國際水道自由航行的權利，
- （四）限制中東國家的彼此軍備競賽，
- （五）承認一切國家的政治獨立與領土完整。

美國代表高德柏大使隨卽於二十日在大會中根據上述五原則提出美國的決議案

。據公平觀察家的看法，將來聯合國大會中，美蘇雙方的提案都未必能完全通過，而可能另作一個折衷的決議，不痛不癢，求其面面俱到，而實則一無實效。盡聯合國內如無美蘇的諒解與合作，不論在安理會或大會，勢必形同癡漢，無事可爲，已爲一般人所看透。

(五) 美蘇高峰會議的實現

有人始終認爲美蘇之間，可能利用柯錫金出席聯大會的機會，舉行兩國的高峯會議，不但交換關於中東問題的意見，且可從而磋商越局如何可以獲致和平的方案，或甚至可以商談其他任何問題。詹森早有表示，如果柯錫金願意會晤的話，他很樂意會談。加拿大外長馬丁且曾於訪晤柯錫金時，力勸柯氏對於會晤詹森之舉，不可失之交臂。如果他們有此會談的一舉，地點當不會在紐約市內的聯合國，或美京的白宮。柯錫金爲了避免引起阿拉伯國家的誤會，或招致中共加強其譏刺蘇美「勾結」的宣傳，所以截至廿一日止對此事尚無決定。據略知內幕消息的人士所傳說，實際上柯錫金與詹森彼此都願作一次深談，但地點既非華府或「大衛山莊」（以前艾森豪總統與赫魯曉夫會談的地方），亦非紐約市。魯斯克國務卿與蘇聯外長葛羅米科廿一日的晚宴中，對此事的安排，已有具體的辦法。果然，詹利遂在紐澤西舉行會談了。

這次會談，兩度舉行，詹柯兩人只由翻譯員陪同，閉門面談了差不多十小時。雖無具體協議宣佈，但事後雙方俱稱這次會議極爲有用。詹森總統特別強調，他們在此次會談中，俱能諒解對方在世界上的動機和承諾。從此之後，雙方既能諒解，對於世界和平的促進，自當有所裨益。而且這次會議，更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因爲這可說是世界力量大重組的開始，而美蘇自開頭起即合作解決世界問題，這還是第

一次。

再說，蘇聯代表團鑒於聯大會議中激辯的情況，深願蘇聯的提案能全部通過於大會。但向人表示，如果失敗，只要能通過要求以色列撤兵的一點，餘事留待以後藉談，則蘇聯也可感到滿意。因為如此，蘇聯便可再在安理會中加上壓力，迫使安理會不能不採取「行動」來促以色列的接受決議案而撤兵，也就使蘇聯對阿拉伯國家有所交待了。目前在聯大會議中的情勢，最可注意的是印度等所謂不結盟國家，可能支持蘇聯的提案。他們希望至少能以三分二的票數通過要求以色列立即撤兵的一項議案，如果安理會不採取行動，則蘇聯可能再供給阿拉伯國家大批軍火，促使它們在以色列軍隊佔領區內進行其「拿手好戲」的「民族解放游擊戰」，困擾以色列。這批「不結盟國家」，既不敢得罪蘇聯，又不願開罪於阿拉伯國家，因為它們掌握了石油供給的來源，並控制了中東交通運輸的道路。至於以色列這一小國，在外交上商務上可以吸引它們的力量太微薄了。它們似乎無所顧忌的！（菲律賓新聞日報）

以阿戰爭將有第二回合（一九六七年七月十日）

在聯合國大會內，中東戰爭問題如何善後，各國代表方從事進行舌戰的同時，埃及（阿聯）和以色列雙方又在蘇彝士運河東岸的西奈半島上交鋒了。休戰以後，這樣的衝突已發生了兩次。當然，雙方又要互相控訴挑釁。聯合國如「不可能」用快刀斬亂麻的方法，對中東的糾紛，作一次根本解決，誰也不能保證今後絕無戰禍。而且此一地區，橫跨亞歐非三洲的孔道，小戰星星之火，極有燎原的可能。此番六月初的六天戰爭，雖因美蘇巨頭使用「熱線」，相互聲明不願捲入戰爭，幸而不會擴大，但將來如果再有第二第三回合的戰事，無人敢於保證戰火永不蔓延的。

據以色列的官方宣稱，自七月一日起至三日止，埃及和以色列隔着蘇彝士運河作砲戰，已有三天的接觸了。而且西奈半島上的以軍運貨列車，因車軌被埃軍地雷所毀而出軌。上星期六，雙方又作大規模的坦克車戰，空中也有飛機交綏，此已象徵中東戰事即將有第二回合。此外，敘利亞與以色列的邊境，亦常有零星的衝突，幾乎每日有之。但來勢不兇，故以國對仗，不及對埃之緊張。由於最近蘇聯加緊運輸飛機坦克，補充埃及在六天戰爭中的損失，更可窺見蘇聯對於中東之援助阿拉伯國家，採取雙管齊下的辦法。一面在聯合國會場上叫囂奔走，希望能收獲譴責以國的果實，另一面却又支援埃及等阿拉伯國家，授以武器，俾可於必要時再度作戰。這樣，蘇聯雖不自己插足，而儘可操縱阿拉伯國家在中東繼續

厥後，使美英等國感到頭痛。同時西萬盟國已被蘇聯分化，如法國戴高樂總統的明言詆責以色列挑釁，即其一例。種種迹象，顯示蘇聯所需要的不是中東有久遠的和平，亦非足以釀成核子大戰的戰爭，而是仿照共黨在越戰中所表演的長期游擊戰。因為蘇聯領袖相信，美國既在越戰中派了四五十萬大軍，不可能拔出泥足，則自亦不再會介入中東的戰局。於是蘇聯便用這種軍援方法，使埃及、敘利亞、伊拉克等等國家，經常對以色列進行其游擊戰。故以阿之間的第二回合以後的戰事，可能為越戰式的戰事。

阿拉伯國家的對以繼續作戰，不僅見之於言詞，而且有實事作根據。連日以來，埃及的開羅機場，和亞歷山大港口，常常有每天數小時的禁止通常船隻和飛機的出入，可以表示必因蘇聯運入軍火而使用。蘇聯的技術人員亦有大批派到埃及。據說是幫助蘇援武器運到後的迅速裝配，以便即可供給使用。同時又在加緊訓練埃及官兵，如何使用更複雜的雷達和飛彈系統。以此之故，埃及政府業已下令蘇彝士運河區域內塞德及伊斯馬利亞兩港的居民統行遷出。甚至沿運河區的各國領事館也都封閉起來。被阻在運河中的外商船隻也被禁止使用無線電的廣播。開羅的高射砲又都裝置起來，供隨時可以使用，天空又經常有噴射戰機的翱翔。不但埃及已在積極準備再對以色列作戰，即在此番未參加作戰的黎巴嫩，其報紙亦在揚言每個阿拉伯人都要時時準備對以再度作戰。問題只在何時作戰，以及何人出而領導作戰。其在以色列方面，則因有六天戰爭的勝利，其空氣自然不如阿拉伯國家的頹喪和緊張，但亦有其不符不警惕的事態存在。以國當局的艾希柯總統表示，雖竭力希望能與阿拉伯國家直接談判，尋求雙方如何能和平共存之道。他總是說上次的六天戰爭，乃被迫而然，不是願意的。他更願望，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和平相處以後，大可將用於備戰或戰爭的錢，用之於建設。如能共同努力，從事於水利、工業、貿易

、農業、教育、衛生、和旅遊事業的建設，則各國的資源得以開發，人民的生活程度亦可提高。以色列當局似乎不大贊成聯合國的干涉，認為中東問題之解決，不能有所裨益。他對蘇聯，認為它與其再供給阿拉伯國家武器，誘促它們再對以國作戰，不如力勸它們對以國直接談判促成和平之為愈。否則再供武器給它們，大有準備噉使它們再作戰爭的用意。而且就埃及在西奈半島所遺留的火箭與毒氣而言，將來如果再有戰事，可能有核子武器出現的！（菲律賓新聞日報）

以阿停火非即和平（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一日）

以色列與阿拉伯三個國家（阿聯、敘利亞、約旦）之戰，雖祇六天，因埃及大敗，及外來的種種壓力而即停火，但並非意味着中東地區從此和平，人民可以安居樂業。聯合國臨時特別大會經過旬餘的嘔叫爭辯，迄今尚無具體結果。目前，蘇聯與美國所擬議的兩個議決草案，似乎都無能獲大會代表三分之二通過之把握。於是蘇聯支持南斯拉夫及其他十六國的共同提案，美國則贊成拉丁美洲十九國提案，針鋒相對，各自在爭取他國投票贊成。結果勢均力敵，無一案能獲得聯大的通過。

南斯拉夫的提案，主要是要求以色列軍隊從六天戰爭中所佔領阿拉伯三國土地立即撤退，並貫成安全理事會執行促以軍撤退的工作，採取行動解決中東問題。（較之蘇聯所原來提議的，除促以軍撤退外，還要譴責以色列「侵略」，並賠償阿拉伯三國在戰爭中的損失，自然已經減輕了分量。）但是美國代表高德柏大使七月三日明言，他絕不能投票贊成南國的提案。他並且列舉十點，認為中東和平不可缺少要素：（一）儘可能從速撤軍回到本國領土，勿使戰爭狀態延長。（二）各國相互承認他國有其獨立存在的權利，和平共處。（三）保證用相當安排的方法，使中東諸國維護領土完整與政治獨立的局面。（四）保障中東諸國的安全及其權益。（五）中東諸國相互間放棄使用武力威脅用兵。（六）尊重一切國家的船隻在國際水道中有航行的自由。（七）使難民問題能有公正與永久的解決。（八）中東諸國莫

作軍備競賽，而相率改進國家的經濟與人民的生活。(九)由國際保障「聖地」(按：即指耶路撒冷)的安全，以便各種教徒都能自由出入，故耶路撒冷問題，不當由一個國家作片面的決定。(十)由國際安排，包括聯合國的援助，使中東各國能達其和平共存的目的。在這裏，美國顯然反對以色列數天以前宣佈耶路撒冷老城與新城業已合併爲一的舉動。高德柏並且指出南國提案並未提及此點。可是蘇聯外長葛羅米科除了強調支持南國提案外，並更痛詆美國的提案是十足的「帝國主義」。法國代表西度則不但明言支持南國提案，並且傳說他接到巴黎訓令，要爲南國提案爭取更多的贊成票。然而，聯合國大會內這場舌敝唇焦的論壇戰爭，結果落了一場空。何況即使大會通過了某一種議決案，也祇有建議性質，如要有效執行，還得經過安全理事會這一關。可見蘇聯三星期前的催促召開緊急大會，並鄭重其事的由柯錫金總理親自出席，實際上不過安撫阿拉伯國家，同時爭回蘇聯在中東失敗的面子而已。

也許有人認爲柯錫金此次訪美之行，真正的動機在於乘便可以親自觀察美國對中東及整個世局的態度，故他與魯森商談乃其目的，而用出席聯合國大會作爲掩護的幌子。但卽就六月廿三日與廿五日的詹柯兩氏所作十小時的高層會議而言，表面上也看不出對任何問題有顯明的結論。「冷戰」是可望因此融解呢？或反而更加濃縮呢？各方面的觀察也不盡相同。據「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週刊」派駐各國的記者報導，大概作如下的看法：(一)就蘇聯所表現的態度而言，冷戰仍在繼續使進中。(二)須等候相當時間，局外人方能深切感到，美蘇之間經由這次高層會談究竟有什麼諒解。(三)假如美蘇之間果有緊張的情事，則希望鬆弛冷戰而獲致任何決議，或許還要經過兩國繼續舉行若干次的高層會談。其所以然之故，因爲目前的蘇聯，已非如史太林時代，柯錫金不像史太林，有其獨斷獨行的權力。柯錫金由美國

當局談話所獲的印象，尙需經過克里夫林宮蘇共首要的咀嚼研究，方能決定有如何的反應。所以，如果希望詹柯經過兩天十小時的會談而即能澄清美蘇之間或東西兩陣營之間的陰霾，便是過分的奢望。總之，聯合國大會固然空闊一場，美蘇巨頭會談也不過交換意見，而中東大局並非因此即可走上和平的康莊大道。（菲律賓新崗日報）

聯合國與以阿戰爭（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六日）

轟動世人聽聞的中東六天戰爭，雖然蘇聯要求召開聯合國的緊急大會，甚至有勞蘇聯總理柯錫金躬親來美出席，爲了提案要求（一）以色列立即撤兵。退回從前的邊界，（二）譴責以色列侵略，（三）賠償阿聯、敘利亞、約旦三個阿拉伯國家的戰爭損失，大肆宣傳，但經過十多天的辯論，表決結果，不祇蘇聯提案慘遭敗北，即其所支持的南斯拉夫等國提案，只要求以軍立即撤退的，也並不能獲得三分之二的票數。此外，美國除自動撤回其提案，它所支持的拉丁美洲十九國提案，要求以軍撤退而同時由聯合國謀取中東和平，也無三分二的足夠票數，於是聯合國大會竟形成一籌莫展的僵局。但總算通過了兩案：（一）瑞典提出的照顧難民和戰俘案，（二）巴基斯坦提出的否認以色列片面宣佈的耶路撒冷統一管理爲有效。休會至七月十二日復開時，能否由各方互讓，而商定一種折衷方案，顧全各方面子，也成爲疑問。另一方面，蘇彝士運河兩岸的以埃兩國軍隊，連日零星開火。彼此又向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報告，指責對方違反停火的決議。可見戰事隨時可能再度爆發，距離中東永久和平，委實太遠了。總之，在聯合國內，如果外蘇美兩國當局不能有會心的微笑，而携手合作，聯合國對中東問題的解決，勢必無能爲力的。

蘇聯，這個支持阿聯納塞對以色列挑戰的國家，連日補充阿拉伯國家在戰爭中所損失的飛機和坦克

，積極進行，而一方面又由蘇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公開聲明，蘇聯援助阿拉伯國家對以色列作政治鬭爭，此即無異表示蘇聯無意介入戰爭，為阿拉伯集團跳火坑。換言之，蘇聯只希望助阿武器，對以國進行其時斷時續的長期小戰，從而換取它所需要的東地中海沿岸的海空軍基地，例如埃及的亞歷山大港之類。因為蘇聯明知如果它不慎而介入戰爭，勢必引起對美國的直接衝突，從而世界性的核子大戰無法避免，蘇聯自己也將遭殃。

其在聯合國，瑞典代表阿斯莊曾說，聯合國大會應設法通過一項議案，一面令以阿雙方停火，一面由秘書長字垣指派代表前往中東視察，並與雙方有關國家磋商可為共同接受的和平條件，以求中東和平的實現。假使大會於兩天後復開會議時能有具體的提案，至多亦不過類似瑞典代表的說法，這還是一張粉飾一時的水膏藥。截至目前為止，阿拉伯國家仍在，幻想他們如獲蘇聯之助力，終究可以在外交戰場上迫使以色列「無條件投降」的，所以並不願跟以色列直接談判的。其實他們迷信有蘇聯的「佛脚」可抱，轉使以色列佔領其戰勝中所獲土地之時間拖久，對他們反而更不利的。

以色列方面，對於聯合國大會的表決結果，似乎感到高興。其總理艾希柯稱此次聯大的投票，「公平而合理」，自然有「勝利」之感。而且就以國當局的立場說，他們決心在未能與阿拉伯國家直接談判和平條件以前，將不會接受聯合國所通過的以軍撤回原來這邊界的任何決議案的。他們之所以要如此，其用意在於迫使阿拉伯國家在事實上承認以色列的存在。假定阿拉伯作戰的三國之中，約旦國王胡申願意與以色列先作談判的話，以色列可能願意從約旦河西岸的佔領土地上退兵的。然而，蘇聯在幕後如仍然支持阿拉伯國家團結反以，則以色列對和平的願望，一時尙難實現。惟如果有談判的機會，以色列希

望：（一）國際保證狄蘭海峽通入阿喀巴灣的海道，以及蘇彝士運河，各國（包括以色列）有自由航行之權利，（二）西乃半島和迦塞走廊，改成為非武裝地帶，（三）敘利亞境內可以俯瞰加里里海的高地，和約旦東岸的約旦領土，均規定不駐兵設防，則以色列或可不堅持不撤兵。但以色列的鷹派著名人物戴原將軍（現任國防部長），對於撤兵是不贊成的。因此，關於撤兵問題也許可能引起以色列要人內部的分裂。

反之，阿拉伯國家對於聯大會議上週的毫無結果，自感非常失望，因而極力指責美英的阻梗。甚至比較對西方原屬溫和的黎巴嫩，也正在加強其反美姿態。但也有人認為不可過於反美。例如產油國家的不供應石油於美英兩國，他們也知道最後受損害的仍以阿拉伯國家自身為多。故阿拉伯集團諸國的團結亦並非嚴絲合縫的。（菲律賓濱新聞日報）

美蘇鬭法與世局（一九六八年二月十四日）

最近一期的「生活」畫報，刊載了該畫報記者專訪蘇聯共首柯錫金的長篇談話，柯錫金除了自吹蘇聯革命五十年來的進步，表示這第一個共產國家在各方面的成就以外，特別提及美國政策的錯誤。他說，美國在越南的戰爭是一種污穢的戰爭。除非美國停止其在越南的用武，蘇聯無可勸導北越政權及越共的民族解放陣線與美國從事和談。他又說，美國在中東，支持以色列，阻礙聯合國安理會作出要求以色列歸還六月戰爭中所佔地區的決議，無異在中東玩火。他希望美國對於蘇聯，能恢復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雙方合作的精神，則世界和平即可到來。換句話說，蘇聯共首要美國重行跟蘇聯攜手，共同支配這個世界。

然而，從我們旁觀者看來，世局之所以紛擾，原因都由於共產集團國家的從事新式侵略所引起來的。目前越戰中的北越政權和它的民族解放陣線，完全獲得蘇聯武器的支持，固不容自絲毫懷疑，即使北韓的規據美國情報艇普布魯號，幕後也有蘇聯作後盾的陰影。美國在越南和韓國的困擾，在蘇聯是求之不得的。美國的泥足愈是不能拔出，蘇聯愈樂見此種情形的拖長。蘇聯表面上裝出願與美國合作維護世界和平的姿態，而骨子裏却無時無地不在跟美國鬭法。

有人以為俄毛之間的交惡，將可促成蘇聯與美國携手的世局。其實不然，蘇聯仍以打倒其第一強敵

「美國」爲不變的宗旨。儘管赫魯曉夫已經下臺，但他的「埋葬美國」的方針，仍爲其繼任者所奉行的教條。故俄毛之間依然殊途同歸。北越之所以能與美國強大的三軍作戰，固以蘇聯的大力支援爲有恃無恐的憑藉，即北韓共會金日成之敢於搗搗情報輻普布魯號，以及派遣敢死的游擊隊滲透到南韓首都漢城，陰謀狙擊南韓總統朴正熙，擺出再度南侵的姿態，也還是仗着有蘇聯撐腰的威勢而使然。蘇聯之力助北越與北韓兩個共產政權，其用意顯然有兩點：①儘量分散美國的兵力，削弱美國在越南的聲望；②與中共政權爭取亞洲共產集團的領導權，使金日成胡志明之流，都跟莫斯科走而不再走向往北平的路線。同時，乘此美國爲亞洲危機所困擾的良機，它自己便可一步一步的深深插足於中東地區，尤其它的海軍亦可以巡駛地中海，使美國第六艦隊感受威脅，也實現了自帝俄時代起即有的南下進出地中海和波斯灣的願望。

不過，蘇聯共黨的傳統政策，只是想在實質上，利用他人絆住美國的手足，而無需它自己捲入戰爭。則所檢得的便宜將更多。萬一越戰韓戰進展有迫近促使美蘇直接衝突的情勢時，蘇聯仍不惜退却的。譬如赫魯曉夫在古巴的飛彈危機時，便是如此。至於美國如因越戰或韓戰的擴大而促成美國與中共的戰爭，美國自會炸毀中共的核子裝置，不啻爲蘇聯去一張敵，蘇聯暗地裏還會感謝美國，而且它也可以乘火打劫，打毛澤東這隻「落水狗」的。既如此，蘇聯那肯替美國出力，使美國能拔出陷在亞洲的泥足呢？

蘇聯在對美國的冷戰中，凡屬反美的共產政權，或「准共產政權」，只要希望蘇聯予以援手，它除了不肯直接派兵介入作戰而外，它都可以慷慨允諾的。這自然令我們不能承認蘇聯共會是愛好和平的份

子了。至於所謂「共存」，也不過是蘇聯用來拖延它所持「赤化世界」的時間表的一種手段或口號而已。

美國目前所最感苦惱的，它以美國的人力與資源，擔負捍衛自由世界安全的重大責任，却到處遭受其盟國的「白眼」，而尤以西歐的盟國為然。法國的戴高樂政府為其尤甚者。它不但袖手作冷眼的旁觀，且用惡毒反美的拆臺手段來打擊美國。美國在這種「吃力不討好的」國際環境中，仍能不躲回到孤立主義的古老盾牌後面去，總算是詹森政府毅力堅強的效果。否則美國如步英國工黨政府的後塵，也背棄了它對自由世界各盟國的承諾，撒手而去，不管亞洲太平洋地區的事，那麼，世界真要「滿地紅」了！

（紐約華美日報）

詹森的「探求和平」(一九六九年二月三日)

「無官一身輕」的美國前總統詹森，前些時為「大英百科全書」寫了一篇題為「探求和平」的文字，並由百科全書出版人將其全文刊登於一九六九年年鑑中。本年二月號的「讀者文摘」則節載其要旨，佔篇幅有十二頁之多，我原想寫一篇有關綜論「詹森時代」的文字之前，得有機會先讀到該文，不啻詹森的「夫子自道」，因此先根據他的「自道」，略論詹森「探求和平」的成敗得失。

詹森在此文中，開宗明義便描述美國總統責任之重大。尤其他感到在五年之內所面對種種國際問題的困擾，並無簡單的解決方法。雖然每一位新總統就職後多少要自出心裁，在歷史上寫下他自己的紀錄，但事實上並非如此簡單。關於外交問題，他不能不從過去的總統們的成就、承諾、創見，或錯誤中，認清道路而前進。例如對國際條約，他不能不尊重；對他國所承諾的事情，不問政治的、經濟的、或軍事，他必須使他們感到滿足；對世局的發展，不問是外交的、理念的、與科學的，他不能不有反應。況目前擁有核子武力的國家，至少已有五國；而極權主義的共產國家，已佔有歐亞兩洲的大量土地，威脅整個世界的秩序，凡此種種，乃是一位新總統不能不考慮的難題。

詹森又從而指出，美國雖是一個富而且強的大國，可惜它的權力亦有限度，並不能用來塑造一個合乎理想的世界。在此複雜，國際環境中，美國雖可支助他國，但並不能改變懷有野心的人。它雖可促使

業已發生的國際衝突，縮小範圍，但並不能使這類衝突絕不發生。在過去的幾個世紀中，維持世局安定的國家都是西歐的國家，即使在十九世紀的美國，亦賴有西歐國家爲前衛——而得於孤立之中獲安全。但第一次世界大戰，迫使美國不得不爲維護民主而參戰。戰後美國人民幻想仍可回到孤立主義的時代，反對加入國際聯盟。再經第二次世界大戰，而共產主義國家崛起，英法等國國力銳減，亞非兩洲許多國家紛紛獨立，殖民主義的國家因而解體，以往的國際均勢爲之破損，世局動盪，至今未息，加以美蘇兩國成爲握有核子武力的超級強國，稍一應付不慎，很可能毀滅世界。雖聯合國應運而生，可是蘇聯拒絕美國所提出限制核子武器的計劃，只落得從事於核子武器的競賽。聯合國既等於癱瘓，蘇聯則乘機擴張，威脅鄰邦。美國乃有杜魯門主義及馬歇爾計劃，更進而組成謀求集體安全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廿年以來，因此勉強阻止世界大戰的重行爆發。然而危機重重，隨時可以發生，未來的世局如要安定，不能不寄望於西歐、日本、與美國的合作。詹森認爲只要上述這三個中心能够協力防止侵略，維護世局的和平，則蘇聯與中共久而久之亦可接受和平合作的方案。否則將來的世界必更遭遇紛亂動盪的危險。

詹森跟着說出在他的任內，便遭遇到兩次危機：①爲一九六七年中東的以阿衝突。②爲一九六八年蘇聯率五國共軍侵入捷克。就中東而論，此一年半來，美國在聯合國內外，圖謀減輕此地區的危機，切防以阿戰事的再度發生，但尚無把握。故繼任的新總統，勢必繼續向此目標努力達成和平的願望。至就蘇聯侵捷而言，美國雖力避介入，以免觸發大戰，但不能不警告蘇聯，美國及北約組織認爲如威脅西歐安全，及本身利益時，則決不容忍而坐視。其唯一邊阻蘇聯侵略的方法，祇有加強北約各盟國的團結，由大家共負此一責任。但由於法國的作梗，西歐國家迄今未能實現其必需的團結，這是美國所懸慮的

。譬如剛果內亂時，西歐各國絕無援助剛果的舉動，迫使美國不能不派出若干運輸機，供給剛果政府運兵之用，該國局勢乃告平靜。目前因蘇聯侵捷的結果，或反可刺激西歐國家，重視北約而不使之解體。此外，戰後復興的日本，應該覺悟而共負經濟上援助亞洲各國的責任，使之免於赤化。

關於美國派兵援助南越剿共之事，詹森雖迭遭所謂和平份子的抨擊，但他說明當時情勢所迫，美國已無他途可循。此等和平份子以為南越的存亡對美並無切身利害關係。但故甘迺迪總統曾於一九六三年三月間鄭重事宣稱，如美國對南越放棄其承諾的責任，勢必拱手以讓共產勢力的席捲東南亞，威脅印度，從而進入中東地區。一九六五年越共游擊的恐怖行動既加強，北越正規軍也侵入南越。共軍假道寮國與高棉而向南越不斷滲透，而且中共更公然援助泰共，以顛覆曼谷的泰國政府為目的，中共攫奪印尼的陰謀雖失敗，但並不放棄其捲土重來的企圖。所以當時的美國雖不欲負起捍衛南越這一小國自由的責任，已勢有所不許，因並無他國起而予以援助。美國人民因不了解游擊戰的進退出沒無常，遂受所謂和平份子的迷惑，而有反越戰的傾向。當一九六五年七月，詹森考慮於下列三途之中選擇其一途：①減少美軍的犧牲，於最好的情況之下由越南撤退。這必使美國受到屈辱，而且打擊美國在世局演變中所處的地位。②繼續當時的現狀，以七萬五千美軍為限度，在南越作拉鋸戰，而越局將每況愈下。③擴充美軍數額，俾可阻遏北越共軍及越共游擊隊吞併南越的陰謀。同時鼓動南越西貢政府的改革，以便有機會開始與共方談判。詹森說，他為了作此抉擇，曾費了不少時間的深思熟慮，終於選擇了第三途徑，此後三年期間，越局漸有進步。不但越共不能達其武力奪取南越的奢望，而且南越成立了憲法選舉的政府，政局從而穩定。因之，東南亞局勢漸見曙光。亞洲自由國家在經濟上亦多有進步與成長，南越更可有成為

南韓第二的進步成果。最可喜的，是眼見有一個「新亞洲」湧現出來的景象，即自由亞洲各國具有一種合作開發的信心，而且澳洲與紐西蘭也派兵參加援助南越剿共的任務。如此，美國乃可見及亞洲與太平洋地區的國家確乎走上合作自衛之路，而美國只是作爲他們的後盾。

最後，詹森更寄其希望於中共，能不再支援北越及越共，以拖長東南亞的戰事。

綜上所述，詹森在此文中，所透露的構想，主要的有下列數點：①他要使世人明瞭美國之所以援助南越剿共，爲了保障自由亞洲各國的安全，並使侵略者知所戒懼，不敢再使用暴力顛覆鄰國，如美國漠視它對東南亞的承諾而遺棄不顧，則無異鼓勵侵略者得寸進尺。②他爲負責實踐其對援助東南亞的諾言，所付出的代價，亦即所忍受的懲罰，固然重大，但如果自食其諾言而不履行，則所將感受的懲罰，必更重大。③聯合國雖不能盡其責任以制止侵略，維護和平，但美國仍當維護聯合國的存在，因爲它至少可使各國能有互相接觸的機會。④美國對蘇聯的關係，他在任期內一直在設法建立彼此溝通的橋梁。雖因越局未獲解決，不免影響上述的搭橋上作，但已有相當的成就。例如禁阻在外太空使用核子武器條約、兩國互設領事館協定，禁阻核子武器擴散條約等等的簽訂，以及進而磋商兩國如何限制製備飛彈系統，都是旨在減少美蘇衝突的機會。所惜蘇聯侵入捷克之舉，不無打擊這種企圖的實現，但他仍相信蘇聯將會覺悟，而讓美蘇兩國彼此終有相互諒解之一日。但要達此目的，所有非共國家必須確實團結，並且明白警告侵略者如有威脅和平的行動，必難再事容忍。

詹森最後向其繼任者及抨擊者作下列的建議：

○目前的時代，由於大眾傳播工具的進步，以及戰爭將影響及於任何人。故政府的外交政策當盡量

向人民說明，俾獲他們的支持。由人民對於政府所持長期性的外交政策亦需要具有耐心，不可操之過急以求速效。

①以美國派兵進入多明尼加爲例，係以護僑爲目的，期望該國的騷亂不致擴大而危及中南美洲各國的安全，並經泛美組織各國外長會議的支持，卒能達成任務。而後美軍撤出，建立了各國共同組成的哥維和平的部隊。使多明尼加能產生新的政府，獲其人民的支持。這是證明美國並無佔領他國土地野心。

②美國當前雖有不少疑難的問題，但較之蘇聯面對東歐各國追求自由的難題，及蘇聯與中共之間的問題，乃至中共在亞非國家的聲望消失，則美國的問題不如它們的嚴重。

③美國的任何總統，都將遭遇到有關世界和平及美國安全的挑戰，使總統不能不發揮其明智與勇敢的精神以奮鬥圖存。他引用故甘迺迪總統的一句話結束他的整章。甘迺迪曾於受抨擊時說過這麼一句話：「這是一個危險而又紛亂的世界，但我們總得在這個世界上生存下去。」

要而言之，詹森此文的作用在於解釋他雖曾派兵援助南越剿共，而其目的則在遏阻共方的侵略和顛覆。不但此也，他更無時不在尋求搭橋之道，企圖與蘇聯、中共、乃至北越「和平共存」。可是我們不能不指出：美國的援越，如果「爲德不卒」，但求美軍可以撤離南越而回國，無論巴黎談判如何進行，美國似已暴露其弱點，其結果恐祇有損害美國在世界上尤其在亞洲太平洋地區的期望。而且我們相信「探求和平」如不得其道，爲和平而不惜遷就侵略者，不啻與虎謀皮。蓋侵略者的貪慾無窮。美國何能填飽其慾壑？（紐約華美日報）

對美蘇談判的兩種看法（一九七〇年三月五日）

三月號的「讀者文摘」刊載有關美俄談判的兩篇文章，標題為「我們能信任克里姆林宮嗎？」其一係前紐約時報軍事記者鮑爾溫所寫，認為蘇聯說話甜蜜，而行動辛辣，意在對蘇談判必須萬分小心。其二係前副總統韓福瑞所寫，則認為美俄兩國現今站在一個共同立場，故問題已超出信任與否之上，而有不得不相互談判之勢。我們且看他們雙方所列舉的重要理由，再提出我們的意見。

（甲）鮑爾溫的文章，先列舉蘇俄以往許多言行不符的事實，如一九六二年十月葛羅米柯外長向甘迺迪總統聲稱蘇聯無意在古巴裝置進攻性的飛彈，實則當時甘總統已握有此項裝置飛彈的照片，諸如此類之事不一而足。就核子武器而言，過去廿五年當美國擁有優勢時，不問有無限制協議，自可遏阻核子大戰之爆發，但此項情勢並非由於蘇聯之可信任而得。鮑爾溫以為一切人與人或國與國間之協議，其要素即在相互信任。尤其關於限制軍備之談判，如無可以確切視察之具體規定，便非常危險。他說歷次美俄間有關此類之協議，蘇聯實際上都有破壞，而不利於美國。故蘇聯如真有誠意談判，當就下列各項，有事實上的表現：

①蘇聯現在是世界上軍費支出最大的國家，其潛艇艦隊亦為世上的最大者。蘇聯且已發展一種「局部軌道轟炸系統」（FOBS），如果使用起來，可能使美國所有警報時間減縮至五分鐘。故假使蘇聯能

如美國一樣，先作片面的自動裁減軍費，至少同意可作有限的相互視察，方可取信於人。

②越戰的拖長，全由於蘇聯的援助北越和越共「解放陣線」。雖然美國已停炸北越，撤退軍隊，力求和平解決，但蘇聯及共產國家的船隻繼續運輸一切軍需物資到海防，其蓄意支持戰爭，顯然可見。故蘇聯如確望改進對美的關係，應即減少對河內的支援。

③美國的太空人登月計劃完全公開，蘇聯則否。美國一向主張合作進行探觀太空的工作，這是有利於兩國及全世界的。但蘇聯迄未同意。

④蘇聯在中東，軍援埃及等阿拉伯國家，並透過波斯灣的亞丁，在阿拉伯半島支援產油王國，同時進行顛覆活動。在其他地方亦屬如此。如蘇聯能改變此類作風，當可減少西方國家對蘇聯帝國主義的危懼。

⑤蘇聯一切宣傳，向全球各地都是以抨擊現存制度為中心，不但廣播如此，而且用大量虛布，支助全球各地的激烈刊物和組織，反對自由世界的各國政府。其對內宣傳，仍以美國為其最大敵人，以最醜惡的言詞，詆華盛頓為全人類的共同敵人。如不改變此種態度，何能顯示其有與美國和平共存之誠意？鮑爾溫以為蘇聯如不能從上述各點，有新的改善表現，則美國雖然願意試圖對蘇聯改進關係，但仍不能放下我們防衛的警戒。除非蘇聯至少有一種實質上的具體表現，否則美國何能信任它。

(乙)韓福瑞的文章：其主要論據，以為面對核子大戰的浩劫，美蘇兩個超級強權，有共同的義務，必須尋求終止軍備競賽的有效方法。

韓福瑞說：美國人固然常對蘇聯發生可否信任的疑問，但蘇聯方面也常對美國發生疑懼。幸而在過

去的十年間，兩國已有若干合作的成果。例如：對南極地區不作軍用的協議，局部禁止核子試爆（大氣層、海洋、太空禁爆）的協議，阻止核子武器擴散的條約，互設領館促進雙方人民旅行交通的協議等等，都顯示雙方均感覺如不相互自行剋制，將導致更大的危險，今後如要達到限制軍備的目的，必須雙方放棄要佔有優勢的觀念，在具有相等力量時，方有可能達成協議的機會。所以，蘇聯現在已有若干「反飛彈」（ABM）的佈防，美國亦正在辯論「反飛彈」系統的裝置佈防問題。韓福瑞認為美蘇兩國具有明智頭腦的人，應知此刻開登最為重要，因為雙方已無力量絕對一擊而毀滅對方的可能，這是不能錯過的談判限制戰略武器問題的機會了。否則，雙方都在考慮研究「多彈頭核子飛彈」（MIRV），且作此競賽，勢將以為先有此項武器可操絕對優勢，於是將迫令雙方進入更大的軍備競賽，其費用亦必更鉅。

因此，韓福瑞作出大膽的建議，他主張美國不妨片面宣告，先行自我約束不製造「多彈頭飛彈」，但以蘇聯作同樣行動為條件，要求在相當期間訂成禁止這種武器試驗的協定。他認為如果訂立此項協定後，美國當有方法可以窺知任何違反協定的行動。

我們讀了這兩篇文章，對他們謀求世界和平與美國安全的誠意，毫無懷疑，而且也很願望這兩個超級強權的領導階層能達成限制戰略武器的協議，俾人類得免於空前的浩劫。但是，確如鮑爾溫所言，過去的許多協議，不是美國事前作讓步，便是蘇聯事後作破壞，而美國無如之何。故對今後的重要談判，美國不能不十分慎重。尼克森總統曾揭櫫談判時代應具三要素：①合作、②實力、③談判。我們認為

最重要的在於「實力」。如無相當的「實力」而貿然寄望於談判，等於手中沒有牌而想跟人家打撲克。故自我約束先限制自己的實力，作為談判的起點，萬萬要不得的！（紐約華美日報）

氫彈製成以後（一九五四年四月十五日）

美國氫彈製成以後，所給予美國國內和全世界的影響，必將非常巨大；這是不言而喻的。雖然美國的氫彈爆炸，早在前年十一月一日在安尼威吐克島區域上演過，但正式氫彈的試驗，不能不推今年三月一日和二十六日的兩次大爆炸。以前原子彈的爆炸威力以萬噸計，如今氫彈的爆炸威力却以百萬噸計，原子彈之視氫彈，正如小巫之見大巫。但丁神曲中的「地獄」，比到氫彈所造成的「火海」，黯然褪色；而且但丁的地獄不過出於個人的想像，氫彈下的火海却是百分之百的事實！

上月三十一日，艾森豪總統帶了他的原子能委員會主席史特勞斯海軍少將，出席白宮記者招待會，所作繪聲繪影的報告，以及美國政府業已准許放映前年十一月初氫彈爆炸的彩色影片，令美國人民的神經，爲之緊張萬分。報章雜誌所記載，街談巷議所接觸，H彈的字樣到處可見，H彈的名詞，到處可聞，也有記者故意賜予嘉名，稱之爲HEL彈（地獄彈）！據史特勞斯少將的說法，不論紐約、倫敦、或莫斯科……任何一個大都市，只消一顆氫彈，就可整個完蛋大吉。稍加分析，則八英里直徑的圓圈之內，全化灰燼；十六英里直徑的圓圈內嚴重損害；廿八英里直徑的圓圈內次之；卅二英里直徑的圓圈內局部損害；五十英里直徑的圓圈內尚略有燃燒。讀者當可想像到它的威力之大，比當年廣島上空的原子彈，其相去何止百倍千倍！

在戰神所賜新武器的面前，不但使蓄意侵略者顛慄，即志在防禦者亦無不因而膽寒。美國人知道「我能造，寇亦能造」，因此格外須注意自己本土的空防。但美國今所持以阻遏三次大戰者，亦唯此有效的新武器是賴。自由國家所可自慰的，便是環繞蘇俄、中共輪心的周圍，已建立了空軍基地的鎖鍊。試從北極頂端一望，東自南韓、日本、沖繩島、菲律賓、新加坡起，經錫蘭、沙地阿拉伯、（新近又加巴基斯坦）、土耳其、北非、希臘、義大利、西班牙、而達大西洋區域的法國、英國、冰島、格林蘭，乃至加拿大、美國、阿拉斯加，而同到北太平洋的阿留申羣島，這一個大圓圈，沒有一處不可以出動飛機，向共產集團的心臟地帶投擲原子彈與氫彈的。不要說，中共匪幫要發抖，就是他們所敬若神明的「老大哥」，也一定在克里姆林宮中瑟縮齒戰。莫洛托夫最近所說的一套，什麼蘇俄參加北大西洋同盟啊，什麼美、英等國都去參加他所建議的全歐安全協定啊，一方面看固然是騙人的鬼話，另一方面看也未始不是他們臨時抱佛脚的「急叫」。

五角大廈中一位軍事專家說：杜勒斯所倡言的「立刻大力反擊」政策，美國現在對蘇俄的確可以實行。因為以蘇俄國境之大，來自四面八方的空襲，使它處於防不勝防的地位。譬如美國的四周圍，冰島、百慕達島、巴拿馬、古巴、夏威夷、阿拉斯加，都成爲蘇俄的空軍基地，試問美國四十州所感受的威脅如何。而且，美國在今後的世界大戰中，其巨型轟炸機將不復如二次大戰時一般，於投彈後仍必飛返其出發的基地，他們將作穿梭式的飛行，投彈之後，即可逕飛其他附近基地降落。譬如從格林蘭東飛的轟炸機，可於完成任務後，即南飛土耳其或沙地阿拉伯基地去，使蘇俄摸不着頭腦，無從攔截。而蘇俄飛機之襲美，則無此便利。還有，蘇俄任何一個地方，都在美國B五二型戰略堡壘轟炸機的三五〇〇英里航

程之內；即以B四七戰略噴氣機的二〇〇〇英里航程而論，也祇有西伯利亞幾個最遼遠的地方在其航程以外，但也有辦法補救，因為美國業已發明了噴氣機空中加油的方法，無形中可使其航程延長。並且有了這種驚人成就，美國的原子彈轟炸機和原子彈、氫彈，都可停儲在英國或沖繩島那些距蘇俄較遠的基地上，而不必停在西德或南韓，以免一旦被毀。美國領土面積僅及蘇俄三分之一，但假使美國有一萬具攔截敵機的噴氣機或火箭，足以打下大部分的敵機，蘇俄縱有三萬具的攔截武器也不能收穫同等的功效。此外，美國如反擊蘇俄勢必數百架飛機出發，而並不集中攻擊一個地方，如二次大戰時一樣，因為一個氫彈可以毀滅蘇俄的任何大都市，一個原子彈也可以毀滅蘇俄的中小都市。所以美國專家說，即使美國預先宣布某日某時要轟炸莫斯科，蘇俄縱出全力，也沒有方法保全其首都。

蘇俄雖然早已把工廠疏散，移到烏拉山和西伯利亞去，但此不足以阻止空軍的進襲。而且愈疏散得遠，則蘇俄自己的陸上交通愈難。譬如西伯利亞漫長的鐵路，隨處可以炸毀，又無公路可以代替，故鐵路、電報、電話的割斷，將使極權的國家頓時感到癱瘓。

但是，反過來看美國，面臨原子大戰的危機，也有他不少的弱點。美國的高度工業化，人口集的中都市較多於蘇俄，故如無萬分健全的空防，則美國人口將在原子彈襲擊之下犧牲的必不在少數。目下電氣工業家施伯蘭 (Robert Sprague) 所擬具的美國空防計劃，雖被許為十分圓滿，但尚無立即實行的象徵。艾森豪即使批准他的計劃，實施起來，也要費龐大的款項，等候一二年才可成事。至目前而論，說來笑話，美國的雷達警報網只能保證每個城市有十五分鐘的疏散時間，但他們估計要疏散整個城市的人口，起碼要二小時到六小時（像紐約八百萬人，恐怕六十小時也未必能辦到完全疏散），試問能有什

麼安全保障？聯邦民防局局長貝德遜 (Val Peterson) 說：他正想訓練演習城市居民的全部疏散，以免臨時倉皇失措。可是他們目前還只能得到一個結論。便是：任何城市在原子彈的襲擊之下，每一家庭，每一工廠，每一學校，每一商店，每一農場，都變成了攻擊目標；沒有一個人可以獲得安全的保障。

因此，我們應該可以想像得到，即使美國擁有空前威力的氫彈，仍然要竭力避免三次世界大戰。(臺北新生報)

美英法商談核子武器問題（一九六二年六月廿一日）

美國國務卿魯斯克已於六月十八晚飛往巴黎，將再轉赴西德、義大利、英國、葡萄牙等國，在歐洲作十天訪問。他所要與各盟國當局商討的問題當然很多，比較重要的不外三個：①英國加入西歐共同市場問題；②西方盟國對於使用核子武器之戰略問題；③大西洋兩岸盟國如何合作援助尚待開發的國家問題。他不承認對於這些問題，盟國之間有根本差異的歧見，祇是希望能因此行而充分交換意見，俾此項大同盟更能加強團結，共同從事於未來的偉大工作。今試就核子武器的戰略問題一加探討。

核子武器發展到現階段，世界上已有三國——美英蘇——掌握核子武器，而美蘇更在積極競賽之過程中。法國政府亦力圖急起直追；一般人認為一九六三或六四年法國可能自造核子武器及飛彈。此外，則一部份人常常宣傳中共偽政權在未來的兩三年間亦可能爆炸核子，雖距離製造核子武器尚屬遼遠。在如此局勢之下，美國當局曾熱切期望先與蘇聯訂立協定，凡現在已有核子武器的國家，不將有關核子武器的機密及材料供給他國，以免將來更難控制其使用，而釀成核子大戰。但是關於停試核子及裁軍的種種問題，最近既在日內瓦十七國代表會議中，經過三個月，迄無進展，我們不能相信暑假休會一月之後，在下列月繼續會議時，將會對此種種問題能有任何進展的，故我們在此所研究的，不是核子武器的裁減或銷燬的問題，而是西方盟國在東西冷戰中，如何運用核子武器作為工具，嚇阻大戰的爆發。

當魯卿出發赴歐訪問五國之前夕，美國國防部長麥那瑪拉於六月十六日在米歇根大學畢業典禮中作重要演說，闡釋美國當局對於西方國家運用核子武器問題的立場，演詞中雖未提及法國主張自建核子部隊一事，但絃外之音，顯指法國。窺其要旨，不外下列數點：①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今日最關切者即爲此事。「北約」現已有充分的核子武力足以面對挑戰，不但使發生核子大戰之危險可以減少，且即使發生亦當設法使自由國家之社會組織仍能保存，故在戰爭中須力避以核子武器轟炸城市居民，而限於軍事目標（即作有限的核子戰爭），同時應增強各盟國通常武器部隊的實力，使西歐不致遭逢不用核子武力的任何侵略。②本於上述立場，美國在未來的年度中，將再撥一百五十億元擴充核子武力，準備盡其保衛自由世界之責任。另一方面，國家性的比較微弱的核子武力，如果「獨立使用」，（按此即暗指法國）不獨不足阻遏戰爭，且屬浪費而危險，美國對於「北約」盟國所貢獻的核子武力，既非落伍過時，亦非失其作用。③運用核子武力的戰略，必須有統一的計劃，執行權力更宜集中；盟國之間不可在戰略上有互相競爭與衝突之處。如此，方能使盟國的整個核子武力，一方面可分配於對付敵方重要的軍事目標，一方面又能保留預備的核子武力，作爲報復敵人搶先偷襲之用。④美國所計劃的「北約」核子武力的防禦，乃一種全球性的戰略。蘇聯可以達到西歐的核子武力，與其可以達到美國的核子武力，爲美國所同等重視的。

故美國所存放於歐洲戰區的核子武器，乃僅其各種作戰資源中的一種，美國不但已宣佈將五艘裝有北極星飛彈的核子潛艇撥歸「北約」監軍指揮，且今後將更以主要的核器供給整個的「北約」盟國。

我們看到上面所播的麥納瑪拉演說要旨，可知美國雖暗示不滿於法國單獨自建核子武力的計劃，但並不關閉美國核子武力將可與「北約」盟軍共同運用之門戶。

如上所述，麥納瑪拉代表美國政府闡明政策的理論，業已引起法英兩國的反響。法國方面，由其前任總理戴布瑞於進謁戴高樂總統向新聞記者宣稱：麥部長批評一個國家自建微弱的核子武力以爲無益而有害，只是純粹從物質效率方面看，而忽略了此問題更重要的心理和道德方面。他認爲西歐一個國家渴望建立核子武力，不僅要在物質方面增加一部份實力，乃是在道德上表現其具有爲防衛而作犧牲的意願。假使並此種意願而不使之發揮，則整個西歐國家可能趨向「中立主義」。戴布瑞目前已無官職，但我們不能否認他曾爲戴高樂的親信，故他的話多少可能透露戴高樂與魯爾晤談時的意向的一部份。

英國方面：保守黨政府的重視核子武器的政策，本來遭受一部份政客和人民的反對。如今因麥納瑪拉的演詞暗示一個國家單獨的微弱核子武力並無用處，無異鼓勵西歐盟國宜乎注意增強通常武器部隊，於是工黨和自由黨的反政府派，向來高唱英國不妨片面裁廢核武器者，似可振振有詞。觀察家認爲下週國會復會時，他們或可質詢現政府：①麥氏演詞是否代表甘總統之意見？②英國曾否經常瞭解美國政府就於運用核子武力之政策？③在麥氏心目中，英國的核子武力究竟有否絲毫用處？一直至今，保守黨政府堅持英國必須保有核子武力，方可遏阻侵略。乃麥納瑪拉輕視一個國家單獨的核子武力，此固指法國而言，但對英政府未免亦予以刺激。尤其麥部長以爲美國的政策，在使戰爭萬一發生時，核子武器只限於用在對付敵方軍事目標而不及於蘇聯的城市，更使英國當局有所懷疑。他們認爲極權政府並不遵守戰爭的規律，並不因爲我方不以核彈炸城市而亦即不核炸我方的城市。況且從戰略的觀點言，許多城市的

重要性比軍事目標更高，怎麼能够既使用核子武器而可以限制其轟炸目標不及於城市？

因此，我們可以推測，如麥納瑪拉的解釋，可謂越說明越令人糊塗，愈闡述愈引起辯論。相信即使魯卿分訪法英、西德等國，並不能消除西歐國家對於美國所持態度的誤解，說不定至少戴高樂總統有與甘迺迪總統重行面談一次以求相互瞭解的必要。

我們站在客觀立場，檢討美國一直反對協助法國建立核子武力之舉，認為未免過分歧視法國。須知美國既已經援法國助其復興，又促成西歐共同市場而使之近乎繁榮。再加以阿爾及利亞戰事終可停止，則誰能阻止法國不逐漸恢復其自尊心，發生國家自衛的觀念？何況法國政府的決心建立核子武力，俾可至少追及英國，不自戴高樂上臺始，不過戴氏格外積極進行而已。英法同為美國之西歐盟邦，而「北約」盟軍總部又設在法國，美軍如有事於西歐，斷不容蔑視法國在地理上的地位。乃美對英國則供以核子發展的機密，許其與共，而獨對法國則擯之唯恐不堅。以前法國在核子試爆方面，毫無基礎，猶可說也；今法國既在薩哈拉沙漠有其試爆成績，乃仍吝而不供以資料，必使法國艱辛進行，恃其自力，難怪法國人以為美國寧可讓敵人（蘇聯）盜其核子機密，而不肯以之供給其善意的友人。試問美國當局於此，又將何以自解？

我們如對魯卿在巴黎與法國當局所作關於法國建立核子武器部隊之談判，稍加注意，顯可窺見美國態度近來似已有所轉變。起先，美國似乎很反對法國堅欲研究製造核子武器，以為美英的核子武力既經保證可作防衛西歐之用，即不啻「北約」已有其核子武力，法國何必「勞民傷財」，增重負累，而耗其心思財力於核子武器之製造；其所持理由謂更希望能與蘇聯互約，雙方不供給有關製造核子武器之機密

於他國，則比較可望減少核子大戰發生之危險。但是，因為法國下了決心，不願美國能否稍予以方便的協助，必欲建成其核子武器而後已。且在事實上此事實已無可避免。於是美國乃退一步而表示其希望，即法國萬一亦能有其核子武器，則務須與美英相同，大家對於運用核子武器之時機、方法、與環境，能作共同的決定。換言之，即反對麥納瑪拉演詞中所稱的「獨立的運用」，希望法國拋棄此項想法。

然而，此在法國當局看來，實在等於過早的「無的放矢」。因為法國當局實在並沒有明白昌言，他們一定在製成核彈以後，絕對保持其單獨使用的權力。誰都知道，法國原想在「北約」盟軍組織中能有美英法三國共同指導的機構，意即法國不能坐視其永為次於美英地位的盟國。而美國不願如此。反之，美國因擁有其大量核子武器的優越實力，居於保衛西歐安全的主要盟國地位，責任既重，風險更大，始終表示使用核子武器的命令權應掌握於美國總統之手。誠然，就美國立場言，這也是天公地道，為防患未然計，不能不如此。然則，這樣不是成了美國的「單獨運用」嗎？是否使用核子武器，既惟由美國總統所決定，則西歐國家的人民自亦不能無疑。萬一蘇聯利用其大量的通常武器部隊向西歐侵略，而美國為顧慮其本土可能為蘇聯核子飛彈所襲擊，仍不願以核子武器阻遏敵軍之前進，豈非西歐國家將為蘇聯紅軍鐵蹄所踐踏？故推究到法國所以堅主自建核子武器，以及西德所以要求「北約」盟軍應有其獨立的核子部隊，其真正原因便在於美國自己一向所持的「獨立運用」政策，不能獲得他們的完全信任。以前，他們這些國家沒有經驗力量足以製造核子武器及其投擲工具，自然只好託庇於美國的「大力報復」政策的保護，渡過其難關；今天西歐共同市場的成就，已使他們自信其能够有力擔負自衛工作。凡具有民族自尊心的國家，必堅主盟國平等相處。故西歐國家或「北約」，希望自有核子武力，並不一定要想分

雖——尤其西德對於此舉看清楚有危險。他不過想爭取一個平等地位，俾能與美國將來對核子武器的運用作一決定，而不致永久為美國總統所「獨立運用」罷了。乃今天的美國當局不對自己作一番反省，而竟在法法德德等努力時則不予以助力，迫見其終將不免製成核子武器時，則又提出所謂「國際共同運用」等語，試探法國將來願否與美英的核子武力共同使用，豈非失之過早？

旁觀者語，依我們看，美國應視今天的法國，在核子試爆的階段上等於數年前的英國。數年前可以助英國，何如美國當初許可將核子武器的機密與資料供給英國分享，今亦不妨予法國以助力，而後在情感融洽之下，進行商議西方國家核子武力的「共同運用」方案。水到渠成，何患再有和格？法國當局不是愚駭，豈真會狂妄到妄想以法國一國之力挑起蘇聯核彈毀滅的戰禍，而竟欲與美國分道揚鑣？若謂法國不惜以此為手段而拖美國跳火坑，則試問在此情勢之下，首遭犧牲者為法國，彼又何必作此自殺的舉？所以，美國一方面要與蘇聯作冷戰，對中立國家不惜曲意周旋，而另一面却對自己陣線內的盟國則多方釀成不必要的有傷情感的爭辯，如核子武器問題即其一例，實非計之得者。（紐約華美日報）

美蘇軍備競賽問題（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

美國駐蘇大使湯普森業已到了莫斯科，並且已於一月十四日會見了蘇聯外長葛羅米科。同時準備將湯森總統致蘇聯共首的信面交蘇聯「總統」鮑哥尼。據報，這封信的內容，重在呼籲蘇聯，同意與美國共同停止作「反飛彈的飛彈」防衛系統的競賽，至於蘇聯如何反應，此時尚談不到，要看這位舊地重遊、駕輕就熟的湯普森大使和蘇聯方面談判的結果了。

關於此點，湯森總統在其國情咨文中，亦已有所透露，表示美國願先決定暫緩進行「反飛彈的防衛系統」，希望蘇聯亦能如此，庶幾雙方可以不致再向耗費鉅額經費的軍備競賽之途前進。他認為不論通常武器或核子武器，如果美蘇雙方長此競賽下去，祇有更增加資源的消耗，而對於雙方的安全並無所得。

如所周知，美國自一九五九年以來，爲了研究發展一種反飛彈的防衛系統，即所謂 Nike-X 制度，已花費了近乎二十億元的鉅額經費，但當局仍願遲滯進行這一項武器的製造與配置，因爲估計尚需繼續支出三十億至三百億元之鉅。此其一。並且據國防部長麥納瑪拉的見解，即使完成此項防衛系統的部署，仍不能保證「敵方」飛彈之必難滲透而攻入。故仍有數百萬人民死亡之可能。此其二。惟聯合參謀總認爲應有比種系統的建置，因中共也在製造進攻性的核子武器，不能不防。預料美國國會在討論下

年度預算案時，必將對此問題作重要的辯論。

說到美蘇之間的軍備競賽，這問題自二次世界大戰終止以來，也是核子武器產生以來一直存在的問題。不過自二次大戰以還，世人震驚於核子武器殺傷威力之大，自然更希望各國不再向製造核子武器之途作賽跑的前進而已。惟說是儘管說，希望仍只限於希望。即以美蘇兩國而論，自二次大戰結束以後，美蘇已作了兩次輪迴的軍備競賽了。

第一步，由於蘇聯於一九四八——四九年封鎖柏林，和史太林時代蘇聯對於所有維持國際的安全任何建議都予阻梗，美國遂不能不於一九五〇年代從事於中程及長程噴射轟炸機的製造。蘇聯却趕緊製造飛彈。上述美國噴射轟炸機，先有B四七和B五二型的，後來再有超音速的B五八型，並且逐年改進，使能裝配攜帶核子彈頭，同時配合空中裝油的噴射機，足使轟炸機不必中途降落而即能直達蘇聯心臟地帶。於是蘇聯在發展飛彈的製造而外，也有兩種反應：①製造中程及長程的轟炸機，②建立及發展其防衛系統，包括高射砲及攔擊性的飛機。美國也就不不能不建立其進一步的防禦設備，包括加拿大在內，自阿拉斯加起沿北冰洋邊界而至冰島，裝置所謂「早期警報線」的雷達網。同時在兩洋沿岸亦佈置着巡邏船隻和飛機上的雷達設備。更與加拿大合作設立甚多的防空中心，佈置戰鬥機和地對空的火箭砲。此外，尚有「半自動性的地面防衛制度」。但此還耗費幾十億元的防衛設置，由於武器的進步，轉瞬而即可變成失其效用的「廢物」。

美蘇之間，在軍備競賽開始之初，其注重點似有所不同。美國多注重於進攻性的武器，以為最佳的防禦即是具有進攻的力量；蘇聯則注重防禦性的武器。故蘇聯有其加強的防禦設備，而美國則有更多的

戰略空軍的實力。

不論注重進攻或防衛，美蘇兩國在軍備競賽的過程中，當已體會得到競賽愈深入，則所耗的經費愈鉅大。自一九五〇年代後半期至一九六〇年代仍在繼續中的競賽，已由噴射轟炸機進而傾向於彈道飛彈。並藉人造衛星之助，巡邏偵察敵方之成就，更能瞭解對方所從事的是什麼。當時美國有所謂「飛彈脫節」之說，不論確否如此，美國不能不進入競賽的第二階段，在洲際彈道飛彈的製造方面，質與量都有相當進步。使用液體燃料由地面發射的 Atlas 和 Titan 飛彈漸受淘汰，而趕製那些使用固體燃料，由地下或潛艇上發射的「尖兵」(Minutemen) 和「極星」(Polaris) 飛彈。現在，前者已有一千個左右，後者也有六五六個。估計美對蘇在洲際彈道飛彈方面的比較，約為三或四對一之比，美國自佔優勢。同時，美蘇雙方在防衛性的地對空飛彈方面，亦在加強競賽。佔優勢者却為蘇聯。美國乃不得不改良所製的噴射轟炸機，俾能裝置由空中發射的飛彈，同時在飛機上利用電子的裝置，足以擾亂蘇聯的雷達網。

軍備競賽在目前已到了第二階段，據報蘇聯已在加速研究發展「反飛彈的飛彈」計劃 (ABM)。最近且傳蘇聯不但製造成功，而已佈置設防了。反之，在美國方面，這種所謂 Nike X 的「反飛彈的飛彈」還停滯工程設計及發展階段，距離製造成功還有相當時期。因為美國當局仍注重在悉心設計，務使進攻性的轟炸機或飛彈能夠冲破蘇聯精巧防衛網，而射達蘇聯境內的目標地區。經過一九六二年「古巴飛彈事件」美蘇難牌，蘇聯撤回運交古巴的飛彈，且與英美兩個簽訂局部禁止核子試爆條約以後，美國當局以為蘇聯已承認此種相持的「均勢」，不致再迫使美國更作「第三回合」的軍備競賽了。蘇聯新領

袖布里茲涅夫和柯錫金上臺以後，美國更希望他們或係企圖與美國訂有相互維持現狀的「條約」，因此計擬對蘇停止再進一步的軍備競賽。詹森總統最近派湯普森大使赴蘇履新的重大任務，便在說服蘇聯，雙方相約不作發展「反飛彈的飛彈」計劃。但是果然可能嗎？而且，中共也在趕緊製造核子武器，如果情勢不變，估計到了一九七五……八〇年間，中共也可有威脅美國本土安全的核子武器，這不能不使美國多了一層顧慮。

再說，傳聞蘇聯一方正大量裝配ABM鞏固其反飛彈的防衛力量，同時也加速製造使用固體燃料發射的洲際飛彈，備進攻美國之用。如果所傳屬實，則今後美國的「尖兵」和「極星」飛彈恐將不能對於蘇聯再佔優勢。於是美國如不能獲得蘇聯同意停止軍備競賽，其勢又不得不走入第三階段的競賽。可見湯普森大使能否達成任務，所關甚大。

美國面臨第三階段對蘇的軍備競賽，不得不考慮下述種幾重要抉擇：①應否着手從事Nike X「反飛彈的飛彈」的生產與佈防，並佐以大量的更進步F—II型截擊飛機，及大規模的防空室，使人民能躲避核子彈？②抑或應當按照前定計劃，使用最新的洲際飛彈，保持美國所握有的遭受敵方核子突襲以後的反擊蘇聯力量？③抑或除了使用「改進能力飛彈」(ICM)足以反擊蘇聯的突襲而外，更佐以進步的人駕戰略飛機 (AMSA)，以代替B—52型甚至B—111型的轟炸機？如果決定採取第一策或兼採第一及第三策，那便表示美國決心準備用武力維護其世界霸權，對蘇聯只有鬭爭而無合作的想法了。

按照國防部長麥納瑪拉的觀點，他一直堅持，只要美國能確保擁有對蘇聯核子突襲後的反擊力量，蘇聯便不敢對美國作核子武器的挑戰，故此為最好的防衛。所以他認為美國不必因蘇聯從事於ABM

（反飛彈的飛彈）的製造佈防，而亦步亦趨，作此耗費龐大經費的競賽。但此種意見，經常為聯合參謀部的軍事權威及國會兩院軍事委員會所懷疑。即詹森政府的閣員亦未必全數支持麥氏的觀點。但除了軍事而外，在政治上或經濟上，美國當局如何抉擇，也大有考慮的必要。

就政治言，譬如美國決定完成「AIM」反飛彈的飛彈計劃時，將來此種武器除了在美國本土上裝置而外，是否在盟國的境內也裝置呢？其費用是否由盟國分擔呢？是否因此而更使美蘇兩國不易走向協調之路呢？美蘇不能協調，是否與西歐盟國現方圖與東歐共產集團互讓而和平共存的旨趣相背呢？而且中共加緊追上核子武器的競賽以後，能否使日本印度等國甘心處於始終落後地位呢？直至目前為止，蘇聯已與美國簽訂局部禁止核試驗的條約，亦同意簽訂太空和平使用的條約；而且美國也在希望進一步更能簽訂包括禁止地下爆炸及建立禁用核子武器地區的條約，從而逐步達成全面裁軍的條約。如果美國決定從事新的軍備競賽，這些希望是否會完全落空，而使詹森政府「圖改進美蘇關係的工作受到不利的影響？」

就經濟而言，倘美國決定製造並配備AIM反飛彈的飛彈，則今後每年的國防經費預算至少要增加五六十億元。亦即目前在越戰期間的全年七百億至七百五十億元的預算，此後將無望再能減少。（越戰以前，年支約五百億元。）斯奈森的大社會計劃所需的經費恐將大為削減。誠然，美國全年的國民總生產額可達七千九百億元，故國防費支出七百億至七百五十億元，佔其百分之九，並非不能負擔。但國家資源（包括人才與物力）用於國防者既多，則其他方面所能使用者也必少，乃自然之理。何況華國近年

以來的總統，包括詹森任內，都在力求避免世界大戰。當然也不願從中加強軍備競賽而增多觸發大戰的機會。詹森總統所以寄運望於湯普森大使在蘇所進行的商談者，其故當在此。（紐約華美日報）

「原子時代」的廿五週年（一九七〇年七月廿三日）

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美國研究製造原子彈，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六日黎明在新墨西哥州的阿拉摩高杜試爆其第一顆原子彈成功，不但使二次大戰因美國急於八月下旬向日本的廣島和長崎投了兩顆原子彈而提早結束，並且使這個世界進入所謂「原子時代」；到今年已經有廿五週年了！回顧這廿五年中，世局紛紜擾攘的變化，波譎雲詭，令人不勝感慨。

第一，美國在二次大戰初了時，不僅富強甲天下，而且為掌握原子彈的唯一國家。可是在萬廿年，所謂「核子俱樂部」現已包括了五個「會員」，原子勢力的局面，所爭者已非「有無」，而為數量的「多少」，而更將為使用的「先後」。在目前的階段，美蘇兩國代表在赫辛斯基和維也納的兩次談判中，有關戰略武器的限制問題，業已涉及「反飛彈的飛彈」(ABM)和「多彈頭飛彈」(MVRM)等等複雜武器的爭執。而且因為人類探月初步成功，迄今已有一年。人造衛星似已視為尋常。人造太空站也可成為事實。於是人類互相殘殺的悲劇，很可能因狂人的莽撞而在太空、地面、及海底演出。假使此種趨勢無法遏止，人類難保不走上洪荒時代稱霸的「恐龍」自我毀滅的末路。

第二，這廿多年來，美國雖一直渴望由國際協議控制核子武器的發展，但自巴魯契計劃提到聯合國要求討論的蘇聯所反對而落空以後，國際合作控制原子能的想法，已引導到祇為和平使用的一條路上去

。此種願望將來能否達成，無人敢於臆斷。至於所謂「局部禁試核爆」以及「防止核子擴散」的兩種條約，都是在蘇聯屢經試爆自覺確有把握追上美國以後，方肯簽署，自不能期望可藉此條約以遏阻蘇聯在研製核子戰略武器的競賽途中更行向前邁進。如從蘇聯最近擴張海軍，謀取中東，甚至企圖插足印度洋、波斯灣，以及亞太地區，雄心勃勃，加以觀測，則蘇聯之有意憑藉核子武器以威脅全球，赤化世界，固已路人皆知。何況蘇聯與中共，一面為邊界問題而爭執，一面又將恢復互派大使，其對自由世界所玩的「雙簧」手段，更可證明它們對於赤化世界是殊途同歸的。二次大戰後的廿五年中，雖有「告朔餼羊」的聯合國，並不能消弭戰爭於無形。

第三，就美國而言，主持原子能的研究發展與管制的機構，政府方面有原子能委員會，國會方面有兩院合組的原子能委員會。而後者實際掌握推動的權力。例如主動促成輕氣氫的製造，推進戰術核子武器、核子能潛艇的製造，以及有關核子原料的增產，和核子能電力廠的增設等等，都是由兩院合組的原子能委員會發動的。據倫敦的戰略研究院本年四月份的估計，美國在未來五年內的核子彈頭數量，將由現在的四二三五枚增至一萬一千枚。至於蘇聯現在的核子彈頭大概是一八八〇枚。這是僅指戰略核子武器所用的核子彈頭而言，其戰術武器所用的小型核彈，尚不計在內。即此以觀，可見美蘇雙方一面在談判限制，一面仍在競賽製造。尤其在技術上的改進，有關軍事機密，外界無從知道。未來的浩劫能否消弭，全看世界上有沒有不知天高地厚的狂人了！（紐約華美日報）

美國還可觀望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

在美國朝野要求加緊援華聲浪高漲中，國務卿艾契遜致康納萊議員的函件發表了，不啻對主張援華的人士澆了一盆冷水，但也激起了參議員的憤慨，在參議院內充滿了譴責和指摘的言論，使國務院中人也不得以「亞洲民主主義的高潮將使蘇聯不能控制中國」（合衆社華府十七日電）自嘲自解了。美國應否加緊援華，雖是美國自己的事情，在接受援助的國家本不便有所表示；但這個問題已不是一個單純的「是非」問題，而是有關整個世界和平的問題。我們不忍聽任艾契遜國務卿爲錯誤的情報所迷惑，引導美國步入歧途，再在遠東中國鑄成歷史的錯誤。所以，我們仍不能不撰文，糾正這個存在中美兩國之間的一個可怕的錯誤觀念。

艾氏致康納萊議員的信，是三月十五日發出的，因其意義重大，發表後足以削弱中國政府在和談中的地位，所以一直沒有公佈；但羅特島民主黨參議員格林，却要求將該函發表，因此便在四月十六日對外發表了。這封信的內容，說明了國務院對於麥卡蘭十五億美元援華議案的意見，全文由美國新聞處翻譯，上海各報均已刊載。

我們綜合該函的大意，可得下列幾點：①自大戰勝利後，美國已給予中國二十億美元以上的援助；但中國政府的經濟及軍事局勢依然惡化到如此的程度，在華南也無力抵抗中共的續續南進。②中國政府

軍隊的失敗；並非敗於彈藥及配備的缺乏，今後美國即使再予以軍事援助，也不能改變中國目前一切發展的狀態。③美國如若繼續援華，僅能延長中國的內戰，徒增中國人民的痛苦，其結果勢將加深中國人民的反美情緒。④美國如欲挽回中國政府目前惡化的局勢，必需運用大批武裝部隊實際作戰，而這種行動實違反美國的傳統對華政策及其本國的利益。因此，艾契遜便作一結論，他說：「國務院的意見認為，這個議案所建議的援華，不問其範圍及其性質，均不是中國目前的環境所能保證的。」但是艾氏深恐這種過分消極的對華政策，會引起輿情的不滿，又在結論的後面，開了一個小小的「方便之門」。他說：「政府已考慮請求國會延長一九四八年援華法案的期限，以便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二日該法案終止後的一定時期內，撥發尚未支付的剩餘援款（約五千四百萬美元）。如果在這個時期內，中國局勢能獲得澄清，則可能提出更進一步的建議。」

這封信充分暴露出美國對華政策的矛盾，艾契遜對於中國局勢，至今猶抱着觀望態度，一方面為錯誤的情報所迷惑，認為繼續援華無補實際，徒然加深中國人民的反美情緒；另一方面又恐怕輿情的指摘，仍將「援華之門」，閉着不關閉。這種優柔寡斷，患得患失，躊躇不前的態度，不要說中國人民看了要表示無限的感慨，就是美國人民也要表示深惡痛絕的。所以，在參議院內充滿了一片反對艾契遜的呼聲，共和黨議員勃里奇要求國會澈查國務院的對華政策；原提案人麥卡蘭則指斥艾氏向國會提供錯誤及不實之情報，不啻對中共示弱。紐約時報也認為政府對於中國問題不能遲疑不決。艾契遜雖未直接答覆，但其左右的人士則已為其辯護，「即使中共在內戰中獲得完全勝利，但亞洲民族主義仍將阻制蘇聯控制中國。故一俟內戰結束，中國必將一切外來勢力摒除於門外，政府對華所以採取「袖手旁觀」的政策

，其故即在此。」這種聊以自解自嘲的說法，徒見其強詞奪理而已。我們祇要提出下面兩個問題，艾契遜就無法答覆了。

第一，戰後美國的對外政策，一直以「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劃」爲其基調的。一言以蔽之，乃在「防共反蘇」四個大字。過去因盼與蘇聯妥協，合力締造和平，尙不願作露骨他表示；但至今日，大西洋公約已簽字，包圍蘇聯的形勢也已形成，甚至杜魯門總統警告各國說：美國爲了世界和平，不惜使用原子彈。美國在歐洲，如此反共，這般反蘇；但在遠東，艾契遜對於反共最烈的中國政府，却另眼看待，採取觀望態度，艾契遜究將如何自圓其說呢？史泰遜說：「對亞洲未克實行馬歇爾計劃，實爲吾人最悲慘之失敗。」艾契遜聽了不知作何感想？

第二，美國本有不少人對於中共存着許多幻想，認爲中共並無國際性，不過是一種主張土地改革的政黨而已；甚至還有人以毛澤東可以做中國的狄托，不受莫斯科的支配。過去抱着這種幻想，尙有理由可說；但至今日，仍以此自解自嘲，豈非盲目的外交家？到今日還沒有看到毛澤東反對大西洋公約的通電嗎？還沒有聽到毛澤東的八項條件之一：「取消一切賣國條約（中美貿易條約，中美互助協定，中美救濟協定暨一九四七年的中美協定）嗎？辦理外交，如不正視現實，無異於盲人騎瞎馬，豈不要闖出滔天大禍來！

要之，中國局勢將急轉直下，遠東所受共產勢力的威脅益見嚴重，美國還可抱着觀望態度嗎？前國務卿馬歇爾已自認錯誤而去職，艾契遜國務卿豈可再蹈覆轍？共產勢力刻正向世界的「真空地帶」——

亞洲發展。中共的成功，就是共產勢力控制整個亞洲的開始。艾契遜豈可一味逃避現實，而仍採取「觀望」態度？參議員的指摘固不足慶，但是歷史家的批判是殘酷的，是不能不重視的。（上海申報）

美國全面外交中的亞洲政策（一九五〇年三月三十日）

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發表「全面外交」的演詞以後，近又在加州發表二次重要演說；其一述及亞洲政策，其一則向蘇聯提七項條件的和平試探。這都是值得全世界人民深切注意的文件。

艾卿的和平試探，不出他的意料，事實上已爲蘇聯所拒絕。因爲蘇聯共黨的真理報已經發表評論，痛駁他的七項條件，而且說以往的過失都在美國。蘇聯作家蘇洛夫更指責艾卿爲「說謊大家」，爲「法西斯外交家」，爲「戰爭販子的侍從」，而認他的演說是一樁「傲慢的最後通牒」。可見在今天蘇聯滲透戰術到處取勝，趾高氣揚的時期，誠如艾卿所說「與蘇聯舉行會議，沒有甚麼用處」的了。不知一味想要遷就蘇聯而向他低首的聯合國賴伊秘書長，看了蘇聯報對呼籲和平的強橫答覆，作何感想。

今天筆者願以亞洲人一份子的身份，對美國目前行將擬訂之「全面外交中的亞洲政策」，作一點比較切近事實的貢獻。

加州參議員諾蘭先生說艾卿已奠立了一項有效政策，以阻止共黨在東南亞的擴張。不過在擬訂亞洲政策時，如不把在臺灣的國民政府考慮在內而予以忽視，那是他的主要缺點。筆者固深有同感；但也相信艾卿既已有透澈的見解，堅決的主張，則在最近與吉思普巡迴大使商討之後，當然破除成見，正視現實，訂定完滿無缺的新亞洲政策的。

艾卿所以要求「全面外交」者，其主旨當在呼籲美國朝野一致，呼籲民主國家一致。這是絕對正確的。因為蘇聯的共產集團國家，除了狄托的南斯拉夫而外，已全體一致，聽命令於蘇聯。民主國家之對蘇聯集團，無論會議也好，冷戰也好，如不能意見一致，步調一致，何能取勝？過去冷戰，民主國家在歐洲方面比較有些成就，而在亞洲方面則不能不認為近乎失敗，其原因固非一端。中國政府與人民自也應分負相當的責任。但最大的病根即在於民主國家對亞洲政策之不一致，不但美英之間有出入，（英國承認中共偽府以後更顯而易見），即美國朝野亦未必一致。

美國的外交政策，自羅斯福總統以來，向以兩黨一致為號召的。獨惜大戰結束以後，美政府的對華政策，始終因看法不同而在兩黨爭持之中。這原是美國內部的事，用不着外面的人去妄加批評。但美國事實上已被公認為民主國家的領導者，他的一舉一動，影響必及於亞洲，更及於世界，已為衆所周知。因為美國一部分人士過去誤信了中共僅是土地改良主義者，誤信了中共是愛國份子，誤信了中共可以不受蘇聯的指揮，誤信了毛澤東可以成爲東方的狄托，於是由幻想而構成一幅迫使中國政府與共黨和談的聯合政府的藍圖，以爲讓中國走上東歐波蘭捷克這一條路，當可求一時的苟安。惟其這一出發點弄錯了。於是美國的對華政策，沒有始終一貫地向着援助國民政府反共的大道上走。這不但打擊了中國反共軍隊的士氣，並且削弱了國民政府的信用。這也不但使中國大陸被蘇聯所控制，並且更鼓勵了亞洲其他國家（原來許多是殖民地）內部的許多共產黨，使他們都躍躍欲試的騷動，企圖奪取政權，而英國印度這些國家，急不暇擇，倉卒而糊塗地承認中共，尤其助長了亞洲各國共黨的氣燄。所以，今天亞洲局勢岌岌可危的原因，種根於美國過去對華政策之不一致，不堅定，與英國的貪圖近利，妄想綏靖。這就不免

中了蘇聯「分化」之計。現在艾卿既以「全面外交」相呼籲，要求大家一致，筆者以為應該先求美國的兩黨一致，次求英國集團也與美國一致，然後更求所有民主國家的共同一致。必如此，民主國家的陣線乃能無懈可擊，蘇聯也無所施其挑撥離間的毒計了。

最近美國參眾兩院外交委員會通過撥用以前指定的援華款項，以援助自由中國及亞洲其他非共產地區，美參院法案與眾院法案雖對援助自由中國的款額尚未一致，但此必不難調整。這是美國對亞洲對中國的外交政策，已經漸趨兩黨一致的好現象。此種良好的開端，必能收到「全面外交」填補亞洲缺口的效果。諾蘭先生的看法是對的。

為甚麼筆者認為美國朝野能够重視臺灣、海南、和中國大陸上的自由區，開始重覆予以實力的支援，不像過去一二年的冷淡，就是美國新的亞洲政策之開始呢？因為亞洲的重心在中國，訂定亞洲政策必當以援華政策為出發點。

筆者敢大膽說一句：要保世界，先得保亞洲；要保亞洲，先得保中國。故今天民主國家要定亞洲政策，其根本就須先計劃如何驅逐中國大陸上的共黨傀儡政權，然後亞洲可告安定。早在世界大戰期中，羅斯福總統與蔣委員長都認定中國是亞洲的安定力，可惜我們中國固然沒有好自為之，而英美的政治家又沒有一致抱定這個見解不變，以致敗壞至此。但是「亡羊補牢，猶未晚也」。假使大家今後反省錯誤，撤除成見，改絃更張，共同努力，則中國事依然大有可為。美國英國切勿認為亞洲之事，可以拋開中國，專在中國以外想辦法，就能挽救過來的。

列寧規劃世界革命，早就指出到歐洲最近的路是經過亞洲。而日本軍閥田中義一，則以為欲征服亞

洲，須先征服中國，欲征服中國，須先征服滿蒙。故史太林在雅爾達會議中的要求，以及他以後扶植中共製造叛亂，奪取政權的作法，實乃抄襲田中的方法，執行列寧的政策。故中共一天佔有中國大陸，亞洲各國即一天不能免於赤禍的威脅，並不必由中共派兵越出國界，各國自會鬧得天翻地覆的。只要看中共最近對東南亞各國的肆意鼓煽與暗中援助，以及周恩來譏罵艾卿的演說，就該恍然大悟了。所以，如果果想叫中共自限於國境以內，一面再用通商貿易去引誘他，以爲如此便可騙得中共相安無事，好讓民主國家從容布置東南亞的防共，那勢必再度跌落到一個幻想的陷阱中，將來痛悔火已燎原自投羅網，已經無及了。

中國有句古語：「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今天中國大陸雖一時淪陷於共黨暴政之下，但自由中國的國民政府依然存在，固守臺灣海南，川康滇黔一帶也還有國軍佔守據點。最近國府政治軍事逐漸革新，不但重用苦幹有爲的文官武將，且在蔣委員長復位總統之後，士氣爲之一振。浙東松門海門國軍試探登陸的成功，可以顯示形勢已與一年以前不同。大陸上的中國人民，在中共橫征暴斂之下，飢餓死亡威脅之中，已經怨聲載道，大有「及汝借亡」之概。中共從前以批助農民相號召，而今則農民不是填了溝壑，就是散到四方，上山打游擊去了。所以國府整軍經武的結果，在高空封鎖大陸相當時期以後，發動大規模的反攻登陸，絕對是可能的。只要民主國家——尤其是美國，有此真切的認識，對國府存着「士別三日，便當刮目相看」的心，真能如艾卿所說：「只要有決心，有意志存在之處，其人民復擁護其政府，要想獲得問題的解決，美援也許是不可或缺的一個因素」，而充分予以必要的軍事與經濟的援助。筆者敢信用不着美國的一個兵，中國反共壯士一定可以反攻到大陸上去驅逐蘇聯所指揮的中共傀儡

。這才是確保東南亞免於赤禍的釜底抽薪最上上策。

因爲果如上述，則中共自顧不遑，何能再有心力來製造東南亞的騷亂？蘇聯控制中國尙不能成功，更何能經由中國以征服亞洲？所以筆者以爲美國如果重訂亞洲政策，應當首先重視中國，援助自由中國，然後同時以促成締結亞洲或太平洋防共聯盟，援助各國的經濟發展，加強各國的團結力量，方可阻遏共黨在東方的兇詭。然後蘇聯也許能改變他的漫無限制的擴張政策，願與民主國家共商和平相處之道。那時，自不必使用輕氣原子彈或鈾原子彈，而世界和平與人民自由都可確保。所以說：保世界，須先保亞洲；保亞洲，須先保中國。而保中國之道，就在：一、積極的，援助國府反攻大陸的力量；二、消極的，相約切勿與中共有任何往來，不但不承認，並且也不通商助共。

筆者深信：美國在政府與國會協力合作之下，必能展開其全面外交。而對蘇聯的全面外交，必須始終一貫，必須東西一致。過去美國的重歐輕亞，是東西不一致；過去美國對華的舉棋不定，是前後不一貫；過去美國對東歐想把鐵幕裏的國家拉出來，而對本有反共決心的中國，則反希望國家仿倣東歐各國，與共黨組聯合政府，讓他牽入鐵幕中去，則既不一貫，又不一致。

艾卿重訂全面外交的亞洲政策，相信他當能因目前的事實，而矯正政府從前的失着，置重點於援助自由中國的反攻大陸，更配合了援助一切反共自衛的亞洲各國，保障其國家獨立與民族自決，則東亞赤禍與世界三次大戰，可以消弭無疑。（加拿大維多利亞新民國報及三藩市國民日報）

杜勒斯辭職與美國外交政策（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七日）

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先生之因病辭職，前日經艾總統含淚宣佈以後，美國朝野人士，不問其政見是否與杜卿相同，或甚至嚴酷批評而不留餘地者，幾無不一致表示其欽敬與惋惜。而艾總統當向記者宣佈之時，飽含熱淚，幾不成聲，力讚杜卿之成就，在美國爲史無前例。且謂今後杜卿雖以病體難勝繁劇，不克負荷國務卿一職之重任，但仍當力挽其充任顧問，藉備有關外交政策之諮詢。尤足見杜卿以一身繫天下之重，固非尋常所能想像於萬一也。至於舉世各國凡友邦朝野之函電慰問，致其崇敬者，固不待言。而彼仇視杜卿，目之爲「眼中釘」，聞其辭職之訊，而欣然色喜之共產集團國家，或猶藉此加以冷嘲熱諷，則更在意中。且亦唯其如此，更足證明杜卿其人，實爲自由世界反共陣營之中流砥柱。

杜勒斯先生，自幼卽懷大志，慕其外祖父羅斯德國務卿之爲人，而思有以克紹箕裘之道。年方十九，卽隨其外祖，出席第二次海牙和平會議。此爲其從事外交工作之始。嗣在紐約執行律師業務垂三十年，對於國際法之熟諳，久有口碑。民主黨執政時代，彼早爲國務院之顧問。關於聯合國憲章之草擬，貢獻頗多；而對日和約之完成，尤爲杜卿之傑作。迨一九五三年艾總統入主白宮，杜卿奉命出任國務卿，而其壯志始達。六年以還，在自由世界對共產鐵幕之鬭爭中，杜卿堅持道義外交之定力，運用「大力報復」，與「戰爭邊緣」之政策，迫使共產侵略勢力不得逞其兇鋒。雖其所倡「解放鐵幕」之政策，迄今

尙東諸高閣，但在盟國姑息聲調始終並不全息之氛圍中，美國猶能巍然屹立而絕不搖動，要不能不謀爲杜卿之力使之然也。

今杜卿辭職矣，世人所注意者不外二事：①繼任者何人？②美國外交政策是否將有改變？就前者言之，雖外間頗傳現任代理國務卿之赫德最有希望，但就艾總統何日所言，當從另有所屬，亦未可知。如何選擇輔弼，固爲總統之事，宜非他人所能左右，更就後者言之，各人自有其性格與才能，斷無兩人之所言所行可以完全相同者，故亦無人可斷言美國之外交作風今後可以絕對不變。然須知外交政策之負責者，在美國政制上視定爲總統。故祇須艾總統主意堅定，而猶重視杜卿之意見，延攬顧問，虛其前席以垂聽之，則雖謂美國外交政策將不至有變更，亦無不可也，何況四月廿九日之巴黎西方外長會議，五月十一日之內瓦東西外長會議，今已箭在弦上，引發在即。目前要着無過於團結西方盟國，而不誤亞蘇聯所佈之陷阱，則美國舍向杜卿所開拓道義外交之大路前進外，更有何他道可循哉？（紐約華美日報）

赫德繼任國務卿與美國外交（一九五九年四月廿一日）

不論美國過去六年間的外交政策是好是壞，我們總不能不承認這六年來的外交政策實際上是國務卿杜勒斯的政策。名義上，法律上，負責主持外交的是美國的艾總統，杜卿不過是為執行的幕僚。但因艾總統信任之專，與杜卿自信之強，使杜卿因應時宜，折衝樽俎，有得心應手之快。雖稱之為杜勒斯的政策，亦無不可。杜卿獲准辭職，赫德奉命繼任國務卿。已由艾總統即向參議院提名，當可通過無疑。

就赫德個人的經歷而論，他於一九一六年時曾任美國駐德大使館參贊，翌年調任駐比代理公使，早年便有外交經驗。第一次大戰休戰時，他報告戰敗的德國極有傾向共產之可能，因之美國決定運糧作救濟工作，而赫德則襄助胡佛致力於此事。此後他歷任麻省立法議員，並四次當選聯邦眾議院議員，兩任麻省省長，對國際問題向所留意。即此可知赫德在前年奉命擔任副國務卿之前，不但熟悉外交事務，且富有行政經驗。加以兩年多來，襄助杜卿，主持國務院的日常工作，對於杜卿政策之方針，更已瞭如指掌，而面對蘇聯共產集團所加於自由世界之威脅，如此其嚴重，吾人不能相信他正式繼任以後會有大規模的改弦更張的舉措。

試再深加研究，美國這些年來的外交政策，儘管好像往往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以致杜卿任內飛航行程超過五十萬哩，仍然不能使自由世界真正獲得安全的絕對保障。但分析起來，舍目前所採行的

集體安全、①武裝和平兩大方針而外，美國亦實在並無他道可循。杜卿歷年所曾標榜的政策，無論是「解放鐵幕」，或「大力報復」，或「戰爭邊緣」，或「不用武力」，或「公正永久的和平」，以及其所締結或加强的各種盟約，幾無一不用來達到前面所舉出的兩大目標。

總之，杜卿不但自己相信，並且已說服了艾總統，認為蘇聯的共產權極政府征服世界的野心一日不變，自由世界尤其是美國決不得一日安枕。而除非蘇聯動手侵略，美國斷不能殺自我開。因此只有在長期冷戰的局面下，始終致力於兩點：①在軍事經濟兩點上加強美國的實力，同時加強盟邦的實力；②在外交上盡量調協於各盟邦之間，彼此忘其小我，而力謀大我之團結，使蘇聯無隙可乘。庶幾再過十年廿年卅年後，如杜卿之所期望，共產國家終將因其人民內部之變化而漸改其體制，（杜卿早言，共產政制必不長久，）而後世界可望接近於和平。姑無論杜卿為美國所計劃的外交策略，將來是否能如願以償，但就現局面言，除了美國願意與蘇聯訴諸武力戰爭，或自甘重蹈英國以前姑息侵略者的覆轍，招致更大的戰爭而外，任誰擔當國務卿的職務，也可斷言未必能移易其路線。何況今後，艾總統對美國外交的進行，勢必較前更多負責，而杜卿又仍為顧問。我們自更相信：美國外交政策此時將無重大變更。

赫德為美國有史以來之第七十名國務卿。前日參議院已在四小時之間，以九十三對零票（五人缺席，但早聲明支持赫德）之一致，批准其任命案，實為史無前例之迅速。按照參議院章程之規定，凡批准任命案，至少須經過七天之時間，且由委員會提出審查報告於院會後，至少須俟次日方能由院會正式通過。但此次參議院兩大政黨之領袖，尤其以外交委員會主任委員傅伯雷之要求，竟破例為此迅速通過之創舉。其所以如此者，固非無欲顯示國際，特別顯示蘇聯，赫德乃受美國兩黨一致之支持，以增加其折

衝樽俎時之聲望。而赫德以馳騁政壇之老馬，其平素之學養，因應之才能，足以獲國會議員之同情，要亦可由是而見。吾人觀於美國參議院此一幕之戲劇性的行動，自當澈悟下列之兩點：①運用民主政治，如當日美國參院之所為，置國事於黨見之上，誠為良好之典型；②在民主政制之下，決無所謂「不可缺少」之人物。縱以杜卿才具之老練，識見之卓越，得艾總統信任之專，而一旦困於病魔，疾入膏肓，其繁劇重責亦必有人焉繼起而負荷之者，無所用其憂惶與疑慮。

在赫德任命以前，外界或以艾總統提名之稍形遲緩而疑其將有損於赫德之聲望者。今讀赫德在參院之供證，當可釋然。蓋艾總統早於杜卿正式辭職之前，親囑赫德作體力檢查，以便其作提名之依據，從可知無所謂信任不篤。在赫德就職以後，或亦有疑其將不復「率由舊章」，而改變美國之外交政策者。其實赫德早於上星期六艾總統宣佈提名之翌晚，答覆電視記者，謂彼乃國務院工作「隊伍」之一員，而此「隊伍」政策自必仍將繼續。此寥寥數語，可知杜勒斯在其國務卿任內，並非如外界所云，獨斷獨行，表演其「一人之外交」，而實已建立其工作隊伍於國務院之內。其政策之決定，亦即取得「隊伍」之合作。而赫德者，不但為此隊伍之一員，且吾人可信其必為重要之一員。蓋赫德之為副國務卿，出於杜卿之推薦，而赫德此次之提名繼任，亦當然為杜卿之薦賢自代。誠然，一人有一人之作風，吾人固不能期望赫德亦必如杜勒斯之飛航數十萬哩，棲皇奔走於天壤之間，但其拳拳服膺於對侵略不姑息，對正義不拋棄之外交方針，則可斷然無疑也。（紐約華美日報）

祝望艾森豪總統遠東之行（一九六〇年六月十五日）

艾森豪總統已於昨日在其遠東之行中踏上他所要訪問的第一個國家——菲律賓的領土了。接下去，他還要於十八日訪問中華民國，十九日訪問日本，二十二日訪問大韓民國。這四個國家都是美國的盟邦。除日本還有一小部份左傾人士在鼓噪「反美」外，其他三國都可說是全心全力願與美國合作抗共的。艾總統這次二萬三千哩之「長征」，是他就任總統以來最遠的一次旅行，也是他代表美國表示重視亞洲尤其遠東的一次重要旅行。至少，美國當局從前所持「重歐輕亞」政策的疑雲，應可藉此一掃而空。我們雖不敢奢望美國從此就會在遠東採取更積極的主動的反共政策，但正如艾總統臨行時告別華府的聲明書中所說：可以「增進國際瞭解的空氣」，使美國與這四國間的「友誼更爲溫暖、合作、更能產生良好效果。」我們祝禱艾總統此行平安並有美滿的收穫。

艾總統在其臨行聲明書中，有下列一段話，說明美國與他此次所訪四國的關係，言簡意賅，頗可注意。

○美國與菲律賓共和國，六十年前便有密切關係，而在許多年前美國便在菲律賓發動其第一個大計劃，如何援助一個開發的民族建設一個繁榮的獨立國家。

○美國援助中華民國，足以顯示世界，一個自由民族能够抵抗一切破壞力量而仍確切保持其寶貴的

民族遺產，同時能在不犧牲人類價值之下，有雄偉的建設。

◎美國與日本，今方建交百年告一段落，在展望未來之百年中，美日兩國更可共同致力於全世界之繁榮與和平。

◎自大韓民國建立以來，美韓兩國一直在自由世界前線共同維持一項偉大工作，對美國的安全與聯合國的榮譽都關重要。

就上面的敘述看來，美國所懸為未來的鵲的，不外繁榮與和平。由此證明共產國家所橫加誣蔑，說艾總統此次遠東之行帶着濃重的火藥氣味，而必欲發動各國的共產黨徒和左傾份子（尤其日本）來反對艾總統的訪問全屬無的放矢。

我們對於艾總統的訪問遠東，尤其列入訪問中華民國的日程，當然表示竭誠的歡迎。但我們仍然認為美國在遠東的反共政策還是不夠積極。最不可解的，便是願意處處居於被動。就二次大戰結束以來，十餘年間的世事演變而言，我們幾乎可得到一結論：由於美國過去重歐輕亞政策的實施，在歐洲確已擋住了共產勢力的擴展，而且我們也相信蘇聯在北大西洋同盟未解體，美國在西歐南歐的基地未撤廢以前，決不敢在歐洲挑動核子大戰。但是這十多年間，國際共黨在亞、非、中南美洲的勢力擴展蔓延，乃有目共觀的事實，而其第一步便是中國大陸的關入鐵幕。假使沒有中共霸佔大陸，不會有僵持的韓戰，更不會有分裂的越南；東南亞及印度邊境，乃至南洋羣島的情勢，也不會天天在共黨勢力威脅之中。甚至日本的左傾勢力也不會有今天那麼囂張。美國當局在國府與中共相持於大陸之時，所採取的強迫調停，以至停止援助，坐待「塵埃落定」的一套政策，實在說來，是一着錯，滿盤輸了。可是，「亡羊補牢，

猶未爲晚」，能在國府播遷臺灣以後，恢復援助，使其和平繁榮，實力壯大，成爲千千萬萬中國愛好自由人民的向心力。中共所以不敢再行變幹，卽爲此故。但，美國政策如果只止於此，不論訂立什麼多邊的或雙邊的聯防條約，而不以根除中共這個禍根爲目的，則我們可以說遠東終無安定之一日，太平洋亦終無和平之一日。中共頭目所說「共產國家與帝國主義間之戰爭爲不可避免，而勝利將屬於共產國家」的調言，便可表示他們終極的動向。深望艾總統遠東歸來，能體認到中共對於遠東威脅之存在，更進一步策劃自由國家在遠東反共陣線之加強，庶幾可以消弭人類未來之厄運。（紐約華美日報）

歡迎艾總統訪華（一九六〇年六月十八日）

艾森豪總統今日上午九時（臺灣）業已乘艦抵臺，訪問中華民國，接受中國人民誠摯熱烈的盛大歡迎了。在自由中國朝野，能藉此良機，對自由世界的盟主尤其是中國的患難朋友——美國的元首，表示感謝多年援助之忱，自更有裨於兩國盟誼之促進與增強。而在美國，尤其在艾總統，正當為蘇聯中共的國際共黨所圍攻困擾，特別接連遭遇到蘇聯赫魯在巴黎的狂言甚至撤消邀訪的侮辱，以及日本岸信介政府竟然被迫於左傾份子所鼓煽的羣衆暴動，而突然聲明願望艾總統展期訪日的意外打擊，全世界人士都感到震驚。並深惜美國與艾總統聲望同受損害之時，能於接受菲律賓朝野盛大歡迎以後，即繼之以親自親視十年前播遷臺灣而始終在反共前線卓立不屈的中華民國，不但在美國援助之下，砥柱中流，日益壯大，而且還能忘記以往在中國大陸上所經歷的痛史，掬其十二萬分的肺腑至誠，以莊嚴的禮貌，隆重的場面，在親愛和睦的氣氛中，暢迎這一位素所崇敬的盟邦元首。我想，艾總統乃至美國朝野的心靈上也當會有「需要時的朋友實在真够朋友」之感吧。

我們中國人，向沐孔子之教。「有朋自遠方來」視為無上樂事。而況艾總統不遠萬里而惠然蒞止，其快樂自必無可形容。而我們所以待友之道，對己則「人不知而不愠」，儘管對方沒有深切知道我們的痛苦與期望，我們却怡然處之，而毫無怨尤；對人則「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引以為反省大戒之一。故言

忠信，行篤敬，爲待人接物之要道，絕不願「巧言令色」，徒飾外貌以求取悅。換言之，我們中國人歡迎艾總統訪華，並不當以慥迎一位「大財主」，或一個「大力士」的心情去慥迎他，而難有絲毫拜金或拜力庸俗思想在內。由於艾總統七八年來屢以領導世界求致公道的正義的永久的和平爲號召，我們把他作爲正義和平的象徵來慥迎他。打句譬喻的話，我們中國人，無論朝野，似乎把他當作紐約港口的「自由神」的化身來慥迎他。

國際共黨，現方在全球動員，想把艾森豪變成一個「不被慥迎的賓客」的象徵，充其仇美恨艾的心理之所至，恨不得把艾克形容成功頹乎「不可接觸的人」一般，其爲侮辱至矣盡矣！這是毫不足奇的。只有幼稚糊塗而不瞭解共黨的人才會震驚於共黨態度何以一變至此。共黨征服世界的野心，看清了其唯一的大敵是美國。他們處心積慮要孤立美國，要拆毀美國在自由人類心目中的偶像，自然要首先盡情污蔑艾森豪打擊艾森豪，從而攪起美國內部的政爭，自由世界的內訌，以達到他們鋤去這個征服世界途中絆腳石的目的。我們中國人今天慥迎艾總統，不但在他遭遇挫折，心情惡劣的氣氛中要給他一種誠懇的安慰，一種至情的溫暖，而且要本友誼友諒的精神，坦白直率，披肝瀝胆，忠告善道，指出美國過去對共政策的主要錯誤所在。如此，方可以救美國，救世界。我們今天擔心的倒不只是中華民國本身反攻復國工作的何時完成，而更在於身居領導自由世界地位的美國，今後如果不再堅定地站起來，強固團結一切真誠反共國家的陣線，而猶圖對共姑息，美國亦將面臨顛覆的大禍，勿謂言之不預也。（紐約華美日報）

敬向陳副總統進一言（一九六一年七月卅一日）

中華民國副總統兼行政院長陳誠，今日飛抵美京，報聘美國總統詹森之訪華，並與甘迺迪總統會商有關中美兩國及整個世界大局之問題，同時將代表蔣總統慰問旅美僑胞。此為中華民國最高長官訪美之首次，又適逢中美最近確有若干嚴重爭論的問題。可見陳副總統十日之行，其任務迥非尋常，其影響亦必遠大。十餘年來，吾人曾數呼籲國府最高當局或躬負責任之行政院長，應早日訪美，充分交換意見，以免隔閡叢生，遲至今日而始幸見陳副總統兼行政院長之有此行。雖為時似已較晚，但能訪美，總比不訪為好。能向盟國最高當局率直傾吐吾人正大光明之意見，總比隱忍含恨馴至同牀異夢為佳。時機迫切，稍縱即逝。謹以野人獻曝之誠，貢其千慮一得之愚。

陳副總統此行，其根本問題當在如何有利於吾中華民國之光復大陸，而對最現實之困難問題則有二：①為美國當局擬承認外蒙並許其進入聯合國；②為美國一部份策士不但蓄意贊同今秋聯合國大會可以討論中國代表問題，甚且擬以假借所謂「繼承政權」之理論，容許中共進入聯合國，以實現其「兩個中國」之幻想。此固與吾人所日夜祈禱之光復大陸，背道而馳者也。

陳副總統身負重責，功在國家。十餘年來，常謂願以待罪之身，為補過之舉。國勢岌危，今日瀕臨被人宰割之邊緣。救亡圖存，必須首先掃除失敗主義之心理，萬勿作退出聯合國之打算。惟有在此大前

提下，方可作積極之奮闘。

大凡問題之來，必有其因，決非一朝一夕之變。卽以外蒙問題言，吾人固不當貿然同意美國之承認外蒙傀儡政權，然亦曾自思十六年前國府曾派大員前往蒙古監督所謂「人民投票」而居然「滿意」，並於次年一月承認所謂「蒙古人民共和國」之獨立，甚至聲明願意準備建交乎？故中國人民堅決反對承認外蒙固未嘗不可，而欲吾政府當局自翻前案，說服美國不予承認，則難矣。政府之所能爲力者，否決外蒙傀儡之入聯合國耳。然此在美國不足以阻其承認，而在我們則應尙留以有待。當共軍入藏之時，蔣總統鑒於民族自決爲時代潮流，而援藏又鞭長莫及，於是立即宣告，一俟大陸光復，西藏政治當由藏族同胞自決。然則國府不但許外蒙同胞自決於十六年以前，亦且許西藏同胞自決於若干年以後。察諸民族自決原則，國府殆可謂得風氣之先，主張亦未始不正大。今如仍欲在此民族自決潮流洶湧之時代，以阻美國之承認外蒙，勢必徒勞無益。吾人所可力爭者，祇在外蒙傀儡政權參加韓戰與聯國爲敵，其好侵略不下於中共，故吾人爲維護聯國憲章計，反對其混入；至美國之承認與否中國可不必問也。

抑尤有進者：辦外交，宗旨可不變而方法則無窮。所謂「外圍內方」者庶幾近之。吾人今日對美談判，其重點當顧及有利於中華民國之光復大陸，而目前最急要者爲鞏固中華民國在聯合國之席位。中國政府應針對美國當局最近力倡「民族自決組成民主政府」之說而強調之，因勢利導，取爲吾用，則中國代表權卽不應有任何問題。民族自決首倡於威爾遜總統，而近年尤風靡一時。甘總統及其西方盟國對於柏林危機在外交上之反擊，更始終堅主由德國人民自由投票決定其政制；推而至於韓越，亦無不主張遵循此道以求和平統一。雖西方之願能否得償，固未可必，而民族自決主張之如日中天，要可知矣。吾中

國應付外蒙問題，乃至應付所謂「兩個中國」之荒謬主張，無不可因善於運用此民族自決之原則，迎刃而解。質言之，中國當局開宗明義，宜以此堂堂正大之道理，說服美國：合乎民族自決者，中美兩國俱贊成之。反乎民族自決者，中美兩國俱當堅決反對之。祇須美國贊成此一正大光明之原則，則不但外蒙問題，吾固可以游刃有餘，即彼製造「兩個中國」之謬說者，亦必自慚形穢而無可置喙。

以外蒙問題言，中國代表團握有可以否決其進入聯國之權利。而用與不用，得隨時斟酌。人民儘可高呼反對以爲政府後盾，而政府則正宜持此以爲外交談判之鎖鑰，用爲取得多數國家堅決反對中共混入聯國之確實保證。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而關鍵則在把握「民族自決」之原則。設美國及其他一切友邦漠視中國之地位與權益，而仍欲對中共作姑息，則中國可以堅持外蒙之爲蘇聯傀儡，並非真正民族自決，而予以否決；反之，如美國與一切友邦果能絕對簽字保證支持中國代表團所作之嚴正聲明，而在民族自決之原則下共同否決中共之入會，則中國亦可放鬆對外蒙入會案之反對，而聲明此反對票「非否決」，或竟「棄權」以示寬容。總之，既曰外交談判，則有所「給」必應同時有所「取」。我方之可以「給」可以「不給」者爲外蒙入會問題，而我方之必須有所「取」者即爲美國及各友邦對於堅拒中共入會之確實保證。

然則如何可以堅拒中共入會乎？吾人應根本反對美國幻想家所謂容許中共入會與國府代表並存於聯國之說法，而當根據「民族自決組成民主政府」之大原則，由中國代表團作如下之堂皇聲明：中華民國政府乃根據憲法由中國全國人民投票產生之惟一合法民主政府，自有聯國以來，從未間斷，履行憲章義務，世罕其匹，亦決不願退出聯國，其代表權之合法地位，不容討論。若有懷疑中國大陸上人民不

贊同民主憲政之中華民國政府而擁護共產極權之蘇聯傀儡中共者，則儘可由聯合國制訂公平詳盡辦法，派員在各地區實行監督，俾中國全國人民（包括海外有國籍之華僑）自由秘密投票，以資取證人民意志之何屬。在未能取得此項實證以前，中國政府認爲中國代表權問題絕對不容討論，因其關係違反民族自決之原則，乃對聯合國及其創始國之一——中華民國之侮辱。中國政府必使用任何權力以反對中共之混入。中國政府相約作上述聲明後，美國及一切希望中國不反對外蒙入會諸友邦均應事先保證，起而響應支持，永遠打消討論中共入會問題無理取鬧之提案。

陳副總統此次訪美，宜具最大決心，盡其力之所可能，克服外交之難關，而以大開大闢，大氣磅礴之態度，打動美國當局之心絃。若盟國當局依然冥頑不靈，則中國一方面萬不可宣告退出聯合國，而另一方面即應自動自主，立即號召海內外崇尚民主自由之同胞，齊向反攻大陸，光復河山之大道前進！（紐約華美日報）

歡迎陳副總統蒞紐約（一九六一年八月三日）

陳副總統辭修先生今日蒞紐約慰問華僑，此為陳氏訪問美京商談世界大局及中美雙方有關問題以後訪問美國各大城市之第一站，以陳氏之忠黨愛國，事繁責重，而能於百忙中撥冗前來紐約，僑團僑胞不但以十二萬分的誠意，歡迎此一位首次訪美之中華民國最高行政長官，且認為此一訪問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先就世界局勢言，目前適為蘇聯製造的柏林危機而使整個人類走上世界大戰的邊緣。姑息是引導戰爭之路，盡人盡知。陳副總統向甘迺迪總統表示中國決支持美國對於柏林問題之堅決立場，且認為此可增加亞洲自由國家對於美國領導反共之信心，乃完全代表中國人民之所欲言者。在此嚴重萬分之時，中美兩大盟邦能澈底交換關於世局之意見，使美國不致重蹈二次大戰期間「重歐輕亞」之覆轍，相信對於全球反共之大業，大有裨益。此其一。

次就中國局勢言，由於美國當局中不少幻想家之設計，不但抹煞中國大陸上數萬萬同胞備受暴政壓迫而不斷反抗之事實，而反欲假借所謂「繼承政權」之理論，製造形同「兩個中國」之陰謀，藉口使用「新技術」以阻中共之混入聯國，而實則圖授中共傀儡政權以隨時可以自願進入聯國之鑰匙。吾人固願美國所作決計拒絕中共進入聯國之保證終能兌現，但決不容許構造「兩個中國」之議案提出於聯合國大

會。陳副總統在與美國總統及外交當局晤商時，定必將中國朝野之堅定意志，坦率披露，使盟邦不致對於自由中國之立場再有絲毫誤解，以爲中華民國政府對於任何問題俱可俯仰由人。吾人相信，陳氏必已更進一步，說明亞洲不安定，世界決無和平，而中國大陸不光復，中共決釀禍亂，故美國如真欲領導世界遏止赤禍蔓延，祇有以道義的物質力量，支援中華民國的光復大陸，不復束縛盟邦中國之手足，方爲上策。此其二。

復次就團結海內外中國人民一致爲反共努力而言，陳副總統此次訪美，尤有重要深切之影響。政府雖已於七月間舉行第一次陽明山會談，討論經濟財政問題，並且準備再繼續舉行二次三次會談，分別討論文教及政治問題，以期收集思廣益之效，但旅美僑胞爲事業工作所羈。其確能飛渡重洋前往參加者爲數當不多。而一般僑胞衷心最殷切之期望，最誠摯之呼聲，卽敦促吾政府迅速提早反攻大陸，解救同胞，恐仍將墮於上聞。今者幸有此一良機，躬負行政重責之陳副總統，能親與旅美華僑接觸，聽取其意見，洞悉其志願，其不能口頭傳達者，更有書面意見之呈遞，則其效力蓋已勝於參加陽明山會談者萬萬。今日之事，千言萬語，不外「光復大陸」四字，與其坐而言，不如起而行。故「會談」在其次，而「會師」爲首要。相信陳副總統由美京而紐約而芝城而大埠，凡行蹤所至，耳鼓所聞者，勢必異口同聲，要求早日反攻。陳氏此行，當可知如不早反攻大陸，則政府將不足以寬慰僑胞。此其三。

總之，一千數百萬僑胞散處海外各地，天涯地角萬衆一心，所求者光復大陸而已。吾政府信誓旦旦，息壤在彼，其將何以慰僑胞乎？（紐約華美日報）

陳副總統帶回者何？（一九六一年八月五日）

陳副總統訪美十日之行，雖尚僅及其半，但今午已飛離紐約前往他埠訪問，紐約僑胞於瞻仰丰采，舐聆偉論之餘，臨歧之日，不無惜別依依之感。惟就旅美數十萬僑胞而言，縱無隆重禮物可以壯陳氏回國之行，而其一片歡迎長官之誠意，萬分祝禱反攻之心聲，相信將使陳氏永留一不可磨滅之印象。

猶憶辛亥革命時，國父孫中山先生由美國繞道英法兼程東歸，甫抵上海之日，中外記者爭相詢問帶回者何物？國父答之曰：「帶回者革命之精神耳！」國父生平常謂華僑為革命之母。華僑之革命精神，國父倡導之，而國父更携回華僑之革命精神，以鼓舞革命建國，再接再厲之勇氣。有此精神，則百折不回，有志竟成。蓋僑胞離鄉背井，胼手胝足，鑒世界競爭之烈，抱祖國危亡之痛，其熱望國家復興，民族重光之情緒，有非筆墨可以形容者。是故排滿革命、討袁護國、誓師北伐、浴血抗日，海外華僑無役不與，輸財出力，惟恐或後。昔日之所擁護革命者既如此，今日之所期望反攻而願貢獻其能力者，自可不言而喻。陳副總統此次訪美，固以商談世界大局及有關中美兩國共同利益問題為主要任務，而藉此機會，不遠萬里，得與旅美僑胞晤敘，親聽僑胞所陳述仰望於政府而誓必願意共同致力者為何事，回國以後，上以報總統，下以告朝野，由是而更求海內外之加強團結，為誓師反攻光復大陸，開始其前奏曲，則此行真不虛矣。設有國人於陳副總統臺北下機之日，詢問帶回者何，陳氏亦可答之曰：「帶者反攻之

精神耳！」

或曰：今日原子時代何可兒戲？反攻大陸，茲事體大，兵員、武器、糧餉、運輸等等，無一不需周詳之籌劃，而國際局勢如何更不能不有審慎之考慮。政府準備十年，猶不敢動，非無故也，而豈僅能以「精神」二字了之？殊不知革命戰爭，物質力量居其一，精神力量佔其九。無革命之精神，縱有精良之武器，衆多之兵員，亦棄甲曳兵而走耳！大陸淪陷前之慘痛事實，陳副總統深知之矣。今也不然。國軍將士有「滅此朝食」之決心，而大陸同胞有「與汝偕亡」之沉痛。可知中華民國政府如一旦反攻大陸，解救同胞於水火倒懸之中，以仁伐暴，弔民伐罪，不但大陸同胞必將起而響應，即海外僑胞之踴躍輸將亦在意料之中。有此革命精神，則團結全民以討中共，正其時矣，尙何「以待來年」之有？

日前蔣總統在國父紀念週致詞，謂亞洲近十萬萬之人民，備受奴役，在死亡威脅之下者已逾十年，此一事實，無可漠視。設若人不能解放彼等於共匪桎梏之下，則最後吾人亦必將喪失自由。此種沉痛之呼聲，其用意當不祇在於喚起自由世界盟主美國之注意，而當爲自覺吾政府先有拯救中國大陸上五六萬萬同胞之責任。若必待大陸同胞先有大規模之起義革命，而後國軍可以渡海應援，則革命精神又安在乎？深願陳副總統帶回革命精神，早日反攻大陸！（紐約華美日報）

美停止與外蒙建交（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五日）

當我國陳副總統訪美，行抵紐約之翌日，本報獨家報導，甘迺迪總統已面允美國決定此時不與外蒙建立邦交。此訊業經國務院發言人懷特於十一日發表談話，予以證實。其談話之大意略謂：美國政府雖曾考慮試探與外蒙建交問題，並與其他國家商討此事，但鑒於當前世局，為美國利益計，「此時」宜停止此項試探。彼又聲明美國決定繼續支持中華民國政府在聯合國之地位而反對中共入會，但美國政府仍將考慮容許外蒙在「適當時間」進入聯合國問題。同時，懷特更表示：美國決定此時不與外蒙建交，乃為本身利害關係，並非由於中華民國之要求云云。關於美國停止考慮與外蒙建交一事，中華民國外交部發言人並已宣佈表示歡迎。吾人固亦承認美政府此舉之動機乃為美國本身之利益着想，但究竟不能不稱譽為此乃陳副總統訪美之行最有具體收穫之一點。

惟美蒙是否建交為一事，而外蒙是否進入聯合國為又一事，中共偽政權之能否被阻止混入聯合國更為另一事。故站在中華民國地位，對於美國政府上述聲明，尚無充分歡喜讚歎之可能。何況國務院聲明亦祇謂美國「此時」停止與外蒙談判建交，可見將來仍有隨時重行考慮試探之可能？此其一。美國對於外蒙進入聯合國問題，在該項具有聲明性之談話中，更明言仍將考慮於「適當時間」容許入會，所謂「適當時間」，依若干記者之闡釋，當指九月間聯合國十六屆大會召開之期間。且據另一報導，謂美國對此

問題，將改變以往之支持態度，而採用投「棄權」票之方法，並勸中國政府亦不堅持「否決」，而與美國同樣投「棄權」票。果爾，則外蒙入會問題在未來的安全理事會中，是否能因中美兩國棄權而即不足「七票」之數，仍待研討。此其二。中華民國所以反對外蒙入會，固係爲維護聯合國之憲章，其理由則①外蒙政權乃爲蘇聯傀儡而非主權國家，②外蒙與中共同時參加韓戰，與聯合國爲敵，故中共爲侵略者而外蒙爲幫兇，但最主要者乃恐今日聯國對於外蒙，可以拋棄憲章，放鬆入會，則他日何嘗不可如法泡製，而許中共混入？況美國政府中人至今猶以維護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席位爲理由，謂要爭取多數，須得非洲若干新國（舊法屬）之支持，如外蒙與茅里塔尼亞兩國入會問題合併討論投票不予變更，則中國否決外蒙入會，蘇聯必將否決茅國入會，勢必影響及非洲國家抱怨於中華民國之反對。故此一問題之複雜性，迄今並未減輕。此其三。之要，中國政府及其代表團，必須利用此短暫月餘之期間，在外交上更進一步，「解」此外蒙與茅里塔尼亞進入聯合國合併討論之「結」，嚴格根據憲章分別投票表決，或中美兩國盡力說服其他三國（如英法類比瑞亞等）亦在安理會對外蒙投票棄權，而使之不能獲得七票通過，同時對非洲國家竭力保證支持茅國之入會，然後萬一蘇聯再否決茅國，非洲不少國家將集矢於蘇聯。此爲技術運用上最重要之點，當局必早見及。（紐約華美日報）

讀詹森歡迎嚴副總統演詞（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

我們讀了詹森總統在五月九日白宮歡迎中華民國副總統嚴家淦氏午宴席上的誠懇演詞，有幾點感想，必須一吐為快。

第一、詹森在全篇演詞中，強調讚揚中華民國近年來在臺灣經濟繁榮的成就，再稱我們自由祖國的農民和技術人員，是幫助別國別洲比較不幸的人民，向饑餓和匱乏作戰的英勇士兵。這一段話，不但使我們海外僑胞聽來非常感奮，足以引為自豪，而也更鼓勵我們國內的農技人員今後格外努力。我們早已認為我國多年來派往若干亞非國家的農耕技術人員是作了很實際而也很有效的國民外交，對於抬高我們國家的地位，貢獻良多。今得詹森總統之言為證，更可說明我們從前的看法是不錯的。此後凡我旅外華僑，不論是從事何種職業，也不論是那方面的學者專家，都要在居留地各就本業奮發上進，表現其工作的成果，便可很自然的收到國民外交的績效。

第二、詹森總統一再提到中美兩國訂有共同防禦協定，並說明美國一向忠實於這個聯盟。但他更有一句頗為含蓄的話，值得我們十分注意。他說：「我們的同盟關係更要深過一層。這是經過戰時考驗，和受過共同抵禦試圖毀滅我們力量的鍛鍊的一種聯盟。」我們雖不知道他所說「更要深過一層」這句話的真正主意是指點什麼，但我們確實希望中美兩國的聯盟，跟着時勢的演進，亦即戰時的考驗，而有深

一層進一層的運用，務使聯盟所發生的效果不限於共同防禦而止。在軍略的意義上，最好的防禦應該是攻勢防禦。故若中美的聯防協定只作防衛台澎島嶼，而不從剷除亞洲禍根這點上着眼。依然不够理想，亦且不符實際。在今天中共「紅衛兵」囂張擾亂，甚而企圖向澳門香港「輸出擾亂」的形勢之下，中美兩國為保證越戰勝利以及安定亞洲計，實有對中國大陸採取進一步的聯合行動之必要。我們切望嚴副總統及其隨員諸位先生對於此點已經商討過，不過不能宣之於口罷了。因為實在說來，艾森豪杜勒斯時代所與我國外交當局簽訂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對今天的亞洲局勢已經不甚合適，確有其修改的必要。兩國當局應有共同的感覺吧。

最後，詹森總統贊譽我自由祖國的土地改革計劃，可作全球各國的模範，又說我們的國民生產總額在過去十五年間增加一倍，故人民已能享受亞洲最高之一的生活水平。我們當然非常高興聽到這種讚美的話，但同時却又似乎不能不慄慄於「晏安酖毒」之警誡。因為據來自臺北的旅客所報導，臺灣近來的繁榮，使社會上的娛樂事業竟有超過香港的趨勢，甚至流傳「紅包到處有，太保滿天飛」的諷刺話。我們雖然不能斷言這種批評是有事實的根據，但我們總得希望當局本着「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意思，隨時努力，整肅社會風氣，使之不背乎準備光復大陸的大政方針，然後經濟繁榮不致麻醉或腐蝕我們的人心。（紐約華美日報）

敬向嚴副總統進一言（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五日）

中華民國副總統兼行政院院長嚴家淦氏已於五月九日飛抵美京，且與詹森總統及其輔弼商談有關兩國共同利益之一切問題矣。前日則已由美京而抵紐約，旨在訪問此間僑胞及我國學人與留學生，更與聯合國秘書長宇譚及紐約省市當局交換意見。吾人雖不獲盡知嚴氏在美京商談「當前問題」之結束如何，但就其表示此行目的，乃「在此一艱難時期，進一步加強中美傳統友誼」而言，則深信其當已努力剖陳自由中國朝野之願望，而使此行爲不虛。古人云：「可與之言而不言，失人。」嚴副總統爲可與之言者，則以僑胞喉舌自居之本報，豈容緘口，而失之交臂？

嚴副總統從政數十年，以善於理財馳名國際，而此次應邀訪美之隨員中，除外交部次長沈鈞及其他外交官外，復有經濟部長李國鼎及經合會秘書陶聲洋兩位經濟專家，可知其訪問重心，似側重於經濟。然而當此時，正值中共內訌，俄毛交惡，大陸紛亂，同胞待救之際，海外僑胞之所日夜期待者，不獨限於自由祖國之經濟繁榮，而尤在於吾祖國政府早日兌現其光復大陸之諾言。誠然，此十數年間，我國政府經濟方面之成就，有口皆碑，其於國際地位之提高，美國輿論轉變，可之謂種其因而獲其果。嚴氏於此，貢獻頗多，無待贅述。惟是金匱尚缺，故土無光，究不能盡符國內外同胞之共同願望，然則將何以說服美國當局，改變其約束我國反攻救民之政策，而予以道義的、物質的、後勤的支援，要當爲嚴氏

此行內心所抱之最之目的。吾人誠望中美兩國「進一步」相互瞭解之工作，嚴氏縱即結束其訪美行程，亦仍必詳籌熟計，而爲繼續不斷之努力。

至於臺灣之經濟繁榮，社會安定，固符合國人之願望矣，但在此「艱難時期」，一切似當以準備光復大陸爲至上之原則。如祇顧及繁榮，而不整飭社會風氣，使人心爲之振奮，則古人所謂「晏安酖毒」之戒，不啻爲吾人今日言之矣。吾人對自由祖國政府之措施，惟其愛之深，故望之切，深冀吾政府當局能於促進繁榮之同時，先從移風易俗入手，務使朝野上下，一致抱定「滅此朝食」的決心，發揮「臥薪嘗膽」的精神，則在心理方面方能奠定反攻復國的基礎。

猶憶總統府秘書長張岳軍先生曩年訪日時，蔣帥嘗語張氏，謂「今後一百年將爲亞洲世紀」。此語證以此二十年來之演變，可謂信而有徵。而吾中華民國蔣總統更道破「亞洲世紀」之關鍵所在。其言曰：「世界禍亂之中心在亞洲，亞洲之禍根在大陸共匪。今「紅衛兵」之暴行，已由大陸而傳染於澳門，更漸由澳門而蔓延於香港之九龍，中共僞政權存在一日，即亞洲絕無安寧之一日。吾自由中國朝野人士，爲救國計，更爲亞洲安寧計，對於中國大陸目前之紛擾，應下最大決心，乘此時機，伐暴伐亂，此真正所謂「弔民伐罪」也。如美國當局依然不明是理，而仍欲憑藉其中美共同防禦協定，束縛我國之手足，我國祇有發揮壯士斷腕之勇氣，提出修正條約換文之要求，作爲準備行動之先聲。另一方面，速謀建立自由亞洲各國之反共同盟。然後以自由亞洲同盟各國之聯合力量影響於美國。則美國之對亞政策庶幾可望轉變，而不復拘泥於現狀之維持。此則全視乎吾國朝野上下在外交方面之努力如何耳。

時乎時乎不再來！願以「團結全民，光復大陸」八字敬祝嚴副總統訪美成功！（紐約華美日報）

聽嚴副總統演詞以後（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

旅居紐約的僑胞、學人、和留學生，在這幾天裏聽到中華民國副總統嚴靜波先生的演說和電視節目中答覆記者的話以後，大概不免有幾種感想：○他說話的謙和、親切、與自然，頗能贏得一般人的好感。○他雖不十分強調自由祖國政府必定立即光復大陸，但力言建設復國基地的臺灣正是復國工作的一環，七分政治三分軍事之說，絕非不作軍事上的努力，從而暗示指責國府只求偏安這種批評之不甚中肯。他措詞的委婉，自可博得聽衆的同情；但也可表徵他這次訪美，未必就能說服美國當局不再約束我們反攻大陸的行動。○他對中國大陸上的中共因奪權而內訌，曾作扼要的分析。指出除林彪外，中共的所謂「副總理」和高級軍人都已受到紅衛兵大字報或多或少的抨擊，這確是顯示了中共「內潰」「自斃」的伏根。但是很可惜，自紅衛兵之亂以來幾近一年，而自由世界尤其是我們自由中國又坐視這個「伏亂」的良機，快要讓它一縷煙似的飄過去了！中共既不敢明目張膽介入越戰，與美國正面衝突，因而中華民國感受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拘束，未必可能經過商得美國的同意而執行我們復國救民的政策。歸結一句話：我們還是處於被動的地位！

再看芝加哥每日新聞報日前譯載巴黎一本法文雜誌所登其記者馬萊訪問共黨周恩來時的談話。周恩來大概說，如美軍進攻北越，而北越請求援助時，或北越將被和平出賣時，中共即將派遣大量「志願兵」

援助北越。他表示中共決不容許其「邊界」感到威脅；同時他又指責蘇聯實際上與美國串謀出賣北越。其實，這些都是周恩來的老調，用來作為遮掩中共一直不敢公開派兵和美國作戰的藉口。而在蘇聯一方面，却反在指責中共，阻礙蘇聯援助北越的軍需物資經過中國大陸的運輸，甚至暗中與美國互作不擴大戰爭的諒解。俄毛之間固在互相抵牾，而就我們看來，在中共內訌沒有結束以前，以及它自己沒有把握向美國挑起核子戰爭以前，共豈如不發狂，未必會自掘墳墓的。故摧毁中共政權，我們不能完全陶醉於中共「多行不義必自斃」的想法，而仍有待於我們自己的努力。

至於中共最近對香港的作法，也未必真正有意吞食香港，敲破這每年約有四億美元外匯收入的「金飯碗」。北平僑國務院遞交英國駐平代辦的抗議，利用其所製造的九龍前幾天的暴動事件，向英政府要求香港當局「懲兇」、「道歉」、「賠償」和「釋放被捕者」，同時指責香港政府准許駐越美軍赴港渡假即係把香港作為美軍「侵略越南」的基地云云。其用意所在，不過沿用不久以前對付澳門的手法，希望香港當局也經不起它的一嚇而即屈服。香港，由英國負統治之名，而由中共握控制之實，這是共酋的如意算盤。所以，香港社會的不安，居民心理的惶惑，此後在所不免，但中共未必敢因奪取香港一隅之地而即冒擴大戰爭之險的。

然而，西諺有云：上帝要毀滅一個人，必先使他發狂。毛曾澤東發動紅衛兵，便是他近乎神經錯亂的發狂行動。誰又能料他最後不會搞出「中共自殺」的大亂子來呢？（紐約華美日報）

華盛頓之偉大（一九五四年二月廿三日）

華盛頓之誕生於一七三二年之今日，不獨爲新大陸創建一新民國之朕兆；且爲舉世之向往民主自由者樹立一永不磨滅典型，其盛德大業之昭垂百世，宜美國人民恒久紀念之而弗替焉。

華盛頓，一農家子耳。當其於一七七五年夏受命於十三州之大陸會議，統帥大陸聯軍以抗英軍之初；人數莫及，武器不如，所恃者信心而已。吾人讀美國之獨立戰史，則知八年之間，所謂愛國軍之瀕於崩潰者屢矣。其訓練之低劣，紀律之鬆弛，裝備之缺乏，精神之衰落，軍費之支絀，以及十三州間之摩擦猜忌，幾無一不可使前線統兵者垂頭喪氣，而華盛頓獨以百折不回之堅強意志克服之。就戰言戰，華盛頓幾乎屢戰屢北，而其所以有不朽之大名者，則在於能屢北屢戰。其勇毅，其智慧，其仁慈，其可驚之自制能力，其持久之服務精神，實使此佛吉尼亞之種植家顯然成爲獨立戰爭中之靈魂。故雖謂十三州之所以能終於獨立，胥爲華盛頓之所賜，不爲過也。

抑華盛頓之所以彌足景仰者，不僅在其對戰爭之領導，而尤繫乎彼對於建國之偉大貢獻。當戰爭猶在繼續時，十三州固有「邦聯條款」。但結合鬆懈，絕難收建國之效。有識之士怒焉憂之，於是而有一七八七年五月之費城憲法會議，此短短四月之會議，居然能於論辭爭執之中，創造一史無前例之成文憲法，使三權分立與中央地方分權之原則，確立而不拔。建國先賢如佛蘭克林與漢密爾頓輩之智能，固永

不磨滅，而華盛頓爲會議主席之沉默寡言，調和折衷於其間，尤爲會議成功之要素。嘗聞民主政治之精神在於有理性之會議。華盛頓之領導美國憲法會議，誠足爲卓絕之模範。至於一七八九年春華盛頓就任開國總統以後，雖其自身爲聯邦派，而獨能於任用傾向中央集權之漢密爾頓爲財長外，更以傾向地方分權之傑斐遜爲國務卿，兼容並蓄，期使此初建之新邦能因團結而進步，則其偉識尤不可及矣。（紐約華美日報）

儒將麥帥的不朽演說 (一九六一年七月八日)

日來吾人獲讀麥克阿瑟元帥訪菲之兩篇演說，詞章典雅，意義深長，無怪其感人之深，聞者淚下。而與麥帥動人之演說適可反映成趣者，即美京連日傳來一片如何容許中共進入聯國之聲浪，若所謂「繼承國理論」等等之怪論是矣。兩事之所以在此相提並者論，藉以見今日之美國，殆所謂「黃鐘毀棄，瓦釜雷鳴」乎？

麥亞塞元帥，不世出之名將，其學識，其才能，其經驗，並世能抗顏行者，曾不多觀。然而統率聯軍，援韓抗共，大功未竣，長城自壞，此真可為自由世界長太息也。麥帥在菲國國慶之日，勗勉菲國友人之詞有曰：如君等奮起再戰，美國人仍將為與君等並肩作戰之武裝同志，而為舊時君等統帥如余者，亦仍將以其餘年，目親君等因戰績而獲殊榮。世事固有升沉，聯盟縱有成毀，而美菲兩國之友誼則光芒萬丈，歷久常明。吾人嘗共同流血、流汗、流淚，亦曾共同尋求道路、真理、光明，而在此不戰不和之漫漫長夜中，吾人仍並肩攜手，堅定如昨。……今將與諸君別矣！……余不得不忍痛承認，生命之深沉暗影似已不可令余再能向諸君保證「余必將重來」矣！當麥帥演說至此時，臺下如雷之呼聲，無不曰「否，否！」而婦女均已熱淚盈眶。嗚呼！菲國何幸而有此良友如麥帥者！美菲兩國敦厚深切之友誼亦何幸而有麥帥為之紐帶！

尤足顯示麥帥見識之高遠者，爲其七月五日向菲國國會之演詞。此演詞之重心在指出美國對韓戰之鑄成大錯。其言曰：聯軍可以不必用原子彈而獲勝利。假如自由世界當時能貫徹始終而獲勝，則今日自無須再或與中共作戰矣。故聯軍之不求勝，乃自由世界之大禍。須知凡大國參戰而不求貫徹戰勝，則最後必蒙受一切失敗之後果。韓戰卽其顯著之例。其惡果則中共坐大，威脅全亞，甚至對於世界局勢，舉足重輕，從而危害各洲人民之自由。而今則局勢全非矣。麥帥之爲此言，其心情之沉痛可知。當杜魯門罷免麥帥之日，去今十年矣。吾人早知此舉不啻自由世界之意圖自殺。昔日美國號令天下，而今日則已被迫至於急圖自救。但美國當局今日聞麥帥之痛語，亦能有所反省否乎？至於自由世界之其他國家，雖標榜反共，而徒知「以待來年」者，經此沉痛演變，江河日下之十年以後，其亦能猛然醒悟否耶？

所最奇者，美國十年以來，步步退讓，冷戰失敗既至此矣，而猶不悟，近更自詡聰明，謬倡「繼承國理論」，以爲「兩個中國」政策之飾詞。何其醜耶？夫既曰「繼承」，則必其前者已亡，斯後者可繼。譬諸「大清帝國」亡而後「中華民國」繼，則中國之前後固相承也。今之中華民國，政府雖暫遷於臺北，其與抗戰時期之遷於重慶何異乎？中華民國之國號如故也。法統未斷也。主權領土雖受蘇聯侵略之損害而未全喪失也。數萬萬人民縱在殘暴磨折之下而未嘗甘心臣服於蘇聯傀儡之中共政權也。中華民國既未亡，則何有「繼承」之可言？吾國前駐英大使鄭天錫博士曾於英國承認中共時曰：「吾國家身未死而英欲爲之蓋棺耶？」然則今之美京怪論，豈亦有爲中華民國蓋棺之意乎？噫！（紐約華美日報）

當國者不可不慎（一九六四年二月廿六日）

美國一位退休的外交家羅拔·墨菲，最近寫了一本回憶錄，題名為「戰士之間的外交處」，敘述他自一九四〇年起至一九五九年，正是二次大戰期內及戰後數年間，他在美京及歐洲、遠東、中東、非洲各國之活動，及其所得之感想，因為正是一個風雲際會、縱橫捭闔的時代，他所敘述的如果都是確實的話，不但覺得他是能力卓越，而且見識超羣。尤其使我們讀了有所感觸的，便是當國者不可不慎。特別在世局紛紜多變的時代，對於應付國際事變，當局必須高瞻遠矚，衡量各方面的因素與環境，而作妥適的決定，萬不可挾有偏見，草率從事，否則難免貽誤國家，縱使當時未必顯現其惡果，而流毒必及於後世。我們看到美法兩盟邦邇來之貌合神離，恐不免凶終隙末，如讀墨菲之著作，更不能無所感慨了。

據墨菲所述，一九四〇年納粹德國擊敗法國時，他正為美國駐法大使蒲立德之得力助手，後來他命派往維琪貝當政府處任美國代辦，又調往阿爾吉斯任美國代表，他雖非一個贊成戴高樂的人，但認為羅斯福總統挾有不歡喜戴高樂的成見，以及當時美英當局屢次謀以扶植其他法國將軍如韋剛、麥勞特，或甚至海軍上將達蘭等，取戴高樂而代之，未免過於刺傷了戴高樂之心，而此種錯誤估計，激起戴高樂對美英領袖之懷有敵意，演變而影響到今天法美兩國間的關係。

其次，墨菲又曾敘述一件故事。現任法國外長茂維爾，在一九四〇年法京陷落後，雖曾任職於維琪

政府，但暗中幫助盟國，將法政府庫存黃金從納粹德軍佔領區內移出而運至非洲的自由法國境內，可是當時的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翰到阿爾吉爾斯視察以後，竟然干涉外交事務，堅持此與維琪政府有關係的茂維爾，必須「滾蛋」，迫使遠征非洲的美軍統帥艾森豪將軍趕走他，不許他在阿爾吉爾斯立足。墨菲雖回美國力圖改變決定，而終於力不從心，不得已祇有通知法軍司令部，美國政府不能接受茂維爾爲法方之代表，雖然他也許是當時法軍總部裏最有能力的文官。如今，二十多年以後，茂維爾却正是戴高樂政府中居於重要地位的外長了。戴高樂今天對美的倔強態度是否受到茂維爾對美懷有睚眦夙怨的影響，以及戴茂兩人今日之所爲是否都含有對美報復作用，我們固不得而知；然人類終究是感情的動物，而況這一武一文的兩位法國政要，都有恢復法國光榮的雄心，則當羽毛豐滿之後，洩其往日鬱積胸中之憤懣，亦是人情之常。然在二十年前的羅斯福與摩根翰，又誰能料到他們自己之趾高氣揚，預種禍根，而令今日嘗其苦果？

墨菲除了說明羅斯福計劃中之美國戰後外交政策乃以美蘇合作爲中心；其後雖蘇聯對美加強冷戰，而此政策至今似仍不變，猶爲詹森政府所遵行。墨菲又敘兩事，亦均屬美國鑄成大錯：(一)爲應付蘇聯一九四八年之封鎖柏林，當強硬要求保持陸上通道之權利，而不宜以「空運」爲躲避衝突之計；(二)美國不當在韓戰中後退，而放棄其驅逐中共「志願軍」於北韓境外之目的，致坐失追逐中共之良機。此皆杜魯門總統任內對共示弱之表示，更啓共方困擾美國之門戶。由此看來，當國者真不可不慎啊！(紐約華美

應向林肯學習的是什麼？（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三日）

昨天，二月十二日，是美國偉大的林肯總統的誕辰，雖然距離現在已有一百五十八年之久，但林肯的嘉言懿行，還是活在人們的心頭。有志氣的青年都有一種希望，願學林肯。到底應向林肯學習的是些什麼事情呢？在他當選總統後的貫徹「解放黑奴」和堅持聯邦必須有整個的團結……這一類政策，大家已耳熟能詳，姑置不談；這裏且略舉一二件他在微時的事情，大可供青年們的效法。「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大家應有同感吧。

第一、他的好學精神。誰都知道，林肯是生在一个貧苦的家庭中。他的父親是木匠，能伐樹，也能打獵，以為只要勤勞工作，不必讀什麼書的。可是林肯並不這麼想法。他很仰慕他的舅母，能讀聖經，能講故事，又能寫得流利，所以他有意於求學。雖然他的繼母要將孩子們都送進學校去，但格於父親的反對，林肯只能停學在家，幫助父親在田野裏做着斫樣耕田的工作。幸而他曾在學校裏讀過不到一年的書，更引起了他的讀書興趣。他往往在田野工作有閒暇時，放下了工具，便從袋裏取出一本書來讀。白天能讀書的時間不會多，只有黃昏，伏在屋簷下的地上，專心讀着。他喜讀的除聖經而外，有「聖遊記」、「魯濱遜漂流記」、「伊索寓言」、「華盛頓傳」、「佛蘭克林的生活」等等書籍，雖然讀的書不很多，但因為他能「學而思」，所以從那些書裏反省自己的行為，自勉要學聖賢，並且描繪了自己在「

邊境」生活的理想情景，同時增加了不少的知慧和對人的同情心；也從美國獨立戰爭時期裏的人物傳記中，了解到美國的現實生活，以及建國先賢爲了爭取自由而不惜犧牲奮鬥的史蹟。

後來，每逢地方法庭審案的時候，他總去旁聽，而且頗同情於印第安人；同時他借了一本「印第安那州修正法」，細心研讀，又讀了第二本法律書「伊利諾州的法律」，因而發願將來要跟這些雄辯滔滔的律師們展開口才的比賽。直到他二十一歲時才能讀到向人借來的「英文文法」和歷史的書籍。他一心要靠法律來保護被虐待的人和獸。甚至他從此不肯再跟父親去打獵了。

第二、他的堅持正義。林肯受雇於一個富農之家，爲他們駕駛船隻載貨到紐奧林去販賣，他藉此看到密士土比河，雖然沒有看到海，但見到了航海的巨船。他下了貨後，逛着紐奧林的市街，看見了幾張買賣黑人的廣告，激起他無窮的正義感。他認爲黑人逃亡時，被人追着好像一條狗，被拍買時像一匹馬，被監禁起來又像一個囚犯，都是不應該的。

有一次，他親眼見到買賣黑奴的市場。一批一批的黑奴被腳鐐連鎖起來，甚至慘被毆打，女黑奴更被迫着在大庭廣衆中半裸身體，作爲對顧主的引誘。他見到這種情形，大爲震動。心腦冷靜下來，他便研究黑奴和他們的主人之間何以有如此的差別，他在紐奧林時間過牧師、教員、和縣官們：這是什麼道理？他們異口同聲，都說這是一種制度，爲了救黑人的命才有的。他感到大惑不解，始終不以爲然。他又在港口一家咖啡店內，聽到掌櫃的說：昨天這位賭錢的黑奴把他的兩個裸體的兒子賭輸掉了。他受了重大的刺激，於是決心要廢除這種制度，他似乎感到身上負有重大的責任。可見他早把廢除黑奴引爲自己的責任了。（紐約華美日報）

華盛頓與林肯（一九六七年二月廿二日）

一七三二年二月廿二日，即距今二百卅五年前的今天，佐治·華盛頓誕生於英屬新大陸殖民地之一的佛傑尼亞。由於他的領導，終於獲得獨立戰爭的勝利，創建了美利堅合衆國，不但齊選了史無前例的美國第一位總統，而且人人異口同聲稱之爲美國的國父。美國歷史上，偉大的總統不少，而其最膾炙人口的，是兩位，華盛頓而外，則首推林肯。今試將這兩位都是誕生於二月間的偉大總統相提並論，而辨別其異同之所在。

美國人稱華盛頓爲「國父」，稱林肯爲國家的「救主」。從這兩個尊稱裏，我們當可窺見美國人民對於兩氏的崇拜。沒有華盛頓，恐無美國的誕生；沒有林肯，美國恐將流於解體。豐功偉烈，異世同勳。就表面看兩氏相異之點頗爲顯著，但就實質言，兩氏相同之處亦復不少。

華盛頓出生於富農之家，是一位戴白色假髮的紳士，又是親率革命軍與英國作戰的一位將軍。而林肯呢，家庭貧苦，從事勞役，工餘自學，卒能躋於律師之列。就背景然，他們兩人可說得是距離很遠。但研究歷史的學者，發現他們確有許多相似的氣質。

第一、華盛頓在獨立戰爭中幾乎一直在打敗仗，但他屢敗屢戰，而絕不氣餒。他統率了一枝饑餓破爛的軍隊，憑藉了他的信心與戰志，終於獲得最後的勝利，從英國政府手裏爭得了殖民地十三州的獨立。

。林肯也和華盛頓一樣，他在三次的公職選舉中都遭遇過失敗，但失敗並不能使他的心灰意懶，而祇知繼續奮鬥，終於膺選了總統。而他在總統的任期內，恰好遭逢政治上派別的鬭爭，最後不能避免因解放黑奴和保持聯邦而爆發所謂「南北戰爭」。他也發揮其堅毅精神，贏得這場戰爭的勝利，使聯邦不致瓦解。這兩位偉人都具有勇氣、仁心、堅忍不拔、與高瞻遠矚的美德。他們都領導過一場偉大而有深長意的戰爭，所爭的也同是人民的自由、國家的團結和人類的尊嚴。

第二、華盛頓於一七八九年當選第一位總統；林肯於一八六一年當選第十六位總統。彼此在時間上雖相去七十二年多，而他們所遭遇的却同樣是內部醞釀着的分裂。就華盛頓說吧，當時有一派人寧願讓他做國王或皇帝，却被他斷然拒絕。不僅此也，他還堅持對總統不須用「大人」的稱號，以為用「總統先生」的字樣已够尊榮的了，於是這一種稱呼沿用至今而不替。林肯也不喜歡這些官銜的尊稱，他甚至在他熟朋友中，要他們不必稱他「總統先生」而只要叫他「林肯」便好了。他們這種「平等」的精神，可以說真是後先輝映。

第三、當獨立戰爭結束後，與南北戰爭結束時，這兩位總統所面臨國家的難題，同樣都是戰後如何使人民昭蘇，使國家統一。林肯曾在其第二次總統就職詞中說：對任何人無怨恨，對一切人要慈愛，對正義須堅持，大家共同繼續努力，完成未完的工作，為國家所蒙的傷害而裏創，致力於消除戰爭的因素，保持我們自己與所有國家之間的永久和平。華盛頓也以同等的哀矜勿喜的精神，說過一番話：為人道計，深切願望戰刀化為犁頭，刺刀變成剪鉤，所有國家都不再有戰爭。他們兩位偉人都有此種悲天憫人的胸懷，所以他們也都想把美國的經驗昭示全世界的人類。華盛頓說：自由聖火的保持，共和政府的模

範，或都需要付託於美國人民之手中。林肯也說：美國的聯邦政制當是地球上最後而又最好的希望所在，究竟是尊貴的保存抑或卑陋的喪失，全仗我們了。這又可見這兩位偉大的總統，都以爲美國人不只要美國一國得到和平康樂與自由，而且希望流風所及，舉世的人類都能享到同樣的幸福。美國人何幸而有這兩位偉大的總統！（紐約華美日報）

華倫時代的美國大理院（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美國大理院院長華倫，最近已向詹森總統表示，他要退休辭職。這是說明了大理院近十五年來所謂「華倫時代」即將結束。華倫曾經是三任的加州州長；一九四八年杜威選總統時，他是共和黨推薦的副總統候選人，失敗於民主黨的杜魯門。一九五三年艾森豪總統履新後，任命華倫為大理院院長，一直到现在。華倫在這十五年的任期內，確使大理院的判例，呈現了一個新的面目，由「保守」而趨向於「自由」。所以自由派的人物稱頌他的業績，反之保守主義者批評他的成就，甚至有過一度醞釀「彈劾華倫」運動。無論人們對他的好惡如何，他在美國法制史上將永為一位不可磨滅的人物。

華倫雖已七七高齡，但精神矍鑠，當非因不勝繁劇而懸辭。據傳說，他深恐在下屆總統屬於共和黨的尼克森，那時退休或有不便；但他們兩人之間有無任何芥蒂，局外人不得而知。惟此時詹森總統如果接受他的辭職，他便有權在任內向參議院提名繼任華倫的人選。因此，參議院中已有共和黨參議員表示意見，詹森總統既已聲明不願覲選下屆總統，就不應再提出大理院下屆院長的人選，以影響今後大理院大法官判例的趨勢。外傳詹森總統或將把此職授予現任大法官福泰斯或現任常駐聯合國大使及曾任大法官的高德柏。是否如此，目前尚難臆測。

在華倫領導之下的十五年大理院，因為有下列若干重要判例，引起大家的注目。譬如關於種族平等

問題，大理院判決所有公立的各級學校，不該採行「黑白隔離」制度，指為違憲。他的判詞強調教育平等的原則，而抨擊「分離而平等」的說法，以為在今日的時代，黑白分校的政策，顯係違背了「平等」的意義。又如另一判決，任何被警察逮捕的疑犯，在警局偵訊以前，便應享有聘請或指定律師辯護的權利，而且應該疑犯自己知道有此權利。更有一個判例，各州選舉議員的「分區」制度，應由各州當局依據人口比例重行調整劃分，務使達成「一人一權」的目標。凡此種種，都使美國的政治與社會，蒙受重大的影響，也藉此可見華倫對保護人權的努力，宜乎受到所謂開明自由份子的推崇。不但此也，觀察家甚至以為此乃「華倫的革命」；其所以如此，實因「華倫時代」的大理院，與其說是闡揚憲法的精神，不如說他重視個人的權利，而要達到人人「在法律之前獲得平等」的崇高目的。

平心而論，華倫是一位超黨派的人物。他以前所以能連任三屆的加州州長，便是得力於他所持的那種「公平」態度。當一九四二年他競選加州州長時，早已說過：「我是一個共和黨黨員。但我將尋求兩黨的支持」。他因此深信他自己是一個「獨立」的個人。他要公平的為任何人服務，不問其人的政治立場是否與他相同。他在大理院院長任內，大概仍持此種態度。他和易近人，而又要追隨時代，構成不少關於美國憲法的新解釋，此其所以能在十五年間造成大理院的新面目。（紐約華美日報）

讀董著「戰前之中國憲政制度」有感（一九六八年八月八日）

董深博士（爲公）之最近著作「戰前之中國憲政制度」，業由臺北世界書局出版。在是書印刷期間董氏曾以最後校稿見示，不但使公展得先讀爲快，且可藉此窺見其著作之計劃，分爲戰前、戰時、及戰後三大時期。所謂「戰前」者，乃指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以前而言，卽由清末籌備立憲之時釵起，至蘆溝橋事變爆發之時爲止。全書共有「清末立憲」、「民初法治」、「袁氏改制」、「南北分統」、「黨治基礎」、「五權憲政」、「國民政府」、「地方政府」、「吏治制度」、「法制司法」，及「國籍歸化」等章。凡所引證，均詳註出處，書末並有極爲詳盡之「參考資料提要」，以供讀者參考。

董氏與公展訂交，逾四十年，深知其爲人，治事則精明強幹，絕不拖泥帶水；治學則辛勤篤實，必欲窮源究委。天性使然，不勝佩仰。董氏早年卽宣力黨政，熱心民治，且曾被選爲北平特別市第一任民選之市議會議長。嗣爲日軍所迫，自平撤退而出國。抗戰初期，董氏留美學成歸國，其時國軍雖已退出京滬，而上海租界猶在敵僞勢力範圍之外。作者先返滬省親，遂卽接受江浙兩省各教會大學在滬所辦聯合大學之延聘，教授公法及政治學，其後整理所著之講義，編成「中國政府」上下兩冊，交由上海世界書局印行。比書現已絕版，董氏今乃根據其孤本，重予增損修正，仍由臺北世界書局印行，此卽「戰前之中國憲政制度」一書之所由來。

一九六八年初，董氏在出版其英文新著「世界正在組合中之國際公法」，係根據其先後在紐約聖約翰大學及紐約市立大學任教時之講義而編成者。出版以後，頗獲學術界之好評，且不少大學採為教本。我國外交界前輩劉師舜大使（琴五）讚揚董氏「埋頭苦幹」，不求人知之治學精神。又董氏於一九六四年出版英文之「現代中國之政治制度」風行一時，現已出第二版。當時美國遠東問題專家杭培克先生稱許該書「能合論中國政治與法律之史的演變，兼容並蓄，而各得其宜。」董氏此次印行之「戰前之中國憲政制度」之中文新著，公展讀覽以後，不禁與劉杭兩氏有同感也。

猶憶英國學人陶納考察中國以後，曾有感喟，略謂中國青年學人對於西方國家與政制之學說，每能「如數家珍」，而對於中國自己之所有者，往往反多茫然，不以為異。公展雖不完全同意其觀感之評斷，但亦不能不希望國人有所反省。就中國之憲政制度而論，董氏之新著應可彌補其缺憾，如各大學校能採用此書為教本或參考書，而更得資深之教授，指導學生之修習，則凡青年學子之有志於研討中國憲政制度或中國現代史者，曾可瞭解中國之由君主專制而進於民主憲政，其間經過之奮鬥艱難情形，而在異國人士之前，亦不致再蒙「數典忘祖」之誚。

董氏於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初，即知上海租界之必將為敵僞所佔，乃間道蒞渝。當與公展把晤之日，即出其著「中國政府」兩冊見示。夫於倉惶流離之際，仍能孜孜於教育及著作，其精神誠不可及。

當時彼更以此書就正於陳布雷先生，並以其英文著作「國際公法例案」及「中國與國際公法」兩書，就正於王亮騰先生，深獲兩先生之揄揚，稱許其學術造詣之深厚，治學之確有心得。時值抗戰正殷，政府求才若渴，董氏乃應召而服務黨國，敬歷中外，在宣傳、立法及外交方面，貢獻良多。但從政不忘

治學，依然不失其書生本色。故於政府播遷臺灣，外部易長，辭職奉准後，即在美國大學授課，曾不數年，在學術界之聲譽騰起。蓋董氏之授課與著作，均秉持其客觀之公正立場，故能受人之重視。

即以本書而論，其敘述起於清末之籌備立憲，止於蘆溝橋七七事變之爆發，全部十一章之內容，夾敘夾議，要言不煩，而每有評斷，無不秉筆直書，令人敬仰其史筆之公正。今試略舉數例，以證吾言。

(一)關於清廷之籌備立憲，作者一方揭破其原無誠意；而另一方面，亦並不抹煞當時各省諮議局對於辛亥革命之間接的貢獻。四川省諮議局之反對川路國有，作者稱許其為武昌起義之前奏，即其一例。至於武昌起義以後，清廷被迫頒布之「十九條條」，作者稱其內容尚合時代潮流，而深惜其不早頒布於十年以前，否則「人心當可緩和，革命或不致即發。」（見第十五、十六頁）此亦不失為持平之論。

(二)關於民國初年之法治，作者雖謂「臨時政府組織大綱」過於簡陋，但仍認為此乃「中華民國第一次之根本法」。其後來頒布之「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作者雖稱其為「民國憲政文件中之最富歷史性者」，但仍以其缺點甚多，引述孫中山先生之評斷，所謂「合九州之鐵，鑄此大錯。」（見第二十四、二十五頁）乃至當不易之定論。

(三)關於袁世凱改制稱帝之敘述，作者對袁氏之抨擊，表示其深惡痛絕，以為「中國之政治乃轉入黑暗之途。」此固人人之所欲言；而在此翻雲覆雨之混亂變局中，作者能評斷「黎氏（元洪）難辭庸碌誤國之咎」，則不失為良史之筆。（見第四十一頁）

四關於黨治時期之制度，作者敘述不厭求詳，其篇幅佔有七章之多。而其中肯之批評，則認為黨治之弊，不在其制度而在乎人。黨內之互相牽制傾軋，與地方黨政機關之不能協調，為其病根之所在。凡

此所云，非躬親體念者不能道，而身歷其境者反又往往不敢道。董氏竟直率言之，真是難能可貴。對於「五五憲草」制訂之經過，曲折委婉，扶微顯隱，使讀者能領會此憲章得來之不易。雖未能於抗戰軍興以前，召開國民大會，制頒憲法，使「熱心民治者不無失望」。但作者之結論，則謂「全國在兵燹之餘，百事既須重舉，自治尚待推行，此時此地亦非實施憲政之良機。」（見第一〇九頁）其鑒空衡平之立場，即可於此數語中見之。

總之，作者之為中國國民黨之忠貞同志，遠在民國十八年時，即被中央甄選為大學黨義教師。但其學術論著素重內容，力避空泛宣傳。當時中央黨部及教育部合組之大學黨義教師檢定委員會，審核其所著之「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一書，評曰：「搜羅宏富，議論風生，文字亦極靈活潑流轉之妙。」又曰：「旁證博引，非積學之士，不克臻此。」夫客觀平實為董氏治學之一貫精神。其對於本書因重視學術性質，故處處能不為黨見所困，而黨義反因此而益彰。其著作之價值即在此。

按作者既以抗戰為劃時代之契機，自必有「戰時」及「戰後」中國憲政制度之續著出版，彼時讀者方能盱衡中國現代憲政制度前後演變之全貌。董氏目前僅以第一部之中國憲政制度問世，但在其自序中亦曾說明即將從事於「戰時」及「戰後」二時期之著作。公展深信其將來必有第二第三兩部之印行，以符讀者之希望。（紐約華美日報）

賴著「國際問題論叢」書後（一九七〇年七月二日）

寫有關時事問題的文章，而要能使讀者過了相當時間以後，讀來仍然愛不釋手，並不視為「明日黃花」，却不容易。尤其評論國際時事，牽涉的範圍既廣，形成的因素又多，作者對於問題的來龍去脈，前因後果，如無精細的研究，深刻的觀察，其論斷未必能洞中窺要，得人心之所同然，而可傳之久遠。因此，我最近讀到老友賴景瑚兄的新著「國際問題論叢」，認為不可多得的一本好書。

這本書，是景瑚兄將他近兩三年來在臺北中國時報上所發表的「專欄」文章三十篇，輯為一編，交由該報印行問世。其中論及美國的十三篇，中國的兩篇，蘇聯的五篇，法國的兩篇，英國的、日本的、加拿大的、德國的、拉丁美洲的、中東的、越南的、以及一般青年問題的各一篇。可以說，這兩三年來，全世界所發生的大事，例如戰爭、外交、政治、經濟、社會動亂、學潮蔓延、……幾乎無不涉及。而且每一問題，作者往往原原本本，彈見洽聞，務使讀者跟着他的筆觸，窺見其底蘊。最有趣的，他有時所寫的本來是嚴重的問題，而能莊諧雜陳，引人入勝，令讀者有神遊妙境，身心舒泰之感，他所欲言者固已由作者道破，而作者之所言，有許多是他所未嘗想到的，真不禁如金聖歎批小說，看「不亦快哉！」之感。

景瑚兄雖學的是工程，但長於文學，在美留學期間，一度任加拿大醒華日報主筆。後來由美學成歸

國，從事黨政文教工作，且曾助陳立夫先生，主持京報筆政，可謂報壇宿將，本報創辦時，他任總編輯，與總經理項定榮兄共同努力，奠定初基。其後主持聯合國秘書處中文部，貢獻良多。性好遊歷，足跡遍全球。其所撰遊記，均先在本報發表，並先後參刊「遊踪心影」及「漫遊散記」，久已膾炙人口，古人所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景湖兄當之無愧，加以服務聯合國，目所及，對二十年來之國際風雲更可洞若觀火。有此秉賦，評論國際問題，自能一針見血，不同流俗。

從本書的卅篇論文裏，我們可以窺見作者對於紛紜複雜的世局，有其基本立場。大要說來：他是愛護民主自由，反對共產專政的。他固然認為「共產帝國由分裂到崩潰，由崩潰到滅亡」，「克里姆林宮的傾覆已經是命裏注定」，「毛共政權的摧毀，一定會先於克里姆林宮的潰滅」，但是，「大陸光復後的中華民國，不但要對中國人民有交代，也要對全世界有交代。我們拯救了七萬萬受苦受難的同胞，更應下決心，去奠定本國民主自由的基礎，也要立志願，去安定東南亞的局勢，保持世界的和平」。語重心長，發人深省，對於這個領導自由世界的美國，他望之深，所以責之切。他在「美國的危機」這篇文章中，引述了二十世紀剛揭幕時老羅斯福總統的一段名言：「將來有幾件事，可能會把美國毀滅。那就是：任何代價的興旺、任何代價的和平，安全第一而非義務第一，柔軟生活的愛好，發財的人生觀。」他從而指出目前美國的病源是「宗教的式微和文化的動搖」，「教育的退化和青年的墮落」，「政客」的無聊和文人的無行，「誨盜誨淫吸毒犯罪的擴展」。他「只有虔誠禱祝美國人提高警覺，加強開志，絕對不讓這個富強康樂復為華盛頓林肯諸先賢艱難締造的國家，重蹈羅馬帝國的覆轍。」

我相信一般讀者也將如作者一樣，虔誠祝禱美國不重蹈羅馬帝國的覆轍。（紐約華美日報）

有涯室夢痕錄序言

(一九五四年一月九日)

莊周嘗說：「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的確，這是一句含有至理的名言。科學發達，知識進步，現代人的知識領域，早已超越古人，日月新異，無有止境。但就人類之所已知的，與自然界之形形色色相較，真滄海一粟之不若。縱有天縱之聖，生而知之，亦未必能自比於西人所謂「全知全能」之上帝。何況中下之賁，大都是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則一生之時間有限，宇宙之事物無窮，何能無所不知，無所不曉？人類之追求知識，只好比之於運動場上的接力賽跑，你跑一段，我跑一程，繼續不斷，追求無已。全知全能之目的，一日不達，求知求能之工作一日不輟；人生意義，如是而已。若就個人而言，顯與人羣全體有異，以生命有盡之故，固祇能各盡其分，各求其知，做到孔子所謂「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的地步，斷不能強不知以爲知。假使以有涯之生，追逐無涯之知，而欲蓋洩天地之秘奧，自以爲「萬物皆備於我」，那便是近乎狂妄的想法。

「只可意會，不可言傳」

固然，古往今來，許多宗教家哲學家都在用盡功夫，想把宇宙的真理，人生的意義，探求究竟，指示津梁。但是教義紛陳，學派各別，亦不過「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到底那一位教主，那一位哲

人，說的是絕對的真理，也只好憑各人自己的見解去認識，辨別，和信仰。恐怕誰也不容易證明他自己的知確是絕對的眞知。因爲凡是絕對的東西，應該都是超現實的。（現實世界裏凡可以思維的東西，無論形上形下，都是相對的。）也就是入於不可思議的境界，還有誰可以用思維知識爲之證實。所以宗教教義之中，有許多只能靠各人的修行功夫，親身體驗，獲得澈悟，而此種悟證，「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實已超越普通所謂知識的領域。故「知」雖已無涯，而尚有超乎無涯之知的不可思議的境界。

眞理往往隱於「不可言傳」之中。一落言詮，反爲下乘。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靈山會上，釋迦拈花微笑，獨有迦葉領悟。這種不言之教，實已超越知識之領域。孟子說，「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天地之間，森羅萬象，如僅就知識而言，則縱然「百世以俟聖人」，聖人亦有其不可知的境界，祇好歸之於神了。科學儘管昌明，原子理論縱已運用，大科學家愛因斯坦四五個月前發刊他的「萬有引力概論」第四版，還在盡心竭智，繼續研討，想把他的相對論學說有所推進，要在宇宙的無限境界和原子的無限境界當中，建起一座橋梁來。換言之，愛氏繼續研究的目的，是要把宇宙學說和原子學說合成一個有系統而且包含各種現象的學術總匯。這位二十世紀的科學界怪傑，在溫澤西州的普林斯登大學的最高學府裏，依然夙夜不懈的孜孜研究。但他是否能夠及身建立起一種足以解釋宇宙間一切現象的學說系統，目前尚不得而知。而且，他雖是「天字第一號」的大科學家，却承認科學與宗教並不衝突，非但不衝突，或反相得益彰。他向吾友賴景瑚兄說：「沒有宗教的科學是跛子，沒有科學的宗教是瞎子。」科學，我們還可以說在知識的範疇裏；宗教却已超越知識的範疇了。然則單憑知識，不能概括宇宙人生的一切道理，顯而易見。我們似乎應該在追逐無涯之知而外，乘

此有涯之生尙有殘餘之日，於靜寂觀照之中，體味「不言」之教，庶幾稍領略宇宙之偉大，人生之真義。我之所以名我斗室爲「有涯」，多少含有自己提撕警覺的教意吧。

長江中的兩艘船舶

「生也有涯」，此固人人所同。秦皇漢武，長生乏術。去年暴死的混世魔王史達林，生前雖屢求長生不老之術，但亦終不能免其一死。可是人生雖同屬有涯，而如何應付此有涯之生，却又各不相同。相傳紀曉嵐對清帝乾隆說，長江中風帆點點，實在只有兩艘船舶，一艘爲名，一艘爲利。他說的雖似刻薄露骨一些，但仔細一想，也未始不隱含幾分道理。卽如孟子生平所力辨者，亦不外義利二字。他說，「孽孽爲義者，舜之徒也；孽孽爲利者，跖之徒也。」義乃行事之宜，當然爲一種道德的標準。爲義的人，心目中只知道應該如此做去，本無絲毫求名之心。但是非自有公論，名亦終必歸之。那麼爲義的人，雖不爲名而實亦爲名。只有真正不爲名爲利，而能使此有涯之一生，絕無白璧之瑕，這是上選。假使瑕瑜互見，小德出入，而大德不踰，不失爲中品。假定一生檢點，只覺滿眼缺陷，大有慚色，不但虛此天地間之一行，亦必自感將無以逃千秋萬世的責備。毛澤東周恩來輩甘心賣國，自外生成，固不必論；但若張治中等，昔嘗受今總統蔣公特達之知，亦曾自號爲三民主義的信徒，乃竟背黨叛國而去，他們如果檢點其有涯之一生，良心將何以自解？也許古今中外的大奸巨慝；自有他們的一套人生觀。所謂「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就是這些梟雄奸賊的解嘲語吧！

說到人生觀，原是一個見仁見智，各有不同的問題。「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老子所謂的萬

物，當然包括人在內。人在天地無私的眼光裏，既不過「狷狗」的一種，有何奇特？他從這種基本觀念出發，自然得到「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人乎？」的結論。由是他發揮他的極端的嬰兒主義的人生觀，勸大家去學那一嬰兒」。但「天地之性，人爲貴。」這又是孔子對於人的見解。他認爲人在天地之間是唯一了不起的東西。如果能盡己之性，盡人之性，乃至盡物之性，那就可以「贊天地之化育」，進而「與天地參」，達到三位一體的無上境界。他們兩位大哲對於人生的態度，絕不相同。老子主張「見素抱樸」，清靜無爲；孔子却主張「克己復禮」，「知其不可爲而爲之」。古今中外沒有一個大思想家不是自己有一套人生觀的。豈但思想家？推而至於引車賣漿，販夫走卒，你看他們好像渾渾噩噩，不識不知，實則他們也有他們自己的一套人生觀。即使抱着一五斗可以解醒」那種觀念的酒中仙，如劉伶之流，也何嘗不自己建立起他們的人生觀？有人生，就有人生觀，除非滅絕了那個人的思想。人生的天壽雖有不同，但其爲有涯則一。如何排遣此一有涯之生？這便是每一個人所持各種不同人生觀所要解答的問題。

李太白是詩聖，也是酒仙。他曾說：「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浮生若夢，爲歡幾何？」所以他竭力鼓吹秉燭夜遊。現代都市中許多通宵俱樂部，火樹銀花，城開不夜，倒是得着李太白的薪傳的。蘇東坡詩：「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記東西？」他也有像李太白一樣的達觀。貶謫流浪，在這兩位達觀的大詩人看來，都毫無所謂。不是踏雪的飛鴻，就是浮生的夢客。然而，轉念想來，他們達觀儘管達觀，人生依然人生。踏過雪泥的飛鴻，雖飄然遠去，不辨東西，而爪痕究已一度留在泥上。假使偶爾巧合，山崩地陷，數十萬年後這塊留有鴻爪痕跡的

雪泥成爲化石，也許還可供那時的考古學家作孜孜不倦的探討。浮生縱然短促，但這個血肉做成的臭皮囊，究竟也是曾在「天地大旅社」中做過一番酣夢的過客。故無論如何，在這有涯之生的一刹那間；一個人是多少留有痕跡於天地之間的。何況「物質不滅，能力不滅」的學說，既能適用於萬物，亦必適用於人類，則做一個人，似乎未必能完全無影響於社會。

「此身猶是未歸人」

我常自念，遑難去國，倏將四載。年末周甲，兩鬢早斑。生平師友，強半已作古人。所見所聞，載言載笑，「俯仰之間已成陳跡。」最近讀到老友人驕兄新詞「此身猶是未歸人」的警句，不禁鉤起萬斛閒愁，無計排遣。幸而窮途潦倒，尙須賣文爲活，逼得我不能不每天勉強塗寫，倒是一種消磨有涯餘生的良法。半年以前，新聞天地主編卜少夫兄函徵拙稿，並且希望寫些回憶錄之類的東西。我想，回憶錄是偉人名士的大文章，我何人斯，豈敢勸筆？何況三十多年來我不過是一個客串的報人，目前時代進步，更變成了落伍的記者。耳目聰明，早不如前，腦筋健忘，幾難自信，顯係精力遲鈍的象徵，何能再寫什麼文章？加以平生雖掛黨籍，入仕途，亦仍然一介書生，我行我素；既無偉大政見，更無絲毫治績，縱使要寫，亦絕無回憶的價值。屢次握管而又停筆者以此。但無論如何，我總算是「新聞天地」大旅館裏的一個過客，也曾肝聲大作，怡然入夢，甜酸苦辣，離合悲歡，究竟嘗過不少滋味，經歷不少境界。即使現在，這浮生的夢也還未曾作了，依然在故紙堆中，新聞圈裏，斷斷續續，糊糊塗塗的做下去。蘇東坡儘管說「事如春夢了無痕」，但夢在將醒未醒之際，總還有些微痕跡可尋。所以我雖不敢寫回憶

錄，或者還可如捕風捉影一般，將若干殘夢餘痕捕捉着，配合當前景況，拉雜寫來，算是有涯之生的一點泡沫，也未始不可以解嘲。

既然稱為夢痕，說的當然都是夢話。「夢幻泡影露電」等六如，本是金剛經所說的佛家人生觀。可見夢全是虛幻的境界。夢不過是由各種刺激各種觀念聯合而成的幻象，其內容之不統一，無系統，毫不足怪。雖然有許多心理學家努力在分析夢的成因，也有若干迷信的人在誘人「詳夢」，但夢究竟只能當夢看，認不得真。夢且如此，何況夢的殘痕，更何況夢痕的描繪？其為虛幻沒亂，顛倒妄想，更不可不言而喻。我只是興之所至，隨筆而塗，既無次序，更談不到章法。上自廟儀朝政，下至道聽塗說，小而閨閣珍聞，大而濶寰志異，論學問則形上形下，記風俗則地北天南，無所不談，無所不錄。謬誤錯雜，固所不免；模糊影畫，更必貽譏。好在我並沒有夢過筆頭生花，也沒有在夢中接受過人家送給我的五色筆，當然我更不配寫「東京夢華錄」這一類追記往昔事實的大作品，只是胡謔亂塗，也就顧不得許多了。

（香港新聞天地三〇八期）

與國難俱來的一生（一九五四年一月十六日）

回顧我將近六十年的有涯之生，可說是與國難俱來的一生。我呱呱墜地的一年，正是甲午之戰，清廷大敗於日本的第二年，也就是李鴻章奉命使日，簽訂辱國的馬關條約之年。二次大戰勝利後復歸祖國懷抱，而目前正為遠東反共前衛自由堡壘的臺灣，恰是我降生那年由清廷割讓給日本的。從此東西各國，看穿了滿清帝國的紙老虎，競向一羣昏聩顛預的當局，提出割讓土地，租借港灣的無髮之求。加以康有為，梁啟超一班保皇黨的變法維新運動，又因戊戌政變而宣告失敗；隨之而來的是愚昧無知的拳匪之亂，借扶清滅洋的幌子，做排外自欺的妄舉，以致招來了庚子八國聯軍的攻入首都，釀成不平等條約登峯造極的辛丑條約。這一連串事實，使中國的國難日益加重，幾有即被列強瓜分之禍。那時美國國務卿海約翰的對華「門戶開放」政策，總算把這瀕於瓜分的大禍延緩了下來，使我們中國人尚有急起自救的機會。

我們即謂中國近代的革新運動，實際上是始於一八九五年（乙未），亦無不可。因為孫中山先生的革命運動，與中會的成立，雖是起於乙酉（一八八五）中法戰敗之年，他說那時「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於是以學堂為鼓吹之地，借醫術為入世之媒」。但積極發動革命戰爭，還有待於乙未同盟會成立於日本東京之後。當甲午中日戰爭爆發的前後，孫先生尚由清廷總理衙門委員徐秋畦的介紹，致書

於李鴻章，條陳他的經國大計，即現在人人傳誦的「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四大端。可見那時號稱識時務的李鴻章，如果能採納孫先生的建議，孫先生或亦尚未忘情於緩和的救國方案。唯甲午戰敗以後，孫先生已洞知清廷之無可有為，從而更堅其「傾覆清廷，樹建民國」的革命奮鬥之大志了。

六十年來的救國主流

中國那時的自救運動，除了一部分士大夫震驚於西洋之堅甲利兵，主張輸入應用科學，甚至限於兵器的製造，以圖自強而外，比較開通的知識份子，大概分為兩大派。一派主張變法維新，而仍戀戀於君主，時人稱之為君主立憲運動，到了戊戌（一八九八）政變失敗，此派演變而為保皇黨。其另一派則主張民主共和，而以鼓吹民族革命，推倒滿清皇室為入手，這就是六十年來救國主流的民主革命運動。與中會倡於前，同盟會繼於後，而民國成立以後迄至今日的中國國民黨，自為民主革命運動的中堅。

上述兩派的鬭爭，在政治理論上的辯難，確是經過長時期的短兵相接的。那時的青年學生，無不為兩派的思想言論所吸引，而在心理上作過一番水火不相容的自我決鬪的。我生也晚，當庚子以後的五年，纔十一二歲，四書方讀畢。先師丁翔之先生託其上海友人秘密帶到湖州幾種新書，如鄒容的「革命軍」和章炳麟的「尅書」（？）和清初大儒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顧炎武的「日知錄」，王船山的「讀通鑿論」。這一類提倡民族氣節的遺著，常於課餘為我們私塾裏少數同學，選擇講解。後來又讓我們有機會讀到梁啟超在東京發行的「新民叢報」，同盟會在東京發行的「民報」，和劉師培等在上海

發行的「國粹學報」，使我們幾個十三四歲的毛頭小夥子，受着很深的刺激，也居然在湖州城內一個私塾改辦的兩等小學內，秘密組織起革命團體來。當時我們五六個未成年的同學，很盼望能有什麼方法，和東京的同盟會或他所秘密遣返國內的代表取得聯絡。這件事的筭頭雖沒有接上，但我們竟不顧一切，在學校內部設行一種手寫油印的小刊物「富強報」，鼓吹起排滿來了。那位丁老師知道了，嚇得趕忙令我們銷燬刊物，結束團體，說是如果鬧大了，要牽累到他的。他一面把我們各記大過，一面善言溫慰的勸導我們，說着你們年紀還小，大器晚成這一類的話，我們纔答應了不再明目張膽的幹。那一年（一九一〇）的冬天，我們這一班小學生的畢業考試就由府縣衙門派了委員來監考，考畢就紛紛離別了學校。

「蘇報案」的影響

回憶起這一段經過，雖屬毫無價值，但也是反映當時少年學生所懷抱的時代思潮。在那一時代的思想戰爭中，保皇黨的君主立憲運動，繼早期的「強學報」「時務報」之後，在海內外各地發刊各種鼓吹宣傳的報紙雜誌，而以梁啟超的「新民叢報」為其總樞，陣容甚強，聲勢頗大；加以梁啟超的一枝筆，富有非常的魅力，而他們的後台老闆，又都是袁世凱，張之洞一流的當時封疆大吏，所以在最初的接觸開火階段，他們很佔優勢。他們所倡的「開明專制」，「君主立憲」，與「革命必召瓜分」這一套理論，一直到一九〇五年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發行于東京，纔開始受到重大的打擊。

民主革命派的有力鼓吹，發動於上海的「蘇報」。這張日報最初雖向上海日本領事館註冊，後來實際上變成由去年臺灣逝世的元老吳稚暉敦恒先生主筆的當時唯一鼓吹革命的日報。章炳麟，蔡元培諸氏

，都時有撰著發表。因為該報登了章炳麟為鄒容「革命軍」一書所作的序文，並且在報端介紹了此一奇書的內容，引起了一場文字獄，就是滿清末年的「蘇報案」。蘇報案的結果，雖然由上海租界的「會審公廨」逮捕了章、鄒和報館經理陳範的公子等三人，並宣判章炳麟徒刑三年，鄒容徒刑二年，期滿逐出國外（後來鄒容瘐死獄中，章炳麟則於出獄後亡命日本），但不啻替革命黨做了義務的擴大宣傳。因為有此一案，迫使生殺予奪，唯我獨尊的滿清皇帝，不能不委託律師，在上海「會審公廨」與革命黨對打官司，君主的無上威權，為之掃地無遺。自有蘇報案，而民主革命之氣燄乃愈張。

對保皇黨報刊的主張，駁斥最痛快者，當推胡漢民，章炳麟諸氏在「民報」所發表的大著。例如：「駁革命可以召瓜分說」，「駁新民叢報之非革命論」，「斥為滿洲辯護者之無恥」，「希望滿清立憲者為聽諸」等篇都是。汪兆銘在抗日戰爭時雖為漢奸，但那時他也在「民報」上發表「民族的國民」一文，暢論民族主義，辨明排滿非狹隘的民族主義。孫中山先生更在「民報」發刊詞中，特別提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而歸結其基礎於「民」，顯然對着君主立憲說開始下總攻擊令了。當時的少年學生，受此時代思潮的洗禮衝激的結果，大多數自然情不自禁而奔赴於民主革命派的旗幟之下。而同顧那時的我，不過是那無數少年學生中的一個小學生而已。（香港新聞天地三〇九期）

美日憲法之爭 (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上節所述清末民主與君憲之論爭，說得更透澈一些，不啻是美國憲法與日本憲法之論爭。因為康梁派的保皇黨，雖起初鼓吹開明專制，後來也主張召開國會頒布憲法。不過他們對清帝光緒，感恩圖報，總是巧言如簧，替滿清皇室辯護，其心目中所想向清廷請願的，只是採用日本天皇萬世一系的憲法。他們的理由，無非說（一）中國那時的國民沒有資格實行共和立憲。（二）革命軍寇德騷亂之後，也必不能適宜於養成共和資格。所以祇有仿倣日本明治維新，由清廷逐步變法，施行憲政。梁啟超是保皇黨論壇健將，他的持論雖有時與其師康有為有所出入，但在法制的學理上，不外由抨擊當時風靡歐美的盧梭「民約論」中的國民意志說，和孟德斯鳩「法意」中的三權分立說入手，而下一斷語，惟有採一君主立憲」之形式，行「開明專制」之政治，最適宜於中國之國情。這種保皇黨的政治基本理論，無異是日本憲法模倣論。

民主革命派的基本精神

相反的，在民主革命派方面，由同盟會所號召的共和立憲，假使粗淺言之，可以說是美國憲法模倣論。雖然在一民報一發刊時代，孫中山先生已因環遊歐美，目擊其社會病態，從而完成其三民主義有系

統的理論，欲使種族革命，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民報發刊詞語）；但在最初的民權主義方面，所渴望的共和憲法，自必以實行三權分立的美國憲法為目標。到後來才更參酌中國政治的歷史與國情，於立法、行政、司法三權之外加入了考試、監察二權，創造其五權憲法的精奧理論。不論三權或五權，總之，革命黨所主張的憲法，必定是伸張民權而又須使治權分立的憲法。此種分權最為明顯的憲法，世界上是美國開始實行而有效的，故亦可說是美國憲法的類型，與天皇萬世一系，握有無上權威的日本憲法迥異其趣。故關於立憲問題，民報對新民叢報所發動之論戰，在當時少年學生腦海中的印象，差不多就是美國憲法與日本憲法之論戰；其為立憲固同，而所以立憲的精神則大不相同。由於美國獨立以後一百多年來國勢的蒸蒸日上，華盛頓、哲佛遜、傑克遜、林肯許多偉大總統民主精神的灌溉，以及美國所持尊重中國主權領土完整的政策，與日本明治維新後，即對中國用兵，攫取台灣，覬覦朝鮮，作風頗有差異。少年學生不期然而然的都傾向於效法美國，厭惡日本。革命黨之所以戰勝保皇黨，除排滿的狹義民族問題外，這政治理論上的憲法優劣比較論，實是一大原因。我自己當時就是為革命黨理論所克服的一個小學生。（由今日言之，日本舊憲法已因二次大戰失敗而廢棄了，戰後的新憲法，乃是麥克阿瑟元帥任盟軍統帥時期所授與藍本而重行制定頒布的。麥帥雖為建議美國政府，主張保留日本天皇制度的人，但日本新憲法中，已滲進了不少美國憲法精神，與五十年前自己不可同日而語。）

我彷彿記得最初感受革命思想很深的一次，是在從丁老師處偷讀鄭容「革命軍」一書的時候。鄭容的書，是當時排滿最激烈的言論，孫中山先生在其所著「孫文學說」中，稱該書極受華僑歡迎，開導華僑風氣，為力甚大。近年來我到美國，在東西兩岸各大埠，遇及老前輩的僑領，他們對「革命軍」選

讚不絕口，可見其影響之深遠。「革命軍」一書中，標舉革命獨立的大義凡廿五條，除痛斥滿清專制，壓迫漢人的一部分外，其餘十七八條關於政治經濟建設的項目，幾乎都脫胎於美國的獨立宣言和憲法。鄒容自己也說：「吾幸夫吾同胞之得盧梭『民約論』，孟德斯鳩『萬法原理』，彌勒約翰『自由之理』，法國革命史，美國獨立檄文等書，譯而讀之也」。可見他寫這部大作，所受歐美民權思潮與美法革命歷史的影響，非常之鉅。

鄒容「革命軍」的主張

我且隨便舉出幾條鄒容所開的項目，以證明我所說他的主張都由美國憲法與獨立宣言脫胎而來，絕非虛語。他主張的是：（一）各人不可奪之權利，皆由天授。（二）國人男女皆為國民，一律平等，無上下貴賤之分。（三）生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皆屬天賦之權利。（四）不得侵人自由，如言論、思想、出版等事。（五）各人權利必須保護，須經人民公許建設政府，而各假以權，專掌保護人民權利之事。（六）無論何時，政府有干犯人民權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舊日之政府，而求遂其安全康樂之心。迨其既得安全康樂之後，經衆公議，整頓權利，更立新政府，亦為人民應有之權利。（七）定名為中華共和國，為自由獨立之國。（八）立憲法，悉照美國憲法，參照中國性質立定（一）自治法律，悉照美國自治法律。（二）凡關全體個人之事及交涉之事，及設官分職國家上之事，悉準美國辦理。（三）自由獨立之中華共和國，所有宣戰、講和、訂盟、通商及獨立國一切應為之事，俱有十分權利，與各大國平等。（四）建立中央政府，為全國辦事之總機關。（五）區分省分，於各省中投票公舉一

總議員，由各省總議員投票公舉一人，爲暫行大總統，爲全國之代表人，又舉一人爲副總統。各州縣又各舉議員若干。(一)國民人人皆有效忠國家承擔國稅之義務。

試看上述這許多條款，幾無一不可求其根源於美國憲法或獨立宣言之中。可見當時革命黨人所醉心的改造新中國的偉大方案，最初就是存心取法美國的獨立，而絕非欲追跡日本的維新。這是革命黨和康梁們的保皇黨根本衝突之點。到了鄭容死後，章炳麟出獄走日本，其時適與中會領袖孫中山先生由歐美漫遊而抵日，留日學生醉心革命的已日多，乃乘開會歡迎孫先生之便，進而組織中國同盟會於東京，爲各方面革命團體的統一機構，張繼、黃興、胡漢民、馮自由、鄧家彥、但懋諸氏都爲當時加盟的中堅份子。「民報」也就隨之而發刊，爲革命黨人宣傳理論的大本營。於是革命之勢力，乃一發而不可遏止。試再分析同盟會所標舉的革命四大綱領，除「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仍出發於排滿的民族主義，「平均地權」則爲民生主義最初的目標而外，其第三綱領的「建立民國」，即所謂民權主義的實行，實在就是要模倣美國的獨立，建立一個獨立自由的國家；並說明「制定中華民國憲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僞者，天下共擊之」。更可見反對帝制及變相的專制政體，以及必須仿行美國式的民主立憲，實在是中國國民革命在政治建設上的一貫目標。後來武昌起義，辛亥夏曆十月間，十七省代表組織參議院於南京，通過臨時約法凡五十六條，並公舉孫中山先生爲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設臨時政府於南京，其草擬規模根據於同盟會四大綱中的第三綱，而大體上似不出乎鄭容「革命軍」一書中所標舉各條款的範圍。所以民國的成立，憲法（臨時約法即爲當時的憲法）的頒布，其間報紙雜誌宣傳鼓吹之力，不容埋沒。所謂「文字功成日，神州革命潮」，新世界的先輩是對得起民族國家的。

革命工作者的罪戾

不過，時至今日，不免使人有無限的感慨。革命先進所欲改造的新中國，步美國の後塵而爲亞洲唯一民主共和的新紀元，這一宏願，歷經袁世凱稱帝，溥儀復辟，北洋軍閥弄權，日軍入寇，以至抗戰勝利後的中共竊據大陸，在「民主專政」的口號下，實行空前的極權統治，而爲蘇聯的臣屬。這許多內元外外的挫折，只落得勉強有一部國民大會於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十二月廿五日所通過而於翌年元旦由國民政府公布的「中華民國憲法」，隨之而來的有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四月十九日國民大會所選出的總統，及由總統就職以後所組織的憲法施行後的中央政府。可是由於種種複雜的因素，這一個合乎憲法的中央政府被迫而播遷臺灣，用無數先烈和人民大眾的血淚造成的一部中華民國憲法，竟暫時不能有效適用於中國大陸，坐令呻吟桎梏於中共殘暴統治下的四萬萬同胞，喪失他們所應該合法享有的一切自由，而在水深火熱中，仰待援救。每一念及，不但涕泗橫流，而且汗流浹背。凡曾經參與過國民革命工作的人，都負有重大的罪戾，既對不起先烈，更對不起同胞，而我就是自己覺得罪孽深重懺悔無窮的一個人。我每一次翻閱先烈們所景仰的美國獨立宣言與美國憲法，總是連帶想到並去重讀中國同盟會宣言，民報發刊詞，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華民國憲法這類有歷史性的文件，而我的繞室徬徨，慚疚恥憤之情，也就加深了一層！（香港新聞天地三一〇期）

憲法起草的經過（一九五四年一月三十日）

前已言之，國民革命的政治建設，首要在確立一種民主立憲的政制。民主立憲的政制，不僅需要有一部完整可行的憲法，並且更需要全國上下共同具有尊重憲法，恪守憲法的實貴精神。我雖對憲法沒有什麼深刻研究，但在求學時期也頗好對於各國憲法作比較的探討。迨加入國民黨後，特別對孫中山先生的民權理論，即「權能區分」和「政權治權的制衡」兩大端，感有興趣。我認爲中華民國的憲法，必須根據孫先生遺教所指示的原理原則來創制，方能成爲後來居上的一部民主憲法。可是我雖然兩次承上海市民選舉，充任國民大會代表，參加過三十五年的制憲國民大會，和三十七年行憲後的第一屆國民大會，自愧對於這部憲法，很少有所貢獻。因爲一則人微言輕，學無所長，而又未嘗擔任過任何一屆的立法委員，根本沒有參與憲法起草的機會。二則中樞向制憲的國民大會所提出來的憲法草案，已非民國二十五年立法院根據孫先生遺教所制訂的五五憲草，而爲精神不同的另一個草案了。加以其時政局複雜，黨派之間更有所謂秘密諒解，要想在國民大會中對那草案發動根本的修改，在事實上幾已不可能。國民黨的若干愚蠢的忠實份子，只好暗中對着孫先生的遺教徒自慨歎流淚而已。我當時大概也是其中的一個。

憲草討論關防嚴密

但我在良心上雖不全滿意於三十五年多所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惟既經國民代表鄭重制定，政府依法公布，自應爲朝野上下所共同信守，決不能容許任何方面來破壞。因此，我對於中共的叛國毀憲，特別深惡痛絕。也許有人以爲中共既未選派代表出席於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的制憲國民大會，則後來制定頒布的憲法自無可拘束他們。這種說法是不通的。一方面，國民大會既代表全國人民，又都由選舉而來，則所決議的憲法，任何人都應受拘束。另一方面，這個憲法草案實際上是容納各黨各派（包括共產黨）代表的意見，而後拼湊成功的一件「藝術品」，中共如果講信用的話，當然更有遵守的義務。

關於上述的第二點，並非我憑空捏造，有所謂「政治協商會議」的憲草討論委員會的紀錄可以覆按。我沒有資格參加那個「政協」會議，自更談不到參加他們的憲草討論。但如果問及當時和中共代表周恩來，秦邦憲，民盟代表張君勱，羅隆基，章伯鈞，青年黨代表曾琦，陳啓天等共敘一堂，開誠商討的國民黨代表孫科，王寵惠，王世杰，吳經熊諸氏，他們當不能否認吾言。「政協」會議的秘書長雷啟寰（震）兄，雖是很熟的朋友，但那時的「政協」，似乎關防異常嚴密，他也從來不肯吐露什麼風風雨雨的消息，更遑論公布其會議紀錄於國人之前，以聽人民公判？我當時曾在申報發表社論，指出對共黨的任何談判，只有在「公開」方式之下，求人民的公判，方可不上大當，但又那裏能動大人先生之聽呢？今年夏偶從友人處見到自稱「第三勢力」的當時民盟領袖之一的張君勱所寫的「中國第三勢力」英文著作，窮半天之力把它看完，至今彷彿記得他有一章，敘述中共如何抵制憲法的經過，倒可以作我上文著作，窮半天之力把它看完，至今彷彿記得他有一章，敘述中共如何抵制憲法的經過，倒可以作我上

述第二點見解的旁證。由張君勳的說法，這部憲法所根據的草案，原來最初是出於他的得意之筆。而他的草擬動機，就是一心一意想仿效英國的「議會政制」，把孫先生的「權能區分」和「政權治權制衡」學說認為含義模糊，理應束諸高閣。根本觀念既如此，又以討論的過程中，必須容納共產黨的意見，自然有此「拼盆」藝術品的傑作。

張君勳和周恩來的默契

據張君勳的自述，中共的周恩來，董必武等，於三十五年的三四月間，每天晚上要和張君勳及其他民盟份子商量憲法草案的內容，相互間取得完全的諒解。所以有許多次數，第二天早晨憲草討論會開會時，張君勳往往和周恩來站在同一立場，為某一問題對國民黨代表開火。當然，張固自以為他乃係國共之間的中立份子，不願偏袒任何一方，可是結果怎樣，祇有天曉得。不過，張在另一章裏似乎自己也慨歎的說道：當年和他一起共組所謂「民主同盟」的份子，如黃炎培，張瀾，羅隆基，梁漱溟，章伯鈞之流，都留在共區裏，充任什麼「副院長」，「部長」，「政協會員」的偽職去了。然則民盟領袖尊重中共意見而起草出來的一部憲法草案，為什麼國民黨倒隨便的採納了，而中共又反拒不接受呢？此中曲折，一言難盡。

原來中共在那時是有計劃的既要分化國民黨，使國民黨政府拋棄根據孫先生遺教所擬訂的五五憲草，而同時留有餘地，使中共自己不對此憲草作任何方式的承諾。據張君勳說，有一天爲了國民大會無形式的問題，各省應否自制省憲法的問題，和立法院對行政院可否投不信任票的問題，他們和國民黨之

間，爭辯得面紅耳赤。張到外面透了空氣回來，坐在後面角裏一個櫃上休息。周恩來却跑近他作耳語，說道，我們對這些問題，不妨對孫科稍稍讓步，否則孫科在國民黨裏的民主份子這把交椅要坐不穩的。第一點，國民大會可採用法國兩院合併開會的形式；第二點，不信任票可用另一方式表現；第三點，省憲法可改稱省自治法。後來，周果然如此發表他的意見。國民黨份子就很高興了。一直如此辯論而又敷衍下去，到四月裏將要把草案議完時，秦邦憲奉命將草案帶到陝北去報告中共的中央委員會，恰巧飛機出事喪了命。中共派了李維漢接替他出席續議，李一開首就來一聲明，說這草案只能作為已經討論過的議事紀錄，不能視為各黨派業已同意的憲法草案。中共蓄意否認而且抵制這一郡張君勳十分賣力遷就而草成的憲法草案，已令人如見肺肝。

可是，國民黨怎樣？當時總統府秘書長吳鼎昌在同年八月裏，有一天突然去訪張君勳，說政府已決定採用「政協」會議的憲法草案，準備提交十一月間召開的制憲國民大會裏去了。依法應先交由立法院正式通過，然後方可作為草案。在當時的老立法院討論時，當然有一場激烈辯論的。某立法委員起謂，「這一草案與五五憲章絕不相同，叫我們如何可以通過？」那時，周恩來的分化技術收了很大的功效，孫科院長為要表現他的自由思想民主氣派，毅然的說：「這個新草案，比我們的舊案好，所以應當通過它！」

政府後來把立法院所通過的新憲草，提交國民大會。當年的制憲國民大會雖有些辯論，也總算一帆風順的通過了。這部中華民國憲法似乎由戴季陶先生（傳賢）恭楷繕就，裝訂成冊，並由每一位國大代表簽名蓋章，致送政府，永遠珍藏，以示鄭重。然而單靠一部憲法畢竟阻遏不住中共奪取政權，盜賣國

家的野心。因為中共是蘇聯用以控制中國大陸奴役中國人民的工具，根本並無尊重憲法的絲毫誠意的。

補救之道的商榷

中華民國憲法公布於三十六年元旦，自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起生效，到四十二年年底已滿六年。根據憲法選舉產生的總統副總統，就職於三十年五月二十日，到四十三年的那一天，也滿了六年的任期，依法必須召集國民大會重行選舉。可是依法國民大會代表每六年須改選一次（第二十八條第一項），而現任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的選舉已滿六年（三十六年十一月廿一日全國辦理第一屆普選的），第二屆國民大會代表，又因大陸尚未光復，今年政府無法辦理全國普選，選民亦無法行使選舉權，勢必不能依期選出。在這種為現實所限的困難局面下，如何圖謀補救之道，乃政府一年來所深思熟慮的問題。

現在，政府已從憲法條文的夾縫中，想出一種救急而不違法的辦法。大致根據憲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的規定：「每屆國民大會代表之任期，至次屆國民大會開會之日為止。」由行政院建議總統，在二屆國大代表未能依法辦理選舉以前，二屆國大代表既未能產生而開會，則首屆代表之任期即可認為尚未終止，自仍為合法的國大代表。何況憲法第二十九條規定國民大會應於每屆總統任滿前九十日集會，則四十二年改選總統副總統的國民大會，極遲應在二月十九日集會。而第一屆國民大會曾於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集會，則四十三年二月十九日以前的集會，似乎尚在六年任期之內，於法並無不合。同時，立法院又通過了行政院咨送的國大代表出缺遞補補充條例，以便將犯罪附共以及行蹤不明限期未報的代表，由候補人依次遞補，使國大開會無不足法定人數之慮。政府尊重憲文的苦心，應為國人所共諒。

不過就我個人愚妄的看法，政府此番格於事實的權宜措置，儘管在憲法的法理上講得通，在各國遇着非常事故時的實例上也有先例可以引證，但為格外表示尊重憲法計，其間似尚應起補一道手續，那便是政府這種解釋，建議，與命令究竟是否符合憲法的解釋問題。如果不經過有權解釋憲法的機關（依憲法第七八條，第七九條，第一七一條第二項及第一七三條，應為司法院），先作正確的解釋，向國民宣告，那麼這些辦法和命令，一經任何人的攻訐，便不免惹起辯論的。我們要尊重憲法，要恪守憲法，必須千萬重視這個憲法解釋權，而不可任意侵越了這一個權限。行政機構固無此權，立法機構亦無此權，惟有司法院召集大法官會議，始握有此項絕對的權力。

今姑舉出兩點，必須先獲得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的明白解釋，方可釋疑竇而杜糾紛：（一）國民大會在每屆總統任滿前九十日的集會，是每屆國民大會經常會議的性質（第二十九條）；此外則另有可以召集臨時會議的條件（第三十條）。現在四十三年二月十九日前召集的大會，似乎應是改選總統副總統的第二屆國民大會經常會議而不當是第一屆國民大會的臨時會議。假使應視為次屆的國民大會經常會議，則第一疑問是該會集會之日，是否即應作為第一屆國大代表任期終止之日（第廿八條第二項），何能再使他們出席開會？若謂此為第一屆國民大會的第二次會議，是否於憲法有所根據？因為憲法似乎只規定每屆國民大會由總統召集一次經常會議（第廿九條），此外都是有特殊性的臨時會議（第三十條），似無所謂某屆大會第二次會議第三次會議的條文。（二）每屆國民大會代表之任期固規定至次屆國民大會開會之日為止（第廿八條第二項），是否即可據以推論次屆國大代表尚未選出之時，本屆國大代表之任期應視為無限延長？何況次屆國民大會開會之日，與次屆國民大會代表之選出，乃兩個不同的事實。第

二十八條第一項明文規定國民大會代表每六年選舉一次，則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辦理第一屆國大代表普選後滿六年之日，政府事實上不能辦選舉，此一問題使憲法此條此項不能付諸實施，不得已而暫由任期尚未終了之本屆代表行使其職權，是否符合條第二項的立法原意？我非常贊成此種苦心補救的辦法，但我爲尊重憲法，以免政府貽人口實計，建議應先趕緊由司法院大法官會議作一明確的解釋。（香港新聞天地三一一期）

選舉創痛談往（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

民主的精神在實行憲政，而行憲的入手方法在舉行普選。必須選舉辦得有條有理，合法合度，方符行憲的形式；尤須鼓起一般選民的興趣，人人重視他所投的一票，而絕不爲威迫利誘所搖動，然後方符行憲精神。故行憲決不只是靠了一部冠冕堂皇的憲法就可交卷，一定要看有沒有一股巨大的動力，在推動這些死板板的條文，而使它們都在全國上下一般人的生活中反映出來。反映憲法精神之處，在各種人的生活方式裏都該隨時隨地可以體會到。譬如人民的言論有無自由，出版有無自由，信仰有無自由，集會結社有無自由，居住、遷徙、通信、工作、營業等有無自由；而萬一他們被剝奪了那一種自由時，他們有無向司法機關申訴權利，擅自剝奪人民自由的負責人有無按法懲治的事實。諸如此類，都可以體驗到這個國家的憲法是否真正在實行。其中，反映憲法精神最顯著的事例，在民主國家看來，就是選舉。

神主牌選民的笑話

但是，說到選舉，也談何容易？清末民初，各省縣要辦選舉時編造選民冊籍的笑話，甚至把人家譜牒上的名字，祠堂裏神主牌上的名字都搬來運用，所謂選民公意還有什麼價值？即如民初第一次開國會時，袁世凱利用進步黨（其份子大都爲保皇黨後身，後來之所謂研究系，亦由此脫胎）來攻擊中國革命

同盟會後身的國民黨；於二年十月當選大總統後，突然解散國民黨，並同時宣告取消國民黨籍的議員，接下去自然就是停止國會行使權。當局既無尊重民意機關的素養，自然不把人民代表放在眼裏。袁世凱之帝制自爲，固不待民國四年秋冬之交，早爲識者所料。後來經過護法之役，南北新舊國會之爭，乃至十二年的曹錕賄選總統，十三年段祺瑞再解散國會，一部翻雲覆雨的政治鬧爭史，把人民弄得頭昏腦脹，對豬仔議員固嗤之以鼻，即對所謂選舉亦聯帶喪失了信心。因此，國民革命軍北伐，原想根據孫中山先生遺教，從頭做起，由軍政而訓政，由訓政而憲政，使中國的人民真正能做到國家的主人，行使他們所應有的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種直接民權。我們國民政府由十五年誓師北伐，十六年竟都南京起，一直到三十八年退出大陸，播遷臺灣爲止，這段期間，如果說確有對不起人民的地方，我看別的倒在其次，而首在訓政時期不能確確實實引導人民行使他們的選舉權（此爲四權之首，如選舉尙談不到，更無論其他三權）。地方自治的基礎既未打好，就想一步登天，跨上憲政的階段，這憲政自然不十分穩固的。

這裏，我絕不是說我們不必行憲政，而恰恰相反的我要提請朝野上下的注愛，實施憲政必須像近年在臺灣所施行的人民直接選舉地方議員官吏，切實入手，方有基礎。過去，在大陸上，一直到民國三十五年，南京、上海兩市和江蘇浙江等省方才辦理省市參議員的直接民選，而市縣地方長官依然由上級任命，更談不到省長主席民選。即臺灣在今天，亦只有縣市長與縣市議員係由直接民選，而省長（主席）亦仍然出於任命。此由行憲的立場言，顯然爲美中不足的。總之，我認爲行憲最合理最穩固的程序，乃由下層切實行起；若是頭重腳輕，只望中央先行憲而地方較緩，不啻爲本末倒置之嫌。我希望我們政府

訓政時期走過的錯路，當已經施行憲政以後，不要再蹈覆轍。

中間也應該行憲

譬如說罷，中華民國憲法第十一章「地方政府」第一一二條和第一一三條，明明規定各省得制定省自治法，而省自治法裏應規定省參議會與省長應由人民選舉。現在臺灣省的各縣市既多已按照憲法，由人民選舉他們的縣市議員和縣長市長了，爲什麼不爲更進一步的示範計，從速推進臺灣省自治法的制定，與省議員省長的同时民選呢？若說在反攻大陸未實現前，一切工作須集中精神於軍事準備，無暇及此；則何以前兩年中，政府能很努力推進各縣市的選舉呢？又何以能排除萬難，召集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準備改選第二屆的總統與副總統呢？既要行憲，就須認真澈底的行，似無「下」可行憲，「上」可行憲，而獨有「中」級的省不使行憲之理。也許有人反駁：「如何你敢說臺灣省沒有完全行憲呢？」我將率直的答覆，國府播遷臺灣至今將滿四年，而臺灣一省的省自治法還沒有制定頒布，臺灣還只有臨時省議會與中央任命的省主席而尚無人民直接選舉的省議會與省長，這是明證。

關於省的一級，應該在適當時期，趕快推行人民直接普選的制度，以證明國民政府確是一個尊重憲法努力實施的政府，其重要性姑俟後述。我且先說國民大會在實行選舉總統副總統時，總統副總統應用什麼方法競選，才更能表現民主憲政的精神，而使中華民國步上正當的憲政大道。

民主國家的進行選舉，不論在地方或中央，其關鍵全在政黨制度之確立。這道理，中國瞭解最早而志切實行的是孫中山先生。同盟會的革命團體，在推翻滿清以後，立刻團結當時政治主張大體相同的其

他各派，合流而組成國民黨；適由立憲保皇黨化身而結合其他小政團組成的進步黨亦繼之出現，中國本有逐漸走上兩黨政治的憲政大道的希望。可惜那時進步黨一部分人，妄想依附袁世凱以握政權，乃為袁氏的解散國民黨作了虎俛。不知國民黨因遭了厄運，進步黨亦未能獨存，終於釀成籌安會的「勸進」與袁世凱的叛國。這是中華民國開國史上最傷心的一頁。我之所以重提此事，意在促起人們注意選舉與政黨之不可分。如果不能善組政黨，同時又不能尊重政黨者，而欲求其善用選舉制度，見其利而無其弊，實無異緣木而求魚。不久的將來，國民大會又將開會選舉總統副總統了，我不知目前栖栖皇皇辦理國民大會的要人們，有否想到怎麼樣建立起真正政黨運用的選舉制度這個大問題？

猶憶三十七年春的國民大會，總統副總統競選這一場面，我至今還覺得大陸上反共戰爭的慘敗，以及國府的被迫而播遷臺灣，都不免種其禍根於那一次的國民大會。我也是國民大會代表之一，或許有不少同人以為我這話說得未免過分；其實說穿了，我亦能言之成理。因為那時我們國民黨自己根本就不想採用「政黨選舉」的制度。一着錯，滿盤失，此後無窮糾紛，由是而起。

李宗仁禍國的經過

國民政府之不能粉碎中共叛變的企圖，尤其不能截擊中共主力於黃淮之間，內在的和外鏢的原因固極複雜，但政府內部文官武將意見的不能融洽。不失為主因之一；而最顯著的一點，不容諱言的是李宗仁副總統為首的一派，千方百計，想利用中共叛變的間隙而掌握中樞的軍政大權。由此一念之差，以致華中的大軍，視徐淮之告急若秦越之不相關。加以後來號稱湖南「家長」之程潛，亦以當年逐鹿副總統

不遂所願之故，而隱懷叛變的心理。大事之敗，遂不可問。不但京滬不守，即原來預期可守之西南半壁，亦如土崩瓦解，不可收拾。痛定思痛，我似乎總覺得由於選舉副總統的一幕，沒有照着憲政常軌，好運用安排之故。

當民國三十七年三月國民大會召集之初，國民黨先召集中央全會，確有不少幹部主張仿照各國通例，總統副總統候選人，應由各政黨各自提名，取決於國民大會的票選，故國民黨就該由中央全會決定兩位候選人的入選。而且，大家自然而然的主張應舉蔣總裁中正為本黨的總統候選人，至於副總統，應與總統政見相同，故宜由總統候選人提名，經全會的決定，方為有效。凡國民黨員，除中央黨部所提的兩位候選人而外，不准許任何人另行向國民大會活動競選。不料其時已有幾派人物在分別活動。且如李宗仁一派，自前年的夏秋之交起，久已躍躍欲試，百計布置；國民黨的中央亦從未有所阻止。他們只為一己之私打算，把國家和政黨都丟在腦後，那裏肯一概取決於黨？但在理論上，無可反對。於是一方面假借「天下為公」之說來阻撓，另一方面用政客遊說的方法，力勸蔣總裁不採取此一途徑。甚至傳說蔣總裁擬提胡適先生出來競選總統，以沖淡候選人由各政黨提名的空氣。其次，他們更揚言，那時競選副總統的國民黨要人已有李宗仁、孫科、程潛、于右任四位，蔣總裁千萬不能表示意見，偏袒一方，只好讓他們在國民大會中去自由競選。於是政黨制度在選舉中失其權力與效用，而國民大會中光怪陸離的競選醜劇，乃一幕一幕的演出了。

競選副總統的候選人，和他們的捧場驍夫，各顯神通，互相奔競，究竟大家化費了多少錢，當然他們不肯公布的。不像英、美兩國，競選費用由各政黨分別公開捐募，每一競選人所支付的款項，最後都

有帳目核算報告。其後李宗仁與孫科爭到白熱化的階段時，不但「賄選」票價傳說紛紜，並且演出一回廣東幫朋友打報館的全武行趣劇。四月十九日先選舉總統，開票時的唱票員，老是唱着「蔣中正」，有時則夾雜着「蔣中正」「居正」，用擴音器廣播到南京全市的大街小巷。原來大家知道總統必屬蔣總裁，並無人有意競選；不過居覺老非常有風趣，他說如果競選總統沒有人來「競」，只讓競選副總統來熱鬧，在外表面上亦並不十分雅觀，他願自告奮勇，作一個註定落選的「陪客」，所以除去極少數的廢票外，二七〇四票中蔣總裁以二四三〇票的大多數當選總統，其餘則奉陪者僅居覺老耳。當「蔣中正居正」連唱時，已經顯示着總統正之誰屬，可謂巧合之至。總統選出後的八九天中，副總統的競選更形熱烈，中樞依然沒有決策。其間一度孫科、于右任發起，四位候選人聯名宣告停止活動，聽候國民黨中央黨部或總裁決定候選人，再由國民大會投票，但為李宗仁所堅拒。二十九日開票結果，李宗仁當選副總統，當唱票時，「李宗仁程潛」之聲，洋洋盈耳。首都市民從收音機中聽到或誤會為「李宗仁贈錢」，亦可算得諧音的笑話。

自五月二十日總統副總統在國民大會宣誓就職後，識者早知李系無時不在策劃如何「扶正」的辦法。一些存心攀龍附鳳的政客軍人，明知中共大敵當前，不以為慮，却認為這是最好利用的機會。中共以軍事奪取政權為目的，而伴唱和談乃其手段，李系却反其道而行之，以和談奪取政權為目的，而虛聲抗共乃其手段。重以政府和戰事棋不定，金圓政策又告失敗，軍事頹勢日甚一日，李系遂以為有機可乘，對徐蚌大會戰，採取袖手旁觀政策，湘鄂大軍按兵不動。而張治中更擅離西北防地，入京鼓吹和談；逼迫蔣總統下野的電文，首由白總司令崇禧轄下的河南省參議會議長劉某，用河南省政府主席張軫的密碼

本拍發出來了。這一場無形「逼宮」的怪劇，實在種因於六年前國民大會中競選副總統的一幕。（香港新聞天地三二二期）

副總統的人選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三日)

彷彿記得中國一位名法學家曾說過一句傷心話：「憲法是不祥之物」。的確，從一方面看，近代許多國家，或人民向國王爭政權，或殖民地向宗主國爭獨立，在他們的憲法誕生這一階段中，多多少少是經過流血的。若就流血而論，憲法誠為不祥之物，但從另一方面看，憲法不但規定了人民政權與政府治權之間的分際，而且更規定了掌握治權的首長如何遞嬗的合法手續。故如果能完全養成尊憲守法的習慣，則流過一次革命的血而獲得憲法，就可永遠免去以後再因爭取政權（實為治權）而繼續流血。那麼憲法也可說是無上祥瑞之物。憲法之祥與不祥，全看舉國上下有無尊憲守法之精神以為判。中南美共和國家從前之所以不能幾及美利堅合衆國者，卽以此故。

至就我們中國而論，這句傷心話倒真不幸而成爲適切的描寫。我從民國元年看見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以後，一直就受着洪憲稱帝與「護國之役」，溥儀復辟與「護法之役」，曹錕賄選與國民革命軍北伐之役……這一連串新聞的襲擊。我全國同胞在此四十年中，也都因爲要維護或抵制中華民國的一部根本法，而繼續不斷的流血。甚至我們可以說日本軍閥之悍然侵略中國，造成我們八年的浴血抗戰，也無非要毀滅我們制憲建國的機會。而中共於抗戰復員後之公然叛變，釀成全國同胞的因大屠殺而大流血，亦直接間接和我們的制憲歷史有關（詳見第三節）。我們今天在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正將開會的前夕

，如果請代表諸君誠心誠意捧誦這部一百七十五條的中華民國憲法，真不知涕泗之何從了。

副總統三個最基本條件

在這個舉國重視憲法的期間（如不重視憲法，那便決不會於此時開國民大會），我倒要請大家留心憲法上的副總統問題。副總統的地位，正是備而不用，雖不用而又不可不備的地位。我且打個譬喻，他有些彷彿近乎君主國家的太子地位。從前有人稱太子爲「儲貳」或「儲副」的，這表示他祇是一個「待」在旁邊的「副手」而已。民初，黎元洪的秘書饒漢祥，以善擬駢四騷六的文電，名噪一時，某次竟在電報中引用了「儲貳」的典故，成爲笑柄。其實，在政治制度的作用上看來，倒並沒有多大分別；不過產生的方法迥不相同而已。惟其如此，副總統的人選，第一是要「必賢」，第二是要「能待」，第三是要「顯副」。民主「傳賢」之所以異於君主「傳子」，其理由就在傳子之不一定是賢。假使學民主，行民主，而選舉一個不合「賢」的條件的人做副總統，那麼將來他如果有機會做起總統來，豈不害人民，禍國家？尤其在我們制度規定須有一個負責的行政院長之後，國家的元首更須重「賢」，而不重「能」。這並不是說不必有才能；不過才能在其次，而賢德爲首要。古人謂「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惟有「賢者」而後能用「能者」。如果只問是專家，不問其他，則專家也許在某一專門方面是能者，而未必即是賢者。選舉總統，固須特別選舉賢者，選舉副總統亦必以此爲主要鵠的。因爲說不定，他也有坐總統寶座的機會的。

第二、所以必須注意到那「能待」的品性者，因爲如果副總統是一位不肯安心坐待，大有不甘寂寞

之概的一流人物，他一旦得了這個位置，就必然的在秘密籌劃，如何早日奪取那至高無上的寶座。從前專制王朝，有些急於想登大寶的太子或權臣，尚且有弑父弑君的把戲演出來。何況民主國家？他自以為人人生而平等，你可做得，我為什麼不能做？野心遂油然而生。天下事，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給他一個名器，必定要這個人懂得此名器的「分際」，不在其權限分際之外打主意，出花樣，然後國家政制才可以上軌道。否則設一個副總統，而等於在總統之旁，放着一位天天覬覦總統寶座的人物，你想，這政局還能安定嗎？

第三、我們必須要訪求一種人，除了有賢德有等待耐性之外，更有只願屈居副手，不肯自命老大的宏寬胸襟。惟有具備此種胸襟的人，虛心容物，善與人同，並不藉事表功，好出風頭，然後其本人雖似無藉藉之名，而因其謙懷，必受嘉言。於是總統耳目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周者，得此副座以為輔佐，集衆思，詢國謀，不但遇事陳述，可以溝通各方的意見，而且條陳策劃，大可供總統決策的參考。若自己還坐在副貳的地位，而早已不可一世，隱然以將來的大統正位自命，則發於中，形於外，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其遺害於國家自將不可勝言。

三項基本條件具備，然後可論其他。外傳蔣總統曾對此次副總統人選似有所指示：（一）不可與總統屬同一省籍，（二）不可與總統同為軍人，（三）年齡須較總統為小。此在蔣總統大公無私，並為力求文治計，固為光明偉大的指示。但管窺愚見，則除第三項外，其餘兩項似非必要。古人對於大公無私的精神，曾有兩句最好的話來形容，便是「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求賢的至高無上的條件，便是「賢」。果真是賢者，異省籍可，同省籍亦可。果真是賢者，非軍人可，是軍人亦可。而且，總統與副

總統都是民選的職位，當選了的，則總統為國家的大元帥，並不必親自帶兵上陣，副總統自更無須從事於此。那麼即使從前為軍人，一經提名為候選人，儘可卸去解除現役軍職，不再過問軍務，也就無異回復其文人地位了。此觀乎艾森豪威前年歐洲回美競選總統時的作風，即可知以美國如此嚴防軍人干政的制度之下，尚可以解職的軍人來膺選，遑論其他？故今日中國選舉副總統的問題，不在是否軍人，亦不在屬何省籍，而在能否以大公無私的精神提名賢者為候選人。

試為選舉制度描一輪廓

還有更重要的是總統副總統的選舉制度。我在本文第五節裏已說明，欲補偏救弊，懲前毖後，必須乘此次國大開會，改選總統副總統之際，確立由政黨各推候選人而取決於國大代表投票的制度。我且憑個人臆想所及，約略描述此一制度的輪廓如下：

(一) 由國民大會自行規定一天，為選舉總統副總統的投票日期。

(二) 在規定那一天之前，至少十天，由國家業已承認的公開政黨，各自推定該黨的總統候選人與副總統候選人，構成整個單位的競選票（意即總統候選人與副總統候選人連在一起，不能分開），通知國大秘書處。

(三) 凡無所屬黨派的公民或代表，如競選總統副總統者，亦須至少在國民大會投票日的十天以前，各自組織，合成所謂「社會賢達」亦即是「獨立黨派」的總統候選人副總統候選人的選票，通知國大秘書處。

(四) 然後由國民大會秘書處，奉主席團之命，將在限期前所收到各政黨及獨立黨派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名單，連同略歷，在會場顯著的地方公布；同時，將各黨派的候選人名單，彙總起來，合印成一聯選舉票。其格式可略如左：

黨派		甲黨	乙黨	丙黨	獨立黨派
候選人	總統候選人	○○○	○○○	○○○	○○○
	副總統候選人	○○○	○○○	○○○	○○○
選舉人圈選					

號 1 ○ ○ ○

【註】(一) 選舉人用無記名投票法，就各黨派之總統副總統候選人名單中，自行選擇，決定選舉何黨所推候選人名單時，即在本票最後縱行空白中，對準所選定黨派之橫欄，圈一大圓圈如○，即為完畢手續，自行投入票櫃。

(二) 如在兩橫欄或更多橫欄中圈大圓圈，或根本不圈時，本票即作廢票。

(五) 開票結果，以何黨派候選人之橫欄得圈超過出席代表二分之一，即得票過半數時，為當選總統與副總統。

(六) 如開票無超過半數之選票時，由國民大會另定次日，再就得票較多之兩黨候選人，舉行決選。其選舉票，即可用原印之選舉票，將得票較少之黨派候選人欄數劃去，以省重印手續。

由上述選舉方法，其長處有四：（甲）總統與副總統之候選人既先由黨派自行推定，必屬同一政見者。（乙）副總統之選舉成爲追隨總統之選舉，其成敗繫於總統之人望與政策，故在黨派自行推定副總統候選人時，勢必以尊重總統候選人之意見而定取捨，不致自相水火。（丙）可使政見集中，政黨力量亦集中，逐漸使中國走上兩大政黨之民主政制大道。因爲較小黨派感覺競選力量較弱，勢必漸漸合併而組成另一大黨。（丁）不致如法國一樣，有長期不能選出總統的流弊。（法國此次改選總統，投票十多次，延長一星期之久，可謂笑話。）

民主教育最重要一課

這一制度最重要的意義，是要鼓勵政黨的競選，而不是鼓勵個人的爭奪。惟其如此，所爭者在政策，在政見，而決不是個人的意氣。因爲此種競選方法的勝敗，乃黨的勝敗而非個人的勝敗，故成功者與失敗者個人之間，亦絕無恩怨可計。至就競選方法而論，則在投票前的十天（或十五天）之間，各政黨儘可由其該黨候選人或該黨其他政治家，在國民大會內外，作關於政策政見的公開演講，廣播，以爭取民心的向往。會外廣大民衆的反應，和輿論的趨向，也可影響到國民大會代表的意見。經過這十天左右的熱烈競選運動，大可在社會上造成一種重視選舉的正當風氣，確是當前萬分需要的民主式的民衆政治教育。如果國家在如此艱難困苦的情況下，花費了偌大的一筆經費，好不容易召集一次國民大會，而能够把握機會，給民衆以廣泛適切的政治教育，可算經費並不白花。否則只讓代表們辛苦集合，關起門來投一張票，而社會上除了飯館，旅館，戲院等等生意好了一陣之外，別無影響，似未免太可惜了。關於

競選經費，更應由各黨派各自籌集，並且須規定有所限制。即每一黨派（兩候選人合計）所使用於競選的費用，不得超過若干，其捐助來源與支出，均須經過會計師的公正局核，向社會公佈，以昭大信，我個人涇涇之愚，以為唯有這樣學習邁進，吾中國始可真正走上民主政治的大道。

書至此，有稔友笑問，你為什麼不討論總統的選舉問題，而祇論副總統？我說，上述所擬的態度，是一般的，不分總統與副總統的。至我所以有特別提及副總統者，一因蔣總統領導反共，全國共仰，連選連任，天與人歸，絕無置疑的餘地。二因過去選李宗仁為副總統的一幕，太使國家受到大害，大家不能不懷着可一而不可再的戒心，鄭重討論，應非多餘。（香港新聞天地三一三期）

李宗仁這個人（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日）

「王莽謙恭下士時」

說起中國副總統的選舉，令我不能不想到李宗仁副總統得瞞望蜀的一幕滑稽劇。李宗仁這位將軍，驟看起來固是行伍出身的粗線條人物。但就北伐以來所謂桂系人物而論，則隱然爲其領袖。據若干曾經和他接近過的朋友說來，他似乎還能够懂得禮賢下士的一套，對於僚屬也多少能做到幾分推心置腹，因此向獲時流的好評。尤其在桂系人物似乎不甚得志於中央的時候，他們幾位桂系人物，在廣西本省勵精圖治，吸引了當時若干自命清流的騷人墨客，奔附門下。大學校，戲劇院，藝術館……應有盡有，彷彿有所謂新政的點綴。譬如，馬君武，歐陽予倩，徐悲鴻……一流人物，都曾爲廣西的「文化建設」盡過力。假使李宗仁當選副總統以後，不存心演此一連串的醜劇，則縱然桂系前曾幾次三番向中央搗過亂，而大敵當前，能够更加團結，未始不可做到「兄弟鬩牆，外禦其侮」的地步。可惜這位貌似忠厚長者而野心特大的宗仁李將軍，竟爲少數左右所誤。

我和李宗仁將軍，原來並不怎麼相熟。偶爾在國民黨中央黨部開全會時遇到，或者點頭招呼而已。却是在抗戰初期，我曾有一度和他在前線相見的機會。二十七年戊寅，夏初我在漢口，適中樞有組織各界代表前線勞軍團之舉，分幾路出發。我也奉命參加，並被推主持前往豫魯邊境戰區的一路。此爲第五戰區，司令長官就是李將軍。他的司令部設在豫東潢川。那時在六月初，連日大雨。我們一行人，先於

黑夜由武昌坐火車駛蓬車出發，到平漢南段豫境某站，次日再換卡車和破舊小汽車，帶了許多慰勞物品及錦旗之類，沿着泥濘顛簸的路，趕往潢川。我還彷彿記得到了夜間一點多鐘才勉強趕到。那地方橫隔着一條大河，當然就是潢川。因為軍情吃緊，深更半夜，城門竟然叫不開。我們只好紛紛下車，就近找到了小客棧，胡亂休息一回。明天一清早，就大夥兒進城訪李將軍。

當時李將軍和他的參謀長徐燕謀將軍，張專員任民，都和我們勞軍團一夥人談得很有勁兒。李將軍雖然滿面風塵，可是精神奕奕，頗有生氣，對抗戰軍事也深具信心。時值青徐會戰，台兒莊大捷之後，日寇迂迴渡黃河，窺蘭封，隴海路既被割斷，芒陽一帶，勢受環攻，李將軍獨當方面，運籌決策，衝出重圍，扼守潢川，已有五個月之久了。依當時趨勢看，日寇必以會師武漢爲其第二期侵略進兵的目的，潢川正是我方拖延戰略中的前哨陣地。李將軍任務之重，可以想見。我在握別後，記得曾經亂塗了一首五古，託徐、張兩君轉贈李將軍，中有句云：「于時公奉命，徐海作元戎。貔貅三十萬，攻守聽指蹤。一戰克淮上，殺敵挫其鋒。再戰捷魯南，殲滅奏虜功。……會看武勝關，決戰奮孤忠。一朝寇勢潰，追奔似逐風。……諸將揚我武，爲授錦旗紅。臨風一招展，獵獵壯軍容。昔年欽威武，杯酒今相從。溫良信長者，談笑盡肺腑。……歐戰馮恩河，潢川得毋同？勒銘敢握管，雲台圖南宮。」詞雖不文，但確是當時的寫實，和國人對於李將軍的期望。不料會幾何時，而李將軍由軍而政，却爲若干宵小所誤，不但爭着做了副總統，却還要利用共匪叛國的機會，進而硬要做總統。一念之差。誤已誤國。一生英名，付之流水。怎不叫人替他惋惜呢！

總統引退一段經過

就選副總統這一舉，爲李將軍計，本來可以不必。不過人各有志，李將軍在北平獨當方面，或者受了什麼人的有意鼓勵，發此野心，騎虎難下，勢在必得，猶可說也。最不可解的，爲什麼既做了副總統，還要一嘗總統的滋味？說者謂他之所以不顧一切搶副總統做，爲的就是想一步而躡登總統大位，或者也非過分的誅心之論吧。

民國三十七年五月二十日第一屆總統副總統就職後，共匪叛國的情勢愈演愈烈，不但關外幾已盡非我有，山東河南的軍事形勢亦在急劇惡化之中。但如我政府內部，文武百官，同心協力，軍民團結，一致抗共，則調兵堅守江淮，譬與陣地共存亡，大局未始不可挽回，江南半壁，或西南殘局，或猶可保全。可是正在部署徐淮會戰之際，除了金圓政策的局部施行，終於失敗，給民心一大打擊之外，忽然傳來華中部隊不肯奉調增援津浦南段的風謠，而河南、湖北、湖南三省當局甚至有向中樞要求對共停戰的秘密表示，取瑟而歌，當在逼迫蔣總統「下野」。於是人心浮動，更皇皇不可終日。

那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我忽奉召借新聞報社長程滄波兄立即由滬赴京。我已有預感，恐有重大事件發生。其時爲說公司改組後的申報社長已歷兩年有半，謬膺上海市參議會議長亦已一年有半，默念國家多故，來日大難，昔年誼兼師友的陳布雷先生又已長眠月餘，自願一介書生，有何長策，可補時艱？在火車中輾轉終夜，不能成寐。次晨（三十）一到，就去訪中央宣傳部陶副部長希聖，探詢何事。陶先生亦只說有事商酌，就替我們約定了時間，陪同進謁總統。當總統接見我們時，神色雖甚安詳，但願見有

重大心事。他說，他準備發表一篇新年文告，意欲表示倦勤，徵詢我們的意見，並問上海民情如何。我們雖明知外面已有許多傳說，却又不便問那些來自華中的電報真相如何。當時滄波兄怎麼回答，我記不清楚了；惟我自己則堅稱當此國本動搖，危疑震撼之時，總統萬不能遽萌退志。總統爲國家的公職，由國大代表人民選舉而來，決非一個私人的進退所可比擬。總統雖因力求國內和平，干戈早息，爲表示心跡計，不願因一人之故而阻碍和平，至多亦只能說到但求大局有益，而個人的進退，悉聽國民的公意，却千萬不可提及下野或退休等字樣。蔣總統似頗探及獨堯，當時對陶先生說，就這樣說好了。辭出之後，陶先生回去斟酌文告稿件，我們就趕緊搭車回滬，準備明天看南京來的中央社電報。果然，總統新年文告在除夕發表了，透露一些服從國民公意的口氣，却沒有肯定說到他要下野。我心雖覺稍慰，但總感到時局氣象不佳，意外的大事似乎還要發生。

再過半個多月，我又奉命邀約了上海市實業界文化教育界人士約七八人，於卅八年一月二十日入京，進謁總統，有所陳述。（上海益世報社長范爭波兄也是其中的一人。）我們都乘夜車前往，翌晨到京，先往中山路交通銀行分行二樓客室小作休息，一面並和交際科侍從武官通電話，當約定下午二時赴軍官學校內總統官邸進謁。不料未及一小時，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處送來通告，定即日下午二時在總裁官邸召開中央常務委員會和政治委員會的臨時聯席會議。我不知道有什麼要事討論。但二時與三時之間，又恐會議未必能了。因與同行諸友相約，飯後我先前往出席會議，請他們於三時前逕往官邸會客室相候，我屆時亦即過去同謁總統。

那天，我在下午一點三刻左右，就趕到總統官邸。當走進大會議廳時，中央委員到的已經不少，大

家站着三三兩兩的閒談。中央放了一張很長的會議桌，很像大請客一般，兩旁排列着前後四行座椅，可見準備出席的人數較多於平時。左右兩端各放置一把大椅。我看這場面，空氣非常嚴肅，有些異感，因就近向吳委員忠信請教：今天將討論什麼事？吳禮老說，你還不知道嗎？總統要帶動啊！我驚異地說，這那裏隨便使得？禮老苦笑道：他們逼着要這個位置，有什麼辦法？那時，我恰巧看見李副總統已經跨進了會議廳，自然大有所悟。原來禮老是那一段期間奔走調停的人啊。

「引退」字樣的爭執

一忽兒，蔣總統也走進會議廳來，大家肅然無聲。他老人家笑着，和大家點頭招呼後，就坐在近門的左端一張大椅裏。李副總統，不必說，自然坐在右端的席次。各中委也就紛紛散坐在兩旁的四排椅子上，還剩有零星的幾個位置。我隨便一坐，就坐在外面最靠近右端的末座上，李副總統恰成了我的轉角「芳鄰」。會議方開始，秘書人員就分發了二件印刷品，一看乃是蔣總統和李副總統準備發表的文告。先由秘書朗讀一遍，然後總統發言。那時總統是以中國國民黨總裁的身份，做聯席會議的主席的。他的大意，無非國家需要和平，個人心力交瘁，亟需休息，公務交由李副總統代理，把文告中的意思複述一遍。繼請李副總統發言，李當然謙遜一番，並望大家協力相助。蔣總統乃問各位有無意見。好像幾位老前輩都沒有說話。靜了一陣後，記得似乎谷正綱、張道藩兩委員表示過總統此時倦勤，關係國家前途至鉅，應該鄭重考慮，勿遽作此決定。但總統似已胸有成竹。

我一面聽，一面研讀那兩篇文告，發覺詞句間有不妥，骨鯁在喉，不能不吐。因請得主席許可，起

而發言。我說，總統是國家的公職，由人民所選舉，按照憲法，除了宣誓就職或被國民大會罷免而外，並無辭職退休的規定。文告中所用的「引退」字樣，可能被人誤會辭職，實於憲法無據，總統如果畢竟要暫爲休息，至多亦祇能引用憲法第四十九條第二項，總統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總統代行其職權，此與引退或下野之意絕不相同。故兩篇文告中所有引退及類似之字句應予刪除，以杜歧義的糾紛。我說完了之後，于佑任老先生亦頗以爲然。

總統聽了我的陳述，連說是的，應予修正，並再問他人有何意見。衆亦俱無異議。總統乃指定于右任、吳忠信、邵力子三委員和我即席商酌修改文字，作爲定稿，交由宣傳部通知中央社發表，同時他也就宣告散會。我們這幾個人，就在會議桌上共商，將認爲「引退」等不妥字句刪去，只根據憲法第四十九條第二項文字，說明副總統在總統因故不能視事的期間代行職權。稿既修正，卽由宣傳部取去發表。

那時已三點多鐘，我急忙走過隔壁總統官邸的會客室去，一進門就見侍從人員非常匆忙，他們說總統馬上要到飛機場去。我見了上海來的幾位朋友後，就告訴他們，此一回我們見總統時少談爲是，他就要離京了。須臾，總統進會客室，仍和大家點頭問好。大家的心緒都非常沉重，千言萬語，竟不知從何說起。其中有一位題直的朋友帶着哽咽的聲音說道：「願總統千萬爲國珍重！總統今天當可以看懂了某些人的忠奸賢佞了。請從頭幹起，國事仍有可爲」。總統也就笑着和大家點頭道別。我們就在他的官邸門口，黯然神傷地看他上車，沒有再往飛機場恭送。

我等一行回到交通銀行，我就打長途電話給上海申報館編輯部，說總統今晚文告中，並無引退等字樣，故大標題中千萬不可有下野引退等字，並望轉告各報館，搭夜車回上海，心情非常不安，次晨到了

北站，買申報一看，引退字樣赫然在目，大為駭然，疑必有誤。豈知再取新聞報一看，亦復如此。於是一到家裏，就與申報秘書何西亞兄通電話，問他何以如是？他也不明白，經轉問編輯部，始知昨晚中央社原先發電，文告中確無引退字樣，但後半夜南京中央社忽又來電更正，要上海分社加入原經刪去的字句，於是引退等字重又躍然於紙上。我聽了，知道南京必有過一番爭執經過。乃即到申報館，電訪中央社和申報南京辦事處探聽內幕，其事情有大出意外者。

李宗仁大發脾氣

原來我們幾個人在會議廳修改文告，奉命交中央社發表後，李副總統一散會，就同官邸發脾氣，叫人通知吳禮老，說如果發表文告不照原稿文字而刪去引退字樣，他明天（二十日）就到總統府辦公。換句話說，就是不肯代負職責。吳禮老急了，就和幾位要人商量，起初還想勸李副總統說，這是聯席會議決定的，當時你爲什麼不說？反正你是代行職務，何必爭此文字？但李一意孤行，非爭不可，大家被迫得沒有法兒，聽說後來還是由張岳軍先生用長途電話向已飛杭州的蔣總統請示，婉陳情勢，爲避免弄成僵局計，姑且只有答應李副總統，可照原文發表。於是一場文字爭執，作一結束。（上述消息是否全確，不得而知，不過據南京當時的報告是如此的。在我雖然白費唇舌，但李副總統之必欲如此，其意圖「久假不歸」之心，當已路人皆知的了。

聽說第二天李副總統到總統府辦公發布告時，爲了一個「代」字也曾引起過一番爭執。他老先生連那個勞什子的「代」字也不要，很討厭它。後來還是文書局裏辦老公事的秘書先生們以期以爲不可，他

沒奈何，也只好先「代」一下再說。不過「副」也好，「代」也好，他既然暫時坐上了代行總統職務的寶座，處心積慮，如願以償了，爲什麼又要在國家危急，大陸撤兵之時，不顧一切而突然飛美呢？飛美就醫，猶可說也；爲什麼經國大代表，立、監委員，及中央黨部的連電敦促返國視事，而置之不理，却又反對蔣總統三十九年三月一日的復行視事呢？患得患失，膽笑中外，至矣盡矣！（香港新聞天地三一期）

說起毛邦初案（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當李宗仁於三十九年春初，在紐約布朗市他的「行宮」裏招待外國記者，宣布反對蔣總統那年三月一日復行視事時，我還在加拿大西部的雲高華城參觀文教事業。聽到這種傳說以後，我非常憤慨，就情不自禁的寫了一封長信，勸他切勿作這種「爲親者痛，爲仇者快」的蠢事，並且應該自念此後雖未代行總統職務，仍然爲國家的副總統，實該愛護國家的名器，珍惜自己的歷史，趕快回返臺灣，協贊反共抗俄的大業。我雖然明知李氏於我，毫無交情可言，癡直的話也未必能打動他的心弦，但爲了大義所在，作爲他是一位能受盡言的善人，決計把這封信寄到紐約友人賴景瑚（璉）兄處，託他代爲探明他的「行宮」地址，郵寄了去。同時，把這信稿贈寄臺北中央日報和幾個地方的華僑報紙發表，希望引起輿論界的共同督促。可是結果等於石沉大海，杳無音信。

由於李宗仁的決心在外國關門做他的「代總統」，他的自己踴躍的行動竟然層出不窮。在最近一次他又在紐約「行宮」裏發表他一月三日致蔣總統的信件，反對國大開會改選總統以前，最爲海外僑胞所深惡痛絕的，莫過於他於四十年秋與四十一年春之間，在紐約「行官」裏用我們中華民國總統的信箋，居然親下「手諭」，替貪官毛邦初撐腰，叫毛邦初拒絕國民政府的命令，不必將經手公款移交，並責成他「盡職保管」這一幕醜劇。

我對毛邦初的印象

提起毛邦初，「此馬來頭大」。以他在中國空軍的歷史來論，自然是老資格。他從黃埔軍官學校畢業以後，又赴蘇聯空軍學校受訓畢業。抗戰期間，一直供職於空軍，陞至空軍副總司令。後又奉命派到美國，作為空軍司令部的代表，負責採辦空軍器材。中樞對他信任非常，所以後來中國派駐聯合國的軍事代表團團長一職，也由他來兼任。身兼數要職，經管國家購料公款，數年來其數額當亦驚人。我由加拿大來紐約後，就有人講到他在美國社會上的種種行動。炙手可熱，當然為一時的紅人。

我遇見毛邦初，似乎三十九年多在紐約的「蒂邦」摩天大樓六十多層上的中國派駐聯合國代表團辦公處，彼此相見握手還是第一次，儀表很魁梧，談吐也響亮。單就外貌來看，軍事而兼外交的人才，像他那樣，雖非第一流的上選，也不失為中驕之材。如果不是他自暴自棄，當不致有今天的下場。那天我和他的會見，在座有很多人。原來那時正是韓戰已經打了將近半年，中共方欲參戰的前後。中國常駐聯合國的首席代表蔣廷黻博士，為集思廣益起見，想發起邀集若干關心國事的旅美友好，有一種非正式的定期談話，以便彼此交換意見，提供研討。那一次就是第一遭，時間在晚上九時，故辦公廳早已闐然無人。我到的時候，蔣代表而外，毛邦初也已先在了。後來談話的有胡適之，謝次彰（壽康），賴景瑞，楊西崑等九位先生。彷彿記得當時除了蔣代表以主人地位，說明他邀約談話的用意而外，適之先生發表意見較多。大致不外韓戰既啓，中共勢必參加，遠東戰火，一時不易熄滅。我們反攻大陸的時機，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只要大家耐心準備，不怕中共不替我們造機會。我聽了，自然好像吃了一顆定心丸，

有「怡然自得」之感。毛邦初那時並不怎麼多說話，若有什麼心事一般。大家散了以後，蔣代表從來沒有召集過第二次談話，我也再沒有見到毛邦初的巧遇了。

不久，毛邦初曾奉命回臺述職，第二年（四十年）的春天聽說他仍由臺北回美，外間初傳他要調職的消息也就煙消雲散。其時，我曾經應紐約華僑國民黨老同志余讚棠先生之約，幫助他接辦紐約新報，改組光華日報。數月之後，因精力不足而辭職。余君勉強維持，終以收支不敷而出盤。國民黨同志友好若干人。深以為可惜，乃臨時東拼西湊，並得僑團領袖之助，用分期付款方法將光華日報承盤下來，改組為華美日報以至於今。初時，董事會公推賴景湖先生任總經理，項定榮兄為副總經理兼營業部經理，陳裕清兄暫兼總編輯，而強囑我擔任主筆，負撰述社論之責。我們既然站在報人地位，自對有關祖國的新聞非常關切。可是，那時候自由中國的國際地位，還沒有像今天一般的光彩，西報上很難看到有關臺灣動態的記載；甚至我代表諸公在聯合國裏的發言，也被他們視為無足輕重，絕少有片語隻字的披露。不料在那年夏天，國民政府發覺毛邦初經營購料公款，有不盡不實的情事，令他移交帳款，他不但拒不交出，反而散播流言，說這是他和當時空軍總司令周至柔將軍意見抵牾的結果，不是他有虧職守，好讓那些不明真相的人，把這件事看作政爭而不是整肅官常。等到政府於八月廿一日下令停止毛邦初的職務，並責成他返國時，他更加一不作，二不休，弄通了一兩個外國記者，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他片面的談話，窮形盡相，詆毀國民政府，其不肯交待帳目違令返國，自更不在話下。可是那時候我們政府駐美的代表機構，對毛邦初案並無片紙隻字的說明，致令祇讀西報的人，還誤信毛邦初為「反獨裁的民主自由人士」，豈非可怪？我在華美日報上，就不客氣的痛加指斥。毛樹清兄主筆的民氣日報也大聲疾呼，要求

政府嚴辦貪官。而當時中華公所主席陳中海君（國民大會旅美華僑代表之一），亦急電中樞，主張撤職查辦。他們都認為國家有貪官固然恥辱，但有貪官而不辦，坐令逍遙法外，更是恥辱之尤。這種正義的呼聲，畢竟收了效果。國府終於同年十月初，派司法行政部次長查良鑑先生來美，協助顧維鈞大使處理此丟盡國家體面的毛邦初案。同來者，尚有周宏濤，夏公權，劉炯光，石兆儒諸君。查次長到紐約後，即由總領事張平羣先生，約僑團領袖及僑報記者茶敘於南園酒家，聆取處理毛案的方針。

謠言滿天飛

當時，我親聽到查次長報告，他此來只是奉令協助顧大使，故只有根據法律及一切有關文件的實際材料，研究進行方法，提供意見，以便顧大使的取決。於是有些人竟無端懷疑政府大員來美或許是遊說毛邦初，藉圖息事寧人的；甚至還有人造謠，說政府派人來和毛邦初講條件的。可想而知，毛邦初其時有的是所扣的公款，爲他奔走的更有向惟萱之類，「錢可通神」，難怪謠言滿天飛了。但是，查先生和其同來的諸君，一切置之不顧，只是埋頭做他們分內的整理文件，和研討法律的工作。核算帳目，聘請律師，提供證據，研究步驟，都一步走錯不得。二年半後，查次長回國復命所以能有昭著的成績者，得力於實事求是的苦幹，而決非徒託空言者所可以望其項背。

毛邦初當查次長等到美時，派他的助手向惟萱四出活動，想利用美國的言論自由，運動幾個文人，替他張目，而他自己則除了偷天換日，化整爲零，把國家的公帑，盡用私人名義，分散存放若干外國銀行（聽說最多的是瑞士銀行），以圖掩飾耳目外，更搦出了一塊反對獨裁反對貪污的招牌，反罵政府長

官的失德，一若振振有詞，倒只有他是一個清白的官吏。他更透過李宗仁左右的關係，不知道變了什麼戲法，居然弄到了一紙李宗仁親筆簽署的手諭，令他拒不交款。等到查次長延請律師，正式向美國法院對毛邦初起控訴時，他就拿出李宗仁的手諭來做擋箭牌，硬說他只服從「代總統」的命令，指國府代表無權控訴。李氏這套把戲，騰笑中外則有之，却並不能作為毛邦初的護身符。從此，旅美的十幾萬華僑，更加瞧不起李宗仁了。所以毛樹清兄評論他自甘墮落，一點兒也不錯。

查良鑑次長，是中國司法界的健者。他畢業於東吳大學法學院後，留美深造，於民國廿年得密歇根大學法學博士學位。中國深通英美法的學者中，查次長要算一位辦事不苟，廉潔自守的人才。抗戰期間，他任重慶實驗地方法院院時，我已頗聞其名。及勝利復員而後，他調任上海地方法院院長，有聲於時，我因為擔任上海市參議會職務的關係。彼此接觸的機會較多，更深知他確是一位出污泥而不染的君子。我在參議會中，也常常發些尊重法治的老生常談，其實並無新奇的議論，却不料在當時萬分混濁的空氣中，謬承查先生許為不可多得的救時良藥。他奉命來美查辦毛案之初，我一聽見這消息，就非常興奮，感覺得這件事一定會辦出好結果來的。我到他的紐約客寓裏去拜訪他，並慰唁他夫人的病逝。原來他們賢伉儷在上海時就早給我二張扇面，要內子冠玉替他們繪畫，並要我塗字。不料兵荒馬亂。一擱經年，彼此分別，書畫的債迄未償還，實在對不起他們了。他當時對我說，誦轉告僑胞們放心，我一定替國家盡心竭力，辦真公事的。

這兩年中，查次長往來美京，紐約，與墨京之間，案牘勞形，可想而知，我們敘晤的機會自也很少。直到本年一月十八日，紐約中華公所任南園酒家舉行歡送茶會，我始又躬逢其盛，碰見了他，飽聆他

一番詳盡的辦案報告。他的安詳的態度，語重心長的誠意，使在座的四十多位僑團領袖和報社記者，都感到非常高興，而且頗望他能於復命述職之後，如果沒有別的更重要的任務，還是重來美、墨，辦結這一件中外注目的懸案。

查良鑑對僑胞的報告

毛邦初案的真相，據查次長的報告，經過情形大略如下：

查次長說：在兩三年前，因為國府播遷臺灣，國際形勢惡劣，毛邦初就想乘火打劫，混水摸魚。他經管購買空軍器材的事，公款經他的手，數年間不下三四千萬美元，可是他於國府戎馬倉皇之際，竟然延不報帳。據政府有案可查者，他把持不交的款項，當有七百萬美元之譜。毛邦初既化公為私，分存幾家外國銀行之後，對政府催交的函電，總是覆電搪塞，一味拖延。政府初因大局險惡，不願再有壞的消息給大家增添愁悶，只指望毛的良心發現，自動交款，詎知他愈弄愈不成話。

當四十年（一九五二）五月間，政府組設購料委員會，統辦在美購料工作，命令三軍駐美辦事處移交帳冊款項，陸軍海軍都遵辦了；惟有空軍方面，毛獨抗令如故。政府乃於八月間下令停他的職，並責成他返國。毛仍置之不理，反而大造謠言，散放烟幕。查次長一行人，就在這種惡劣空氣之下，奉命到美國來，從事法律解決。

政府代表向美國法路控訴毛邦初的理由，認為他犯有：（一）侵佔，（二）背信，（三）竊盜等三宗罪名。毛邦初雖信口胡吹，想假借別的名義來強辯，可是美國法院拒不採納，首先依法判決兩點：（

甲)凍結毛邦初名義的私人存款，(乙)查封毛邦初經營的帳册卷宗。毛邦初一看勢頭不對，他的律師也認爲無可挽救，於是他只有改名換姓，化裝潛逃的一法。他終於由美國西南部逃入墨西哥國境。可是我們政府，退守臺灣之後，確已有新的作風，一旦發覺有貪污案件，一定究辦到底。毛邦初縱使逃到天涯海角，查次長代表我們的政府還是跟踪追辦。此在查次長自己，也認爲是中國復興的新精神。

查次長到墨京後，即代表中國政府，延聘著名律師，向墨國政府交涉引渡。墨政府果然在三、五天將化名王杲納斯的毛邦初逮捕下獄。當被捕時，他還住在墨京郊外一所豪華別墅內，過他醇酒婦人，逍遙法外，紙醉金迷的享樂生活。但以我政府的堅決，墨國的協助，毛邦初到底難逃法網。一直到現在，他已坐監十七個月了。外傳他私自外出，甚至說要潛逃到香港或南美去，都非事實。現在，他仍在獄中，最近並做了獄中「花匠」的領班。貪官如此下場，無論如何，可以作爲炯戒。

當然，我們政府希望從早能將毛邦初辦到引渡，歸國法辦。但引渡是一件有關外交的法律問題，手續複雜，爭執亦多，是否能順利辦成。須得看雙方當事國家間的外交關係與條約法律等情況而定，不是片言所能決。即以美、墨兩鄰邦而論，美國向墨國要求引渡人犯的案件，歷年都有，可是真能辦到引渡的人也就不多。所以毛邦初將來能否辦成引渡返國，要等我們的繼續努力交涉。即使引渡了以後，我們政府將仍然依照法律，審訊此一案件，決不會令毛邦初受法外之罰，如果他有應得的罪，一定是於法有據的。

還有一點，除毛邦初本人的引渡須向墨國交涉外，在美國則須追繳毛邦初侵佔的公款和竊盜的帳册單據。美國是法治國家，一切訴訟，按部就班的進行，層次手續，異常繁複。毛邦初用鉅金聘了律師，

初則進行上訴，先後經上訴法院和最高法院駁斥。追款一層，大約有五百萬元存儲銀行尚未動支，或經毛邦初撥借給部屬朋友的，有的業已追還，有的則已凍結。查帳一節，却因毛邦初拒不交出帳冊，只好憑着國內帶來的帳冊，由美國法院指派審計員，逐筆審核鑒定，整理就緒，再行呈送法院積極清查。目前尚未結案的幾宗存款，牽涉六家銀行，而所屬四州的法律又各不相同，進行較需時日，但我們持之以恆，總可望能得到具體結果。

查次長在報告的結語中，以沉重的心情說道：「目前大陸上苦難的同胞正在受罪，急待臺灣軍民和海外僑胞爲他們去解倒懸。也許有人以爲臺灣兵少錢少，怕沒有用，但我敢說我們有的是新精神。這種新精神充分發揮出來，海內外團結一致，我們一定能在賢明政府的領導下，獲得最後的勝利！」

我聽完了他的報告，很相信辦理毛邦初案的絕不苟且的精神，確是中國復興的象徵，我樂極了，馬上回到華美日報，寫了一篇評論稱頌他。（香港新聞天地三一五期）

民主政治根基（一九五四年三月六日）

上節談到毛邦初案件時，我的確認為國民政府這種依法控訴，究辦到底的精神，是中國行將真正走上民主政治正軌大道的象徵。却不料李宗仁以現任副總統之尊，而居然在海外又於二月十日發表他第二次致蔣總統的信，還想鼓其如簧之舌，為貪官毛邦初開脫。甚至硬說，政府「派遣代表，受審於外國法庭，主權喪失，衆議紛紜。」殊不知美國是一個典型的民主國家，素重法治。一個外國人在美國境內犯了案，無論將來引渡與否，其第一步程序，當然須經過法院。除非毛邦初自己願意接受本國政府的命令，規規矩矩地回到臺灣，繳清帳款，則中國政府要查這件貪污案，除了向美國法院依法訴訟外，實無其他方法。這種法治精神，正是民主政治的基本條件之一。我們要學民主，就得好好地從這些地方學起。乃李宗仁不恤這道理，一面在「白朗市行宮」裏下手令，吩咐毛邦初抗命不交，一面又責備政府派代表在美國法庭上打官司，即此一點，就可見他對民主政治全屬外行。

李宗仁這次的一再在美國獻醜，惹起僑報的羣起而攻，我不想在此再多污我的筆墨。不過他的信中，也儼然提到「言論自由」，提到「違憲亂紀」，又提到「人民扶擇」，彷彿他亦知道「自由」、「法治」，與「民意」乃民主政治不可缺少的東西。我所以在紐約華美日報連寫三篇社論，加以痛駁。我說：言論自由，中國憲法早有彰明的規定。李宗仁身為副總統，又為各方所電請返國的人物，數年以來，

他如果有要說的話，儘可在臺灣場所欲言，以取決於民意多數之從違。何以不這樣做，而只是躲避國外，以極度醜詆自己的政府爲能事？此豈負責當局所應爲？須知自由須用鮮血來爭取……如最近疆境反共戰爭爭回自由生活卽其最顯著的一例……若安坐「象牙之塔」中高唱自由，徒令人齒冷而已。

彈劾案的法律根據

關於政府此次召開國大，以及討論彈劾李宗仁案，是否違法一點，我請李宗仁注意下列事實：（一）監察院的監察委員，選出總額僅有一百八十餘人，當通過彈劾案時已過半數，何能謂爲非法？（二）未到臺灣的監委中，且有尙留大陸，靠攏共匪的人。豈李宗仁還要把這些叛國份子計算在內，而承認他們的監委資格？（三）國民大會的開會法定人數，乃規定於國民大會組織法中。此項組織法是國家的普通法律，由立法院通過，經政府頒佈施行。修改與否，權在立法院，固與憲法之修改程序不同。則立法院爲適應事實上的需要，修改其法定人數爲三分之一，有何「違憲亂紀」之可言？若照李宗仁所妄擬的辦法，另起爐灶，用什麼召開各黨派代表救亡國是會議，來代替國民大會，或任命現任的總統副總統於任期屆滿之日（本年五月二十日），自動延長其任期，此例一開，總統副總統可以變爲終身職，這樣才真正是違憲亂紀了！

最可笑的，李宗仁還在侈談「民意」，而事實上他却是最漠視民意，也最躲避民意了。目前凡是反共而愛好自由的中國人，誰不認爲播遷臺灣的國民政府是自由中國的合法政府，又誰不景仰蔣總統領導反共，百折不撓，是自由中國最偉大的象徵？我們可以說，即使目前困處大陸，憔悴呻吟於共匪暴政之

下的無量數同胞，他們內心的深處也必仰望蔣總統的反攻大陸，解其倒懸。韓境中共戰俘一萬四千多人，大家爭着做反共的義士，投奔臺灣，而不願回返大陸受罪，豈非最現成最顯著的民意表現？而李宗仁對這些海內外衆口一詞的呼聲，充耳不聞，徒以國民大會將再開會改選正副總統，他的大名勢將不能再與「副總統」連在一起。又因國大恐將討論監察院對他的彈劾案，就藉口「非法」，一概否認。這又難道是尊重民意者所應有的舉動？並且，彈劾他的是監察委員，將來可能討論罷免他的是國大代表，他們無論怎樣都是人民選舉出來的。國大秘書長電請他回臺答辯，而他却避開國民大會，一再向蔣總統糾纏寫信。彷彿他對這一彈劾案只有請蔣總統想法幫忙，設法打消似的。殊不知彈劾罷免，正是人民代表對總統與副總統所行使的憲法大權。蔣總統之不能干預，正與李副總統相同。蔣總統縱使十二萬分誠意要庇護李副總統，他也有愛莫能助之感。何以故？因為他萬一涉及此案，就不免有干預民意機關之嫌。以口口聲聲標榜「人民扶擇」的李宗仁，事實上却想用詆譏謾罵的方法，迫使蔣總統一不小心，或將陷於干涉民意的不義行爲，他還能說是心目中存有什麼「民意」的念頭嗎？

總之，李宗仁對於國民大會所將討論的罷免副總統案，除了向國民大會正式答辯以外，其他都是不合法律規定的手段。至於此次國民大會顯否或能否通過李副總統罷免案，那是另一回事。按照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十二條，關於副總統之罷免，準用前四條之規定，可見其手續與總統之罷免相同。按照第九條，如罷免聲請書由國民大會代表總額六分之一以上之代表提出者，則罷免案之表決須得代表總額超過半數之贊成方得通過，在此次大會中恐非易事。但目前國民大會所須討論的，乃是監察院的彈劾案，按照第十條，只須有出席代表三分之二的同意，即可爲罷免的決議。就大勢看來，李宗仁愈遲視民意

、愈否認國民大會代表的合法地位，此項彈劾案將愈有通過罷免之可能。李宗仁亦明知其或有如此結果，只好硬著頭皮「鄭重聲明，概予否認」了。

民主政治的基本條件

幾寫到這裏，倒很想更乘便討論一下關於民主政治的基本條件問題。因為我認為就近代史的趨勢來看，尤其就二次大戰後的世界大局來看，顯然是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兩種力量兩種制度之間的鬭爭。克里姆林宮魔王們最近所高唱的「共產主義國家可與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存」一套曲調，不過用以欺騙無知的愚民和動搖的政客而已。故吾國民政府雖偏處臺灣，而顯已成為東亞的自由堡壘，在反攻大陸的艱巨工作中，確為民主集團站在東方鐵幕邊緣的最前綫的。惟其如此，我總以為今後的反攻戰仍須依照當年江西剿共時代總統所頒「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大方針前進。換言之，反攻力量得之於軍事者為三分，得之於政治者七分。而這七分政治，必須從大刀闊斧，用加強民主政治的實施來表現。

如何可算加強民主政治的實施呢？反共會議、救國會議，或所謂各黨派大團結會議……這一套，固未始不可藉以表示政府團結一切民主力量的誠意，但愚見以為這些不過是形式，而各黨派推出人來參加政府機關，分得一官半職，更不過是所謂「聯合政府」的糟粕，民主政治的精神與靈魂決不在此等處。二次大戰時英國在邱吉爾、艾德禮之下的聯合政府，行的固是民主政治；但大戰後的大選，工黨即保守黨先後組織多數黨的一黨內閣，所行的仍是民主政治。美國羅斯福總統在大戰時用了共和黨人物任陸軍部長海軍部長，不是民主黨的清一色內閣，行的固是民主；但杜魯門總統的民主黨內閣和艾森豪威總統

的共和黨內閣，所行的還是民主政治。即此可證民主政治最可寶貴的基本條件，決不在政府人物是否包容不同黨派在內的一點上，而別有所在。然則究竟應該在什麼地方呢？

說得深刻一些，民主應該是一種精神力量，一種生活方式，一種社會習慣，完全由於尊重每一個人（自己和其他人）的生存權利和自由地位而形成的。此處姑且暫緩討論，先就政治方面來舉出幾項民主政治所必須具備的條件。

國父孫中山先生在民權主義的演講裏早已指出，「現在神權君權都是過去的陳跡，到了民權時代」。「各國實行民權，也遭到許多挫折，許多失敗的」他認為「民權是時勢和潮流所造就出來的。」他雖然認為盧梭民約論裏所說「天賦民權的言論本是和歷史上進化的道理相衝突」，但他仍確認「盧梭提倡民權的始意，更是政治上千古的大功勞」。他更斬釘截鐵的教導我們：「將來無論是怎麼樣挫折，怎麼樣失敗，民權在世界上總是可以維持長久的。」國父又嘗把法國大革命口號的「自由、平等、博愛」，和美國林肯總統所說的「民有、民治、民享」，與我們革命建國的「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相配合。甚至我們現行的憲法開宗明義的第一條就規定着：「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可見我們自國父倡導革命以來所決定走的路，是民主政治的道路，而這條道路的創造，乃建築於「為民所有，為民所治，為民所享」的基礎之上的。

政府只能夠做些什麼

由此，我敢說民主政治的基本條件，至少須有下列幾項：

(一) 政府必須由人民的同意而自己建立起來的。因為不如此，人民是人民，政府是政府，政府不過成爲一部份少數人用強力來控制人民的機構，這便發生「警察國家」的怪現象。如以前的納粹德國和目前的鐵幕內的共產國家一般，絕對不能被認爲民主的。——這一項是政府「爲民所有」的必要條件。按美國獨立宣言中所說：「人民組織政府，得被治者的同意而獲有適當的權力。」就是指出政府的權力（即國父所說的「治權」），乃淵源於人民的同意的權力（亦即國父所說的「政權」）。一個國家裏的人民如果能真正行使這種同意權，則其政府可稱爲民主政府。

(二) 政府爲保護人民的基本權利而服務的，如果不能達成此項任務，人民有權改變或廢除它，而另行建立一個新的政府。這一項是說明政府乃爲人民而存在，並非人民爲政府而存在。同時，政府的目的在服務而非佔有。尤其最重要的，是人民有權組織政府，亦有權改造政府。按此在美國獨立宣言中也說得很透澈，它說：「當任何形式的政府摧殘這種宗旨時，人民有權予以變更或廢止，並建立新的政府……」有些人初以爲這種改組政府是近乎革命，免不了要使用暴力或經過流血，但在民主國家看來，他們的改組政府常在規定期間內依法用人民的選票來解決，社會秩序如常，人民毫無驚惶紛擾之感。民主政治之所以優於獨裁政權，其長處在此。——這一項是政府「爲民所治」的必要條件。

(三) 人民享有一種基本的權利，例如中華民國憲法第二章各條所規定的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人民身體之自由，居住及遷徙之自由，言論講學者著作及出版之自由，秘密通訊之自由，信仰宗教之自由，集會結社之自由，生存權工作權財產權，受國民教育之權利，和選舉罷免創制複決之權利，以及其他凡不妨害公共利益或社會秩序之自由及權利，都能確實獲得憲法之保障。……這一項是政府「爲民所

享」的必要條件。由於這一項基本條件，我們應該可以引伸而得到如下的推論，作爲衡量民主程度的標準。即：（一）人民或人民代表行使選舉權時，各個合法的政黨都得憑藉其所宣佈的政綱，作競選演說，爭取多數的選票。（二）人民行使選舉權時，秘密而自由地投其無記名的選票，絲毫不受任何團體或個人的干涉。（三）因爲各政黨得公開競選，而人民又有集會與結社之自由，故各政黨均得依法組織成立，或解散合併，或作其他種種公開活動；人民之加入或脫離某一政黨，也都憑其個人的自由意志而決定。（四）根據第（三）點出發，政府顯然不但容許有反對黨的存在，而且特別重視反對黨的意見，以爲督策自己的借鏡。（五）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爲絕對的，故一個政黨只能以政綱來號召黨員，却沒有方法拘束黨員的言論。因此，每人不但有批評反對黨政策的自由，也有批評本黨政策的自由。人民的選舉，就憑了這些言論和事實來抉擇他們對於各政黨間的取舍。以前的多數黨，往往可以一旦變爲少數黨；能迎合民意博得信仰的少數黨也往往可望變成多數黨。如此交相更迭，使政局爲和平的遞嬗，確爲得力於言論自由的效果。（六）不經人民或人民代表機構通過，政府無權向人民徵收任何捐稅，這是人民財產權的保障，也是控制政府「荷包」的起碼條件；政府動支一筆款項，都須在民意機關所通過的預算案範圍之內。（七）人民既有工作權，當然也有罷工的權利。罷工爲法律所容許，單是罷工，不視爲犯罪行爲。（八）人民如無法院經過法定程序的逮捕狀，不得逮捕拘禁；其不得任意刑殺，更無特論。

還要有容忍的雅量

（四）政府必須在合法的公開的會議討論制度之下，有容忍的雅量，使反對方面和自己同樣享有充

分的發言權。這是民主政治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條件。因為民主政治的精神在於由異而求同，並不是根本不容許異的存在。換句話說，民主政治的目的，是用和平方法求得大同，但絕不是憑藉任何權力去抹煞或根絕小異。如果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各種設施，絕對不許有相異或相反的意見發生或存在，那麼這個國家的人民一定會喪失自由的。有自由，就有歧見。民主政治不患有歧見，而患有有歧見却没有自由發表的機會，沒有交換批評的機會，沒有疏導解釋的機會。民主政治的長處，也可說是它的絕對優點，即在能使各種歧見，在平心靜氣的討論，或相互爭執的辯論中，得到消除歧見而作合理決定的結果。國父在民權主義第四講中所引述的華盛頓政府時代他的內閣中哈美爾和傑化臣兩大人物政見的抵牾，正是民主政治容許歧見存在的最好明證。前者主張更強大的中央政府，後者主張更自由的民主。表面上似乎互不相容，而不知美國建國初期四十年間史實的演進，正恰是指出這兩大潮流的融化合流，便是聯邦（國家權）和民主（人民自由）的勝利。（香港新聞天地三一六期）

閒談美國政黨 (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三日)

要談現代的民主政治，似乎不能不談及政黨；要實行民主政治，自然也不能不熟諳政黨的組織，和善用政黨的力量。中山先生在民權主義的演講中，對歐美政黨政治有很多的啓示。他雖主張在軍政時期訓政時期，採取「一黨」的制度，訓練人民行使四權，但其最後目的依然爲憲政時期的全民政治。他的心目中，對憲政時期政黨的看法，顯然傾向於英美的政制的。他在民國元年九月間於北京（後改北平）共和黨歡迎會上演說時，曾說：「欲求有完全國家，必先有完全議院，必先有完全政黨。……：世界最完全政黨之國，一爲英國，一爲美國。英國有兩黨，一自由黨，（按，現在自由黨已衰落，取而代之者爲勞工黨），一保守黨。……：美國兩黨，一爲共和黨，一爲民權黨。（按，現在一般人譯爲民主黨。）……：英美兩國，政黨所爭持者皆是極要問題。至於議院之議案，兩黨各以是非爲依歸，不以黨見相傾軋。若黨中先有意見，提議一案，先聯屬黨員，私自運動，本黨提出之議案，雖知無益，亦必通過，他黨提出之議案，雖知有益，亦必反對。此種政黨，必與國家無益。民國既成，吾願兩黨（按指國民黨與共和黨）以英美先進國爲模範。……：」可惜共和黨人當時不明此理，祇知爲了博取權利地位之故，附和袁世凱解散國民黨的妄舉，使中華民國開始時的兩黨制度，生命中斷，爲袁氏稱帝鋪了道路，重勞雲南起義，再來推翻短命的洪憲偽朝，這真是中華民國政治史上莫大的不幸。

容許歧見的存在

中山先生既要勉勵大家，搞政黨者應「以英美先進國爲模範」，所以我雖不是一個負責政黨組織責任的人，來到美國以後，也時時留意美國政黨的歷史與現狀，和他們在選舉時候的作風。在將滿四年的短促歲月中，我曾經看見過兩次的紐約市長競選，一次的紐約州長競選，一次的美國大總統競選。今年秋冬又要達到美國國會議員改選的競爭，自有兩大政黨唱對檯戲的熱鬧可看。現在雖未到選舉時期，可是兩黨間已在積極準備了。民主黨在現國會中，名爲少數黨，但實際上參院議席已因塔虎脫之死而經過共和黨一席，眾議院中所差亦微，故自信稍加努力，當可爭回選民的信任而奪取兩院的多數議席。他們標揭的口號，目前最動聽的是：「現政府將使美國經濟衰退，有製造經濟恐慌的危險」。共和黨方面，艾森豪威總統則稱此種批評乃無謂的恐懼，而恐懼心理適足以造成經濟恐慌。反之，他說只要國會通過他今年所提出的各種方案，一定可使國家同時獲得安全和繁榮。此時的失業人數增加到將近三百萬，乃短期的暫時現象，假使三月份過了，失業現象仍無轉機，他將採取必要步驟，挽回此種經濟下坡的趨勢。同時，共和黨內部對於今年競選的政爭主題，似乎仍有若干爭執，艾總統認爲共黨滲透政府問題已成陳迹，不必重視，但參議員麥加錫、傑納等，却仍以此爲重要競選題材。麥加錫這一月來爲了調查共黨滲透陸軍機構事件，在小組委員會調查時與一位軍人頂撞了幾句，惹起他和陸軍部長史譚文之間的衝突。艾總統又力爲史部長撐腰。於是國會內外，民主黨所策動而爲一部分共和黨所贊同的限制麥加錫調查權力之動議，又甚爲塵上。我們看了這五花八門的變化，如果不從歷史上對美國政黨制度加以研究，恐

將有莫名其妙的感覺。例如：爲什麼共和黨內部有如此顯明的歧見？爲什麼一個黨員而又是兼議員的人可對其本黨政府的政策，採取不同的態度？又如日前爲參院所否決的（不到三分之二）共和黨參議員布立格所提的憲法修正案（主張限制總統對外締約的對內效力），和民主黨參議員喬治的修正案，既爲艾總統所表示反對，爲什麼還有許多共和黨參議員連參院共和黨領袖諾蘭在內仍然贊成此憲法修正案？我以為研究美國政治者。應從這些地方去細細體味。

我以為美國政黨的好處，就在乎政黨並沒有全盤採然黨員個人的自由。黨員憑其自由意志以進黨，也可本其自由意志以脫黨，更可聽從其自由意志以發表意見，和決定投票的可否。所以一黨的提案，並不能強其本黨黨員以必然服從而贊同，其在共和黨如此，在民主黨亦如此。這正是中山先生在民國元年所稱許的應該學習的「模範」。所謂「議院之議案，兩黨各以是非爲依歸，不以黨見相傾軋。」。換言之，在他們的腦中，公是公非超過於黨見。惟其如此，故多數黨不一定能保障其所有提案全能通過，（杜魯門時代的八十一屆國會雖爲民主黨多數，但杜氏的計劃時被阻撓。）而少數黨亦未必不可贊成多數黨的提案。也許有人不免懷疑，那麼美國爲什麼要有這兩個各立門戶的政黨呢？此正爲我今天所想試爲解答的問題。

自然的演變

凡是一種制度之成立，必有其歷史，尤必有其適合於民族性的條件。美國之有兩黨制度，其歷史淵源可以追溯到英國的政制，但發展結果則和英國政制又大同而小異，並非完全一個刻板裏所套印出來的

東西。我第一句回答上述疑問的話便是，美國所以有兩大政黨，乃美國人民的習性所使然，亦為其歷史演變的結果，並不是他們的政治領袖所存心創造出來的制度。也許美國人由於其祖宗在英國統治之下就習慣了兩黨制度，覺得這是使政治和平改革的最好途徑，故能久而安之，最可注意的，在兩百年的歷史中，當他們發見只有一個政黨時（美國也有過一黨時期），往往把那個黨分而為二，或另組一個新黨來和它競爭。當他們面臨三個政黨時，往往就在投票期間削弱了其中的一黨，使事實上祇剩下兩大黨。我們如翻閱美國歷史，就可以從中發見這一個有趣的事實。

在英屬殖民地時代，英國有民權黨（Whig）和王黨（Tory），殖民地受了影響，也分上述兩派。這兩派的政爭，到了英王要向十三州徵收很重的印花稅和茶葉稅時，就爆發了獨立戰爭。不過那時並沒有現代式的政黨，祇是一部分人比較傾向英王和他所任命的省長（或總督），常被稱為王黨；另一部分人傾向自治，由各州自行立法，常被稱為民權黨。但到獨立戰爭結束以後，所謂民權黨的一派人物不但戰勝了，而且以「愛國者」的姿態，消滅了反對派，那些所謂王黨的人物都逃出十三州的境外，大部分回英國或加拿大去。雖然現在美國傾向保守主義的一部分人，也仍有時被人呼為「王黨」，（在英國，王黨就是保守黨，民權黨後來就是自由黨。）但自革命獨立以後，決沒有人想再在美國恢復英王的權力。所以美國政治學者高爾（David Cushman Coyle）說：「美國像其他一切革命國家一樣，起初也是一黨的政治制度。華盛頓和其他許多革命領袖都希望維持這一黨制度。」的確，華盛頓在第二次總統任期滿後的告別辭中，竭力呼籲美國人團結，深恐對壘的黨派集中在某一地帶時，可能有另練軍隊另組政府的危險。（後來到一八六一年，南北戰爭果然爆發了。）

美國憲法上規定總統副總統由「選舉團」公舉，而選舉團投票時，規定每州各自集合，每一團員自由在選舉票上選舉兩位被選者，不必聲明任何意見。全國「選舉團」公舉的結果，得票最多者當選總統，次多者當選副總統。美國的建國先賢以爲如此選舉方法，必能使全國人民所認爲最好的人出任總統，次之爲副總統，絲毫不夾雜任何黨見，而且那時也並沒有對峙的什麼政黨。

當一七八七年美國憲法制訂時，意見本不一致，勉強以多數而通過，但在經過各州批准時，（規定須經十三州中之九州批准，方爲有效。）就有兩派爭執。大概商人、銀行家、地主等，由哈爾頓領導，力主批准憲法；而工人、農民和一羣地方政客，深恐地方政府的自治權力有所損失，力事反對。幸而聯邦派的論著辯難，非常有力，卒使憲法獲得九州以上的批准，美國才能由鬆懈的「邦聯」而進一步到建立起一個穩固的聯邦政府，由於開國總統華盛頓的人望與憲法施行以後的工商繁榮，故在華盛頓兩任總統的期間，始終沒有組織二個黨派對立的情事發生。可是到了華盛頓堅辭競選第三任總統時，就因爲選舉繼任總統問題，發生兩種政治組織。一方面是聯邦黨，代表工商家、金融家，城市裏的中等階級，和東北各州的有勢力者。另一方面是傑化臣（也有譯爲哲佛遜者）領導的一派，稱爲「共和黨」（注意，後來傑化臣被譽爲民主黨的開山祖師。）代表着農民，包括由佛傑尼亞州的紳士到田納西州的拓荒者，以及城市中的工人。華盛頓雖自擊此情而懷着憂懼，但終究避免不了兩個政黨的產生。一七九六年，聯邦黨的亞丹約翰當選總統，一八〇〇年共和黨的傑化臣和麥亞農在選舉團中獲得了同數的選舉票，乃依照憲法，由衆議院投票決選，一直投到第三十五次票，傑化臣方始當選總統，而大多數的麥亞農爲副。由於衆議院中的反對黨（聯邦黨）議員可以阻滯大選勝利的共和黨領袖當選總統，使之延遲，於是乃

有憲法第十二次的修正案，規定選舉團分別選舉總統和副總統，不必再讓眾議院來取決。但這樣一來，規定選舉團的原意已失，承認了政黨推選候選人的事實，而選舉團不過變成最後形式上的「橡皮印章」罷了。

共和黨的再分裂

當一八〇〇年時，傑化臣所以稱其黨為「共和黨」者，不過表示他們反對任何國王而已。他們對於法國革命，自表贊成。但聯邦黨則鑒於法國革命的大屠殺，視為暴民政治，頗表同情於法國國王。所以他們便稱傑化臣一羣人為「民主份子」，含有贊成暴民統治或急進份子之意。等到後來法國經過拿破崙的起伏，民主一詞雖已減少了許多急進氣味，但傑化臣任總統時還是自稱共和黨，並不願用民主黨字樣。在他的任內，他買了路易西安那州，把密士西比河流域的西岸土地整個劃入美國版圖，使那時美國人本來向西發展（俄亥俄州和田納西州）的趨勢，加速推進，於是這些邊疆地區內人民的選舉權，與原來東北各州有互相頡頏之勢。這樣一來，傑化臣的共和黨勢力逐漸膨脹，把聯邦黨打擊得垂頭喪氣，到了一八二〇年，聯邦黨連一個總統候選人都推選不出來。所以這二十多年的美國，事實上又幾乎變成了一黨制度。歷史家稱此一時代為「好感時期」，就是表示沒有反對黨的存在。

但很奇怪，傑化臣所版造的共和黨，其內部意見漸有不洽，不久就分裂為二；一派比較保守的，由亞丹奎賽為領袖，稱為「國民共和黨」，其領袖於一八二四年當選總統。另派一比較急進的，由傑克遜領導，稱為「民主共和黨」。傑克遜於一八二八年當選總統。後來那「國民共和黨」於一八三二年改為

「民權黨」，但與英國的民權黨和美國革命初期的民權黨都無關係，不過用此名義，表示傾向保守，以便爭取選票而已。這個由聯邦黨和國民共和黨而演變下來的民權黨，在傑克遜的民主共和黨壓力之下，勉強於一八四〇年和一八四八年的兩次大選中得勝，舉了兩位戰爭英雄做總統。到了一八五〇年黑奴問題的爭論漸形嚴重，民權黨和民主黨（民主共和黨後來就簡稱爲民主黨）的內部各因此而起分化作用。民主黨方面分成南北兩派，民權黨也分裂了，其中標榜反對奴隸制度的一派自己成立新黨，稱爲共和黨，那共和黨並不是傑克遜當年所規造的共和黨，而是民權黨化出來的，提名林肯爲總統候選人，而於一八六〇年當選。爲了解放黑奴的南北戰爭就爆發了。從此美國政治舞台就成了民主黨共和黨兩個大黨角逐之場，而美國的兩黨制度似乎因之確立。

美國自南北戰爭以後，因兩黨制度的確立，沒有再發生過內戰，也沒有再發生過革命。他們兩黨人物雖爲勞工法、稅收、國庫支出、社會保險，及托拉斯等等問題而屢起爭執，但並不動武。他們的歧見，以後也許發生於貧富之間，或城市與農村之間，但並不偏重於地域之爭，故由地域衝突而引起內戰的因素消弭了。由林肯以來將近百年的政治經驗，使美國人民習慣於兩大政黨互以政策競爭的方式，大多數年代，總統和國會兩院議員都由得勝的一黨掌握，但因爲國會兩年改選一次（衆院全部改選，參院改選三分之一），故間有若干時期，總統與國會的多數黨並不屬於同一黨派。最可注意的便是，在這將近百年之中，那競選失敗的一黨（無論是民主黨或共和黨），並不會被打擊得一敗塗地，從此抬不起頭來。林肯以後，共和黨掌握繼續二十四年之久，可是一八八四年的大選被民主黨的克利夫倫打敗了。麥金萊以從，共和黨又握權十六年之久（一八九七——一九一二），却又在一九一二年的大選中，敗於民主

黨的威爾遜。哈定以後，共和黨握權十二年之久（一九二一——一九三二），而又被民主黨的羅斯福打敗得落花流水。但是，羅斯福杜魯門的新政與公政，使美國人民擁護民主黨達二十年之久（一九三三——一九五二），也終於被共和黨抬出來的艾森豪威所打敗，艾森豪威以後，共和黨能坐穩白宮幾年，誰也不敢臆斷。民主黨今年在國會改選中，頗有捲土重來，奪取多數議席之可能。

免於左右傾的危險

美國的兩黨政制，既不同於歐洲大陸的多黨制，也與英國的兩黨制有別。歐洲大陸國家的多黨制，其理論乃建築於一個黨必須堅持一種主義的原則上。因為現代生活是多方面而很複雜的，政治上、經濟上、宗教上，可以有各種不同的主義，於是信仰甲種主義者可組一政黨，信仰乙種主義者亦如此，而政黨遂成爲羈零碎的許多組織。但在議會政治的制度之下，內閣必須有國會中多數黨的信任與支持，而國會中又以多黨林立，並無一個真正的多數黨，於是像目前的法國意大利一般，只好聯合幾個黨派來組織所謂聯合內閣，等到這聯合陣線內部有了裂痕，內閣就得倒塌，政局安能穩定？

而且，在多黨制的國家，勢必只有聯合「中間」黨派，始可保持人民的自由。否則一不小心，就有左傾或右傾的危險。左傾之極就可被關入共產黨的鐵幕；右傾之極，就可使希特勒或墨索里尼第二抬頭。還有，在美國人看來，那左右的極端派，爲了打擊中間的自由份子，往往可以聯合起來對付他們的共同敵人（中間黨派）。由美國人想來，自然遠不及他們可在共和黨和民主黨的兩個尊重人民自由的大黨中，憑他們的政策和治績，自由選擇其一個來掌國家的舵，這種制度來得好。

美國兩黨制度之不同於英國者，由於英國工黨與保守黨在主義上和政策上有根本的不同，而美國的共和黨與民主黨，雖在政策和態度方面有所出入，而其反對獨裁，反對國有產業……則根本並無差異。英國人民可以用選舉票由邱吉爾跳到艾德禮，又由艾德禮跳回到邱吉爾，而不必流血。美國人却決不能容忍半共黨式的工黨路線來指導美國的政治，但可以在民主共和兩黨中挑選一個好的班子，讓他們上臺去唱戲，而不必動刀動槍的打內戰。這是適合美國民族性所需要的制度，經百多年歷史演變而得的收穫。

（香港新聞天地三一七期）

與胡適談政黨（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日）

政黨政治之在某一國，既隨其演進歷史與民族習性而有差異，可見我國如蔣蔣兩大黨政治制度的長處而欲有所效法，亦必假以時日，方有水到渠成之日。拔苗助長，未見得一定有益。日來報載胡適之先生到臺北後的談話，曾說他此番出席國民大會，乃盡其國民代表的責任，尊重憲法的法統。同時對國民政府的設施，他有四點批評意見，其中的一點是他反對一黨制度。當然，我可以猜想他的心目中，是久已憧憬着英美式的兩黨競選，相為更迭的政治制度的。不過他對於黨的組織和運用，以及進行選舉的方法，傾向於英制多呢？還是傾向於美制多呢？那恕我不能猜測了。

適之先生是當代學者，中外欽仰，他在「五四」以前的「新青年」，「新潮」時代，所號召的新文化運動，當時曾經提出過民主和科學，所謂「德先生」「賽先生」，作為運動的目標，可知其醉心民主，由來已久。他對中國國民黨是始終站在一個諍友的地位。他於民國十六七年時，曾經寫過一篇「知難行亦不易」的文章，對孫中山先生「知難行易」的學說頗致微詞，而對於國民黨的一黨專政過渡辦法，也曾屢有批評。他後來對於文化運動，又力主全盤西化，似又與孫中山先生所倡導的發揚中國固有的道德，迎頭趕上世界的科學，有所出入。關於這些，我也曾不自量力，在文字上有所辨難，現在舊稿都已丟了，自不必提。此刻我倒要就一黨和兩黨問題約略一述我個人的夢想。

表現民主作風

彷彿記得我到紐約後不久，某次在拜訪胡先生時，他也曾提及此兩黨問題。他說，今天中華民國憲法已公布施行，「三民主義」字樣也已見之於憲法第一條，國民黨既由訓政還政於民，何勿在事實上更表現一些近乎英美民主政治的作風？最重要的是總要在形式上有一個與執政黨並不完全亦步亦趨的反對黨，然後可以在三民主義建國大原則之下，作政府黨的諍友。相信這樣更可使政治進步。我說，先生的意思很值得重視，不過現在中國除公開叛國的共產黨不算外，不是有國民黨、中國青年黨，和民社黨三個政黨嗎？他們兩黨目前固爲了反共抗俄，大敵當前，正和國民黨共同奮鬥；但在各種政治設施上，未必意見完全一致。由國民黨的地位來看，他們不就應該是合法而應受尊敬的反對黨麼？胡先生似乎認爲這力量不夠。我又說，中國青年黨的領袖曾慕韓先生（那時曾先生尚未作古）現正大聲疾呼倡導「超黨派的團結運動」，是可見當前局勢或宜於團結而不宜多分派別。

胡先生却以爲團結對外與政黨的合法的辯論政策，兩不相妨。他並且引證了土耳其的史實，認爲可作中國一個模範。土耳其在革命建國時，基瑪爾將軍的國民黨，也是一黨專政，厲行一切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的種種改革，爲國家打好基礎；但後來國民黨中的一部分黨員，似乎在得到默許之下，另組了一個民主黨，在某種政策上持着與當時國民黨主政的政府不同的見解，終於在一九五〇年的大選中獲勝。民

主黨的黨魁貝雅當選了總統，可是並沒有把基瑪爾將軍爲國家所建立的基礎毀壞呀。胡先生談鋒甚健，他說得高興時，似乎爲中國國民黨劃策：蔣總統現已爲全國的領袖，應該被尊爲超黨派的人物，他何勿讓國民黨（同是信奉三民主義者）中對某種政策持有歧見的人自由脫黨，另組一黨，以爲政府的在野監督者呢？這樣，然後在民意機關裏，才可以逐漸形成兩個大黨的局面，中國政治自可望其走上英美式民主制度的途徑。

上面所述的一種見解，顯然他是受着美國政黨演進歷史的影響而形成的（參考本文第十節可證）。我不知道胡先生兩次到臺灣時曾否向朋友談及，但他的確在熱望中國培養出一種兩黨制度來，其誠意是無可疑的。當時外界頗有傳說胡先生將被友人推舉組織自由黨，但他極力否認。這次回臺灣以前，他又關過謠，力辯對政治工作全無興趣。

甲式乙式政黨

我也相信胡先生是純粹一位學者，他對中國前途有熱望，但並無搞政黨的勇氣。即以美國而論，搞政黨而成功的人，不一定是學者。杜魯門在民主黨中，不可謂非一個從民主黨基層幹部搞起來而有相當成就的人，但無人認爲他是一個學有素養的「大師」。

我又似乎記得復員以後，適之先生在三十六年夏間發表過一篇文章或講稿，把三十多年來英美德式的「甲式政黨」和蘇俄、意（法西斯）德（納粹）式的「乙式政黨」作一比較，得一結論，他說：

「這兩個世界的根本不同，正在那兩張選舉票的使用方式的根本不同。蘇俄因爲沒有反對黨，故一

九三六年新憲法之下的選舉結果總是百分之一百，或是百分之九十九。美國因為容許反對黨的自由競爭，所以羅斯福的最大勝利總不過人民投票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一九三六年大選）。這百分之六十的大勝利，代表自由的政治，代表獨立的思想，代表容忍異黨的雅量。所謂「兩個世界」的劃分，正在這自由與不自由，獨立與不獨立，容忍與不容忍的劃分」。

「中國國民黨的叛立者孫中山先生本是愛自由講容忍的政治家。……所以在他的政治理想系統裏，一黨專政不是最後的境界，只是過渡憲政的暫時訓政階段。他的最後理想還是那甲式的憲政政治。……如果訓政的結束能够引起一個愛自由的提倡獨立思想的容忍異己的政治新作風，那才可算是中國政治大革新的開始了。」

當胡先生發表此文時，憲法業已制定，而中共業已公開叛變；他所希望的中國政治大革命還沒有實現之前，而中國政治却先經過了一個空前未有的大混亂的階段。這不是說，不應愛自由，不應講容忍，不應提倡獨立思想，而是證明了這一套只有在彼此俱有民主素養的政黨之間是可以行得通，而對那以剝奪自由，迷信教條，崇尚極權，奪取政柄為急務的共產黨是行不通的。

現在，情況變了。中國共產黨已為全國人民的公敵，當然不在合法政黨之列。吾自由中國境內既有名正言順的三個政黨，又有一個反共救國的青年團體，大家反共救國的大目的相同，又是飽經國破家亡，顛沛流離的慘痛教訓，似可大澈大悟，改弦易轍，正好在臺灣這個自由寶島上，表演一番中國政治的大革新了。

摹倣不是辦法

說到中國政治的大革新，並不一定需要完全摹倣美國或英國，也不是像目下若干時髦人物的想法，以為只要再來一次反共救國會或各黨派國是會議之類，推翻憲法，另起爐灶，才可表現所謂「與民更始」。

以言摹倣，則從中華民國誕生至今，幾乎什麼制度都似是而非的摹倣過。民國初年臨時約法的所謂「內閣制」，袁世凱時代「新約法」的假借所謂「總統制」，以實行其「獨裁制」，曹錕賄選時代所謂「憲法」的採用「聯省制」（其第五章國權列舉中央和各省的權限，實採取民國十一年上海國是會議所起草的「聯省憲法」的精神），西南護法政府時代「軍政府組織大綱」的採用「元首制」，「委員會制」（七總裁會議取決等於委員會制），五花八門，固不必論，即中國國民黨於民國十二三年間的改組，及十四年國民政府組織法的頒布，實際說來，亦是摹倣蘇聯的「以黨治國」（不過蘇聯為永久的一黨專政，而國民政府的建國大綱，則「黨治」僅為訓政時期的一個階段，此為重要不同之所在。）及「委員會」制度。一直到民國二十年召集國民會議，通過「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始根據中山先生的「國民政府建國大綱」，開創五院制度。但因為在訓政時期，故精神上仍然沿用「以黨治國」的方法，到抗戰復員以後，因經過「政治協商會議」推翻「五五憲草」，另行起草所謂經過各黨各派共同商訂原則的憲法草案，由國民政府立法院作形式上的通過，提交三十五年十一月召開的國民大會討論，遂產生了現已行之六年的一部「中華民國憲法」。若就摹倣的意義來說，這部憲法真可說得是一部「四不像」的憲

法。（張君勱先生是這個憲法草案的主要負責人，曾稱此草案所規定的中央政制是「修正式的內閣制」。）我並不是到今天還要來反對這部憲法，誠如胡適之先生所稱我們須尊重此一個無數軍民血淚凝成的一法統」。但我們如果要想中國政治有一番大革新，究竟不能不先從「法」上留心研究。雖然此次國民大會的開會，在事實上因為出席人數的關係，恐無修改憲法之可能，但這部憲法裏的缺點，却不是不可以指出來討論的。我彷彿記得民國三十七年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一次會議時，也曾有人提議過憲法修正案，後來因為種種原因，祇勉強通過了所謂「臨時條款」來應付緊急局勢，而把有關國家根本政制的討論擱了起來。當時彷彿有人主張姑待這部憲法施行幾年之後，看看實情如何，再來計議修正，所以修正的議論也就平息下來。不幸這六年中間，國家蒙受空前的大難，山河破碎，政府播遷，此時自也談不到修改憲法。但無論如何，這部憲法的重大缺點，我由卅五年參加制憲的國民大會，一直至今，總覺得骨鯁在喉，不能不吐。我所謂重大的缺點，就是喪失了國父中山先生所精心創造的權能區分亦即政權與治權劃分的制度的精神。

中山先生發明這一理論，乃因鑒於歐美民主國家人民的心理，一方面既恐防政府權力過大，流於專制；另一方面又恐政府受制過多，沒有能力去擔當處理國事，所以他斟酌古今中外的學理與經驗，擬好了一個國民行使「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大政權，政府行使「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大治權的政制藍圖。很可惜這一藍圖的最重要之點，竟被那「非驢非馬」的「政協憲草」所犧牲了。（後來立法院所通過而交由國民大會制定的憲草，實際是政協憲草所脫胎的。）試問現在號稱「代表國民行使政權」（憲法第二十五條）的國民大會，究竟有些什麼大權呢？所謂創制、複決兩權，除了關於

修改憲法和複決立法院所提的憲法修正案外，目前絕無行使的餘地。（憲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三四兩款及第二項之規定如此。）而罷免也只限對於總統副總統，（同條第一款）且事實上亦不常有。然則召開一次國民大會，耗費許多心力物力，祇爲了選舉總統副總統，這難道是中山先生重視人民行使政權的本意嗎？國民大會在此種制度下，形同虛設，（大概張君勱先生最初所擬的「無形國民大會」，本意就在要它成爲虛設的。）既無權管制政府，而人民自身對中央政府自更不能直接監督，此顯然失去了中山先生所倡導五權憲法的精神。

「立法專權」的局面

其次，「政協憲草」的起草所醉心的是內閣制。但英國內閣的精神，在使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融成一片，故內閣首長必是議會多數黨的領袖，各部部长必同時爲多數黨的議員，此與五權劃分之原則已不相合。而內閣制之行使，尤在議會有不信任政府之倒閣權，另一方面政府有解散議會以訴諸選民公意之權，而我們的憲法則兩者都沒有。故行政立法兩機構如意見不洽時，便沒有方法使之融爲一片，其決非內閣制可知。反之，憲法第五五條第五七條又規定行政院院長之任命須得立法院同意，而行政院又須對立法院負責，似乎行政受制於立法，是片面的受制，而不是行政與立法雙方相互制衡的，可見又顯然不是「總統制」的用意。然則按照現行憲法實施下去，如果長此不改，是一種什麼制度呢？請大家想一想罷。

立法院是國家最高立法機關（憲法第二十六條），但是只有一院，並不像美國或英國或西德的兩院

制。其所立的法律，事實上沒有第二機構可以斟酌考慮；所有法案又非全由政府所提出。法律一經立法院通過，送總統及行政院限期於十日內公布施行（第七二條），行政院雖得經總統之核可，移請立法院複議。但如經立法委員三分之二維持原案，行政院院長非接受執行即須辭職（第五七條），不如美國總統事實上還有攔置權（Pocket Veto），把那項不同意的法案擱置，不公布也不交複議；也不像英國政府首長可以請求國王下令解散議會，舉行改選。只有單方面的接受或辭職，而毫無其他補救制衡之法。不但此也，國民大會既不能複決立法院所通過的法案，人民更無對中央法律施行複決之權，在理論上，豈不是立法院成了一個「高於一切」的獨特機構，而無一人或一機關可與抗衡的局面？這不是將逐漸趨向於「立法獨權」嗎？世人每謂英國議會權力最大，除了使男變女一事做不到而外，什麼都可辦到；但英國議會尚有可被解散重選的機會，而我們的立法院却可安如泰山！

作爲一個篤信「政權與治權劃分」與「五權分立」的中山先生遺教的我，（相信其他篤信國父遺教者亦當相同）對於這部事實上可能使我們國家走上「立法獨權」的途徑的憲法，除了因目前大局艱危，當能暫相容忍而外，衷心並不悅服的。

在這樣一種並不十分合理的憲法的約束之下，我們所希望於目前國民大會的，既不能修改憲法，又被暫時奪剝了創制權與複決權，似乎在法律制度上很難有在此時開創一個使中國政治大革新局面的方法。但事實上，我們國家面臨着反攻大陸前夕的緊要關頭，又似乎不能不期望有一番政治大革新的局面。於是有所謂召開反共救國會議，團結各黨各派之說。會議、團結，當然重要，但我以爲根本上還在我們改變對於政黨的固有觀念，使中國開始走上兩黨政制的正軌。（香港新聞天地三一八期）

我所見的吳國楨（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我在本文的前三節（九至十一）裏，正寫着有關中國民主政制前途的問題，並且引述了胡適之先生所說：「愛自由的，提倡獨立思想的，容忍異己的新作風，那才可算是中國政治大革新的開始」的話，頗致期望於中國政黨制度的革新，以逐漸樹立兩黨政制的規模。恰巧這幾天爆出了一個「吳國楨發言攻訐自由中國政府」的問題。惹起許多人議論紛紛。我因此倒懷疑着：年富力強而政治雄心極大的吳國楨先生，是否在打算另樹一幟？假使吳國楨果真有意另組政黨的話，我倒稍有一些意見貢獻：不妨讓他去試試看，而且大可歡迎他就回臺灣去另組反對黨，以示政府的民主態度並不下於吳國楨。

昨有友人見我作此主張，疑我也和他同調，那是大錯特錯了。我的態度是反對吳國楨在外國人面前「告洋狀」的自卑作風的，我更反對在大敵當前之際先拆壞自己的牆腳的；可是我同樣也尊重反對者可以有權發表意見。所以吳國楨果真有具體的反對意見，我奉勸他回臺灣去發表，而且我建議政府准許他自由脫黨，並歡迎他回去，讓他去自由號召那些擁護他的人，另組反對黨，稱爲「民主黨」也好，稱爲「自由黨」也好，只要他確實真心誠意爲反共爲復國，儘可讓人民聽聽他所吹的一套，再看人民擁護誰。「真金不怕火」，民主的政府，決不怕公開合法而並不另擁武力的反對黨的。不過，吳國楨是否够稱此種材料，那是另一問題。政府倘准他自由地組織反對黨，而他偏依然要隔了大洋罵政府，那時誰對誰

不對，更顯然了。

其人的圓滑作風

提到吳國楨先生，我總算和他在上海共事有將近三年之雅。他於三十五年夏秋之交，由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調任上海市市長，其時恰巧上海市第一屆民選的市參議會成立（選舉是在前任市長錢大鈞氏任內辦的），我謬荷上海市民的過愛，當選了參議員；又以杜月笙先生因多病堅辭議長，猥承參議會同人的厚望，謬膺推舉而當了議長，職責所關，自與市長常有接觸。觀感所及，對於他的作風，似亦有多少領略。那時的副議長徐寄嶺先生和參議會同人，也因爲聽慣了吳市長「府會一家」的話，彷彿不期然而然都欣賞他的民主態度。至於他周旋洋人，應付記者的一套技術，更可說是八面玲瓏，十分圓滑。

平心而論，吳國楨並不是一個庸才，他確有一套看家本領。他的漂亮的儀態，流利的演說，講得一口好的外國語，十足一股洋派神氣，以及按時到辦公室（上海人叫「上寫字間」），見了什麼人都要以笑容，甚至和當時氣派很盛的一般鬧學潮的學生，也表示着一種即使「挨打」也漫不在乎的氣度，的確使當時但觀皮相的一般洋商和上海市民，彷彿都在想大上海何幸而得到如此一位現代化的民主市長。

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國際都市。抗戰復員之後，租界雖已收回，洋人潛勢力依然存在。吳國楨認爲要在上海市長任內得名，市民的需要在其次，而洋人的稱譽最爲重要。外白渡橋北堍的百老匯大廈裏，留出了整個一層，作爲常川招待外國朋友的場所。香檳酒、跳舞，自然都是題中應有之義。安福路的官邸大廈，更是外國記者和友邦貴賓常常光臨之地。有一次，市參議會裏某參議員提議要收回靜安寺路上海

跑馬廳，吳國楨因爲事關洋人產業，心內暗暗發急，趕緊說出一番大道理。他想另在江灣或吳淞劃出一個地區作爲跑馬之用，來和跑馬廳交換，並且自誇他一定有辦法做到。同時，他又擬議在上海恢復跑馬，開闢市政府的新稅源。後來，這些都沒有實現，而收回跑馬廳一案却因此只好擱置起來，以聽候市政府的策劃進行。吳國楨應付比較困難的案件，都會用這一套聲東擊西的戰術，轉移對方的目標，而絲毫不着痕跡。

上海市歷任市長，多多少少是做些對市民有切身關係的事的。例如首任市長黃膺白先生（鄂）之奠立市府規模，張岳軍先生（羣）與吳鐵城先生之規劃並建設江灣市中心區，吳鐵城先生之應付「一二八」淞滬戰爭，俞鴻鈞先生之應付「八一三」戰爭，錢鼎尹先生（大鈞）之復員後安定上海秩序，有目共覩，無須縷指。吳國楨先生在任兩年有半，雖然替上海市民辦就了那幾件好事似很難說，但總算工潮應付得宜，沒有鬧出亂子。民食籌劃有緒，沒有大起恐慌。我們自應加以稱許。可是上海有許多道路之高低不平。街巷里衙垃圾堆積，窮年累月，沒有多大改變的迹象。而外國電力煤氣公司則不斷加價，毫無應付辦法。這些都在市民心目中留了一個不可磨滅的印象。

廿載國家恩情

吳國楨先生在上海市長任內，明知熊佛西的市立上海戲劇學校窩藏着不少共黨和左傾學生，我們在市參議會裏也早經主張停辦該戲劇學校，將其經費移辦普通中學或添辦小學，可是他始終相應不理。對於上海市共黨及其外圍份子所鼓動的學潮，他也因爲要顧全民主自由的聲譽，從來不肯用堅決態度去處

理。有一回交通大學裏學生鬧事，我沒有辦法，看不順眼，只好自不量力，越俎代庖，跑到學校裏和若干位主任教授商酌如何解圍的方法。另一次，學生在閩北某地露天集會，吳市長親自出馬，想用理智去說服學生。却不知怎樣一來，突被好事的學生辱罵撲地。許多人認爲此風不可長。但吳市長處之泰然，若無其事。因此，「市長愛護青年」，「市長民主」之聲，又洋洋盈耳。吳先生的政治手法，大率類此。

總之，吳國楨先生不能不說是一個有相當才具的人。而他的熱中心理，他的做官方法，也差不多耳熟能詳。他雖然是留學生，却頗好命相之學，自己又善測字。他在重慶市長任內，據說有一天晚上，心緒不寧，總是翻來覆去，睡不着覺。他對他的黃卓羣夫人說，你且報出一個字來讓我測一測。他的太太仰望着帳子，就說「帳」字。吳先生大呼：「不好，恐怕要送命！」其時，日寇飛機常到重慶轟炸，市長當然提心弔膽的。他對太太說：「帳」字拆開，似是「市長」兩個字；而「市」字不是已經沒有了頭，只剩「巾」字嗎？吳夫人立刻阻止他，「不要胡說八道，你的測字技術並不高明，我不相信」。第二天一早，吳夫人馬上把那時蒙蔽委員會裏的李芋森先生（現居香港）請去，因爲李兄深通命理，並精測字，素爲吳氏夫婦所器重。芋森兄一問，知道是請教他測字，就笑着說，市長的測法雖近情，但還有出入。照他的看法，市長不會喪命，頭也不會沒有的，不過帽子要沒有了。「帳」字左旁的「巾」字，不是市字去了頭，而祇是市字落了帽；並且右旁的「長」字依然存在，故市長的位置當仍可保全，大概恐怕要像張治中在長沙大火後一般落得一個「革職留任」的處分吧。（以上據李先生口述）吳氏夫婦聽了，爲之稍慰。果然，不到幾天，重慶空襲時的大發道慘案發生，而市長「革職留任」的命令就下來了。

不管吳國楨先生今天怎麼樣發牢騷，但就他過去二十多年的宦海生涯，總算一帆風順，直上青雲。由漢口市財政局長而漢口市長，而重慶市長，而外交次長，而中央宣傳部長，而上海市長，而臺灣省政府主席兼行政院政務委員，國家對他也總算得不次拔擢的重用了。如果吳國楨先生是一位「貨真價實」的民主人士，那麼真如紐約中國總領事張平羣先生在答覆美國某記者所說，重用他二十年之久的國民政府也該算得一個能寬容的民主政府了。而何以他一旦交卸臺灣省主席職務之後，就要拂袖而去，趕來美國呢？又何以初來美國時，尚稱仍為政務委員，要替國家爭取美援，而今竟一變為詆毀政府呢？這真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

到美初期未變態度

我在去年初夏，吳先生初到美國西岸時，因曾聽得方自臺灣述職回美的蔣廷黻博士談及臺灣實行地方自治的成績，認為在推行民主政治上相當成功，當時就在六月十日紐約華美日報社論中，稱譽吳先生省主席任內對此有其貢獻。等到他在七月初到紐約，在其公園大道的「大使旅館」中招待記者時，我又寫了一篇「君自祖國來」的社論，要他對自家人打開天窗說亮話，報告一些「真」消息給僑胞聽聽，不要像專對外國人一般用些外交詞令，我並且在這篇文章裏提出三個問題向吳先生請教：

「第一、憑藉什麼力量去反共？這股國內海外以及大陸上潛伏的力量，究已培養到了什麼程度，團結到了什麼地步？第二、任用什麼人才去反共？是否還是論資歷，講派系，談同學同鄉的關係，以為用人的標準，抑或明賞罰，嚴訓練，進賢能，罷僉壬，卓然樹立嶄新的風氣？第三、自由中國今天是否在

政治上已先與竊據大陸的共匪作仁政與暴政的競賽？假使我們所用的方法還不盡完善，是否正在努力改進？」？

但是吳國楨先生對我所提出的問題，並無答覆，也從無不滿意政府的話。後來旅居紐約的十幾位國大代表，由于斌總主教發起，在中美聯誼會聚餐歡迎吳氏夫婦。我也在席間問過吳先生關於外傳臺灣物資換取外匯和設有大跳舞場的謠言。他對前者約略解釋了台糖出售與糧食出口的事，而對後者則稱並不知道。此外再絕未有片言隻語提及國民政府的不够民主，更談不到有「專權」的字樣。去年雙十節前夕，紐約中華公所中美聯誼會華美協進社等團體發起在花園大道的華道夫人旅館內，舉行國慶晚宴，特邀吳國楨先生和斐列特將軍演說。吳氏的演詞還是在呼籲僑胞和友邦人士支持中國政府的反共鬭爭，可見吳先生的轉變，當在那時以後。

當去年十二月初王世杰先生免職案發生時，因為案情真相迄未公布，以致由臺灣香港不斷傳來謠言，後來且有牽涉到吳國楨的。我於十二月四日在華美日報發表「政風」一文，就說政府如果以澄清政風為急務，則對於案情真相宜有一調查報告發布，「必如是而後廉潔之士有所保障，貪墨之徒有所戒懼」。「否則徒使問心無愧者橫遭傳說之誣毀，而暮夜芭蕉，蠅營狗苟者，轉得逍遙於法外。」更於同月十五日論根絕貪污之道，有「法辦今日贖職之官，即所以杜異日醜史之重演。懲治已發之貪污，即所以根絕未來之腐劣」等語。可是王案內情的是非曲直始終未為一般人所知，而謠言也愈來愈離奇。於是美洲日報遂於一月十三、十四兩日也根據所聞的傳說，接連發表二篇社論，提出若干疑問。一月廿五日的民氣日報也有長篇社論「勸吳國楨從速回臺灣」。吳氏對美洲日報和民氣日報，都先後有信去聲明闢謠，

而其一月廿七日致民氣日報函中，則透露幾句肺腑的話，那便是：

「楨之愛國，不敢後人。奸匪未除，大陸未復，楨又何敢從個人一人或一家着想？然而古語有云：『事有可行，有不可行』。又云，『合則留，不合則去』。又云，『忠臣去國，不潔其名』，楨懇請貴報勿逼楨太甚，使楨不得不言所不願言之言也」。

從這一段文字中，可以體味出他後來向外國記者的談話，抨擊政府有所不惜，在他必自以為被謠言所逼出來的他原先不願說的話。不過話又得說回來，謠言不是政府造的，而他闢謠的告白又能在臺灣各報連登三天。並且陳誠院長和徐柏園財政廳長都先後在答覆質詢中替他解釋，澄清謠言，並且殷殷期望他仍回臺灣銷假服務。那可見政府對他絕無絲毫排拒之意，他也應該可以無憾了。然則他到底爲什麼要在中國國民黨推定總統副總統候選人的次日（美國爲二月十六日，即臺北爲十七日），要向合衆社記者突如其來的發表談話，批評國府作風爲「專權」而不是真正民主呢？他的動機何在，值得大家玩味。

「第三勢力」與風作浪

有位讀者黃明漢寫信給華美日報，附了一篇論文，也是討論吳國楨先生談話的動機。他說吳先生曾自稱反對第三勢力，爲什麼又故意發表那些似是而非的談話，給那搞第三勢力的一幫人來捧場？他說他的朋友看法，以爲吳先生巧於自謀，深恐久留美國不歸，或將遭政府的譴責，輿論的非議，故急不暇擇，抬出民主招牌來駕極權，預留地步，備可申請美國政府保護。這些話似乎近於說心之論。我的想法，或者吳先生習於美國政治作風，或有另組政黨的雄心，亦未可知。我因此在華美日報三月四日的社論裏

，婉勸吳先生如果真有志於民主，宜以此時速回臺灣爭取其所謂自由民主爲上策。我更在三月九日論「言論自由」一文裏，說「言論自由，實乎當面批評，使對方有解答的機會。吳先生如果此時整裝返國，爲其所主張者（不問是否正確），作公開的論辯，則我信能重用吳先生如許長久的政府，亦必能容吳先生的盡言，故吳先生大可不必在美國專「告洋狀」」。

但是，旅居美國的華人中，本來有若干不甘寂寞，好搞什麼第三勢力的一幫人，總在「無風起浪」，想找尋什麼機會來反對臺灣，而又自命爲反共。他們以前看見了李宗仁、毛邦初，認爲有機可乘，大好利用，無如李毛太不爭氣，面子戳破，已喪失利用的價值。現在看見吳國楨放了小炮，就轉起他的念頭來了。三藩市的「世界日報」並且載着李宗仁也派人和吳聯絡，而吳也表示只要「愛國而無私心」的人都可合作的消息，不管其是否造謠，我倒很爲吳國楨先生擔心，不要一不謹慎跌落了這幫人的圈套裏去。他們日前更異想天開，利用臺北電傳胡適之先生前幾天因傷風而不出門訪友的消息，就濫放謠言，在「世界日報」上居然白天說謊，發出「胡適被軟禁」大標題的新聞。並且煞有介事的發表李大明氏請恢復胡適自由的電文，和張君勱氏（自稱第三勢力的領袖）無的放矢的談話。可見這幫人唯恐自由中國反共力量之不倒，處心積慮，以造謠生風爲能事。張君勱更硬說「臺灣政府此種行動（軟禁胡適）可爲吳國楨認定臺灣爲極權主義政府之說添一左證」。殊不知恰好在同一天，臺北正在舉行胡適之先生歡迎大會。胡博士並且發表了長達二十分鐘的演說，把他們的謠言當場拆穿。在中國想要喊民主，搞政黨，而竟使用這類鬼把戲，實在太不成材料了。

我還是抱着「與人爲善」的態度的，我雖然反對吳國楨先生急不擇言的手段，但我仍希望他這樣

一個聰明人，一定會知道自由中國在目前的階段中，爲反共而奮鬥最需要的是什麼。正在需要加強團結，需要增進友邦援助的時候，作爲一個政府重要官員，而到外國來詆毀政府，是如何的一件「親痛仇快」的事。吳國楨難道會明知而故昧，替中共造些安慰的資料？所以我願以善意奉勸吳國楨先生（因爲他來美後，除了國大代表級餐歡迎他的那一天和雙十節總領事館慶祝酒會而外，我沒有和他遇見過，也沒有機會知道他的寓址，無法通信。）如果真想另樹一幟，搞一個他心目中的民主自由的政黨，也該光明正大的回到臺灣去搞組織，搞宣傳，不要在洋人面前洗髒布。同時，我想國民政府也一定能寬容他回去試試看搞他的反對黨。假使政府有此大度，而吳國楨先生也有此「懸崖勒馬」的氣魄，那麼「回頭是岸」便是他的唯一前途。（香港新聞天地三一九期）

從吳國楨想到張治中（一九五四年四月三日）

我和那位張將軍，不知由於何種因緣，居然會和他共事過兩三個月；而且在這短短期間，恰巧又逢到他的生命史永遠不可磨滅的一頁。由今思之，恍如一夢。如今在臺灣港澳，當然有不少和他更有深交的人，知道他的性格作風比我詳細的要多得多，但要無所顧忌而把實事紀下來的，恐怕未必肯像我這樣難直的寫。

湖南省府任內

張治中字文白，一口巢縣官話，和老前輩的叛國將軍馮玉祥是同鄉。所以平時閒談之中，常常流露着推崇那位「基督將軍」的口氣。張治中雖為保定出身的軍官，但風度瀟灑，口才便給，很像一個文人。他因為奉命任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的教育長，舉止行動，一味摹倣蔣校長，由是而蒙特達之知。九一八之變既作，廿一年的一二八淞滬戰爭爆發，他率第五軍馳援蘇滬前線的十九路軍，駐節蘇州。我當時雖已隨市長張岳軍先生之後辭去了上海市的社會局長，但仍參加上海各界後援會的救護難民工作，曾與各界代表繞道真茹，一度進謁張於南翔崑山之間。後來張又因需要作戰物資如水泥鋼骨麻袋之類，曾親自到上海租界裏與後援會的各方人士相見。那時上海三百萬市民，萬眾一心，祇指望國軍抗日，誰不景仰

張將軍？他所統率的俞濟時、孫元良等幾位師旅長，都是上海人衷心崇拜的人物。這時候，我雖認識了張，想他未必會知道我。從此直到二十七年秋，我忽然和他共起事來，大出意外。

二十六年七七事變以後，八一三淞滬大戰發生。我因為又擔任上海市社會局長之故，依然從事於搶救難民，及疏散難民於江浙內地城市的工作。一直到日本軍在金山衝登陸，滬杭線吃緊時，我深知上海不久將棄守，乃急與天主教會法國饒神父商妥，劃定上海市，由緊接法租界之民國路起，至城隍廟南止，為難民區，委託國際教會人士代為照料，一面由上海各慈善團體（其時許靜老及黃伯度，黃涵之諸先生均為主持各善團救護工作的領導人物）集中籌募救濟款項及食糧衣服等等，準備萬一上海淪陷時難民生活尚可有所依託。迨南市大火，開北繼之，我軍放棄上海及浦東全部，市政府方在租界停止活動。我因避日人注意起見，離開了環龍路環龍里一樓一底的寓所，在霞飛路某街內一西人的屋內租借了一個鋪位暫住。白晝三餐，跑到間壁二三家的鄰居王延松兄家中勉強度過。其時謠傳敵人搜索黨政有關的人日形嚴厲，我白天很少出門。一天，漢口警察局長陳希曾兄不知怎麼探悉了我的原址，約我見面。我去拜訪他，他就問我：大家都在想走了，你為什麼還不走？我說，一則沒有一文旅費，再則也無法去買船票。那時南京蘇州杭嘉湖都已淪於敵手，要走只有去香港的一法。希曾兄就說，船票我替你設法，旅費只好你自己籌措。我自然非常感激。次日他就把一條法國船開香港的船票送了來，我另一方面就託幾位朋友調度，東拼西湊，借到了法幣一千五百元，化裝坐車到海關碼頭，由渡輪上船。當跳上大船時，在楊樹浦靠近外舷，遙見岸上有守衛的日軍往來，深恐他們莫一要登船搜索，即隱伏小房不出。等到船開出吳淞口，方始駛到房外散步。誰知道俞鴻鈞、杜月笙、錢新之諸先生均在同一船上，彼此相見握手，

互慶脫險。到香港次日，即覓得機票，飛赴漢口。

我在漢口時，得陳布雷先生的介紹，參加軍事委員會參事室工作。直到廿七年九月間，參事室奉命遷重慶，因此我又只好隨着中央黨部的大夥疏散船隻，前往重慶。到渝後，在柴家巷附近剛巧租好一間寓所，還沒有從客棧裏搬進去，却連接布雷先生自漢口發來兩通電報，促我前往長沙擔任湖南省政府秘書長的職務。我因為和當時的湘省主席張治中將軍自問並無深交，覆電請布雷先生為我向上峯婉辭。他又來電催促，說這是文白先生親到武漢商量的結果，並業經呈奉蔣委員長核准，勸我速即遵命往湘，萬不可再行推辭。我迫不得已，只好再把家眷送到成都安頓，自己坐民生公司輪船到宜昌，再換船前往長沙。我還記得當輪船到長沙時，正是十月九日晚上，那天恰逢中秋佳節，一輪明月，萬里無雲。可是往岸上一望，燈火全無；寂靜無聲。船上管事人就說，一定有空襲警報，只好滅了燈靜悄悄地候着。直到十一時左右，警報解除，省政府總務科方科長一志兄派人到船上來招呼我，幫我提了一個箱子上岸，坐車到中正街交通銀行，介紹我和行長魏雲千先生相見後，就借寓在該行三樓的一間客房裏。牀鋪被褥，文房四寶，總算一應俱全。明天雙十節，一早我就由方科長來陪同前往省政府，和張主席相見，並出席國慶日的朝會。

張主席每逢開會的排場：全體職員先在禮堂裏排班站立，待一應就緒之後，張主席纔在軍樂悠揚聲中嚴肅的走入禮堂，大家自然立正，屏息以待。他讀完國父遺囑後致詞時，洋洋洒洒的說了一番大道理出來，不僅國慶日一天為然。那時張主席所標榜的是所謂治湘三大政策。其時因為他的民政廳長胡次威奉命調任四川民廳，原任秘書長陶履謙調長民廳以繼胡之缺，屢辭其所兼秘書長的職務，乃請中央派我

前往。財政廳長尹任先，建設廳長余籍傳，教育廳長朱經農，都是原班人馬；而他的幕府中人還有今行政院秘書長黃少谷先生，和所謂「國大之花」唐舜君女士的故夫雷嗣尚先生，以及夏維海、劉孟純、董世綱、方一志諸君，不可謂非濟濟多士。此外在軍隊做政治工作的人物如郭沫若、田漢之流，那時也都由武漢退到長沙、岳州一帶來活動，自然也都是張主席「禮賢下士」的對象。

長沙大火的內幕

當時任第九戰區長官的是今行政院長的陳誠將軍，不時也從前線回到長沙來和張主席有所商議。我在湘省府辦公不到二三個星期，忽見市面情況有些異樣。大概武漢會戰的軍事轉緊，大軍陸續撤退。到十月廿五日武漢撤守後，蔣委員長飛駐衡山，坐鎮南嶽。從此長沙街道上的人力車和湘江裏的船隻日漸減少，有些商店並且上了排門板，貼出「暫停營業」的招牌。及十一月初，甚至警察崗位上的警察也少了起來。我隨即報告張主席，請予注意。有一天，我在中正街散步，忽然看見很多商店或住戶的牆壁或門板上用白粉寫着很大的「日本字」，大概是告訴日本軍人，你們不想念家中的妻兒？我心裏大為疑慮，難道敵軍馬上要進入長沙嗎？否則爲什麼敵騎未至，而我方先自己有這種舉動？並且那些日文的最後一行，寫着某某政治部的第幾大隊字樣，這分明是官方所授意宣傳的了！我於是立即報告張主席，請其有所指示。他唯唯否否，若無其事。我也摸不情頭腦，只好認爲此乃軍國機密大事，小吏不敢問問的了。在此種謠言紛起的驚疑情況之下，商人和全城市民的惶惑不安，可想而知，於是商店關閉者更多，人力車輛愈來愈稀，全市到了十一月十日左右，可說已成了死城！

可是張主席只有告訴我們，沅陵地方本來有省政府的湘西行署，將來可爲退路而外，從未在省政府會議席上討論此一撤退的重要問題。十日那天，蔣委員長從南嶽到省城來視察，張主席進謁後回來，才囑我們秘書長廳長及省府委員一齊前往行轅請示。當我們見了委員長時，我因爲受了幾個國家銀行的囑託，冒昧請示，軍情緊急，應否准許幾家銀行先行設法撤退，以免臨時匆忙，遭受意外損失？委員長指示：可以通知他們準備，隨時同省政府共進退。委員長對同仁苦撐，慰勉有加，大家都覺得非常興奮。回來報告張主席後，我即通知交通銀行魏雲千行長，請其轉達各國家行局，有所準備。過了一天，到十二日，係國父誕辰的例假日，街上行人絕少，簡直像新年一般，而站崗的警察也很難找到一個。我大爲奇怪，又打電話報告張主席，仍然沒有得到什麼指示。上午十一時許，方始接到張主席電話，要我通知各廳長委員於下午四時齊集在城外張主席的官邸（卽唐生明的公館。唐生明那時帶了電影明星徐來女士在常德做警備司令，故他的長沙公館空着沒用。）聽話，有要事商酌。我當時意想到前方情報吃緊，就囑秘書長處同人對重要卷宗有所準備。四點鐘我們都到了那裏，張主席只向大家說，日軍已由岳州南下，逼新澧河，省府還是先撤湘西爲妥。他和財政廳尹廳長暫留長沙，秘書處酌留一兩位秘書及科員待命，其餘由秘書長廳長率領，當晚出發前往沅陵，極遲明天早晨必須撤退等語。時間既非常緊促，我們當然也等不及再來研究理由，趕緊大家回到省府，動員全體員工，整理文卷及必要器材裝箱上車。其不必要保存的文件並須焚燬。一夥兒手忙腳亂，直到晚間十一時方勉強就緒。我乃回到交通銀行寓所，一面促各行局也準備連夜撤退。一面提了我自己的衣箱到省府來，裝上行李車上。那時張主席在廣播電台上的紀念國父誕辰演說也已講過，並沒有再和我們通電話。我們考慮到如果大批車輛向西渡湘江，一定會在

渡頭滯擱，遂決計寧可繞道向南走湘潭湘鄉再兜回到益陽常德去，路雖較遠，車必較少，或反能早到沅陵。於是卡車小車約共十餘輛，一字長蛇陣，浩浩蕩蕩的向南疾馳，其時已午夜十二時左右。果然往湘潭渡口，車輛並不擁擠，不到一小時都過了江。那晚月色皎潔，車不停輪的跑。第二天清晨過益陽時，外面謠傳長沙昨夜有火災。我們疑信參半。午刻趕到常德，唐生明司令證明了長沙昨夜大火，那時尚未全熄。並且說張主席有長途電話，命令我們再回長沙議事辦善後。我們大家都猶不透究竟怎麼一回事，決定先趕到沅陵，卸下文件器物行李等等再說。傍晚，我們到了沅陵，胡亂吃了一頓晚餐後就重上征程，趕回長沙。因為沅陵行署方面也接到長沙電話，催促大家回去，自不容我們就延一刻了。

第二天上午趕到長沙城外唐生明的公館裏見張主席，沿途還望得見城內火頭，遺骸猶在，那可以說是一整整燒了二十多小時。張主席那時才告訴我們，當十二日那天，前方軍情吃緊，深恐敵軍立刻會攻進長沙，因即預備「焦土抗戰」——這是當時流行的漂亮話。就秘密分配火油破布等等燃燒物，分了地段，交託警備部隊及警察局等各別負責，靜候上級命令指示，再實行放火。（按，那些事大概或因屬於軍事機密範圍，所以張主席從來沒有在省府會議席上提及，也絕未向省府委員廳長及秘書長中任何一個人談到過，當時大家聽了都有駭然之感。）張主席續稱，那晚上他在某一位外國朋友家裏有約會，九、十點鐘回到官邸，街上平靜無事，大概十二點半左右，他方就寢。（這正是我們省政府裏許多車輛出發赴湘潭的時候，街上的確很少行人。）不料到了後半夜兩點鐘左右，他的副官敲他的房門，報告好像城裏有火，他就披衣起來，到陽台上遙望，一面打電話到警備司令部詢問。說時遲，那時快，電話還沒接通，火頭接二連三的起來，已顯得決非一處地方。他說他自己感覺得不妙，連催副官接通電話，可是始

終不通。歇了不到半小時，長沙警備司令鄧悌匆匆忙忙坐了車子趕到，向張主席請示，究竟怎麼一回事。因為他也在睡夢中驚醒，不知道命令誰個發下來。他們倆人一想事有蹊蹺，立刻發動消防人員及警察保安團隊分頭救火，可是那裏救得呢？一直燒到第二天的下午，火勢方緩和下來，然而長沙城內幾條著名熱鬧大街中，如中正街八角亭一帶，以及很多大街小巷，已經一片焦土了。最可憐的，老百姓事前並不知道，有許多人關了店門在裏面做好夢，却只能臨時逃出個單身。至葬身烈火中的，自亦不在少數。當時大家聽了他的簡略報告，都以為眼前只能先起辦災民救濟和一切善後，而追究責任問題，自屬軍事範圍，省府固無權討論，但省主席總應向中樞自請處分。

「三大政策一把火」

我們在長沙，就大夥兒在主席官邸裏就擱了兩三天。蔣委員長也親自到長沙來處理此一空前的大火案。軍法審判的結果，把長沙警備司令鄧悌和省保安團團長兼省會警察局長徐某兩人槍決，以平民憤。張治中的省主席只落得一個「革職留任」的處分。

我在那一二天內，曾溜進城內看看市面情況，只覺滿目瘡痍，老百姓有的還在殘火堆裏尋找遺物。我借寓的中正街交通銀行，也盡付一炬，只剩頹垣殘壁。後來我在沅陵遇到魏雲千行長，他告訴我，他們搶運鈔票文件帳冊，裝箱上車時，幸而還未起火。可是他們的車輔擠在湘江東岸渡口時，第二天清晨敵機光臨，轟炸掃射在渡口候船疏散的車輔和人民，損失死傷的便不少。

當時湖南民間就流行着一副奉送張主席的聯額，倒可說是輿論的反映。額是「張皇失措」。聯是「

治績云何？三大政策一把火」。「中心無主，兩個人頭萬古冤」！聽說當時重慶的政府當局和民間輿論，對長沙大火，都非常憤慨。張將軍雖然還沒有丟官，氣卻似比先前好了一些。

我們由長沙回到沅陵，處理省政府日常的事務，張主席還多半仍住在長沙；有時我們還要到長沙去開會，往來頻繁。直到第二年的二月中旬，國民黨因為汪精衛在河內發出變電妄主和議；召開中央全會，我向張主席請假，由沅陵沿湘黔公路，經貴陽前往重慶出席會議。道經貴陽時，閱報方知湘省政府改組，薛岳將軍繼任主席。我當然也連帶去職，不必再回湖南了。到了中央全會開會以後，張治中不久也到重慶。我和他共事的兩三個月一段因緣就此結束。

此後，我在重慶供職於中央宣傳部，先後襄助葉楚傖、王世杰兩部長，處理國內宣傳事務，（國際宣傳由董副部長顯光負責）；而張治中將軍則先後接替陳誠將軍之後，而出長政治部兼青年團中央團部的書記長，當然又紅極一時。政治部裏的郭沫若、田漢、陽翰笙一流人物，常常在戲劇方面鬧出許多問題，蓄意對國民政府諷刺攻擊，而張治中安之若素，視為無關痛癢。至於赴延安，參「政協」，儼然以「民主將軍」活躍於其間，識者當早知其人格了。（香港新聞天地三二〇期）

顧維鈞聲討吳國楨 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從吳國楨案發生以後，一般比較客觀的海外華僑，除了對吳國楨寄迹異域，詆譏祖國，絕不予以寬恕外，所不能釋然於懷的有兩點：（一）政府除將吳免去官職，另由國民黨中央黨部開除吳的黨籍而外，對於外傳吳在任內所有的劣跡，至今尚未有確實事實宣布出來，總檢察官的下令偵查，也尚無下文。如果長此拖延，不按照法律進行，則所指控吳的罪案，似不能予天下人以共見。（二）吳國楨屢次發表的函件，不論其內容所指如何，但他既以吾國民政府為對象，儘量要以「出賣家醜」為快，則代表國民政府的駐外使節，至少駐在美國的使節，似應負起責任，替政府對外有所辯正。總之，海外華僑，旅美既久，他們耳濡目染，樂見民主作風。他們以為吳國楨的公開叛國，固然別有用心，但政府要當根據法律和事實，作正當的辯論，以澄清他所散播的似是而非的空氣，切不可只讓他一個人隨便放言高論，以為用緘默來對付宣傳，就可不了而了。

疑雲遍佈美國

可是自該案發作之日起，除紐約世界電訊報早有短評捧吳外，他如紐約時報，波士頓的基督教科學箴言報，波的摩爾太陽報，都在三月十六日同一天刊有社論，詞氣之間都為吳函攻訐之詞所動。雖紐約

時報還稱譽年來國府施政頗有進步，希望美國援華政策不受吳函的影響；但他們大體上似乎都不免相信那做過三年之久的臺灣省主席所說的話有幾分值得注意之處。在這種疑雲騰布的空氣中，如果我們不從事實上作有力的宣傳，予以澄清，那麼我們政府的國際宣傳工作，大可不必再幹，樂得省些錢。

三月底，我在紐約華美日報就看到一篇讀者寄來的短論，深怪我國的駐外大員，對這件事所取的袖手旁觀態度。此無異默認吳函所言，無可置辯；在政府立場上是一大損失。幸而到了四月二日，華美日報接到中國駐美大使館郵寄的顧維鈞大使一篇演講稿，文長十九頁，約五六千言，係準備那天晚上出席費城的政府社會科學會年會時演說的，我讀了心頭為之一快。顧大使抓住了這一機會，借着該學會請他所講「美國與新中國」的題目，發了一篇很有價值的議論。他雖然沒有提及吳國楨的姓名，但其中有一段辯解國民政府所推行的民主政治以及政治部制度時，其用意顯然在糾正美國友人的視聽。

一篇有力演說

顧大使，不消說得是中國的一位老外交家，馳譽國際，盡人所知。他由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學位歸國後，一直就跨上外交舞台。他初次奉命持節，出使美國，年紀不過廿七八歲，真所謂翩翩少年。如今他已六十六七歲的老人了。去年艾森豪威總統就職以後，中美聯誼會曾借座紐約華埠的太平洋酒家，舉行慶祝晚宴，中美人士到的有四五百人，座無虛席。當時會長于斌總主教請了兩位貴賓演說，一位是那時方由臺灣訪問歸來的亨利魯斯先生，另一位就是顧大使。我那晚看見他的鬚髮都已斑白，但精神依然矍鑠。惟和在抗戰期間顧大使回國述職，我在重慶嘉陵賓館訪問時所見相比，顯然十年之間，已使這位

壇佔健將蒼老了不少。去年六月十五日美南的門羅城舉行「蔣總統日」，顧大使曾被邀前往演說，可惜我離不開紐約，沒有躬逢其盛。這次讀了他的演說稿，雖然華美日報限於篇幅，不能全為譯載，但我覺得它是最近我們的外交官所發表的稀有文章，有予以表揚的必要。當然，「威靈頓頓」的主意，在於痛駁那些妄圖對中共採取姑息政策者的謬說，而對吳案的辯解不過是一種副作用。可是在目前有些時髦人物想以處於「超然」地位自居的環境中，顧大使能當仁不讓，一馬當先，為國家為政府來說話，無論如何，不能不認它為「老當益壯」的獅子吼。

在那篇有力的演說詞中，顧大使首先指出所謂「新中國」，表面上看似有兩個中國，一個是現在暫時播遷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一個是共產黨在大陸上自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其實後一個並不是中國。他說：北平政權自稱為「民主專政」，這便是自相矛盾。實際上，只有專政而無民主。如所周知，中共藉蘇聯之助，以武力奪取政權，他們並無選舉，其絕對的政治權力乃掌握於蘇聯型態的政治局。他們所謂公民，只限於共產黨黨員和同路人，其他只是他們所主宰的臣僕，毫無權利。此種制度乃最專制的極權統治。中共所用以維持政權的方法，無非用不斷的清算手段，進行其恐怖主義的政策。

顧大使於是列舉中共在大陸上所施行的奴工制度、特務警察、集中營、大屠殺、強迫遷徙、焚燬書籍、破壞道德、搗亂婚姻、拆散家庭等等罪行，證明中共偽政權的所作所為，在精神上行動上都絲毫沒有中國的氣息。真正背後的主人是一羣所謂蘇聯顧問，他們是替克里姆林宮來看守這批中共頭目的。

相反的，對於現在暫時退守臺灣的國民政府，顧大使認為代表着真正的中國。他說：「這是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蔣總統於一九四八年由國民大會依據憲法而選出，兩星期前（按指演說時的前兩週），

又依法當選連任。總統而外，有行政院，相當於西方國家的內閣，對立法院負責而執行政務。有監察院，由各省市參議會選舉產生，代表各地區，對官吏負糾舉彈劾的責任。有立法院，由人民普選產生，其職權相當於美國的國會。它制定法律，通過預算，並有權質詢行政院院長和政務委員。地方自治政府在臺灣已很普遍。縣長市長，和省縣市議會的議員都已由人民普選產生。如果和大陸上共產政權下的獨裁相比較，臺灣在國民政府下所推行的民主制度要高出萬萬了」。

接着，顧大使就不客氣地對於那些蓄意抨擊國民政府的人，指出他們的錯誤。他先說，批評政府是每一中國公民在憲法上所應享的權利，而且在民主國家，這種政治批評一些不算稀奇。不過他要求批評的人注意一點，即臺灣和其所屬島嶼，現正面對着來自大陸上的中共武力威脅。臺灣因此常在戰爭狀態中。他說：「在這種情況下，凡中外公平的觀察家，都因為臺灣雖在戰爭狀態中，而國民政府仍能建立並推進代議政治和民主制度，有如此進步的成就，而曾表示驚羨」。（按：這無異駁斥了吳國楨所謂非真民主的謬說。）

顧大使認為不但臺灣八百萬軍民擁護政府，即海外一千二百萬華僑，除極少數外，亦都擁護國府。甚至大陸上的人民也無時不在仰望這個政府去援救他們，使他們能在殘暴的中共虐政之下獲得解放。他並且引了投奔臺灣的一萬四千多的反共義士，為其顯著的例證。

解釋政治部作用

關於吳國楨所指控的政治部一點，顧大使有如下的議論。他說：「政治部的設立，驟看起來有些特

殊，因為西方國家的國防體制裏沒有類似的機構。但如果從大陸上國軍反共戰爭的經驗中去體味，這一部就覺得有其必要，尤其在目前的階段。政治部的工作很多：一是反間諜工作，一是士兵政治教育；其次是用慰勞軍眷和士兵的方法，鼓勵士氣。各種運動、電影、戲劇、一切娛樂，及訪問軍眷等等，都是該部的任務範圍以內的事。這些工作，在美國有各種機構或社團來擔任，而且也認為同等重要的。此外，檢查部隊士兵的忠實程度，以報告其上級官長，有所考察和警戒。鑒於過去數年間發現過幾件共黨滲透的事件，可知此種工作為目前所不可缺少」。顧大使更以美國的FBI相比，證明臺灣在防止間諜的前提下，為保衛寶島的安全而提高警覺，乃戰爭狀態中自所不免的事。

顧大使對於美國軍事顧問團在蔡斯將軍領導下的工作，加以稱譽，謂對中國六十萬兵力的加強，已有成效可觀。特別提及經援，他說，「在中國政府與美國各機構代表間的合作之下，已保證使美援的每一美元作誠實而有效的使用，美國友人甚且認其足為亞洲其他接受美援國家的模範」。他更指出中國政府具有決心，要使美援在臺灣有最大的收穫，保證安全，穩定經濟，增進人民福利，不僅是他個人的私見如此，且屢見之於美國外交軍事經濟各方面駐臺代表的官方報告，而曾經訪問臺灣的美國名流，各國會議員和新聞記者，回國後都能加以證實。他並且舉出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遠東小組委員會主席史密拉參議員去年十一月的報告為證。史密茲說：

「和兩年前相比，我們覺得臺灣的政治穩定，和經濟情況，已有顯著進步。假使此種進步繼續下去，國民政府將成爲一種繼長增高的重要力量，足以鼓勵大陸上的中國人對毛澤東政權的反抗。臺灣可能作爲中國人民對毛共不滿而重整旗鼓的動力，同時可成爲中國民主政治反抗毛共極權的一種强有力的心

理基礎」。

引了上面這段話後，顧大使更指出，史密茲在他的報告中竟稱譽臺灣為「遠東民主的陳列所」。

最後，顧大使講到所謂承認中共政權和中共進入聯合國問題，他對姑息主義者痛加駁詰。英國承認中共，而中共偏不承認英國，甚至等了四年，英國在北平的代表還沒有被周恩來接見。英國在大陸上的投資，如倉庫、碼頭、礦產、工廠、報紙等等，幾無一不被沒收，甚且勒令封閉。英國人在受拘禁驅逐之後，仍須負責籌款匯往大陸，名為發給其所雇員工的新工，實則無異將外匯貢獻中共。英國所遭受的這種恥辱，有英國外相艾登認為關係並不圓滿的話可為證明。英國如此，其他外人所受的虐待，更不待言。再以中共參加韓戰，虐待並屠殺戰俘而論，中共不但屢次為聯合國所譴責為侵略者，而且其極權獨裁威脅亞洲和平，自為有目共睹的事實。

顧大使明告美國友人：「中共頭目雖屬中國人種，但他們的思想，意念，和其政治上的設施，正如那些實際上控制中國大陸的上萬蘇聯顧問一般，絕不能被認為中國人。……中共政權不過克里姆林宮的支部。共產國際的遠東局設在北平，秉承莫斯科的指導，在亞洲進行其滲透搔擾的戰爭。……中共所進行的「仇美運動」，在學校、戲院、報紙、廣播、講壇、民衆大會，到處都責罵美國為「戰爭販子」，為「帝國主義者」。……凡美國留學生不肯抨擊美國的，都被拘禁，視為「美帝的間諜」。為強迫人民參加這種醜惡運動計，成立了成千成萬的中蘇友誼協會，普遍佈置於城市鄉鎮，使人民不能不跟着他們

親蘇仇美——

請美國記取教訓

與中共偽政權相對照，顧大使指出臺灣的國民政府，「於努力保障寶島的安全外，更致力建立代議政府和推進民主制度。在思想行動上，它尊重中國的傳統精神，珍視孔子和其他古聖賢的教訓。就國際關係而言，中華民國一直執行和平政策，與友邦合作，共維世界和平。它是聯合國的發起國家之一，首先在舊金山簽字於聯合國憲章。……自由中國對集體安全的原則信念甚堅，它爲了實行此一原則，從來多願出力相助，雖然此種助力不能常爲聯合國所接受」。（按，韓戰初起時，我國願派兵參加援韓，而聯合國及美國置爲緩圖，即可爲顧大使此言的鐵證。）

在闡述一百十年來的中美友誼以後，顧大使正告美國知識份子稱，「事實上，現在只有一個合法而真正的中國政府，那便是在臺灣的國民政府。……美國如果欲繼續維持並發展中美兩國間的友誼和合作，只有在臺灣的真正『新中國』携手，因爲它不但得臺灣八百萬人和海外一千二百萬華僑的擁護，甚至也是大陸上四億七千萬中國人求得解放的希望所在」。他在揄揚杜爾斯國務卿和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魏理參議員兩人最近關於日內瓦會議的嚴正言論之餘，根據他的以往經驗，判斷着：「凡犧牲正直和平等基本原則，而企圖對共黨姑息，以交換共方對韓越問題的善意諾言者，將必是政治家的重大錯誤。共黨的毫無信用，舉世所知。他們在雅爾達、德黑蘭、波茨坦所作的允諾，履行成績如何，對自由世界應是一種重大的教訓，嚴重的警告」。他預料中共爲圖取得外交上的承認和進入聯合國計，說不定會假妥和平姿態，與自由世界的代表簽訂什麼協定。因爲共黨也許認爲日內瓦會議是它採取外交攻勢以代替

軍事攻勢的機會。但顧大使鄭重警告美國人：「北平的保證並不比莫斯科爲可信賴。……須知史太林曾對一個附庸國的代表們說，『條約比一片碎紙還無用，因爲你不能再寫上什麼』。……若說容許中共進聯合國，大家不應忘記聯合國大會曾有正式決議案，指責它是侵略者。如讓他跨入此世界組織，那無異給侵略者以獎賞！這種謬妄舉動，對於鐵幕內幾萬萬被奴役的人民，和亞洲愛好自由的人民，在精神上予以何等打擊，難於想像的」。

近來有不少人存心姑息中共的，持着一種謬論，說聯合國是全球性的組織，故所有國家都應加入，不必問他們的政治觀念如何。顧大使對此，痛予駁斥。他說，「那些作此主張的人，忘記了聯合國憲章上所規定做會員國的根本條件。憲章明明規定，會員國必須愛好和平，履行憲章所定下來的義務」。他接着問美國友人們：中共在韓越的行爲，是可被認爲愛好和平嗎？杜爾斯國務卿說中共違反韓國停戰協定至少已有四十次，卽此一端，它可被認爲履行義務嗎？還有人辯稱，如果中共進入聯合國，究竟可使它多少受些約束，大家也可用討論方式來解決問題。顧大使毫不客氣地指出，這是一相情感的想法。他說，「蘇聯是聯合國的永久會員國。它有沒有因此，就不讓使中共侵略韓國並騷擾越南呢？」他更痛駁一般想把聯合國作爲「世界講壇」的謬說，謂「聯合國如果只變成辯論會，那各國納稅人民儘可抗議，他們的錢花得太冤枉了。」

我想在這裏把顧大使此番演說的重要結論，逐譯於後，以爲本文的結束：

「自由世界爲挽救亞洲的危機，必須對中華民國政府予以鼓勵和援助，使其有決心達成克復中國大陸解放中國人民的任務。不問其必需的戰費與犧牲如何，在臺灣的中國政府與人民，一定會踴躍從事。」

國府所有的軍隊雖不及大陸上共軍之多，臺灣軍民即使和海外華僑合計，其數量雖也有限，但其真正的潛在力量實寄於大陸上幾萬萬的人民。可靠的情報，使我們確實相信，如果國府解放大陸的軍隊一旦登陸，而佔有灘頭陣地，不但反共游擊隊，連大陸上的人民都在內，自會欣然奔赴於大森之下，從事於推翻可惡的中共政權之鬭爭」。

「如果此事實現，中華民國政府遷回大陸，開始推進民主政治，一如其在臺灣所施行的，那麼一個『真正的新中國』會嶄然露其頭角。它將是真正的中國，因為它將信守中國傳統，反映中國人民的精神。它將是新中國，因為它的民主不但以中國社會為建築的基礎，而且將以美國為模範。只有這個中國，美國人能深切期待着，為了相互利益而共同工作。也只有這個中國，在將來亦如其在過去，可為美國的忠誠盟友，為了締造一個和平、安全、繁榮的世界，作為他們的共同事業，而充分合作」。（香港新聞天地三二三期）

原子時代珍珠港事變（一九五四年五月一日）

最近因美國在太平洋中試驗氫彈大告成功，威力空前，而蘇俄也傳說業已製就氫彈，於是不僅美國人，即歐亞各國的人士，都在談虎色變，大家深恐原子大戰的爆發。又加以原子博士奧本海墨（Dr. J. Robert Oppenheimer）突然被美國政府原子能委員會宣布暫停其顧問職務，進行偵審其忠貞問題，乃又有好多神經過敏的人，疑心蘇聯的共謀在美國到處佈滿着，說不定任何時刻，蘇聯可以對美國來一次比十三年前的珍珠港事變更嚴重更厲害的空中突擊。恰巧在這時候，有一位退休的美國海軍少將蕭勃德（Rear Admiral Robert A. Theobald）出版了他的驚人著作「珍珠港的最後秘密」，繪影繪聲，令人更想像到萬一再發生一次更大的珍珠港事變，不知道美國社會將受到何等影響。

事隔一十三年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在美國爲十二月七日）的珍珠港事變，站在我們中國人立場看來，並不是幸災樂禍，的確是中國抗日戰爭中最大的轉捩點，我還彷彿記得，當年在重慶供職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時，一聽到中央通訊社報導這一驚人消息，大家不約而同的雀躍起來，一致認爲這是日本軍閥的自掘墳墓，從此中國單獨抗戰四年多的苦難日子一定可以盼望有出頭的一天。日本人的兇惡，雖然一時橫掃

南太平洋，幾乎氣吞全亞，但「狗急跳牆」，我們已可看出他們的外強中乾。在南京的汪記傀儡政權，那一幫人也知道他們的靠山不久就將倒塌。周佛海、丁默邨輩都紛紛想找門路，如何和中央派在上海的地下工作同志聯絡，可以預爲部署，作將功贖罪的準備。後來再經過三年有半，美國的原子弹降落廣島和長崎，日本天皇接受無條件投降時，周佛海丁默邨兩人總算設法實踐他們的諾言，將所部偽軍集中蘇浙兩省京滬滬杭沿線，維持地方秩序，不讓當時的中共「新四軍」和他們的地下活動份子有機會在江南一帶搗亂。平心而論，尙有不無可以減輕刑罪之處。

當一九四五年八月初旬，美國投原子彈和日本投降消息傳來時，我適因事在成都，寓中國旅行社的招待所。那天（八月九日）黃昏時分，起先忽然看見不少美國士兵跑進招待所的客廳裏，歡呼狂跳；後來又聽得外面鞭炮聲，四處紛起。趕忙出外一打聽，纔知道日本有投降的傳說。隨即打電話到春熙路的中央通訊社社一問，證實了這一喜訊。不過說日本天皇的詔書尙未頒下，正式宣布投降，或猶須稍待。但無論如何，止不住一般人的高興。明天，我就趕回重慶。其時，考試院長戴季陶先生（傳賢）有一天在閒談中，却對我慨歎着說：「原子彈帶給我們的勝利太快了！恐怕我們對勝利復員的工作，一切沒有準備好，來日大難，不可輕忽啊！」可惜我們當時都不免被勝利沖昏了頭腦，果然不出戴先生所料，在不到四年的短短歲月中，重復喪失了大陸！回想起來，真是我們大家的罪孽。

現在，事隔十三年，美國却又在嚷着要慎防「原子時代的珍珠港」了。此非我故意危言聳聽，美國全國空防總司令賈德勞將軍（Gen. Benja min W. Chidlaw）最近就曾說：「假使我們要避免在我們的頭頂上進行着大毀滅的可怕武器的戰爭，這個國家必須保有充分的攻勢和守勢的雙重潛力，使敵人

不敢冒昧先發動原子彈的襲擊。成千成萬的男男女女，在空軍陸軍中服務，使用雷達網，助以可能隨時起飛的戰鬥機羣，還有二十五萬愛國的民防義務車，組織成陸上監視團，晝夜不息的注意到天空不明國籍的飛機。當你們深夜聽到噴射機在高空疾飛的聲音時，要知道那些健兒都在爲了你們的安全而拚命，靠上帝保佑，我們不願見這個國家會遭逢到一次原子時代的珍珠港。」

一個瓶子兩隻蠍子

老實說，現在確已走上了美蘇兩國競造原子彈氫彈的時代，誠如奧本海默博士所比喻，「一個瓶子裏放了兩個蠍子」，其終必一拚的危險可能性很大的。不過奧博士因此自一九四九年起就鼓吹着勸美國不必急急進行氫彈的研究與製造，似乎見其一，未見其二。有不少人批評，如果杜魯門總統迷信了科學家們當時的勸告，不於一九五〇年一月決定加工趕製氫彈，那麼今天氫彈將爲蘇聯所獨家專利，蘇聯仍爲蠍子而美國將降爲蚊蚋，世界也就真要逢到三次大戰了。

美國年來所致力的，當然在佈置環繞鐵幕邊緣的海空軍基地，預備可以在必要時，從四面八方出發轟炸蘇聯的心臟地帶、工礦重鎮，和交通要區。自阿拉斯加、阿留申羣島起，沿日本、沖繩島、菲律賓、星加坡、沙地阿拉伯，以至土耳其、希臘、北非、西班牙、英、法、意大利，環繞到冰島、格林蘭、加拿大，以及美國本土，幾乎到處都有空軍基地，可以讓飛機車出發襲擊蘇聯。但民主國家在習慣上決不會採取先發制人的政策，尤其原子彈氫彈的使用，更必格外慎重。所以杜爾斯屢說「大量的反擊力量」，可見這些武力不過用於反擊，而決不是用於先發制人的。因此，擺在美國目前問題，只是蘇聯何

時突然空襲美國的問題，亦即是「原子時代的珍珠港」何時爆發的問題。

要研究此一問題，須先明瞭美蘇兩國的空軍實力與原子彈氫彈的儲存數量。就目前來說，美國的原子弹和氫彈自必較蘇聯的為多。但據專家估計，倘一旦蘇聯自付它所有的數量已足一次出發而即摧毀美國的重工業時，它或將不惜冒險作先發制人的閃電空襲。也許美國猝不及防，而不及還手，豈非首次空襲就變成了末次，空襲迫使美國屈服於蘇聯暴力之下？故美國目前所時刻計劃着的，便是要一方面擁有空前無比的空中反擊力量，使蘇聯有所忌憚，另一方面仍須加緊加密其空防，總要達到可以至少消滅來襲的敵機百分之七十的目的，方可安心。（專家們說，目前美國似乎只有可能打下入境敵機百分之三十的力量，故距理想尚遠。）

美國目前所擁有可以轟炸蘇聯的飛機，大約如下：（一）八個發動機的噴射機B五二型戰略堡壘機，航程六千英里，時速六〇〇英里。此類飛機數量極少，但方在努力增產中。（二）六個發動機和四個噴氣機的B三六型機，航程一萬英里，時速四三五英里。此類飛機已有很多大隊。（三）六引擎的中型轟炸機，即B四七型戰略噴射機，航程三千英里，時速六〇〇英里。此類飛機約八百架。（四）比二次大戰時B二九型空中堡壘改良的B五〇型超級堡壘機，航程六千英里，時速四〇〇英里。此類飛機約二百五十架。（五）B二五型空中堡壘機，航程四千六百英里，時速三五〇英里。此類飛機約二千架。

反之，在蘇俄方面，其飛機數量自非局外人所能確知。但據美國專家估計，約如下列：（一）六引擎的轟炸機，相當於美國B三六型的飛機，蘇聯稱為 Tupolev 110 型飛機，航程六千五百英里，時速五〇〇英里。此類飛機約一百架至四百架。（二）四引擎快速噴射機，蘇聯稱為 Ilyus hin 31 八型

飛機，航程五千英里，時速五〇〇英里。此類飛機亦約一百架至四百架。(三)仿製美國B二九型的Tupolev四型飛機，約二千架至二千架。(四)四噴射機的轟炸機，尙未知其符號，正在試飛中。

不問蘇聯的飛機和炸彈數量如何，美國專家斷定蘇聯目前已擁有遠程轟炸機，可以飛越北極天空，經北冰洋圈而向美國本土投擲原子彈氫彈。權威的美國飛行週刊指出，上述蘇聯的第一種飛機，即相等於美國的三六型機的一種，業已有大編隊的服務；換言之，如果將來數量充足，它們就可以超越北極而南征了。

蘇聯的空襲計劃

照美國五角大廈內戰略家的預測，蘇聯心目中的將來原子時代珍珠港的計劃大概如下：(一)蘇聯的噴射機和重型轟炸機將突然由北極圈飛來，向美國的氫彈工廠、原子彈工廠主要空軍基地，工業重鎮一齊投下原子彈和氫彈。(二)同時，由三百艘的蘇聯潛艇，向美國東西兩海岸，發射導管火箭，即使遠在南方的墨西哥海灣裏的港口，也難免受到蘇聯潛艇的襲擊。(三)美國國境以內的共黨，一定同時在地下活動，四出騷擾，用小型原子武器，新型毒氣，作他們擾亂社會秩序的工具。(四)在上述情況下，華盛頓、紐約、波士頓、費城、波爾的摩、匹茲堡、底特律、芝加哥、聖魯易、阿拉斯加、西雅圖、三藩市、洛杉磯、哥洛拉圖泉水城、奧瑪哈、塔克薩州的華拉要塞、紐奧連等等，都有遭受蘇聯空軍同時突襲可能。(五)同時，蘇聯爲防止報復計，必發動飛機，襲擊美軍在國外的海空基地，格林蘭、冰島、英國、北非、希臘、土耳其，乃至日本、沖繩島等等，亦將爲蘇聯投彈的目標。

美國人所日夜面對着的威脅，正像上而所描寫的藍圖。可是美國並不像珍珠港時代的太平洋上海空軍被矇在鼓裏睡覺。指揮美國空防中心所在地的哥洛拉圖泉水城，有兩位將軍在主持。一是前文業已提及的空防總司令賈德勞將軍，一是陸軍高射砲團司令魯易中將 (Lt. Gen. John Taylor Lewis)。凡雷達警報網、陸上監視網，各種情報網，都連繫在一起，日夜提防着。去年四月間曾經演習過一次假想的敵人突襲，東北西北同時俱來。今後可能在任何時候再來演習。最近美國已和加拿大商訂辦法，分擔經費，在沿北冰洋區加置雷達站，使美國各大城鎮，至少有六小時的空襲警報，可以準備臨時疏散。美國一三七大隊的空軍中，有三十四大隊用於防衛。李梅將軍 (Gen Curtis Lemay) 的戰略空軍，負出擊的任務；而賈德勞的防衛空軍則負攔擊入侵敵機的任務。至於魯易中將所指揮的導管火箭，更是截擊敵機的利器。

美國現當局的國防「新看法」，特別注重在保持着強大而迅疾的反擊力量，使蘇聯根本不敢貿然發動對美國的突襲，那是美國最好的避免「第二次珍珠港」的戰略。

珍珠港事件幕後

這幾天，我讀到蕭勃德少將的新著「珍珠港的最後秘密」一書，才恍然大悟。原來珍珠港事變似乎是羅斯福總統造成的可以使美國參加二次世界大戰的特別方法。就該書第五章裏所敘述的一九四一年十一月美日間的最後一段交涉，情形如下：

日本駐美大使十一月廿六日向日政府發出報告密電，略謂：那天下午四時四十五分，他同野村專使

訪國務卿赫爾，談判兩小時。赫爾稱：「我很抱歉對你說，我們不能接受日本十一月二十日所提出的草約建議。我不能不把六月廿一日的美國草案和九月二十五日的日本草案折衷，另提一新案」。赫爾當時就提出其方案如次：（甲）日本須承認美國的所謂四原則。（乙）（一）東京、華盛頓、莫斯科、荷蘭、重慶、曼谷之間，訂立互不侵犯條約。（二）日、美、英、荷、中、泰等國共同協議，不侵犯越南，並在越南境內維護經濟平等。（三）日軍自中國及越南完全撤退。（四）日本和美國雙方允許，對中國除蔣介石將軍政府外，不贊助任何其他政權。（五）對華撤銷不平等條約及租界。（六）日美訂立最惠國待遇的互惠通商條約。（七）美日雙方宣布資金解凍。（八）穩定日圓的滙兌率。（九）不問日本或美國對第三國簽訂任何條約，雙方都保證不得視為本約目的相違背，或違反維持太平洋和平的宗旨：。

日本政府隨即於十一月廿八日發出如下的訓令：「你們兩位大使已盡最大的努力，但美國竟提出這種侮辱的建議。此為全出意外的憾事。帝國政府，決不能用它來作為談判的基礎。……談判在事實上顯然破裂。此已無可避免。但你們不要讓美國有談判破裂的印象，只是對他們說要再候本國政府的指示。你們可說，雖然本國政府意旨尚未完全明瞭，但想來帝國政府常是提出公正的要求，而為太平洋和平計，亦常願作最大的犧牲……。」

十二月一日，日本政府發給駐美大使館的訓令，指出規定的日期已近在眉睫，時局亦愈嚴重，但為避免美國政府的疑慮計，帝國政府已通知新聞界，說日美間雖意見懸殊，惟談判仍然繼續。

蕭勃德少將根據了美國政府的檔案，和當時陸海軍部所截留翻譯出來的日本密電文件，證明日本的

東條政府於對美談判失敗的前後，已蓄意規定一個最後限度的日期。初為十一月廿五日，後延展至十一月廿九日。過此期限，日本將有對美國不宣而戰的意外舉動。日本軍部及外交部，已迭次密電駐檀香山的領事，逐日報告美艦美機的來去行動及停泊數量。顯見他們的突襲目標為美國駐夏威夷的太平洋艦隊的領事，逐日報告美艦美機的來去行動及停泊數量。顯見他們的突襲目標為美國駐夏威夷的太平洋艦隊。其時蕭少將是統率一小隊驅逐艦的司令官，在太平洋艦隊總司令基墨爾海軍少將指揮之下服務。據事後調查獲悉，那些日本密電，逐日由軍事情報人員譯出後，用極機密方法，分送羅斯福總統、馬歇爾參謀長、赫爾國務卿、史汀生陸軍部長、諾克斯海軍部長等重要大員十三人。此外則菲律賓方面和英國也置有收取日本密電的機器，可以偵獲消息。惟夏威夷的海陸軍司令部却並無此設備。且東京方面亦從未將有關日本動態的重要軍事情報，轉電夏威夷負責防務的長官知道。蕭勃德少將因而推斷，這是羅斯福總統的機密戰略，故意造成引誘日本突襲珍珠港的計劃。

在珍珠港事變前十天，日本政府已密電駐美使領館秘密銷燬所有密電本及一切機密文件，這顯然是作戰的前奏。東京當局看得很清楚。但夏威夷的海陸軍長官絕未接到任何作戰準備的命令，且亦全未知悉日本對美之緊張情緒已到如此程度。以致一旦日機突然出現，美國兵艦或沉或毀者十八艘，飛機損失一七七架，士兵傷亡四五七五人，成為美國史上空前的意外災禍。蕭少將說，此在羅斯福總統，一些不是意外的。

我想，這樣故意造成的珍珠港事變，不會再有第二次的。（香港新聞天地三二四期）



出版界趨向的過去與將來 (一九四三年八月)

抗戰六年餘，一切事業都從經過一次劇烈的破壞而重建復興。在文化事業的出版界，尤其可以看到。抗戰開始時，出版界所遭受轟炸的損失，可以說達到極點；因為敵人處心積慮破壞摧殘我國文化，對於出版界是和學校圖書館同樣的蹂躪，而播遷流亡之間的損失，也是不在少數。出版界在抗戰開始時，更確實乏了許多時候。但是隨着抗戰精神的鼓勵，著作家和出版界不斷的爲文化努力，忍着已往的創痛，負起當前的艱鉅，瞻望未來的光明，出版界不久便和後方的學校及圖書館配合起來，適應需要，慢慢恢復。抗戰轉入第二期的時候，我們便不再像從前感到貧乏，更不因物力逐日節約，文具供給減少，而有停滯現象，並且在日益滋長中。用三十年度和三十一年度作比較，三十年全國出版圖書共一千八百九十餘種，三十一年達三千八百七十餘種，剛剛增加了一倍。就整個出版界而言，這是我們最可忻慰興奮而不能不感謝著作家和出版家在艱苦中奮鬥。

然而，年來出版界的趨向是怎樣呢？

我們要明瞭一國家族學術文化的進步和發展，雖然不能完全從圖書刊物中看到，但是從文字的反映，出版品的趨向，也可以看到全民族的精神生活，我們試一注意三年來的出版趨向，可得一統計如左：

	三十一年	三十二年上半年
文藝	二八%	四一·七%
政治	一五%	一〇·六%
經濟	六·八%	五·五%
黨義	六·四%	三%
史地	六·八%	七·二%
教育	四·二%	一七·一%
哲學	三%	三·四%
科學	七%	四·二%

從這簡單的統計，我們可以看出最顯著現象，即文藝書籍的逐步增多，其他學科——除教育類因有教科書外——書籍的減少或不見增多。固然，文藝為生活的反映，也許因為文藝作家多努力於戰時生活的寫作，文藝作品足以激勵愛國情緒發揚抗建精神的當然不在少數，但從這也可以看出文藝作品之為社會所歡迎，顯示出人們傾向於以文藝作品來消遣生活，代替了其他研究工作。政治、黨義、史地、科學等書籍的減少，其中尤以科學書的減少，實為最不合時代要求的現象。足見人們歡迎軟性的消閒與刺激精神的作品。此種出版趨向的消長情形，實暗示問題之嚴重。我們試再以雜誌來看，三十年重慶出版的雜誌一百六十六種之中，純文藝者佔百分之十強（即十七種），至三十一年度，增至百分之二十一強（即二百二十種雜誌中，純文藝佔四十六種），也是同樣情形。而且愈是物價高漲生活困難的地方，軟性文藝讀物格外流行。現在昆明市上流行的三十餘種雜誌中，竟有十六種是戲劇文藝刊物。此種現象，實與抗建國策背道而馳，殊為隱憂。這是我們希望有所改進，也是社會人士所不會完全明瞭的現象，

而其中問題是何等嚴重！

近來出版界還有一種現象是我們所認為畸形而不應該的，那就是舊小說舊文藝書的翻印盛行。這事實，一方面顯示出出版界的缺乏新的作品，而另一方面可以透視出社會上不免有自我麻痹的現象。這是我們認為最可怕的事。我們並不是認為舊小說，舊文藝作品的不應當看，而是認為在這人力物力時間那麼可貴的場合之下，除非有時間、財力、精神、可以浪費在消遣之中的人以外，沒有一個人應該贊成把可貴的時間、紙張、印刷勞力用到僅僅為消遣的上面去的。教科書的缺乏，好些科學書因印刷紙張的困難而不能付印，而一方面却有這些翻印消遣品流行，這現象是何等可憐！

復次，因人文薈萃與地域的關係，全國文化不能在同一水準上發展，其程度隨地而不同。出版界情形正復如是。試以雜誌而言，三十一年度全國流行的雜誌七百七十餘種中，重慶因為是陪都所在，佔到百分之二十八強，此外各省市佔百分之十至十二者，僅成都桂林福建三處。貴陽祇百分之一，西康寧夏竟無一種雜誌刊行。尤可痛惜者，這許多圖書雜誌的出版品，很少能在接近前線各省編輯印行，而在事實上，最需要抗建國策的宣傳者却正是這些地區的人民。這種偏頗現象，更是值得我們注意而求調整的。所以，從上面的統計和觀察，我們認為今後出版方向，要從質的充實和量的分配兩方面去注重。

在質的方面，就是說出版品的內容方面，當然要切合抗建國策的要求。再切實的說，就是要切合實用。十二中全會總裁所指示實現工業化和實施憲政兩大經濟政治目標，是我們所當作為依據的。對於國民，應當殫精竭思去灌輸科學工業一類的知識。獎勵科學和工業研究書籍出版，以促成國家工業化現代化的早日實現。同樣的，憲法的要義，憲政的精神與基本知識，三民主義的民權主義，恐怕還不見得

爲人人所了解。爲了減少實施憲政的困難，出版界在這方面尤其應當特別加重出版分量。因此，我們今後所需要的是科學方面，不論人文科學、自然科學和應用科學的書籍，都應大量出版。而通俗科學的書刊，尤其需要迫切。在主義方面，則三民主義，尤其是民權主義，民權初步，五權憲法的闡述和淺顯的解釋，更望能多多出版。在文藝方面，我們需要偉大的、建設的、改進人生督促社會進步的作品。僅僅供給享受消閒，讓人們從而得到一些輕鬆的愉快，那不是我們當前所最需要的。在勝利將臨的今日，建設更爲重要，用文藝體裁去寫科學知識，寫教育和地方自治的實施等等，是文藝作家今後應該努力的方向！

其次，說到量的分配問題。我國幅員廣大，文化水準的不能普遍均勻。教育不普及固是一主因，書刊的不能廣佈全國也是重大原因。今後應當在這方面謀改善。出版家遍設分處到內地去，到前線去，到邊疆去，讓書刊向內地流通，向前線流通，向邊疆流通。現在有許多作家都到西北去試探，也有書局到迪化等地方去設分局，這是極好的現象，也是最迫切的工作。我們不要把精力化在已經繁榮的都市裏，到處都是肥沃的荒園，要我們開發，廣播文化種子。這責任是落在作家和出版家的肩上。當然，這其間所需要政府的倡導獎勵和物力的補助是很大的。

戰時文化工作是最艱苦的。年來作家生活的清苦是最堪同情，出版業也不能和別的能夠囤積居奇的商業可比。過去作家和出版家員能本著貧賤不移的精神，簞食瓢飲的樂業，固守着自己的崗位，爲抗建大業努力。現在我們希望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在出版品的質的方面，希望這些更適合抗建的需要，而

量的方面要多多分配到小城市，前線，和內地去。思想不統一，文化失調，往往是致亂之因。從這一點看來，出版家和著作家如果意識到在意志統一上所負責任的重大，便會感到有加倍努力的必要了。（重慶出版界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編輯旨趣（一九四三年十月）

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我中華民族，立國迄今，垂五千年。並世國家，其文化之悠久，殆無其倫。近百年來，他從一個堂堂大國，淪爲被人輕侮凌辱的次殖民地。不平等條約的桎梏幾乎把他束縛得透不過氣來。於是有由權外而媚外，精神上喪其所守的趨勢。不但外人往往以爲中國已無可爲，卽國人亦幾懷疑其立國之道是否還能存在。到了國父倡導三民主義，鼓動國民革命，數十年間，民族意識之火炬始復大放光明。而尤其自抗戰軍興，全國軍民在總裁領導之下，作堅苦卓絕的鬪爭，把世界上所謂三大強國之一的日本，打得日暮窮途，陷入毀滅的深淵。於是全世界人士方曉然於中國立國精神確有可以珍視者在。

抗戰一開始，總裁就昭告全世界人士說：「我們是有無窮的威力」。這「無窮的威力」是什麼？中國的敵人絕不瞭解。中國的友邦也未必開始就瞭解。就是參與抗戰的全國軍民恐亦未必都全能瞭解。祇有讓事實來說明這個真理。

我們這雄偉壯烈的神聖火燄，在持久而普遍地燃燒着；它照耀着東方，也照耀到西方。全世界的人們，在驚奇，在禮讚。不瞭解的人說這是神祕的奇蹟，一個永遠猜不透的謎。祇有眞知灼見之士，才由此而逐漸地體認出中國民族力量之雄厚，是導源於優良的文化傳統與民族精神；他們一方面歌誦這世界

古國的新生，另一方面却大聲疾呼的要效法「中國精神」。尤其是英國牛津大學的教授們，一語道破，他們說：「英國人士對於中國文化學術之真義的價值，在過去不無疑惑之處。但時至今日，一方鑒於狹義國家主義的橫暴，一方感於中國反日態度之莊嚴鎮靜，究竟誰為世界文化的領導者，現在我們可無疑義了。」

這優良的文化傳統與民族精神，蘊蓄在每一個中國人的血液中，溶化而成爲自尊自信的高尚德性；更由這種自尊自信的高尚德性，凝結而爲自立自強的堅強力量。這種力量是內蘊的而不是外鑠的，是持久的而不是偶發的，是積五千年治亂興亡的洗煉，而創造成爲至大至剛的民族精神。在平時，我們是生於斯息於斯而不自知，可是一遇到國家危急之秋，祇要有賢明領導者振臂一呼，把全國的意志力量集中起來，則平日蘊蓄在每一個國民血液中的潛伏力量，便如疾風驟電，有觸即發，無堅不摧。這沛然不可抵禦的民族力量，是導源於四萬萬人的同德同心，而表現在舉國上下的共生共死。我們愈戰愈強的原因在此，我們「威力無窮」的關鍵亦在此。

這就是外國人所尊敬而要效法的「中國精神」！

近百年來，如果我全國上下，能够發揮「中國精神」，何致慘遭五千年來未有的變局，把民族生機斷喪殆盡？而最可痛心的，是我們在抗戰四五年之後，民族中還不免有自輕自賤的渣滓存留着。在長沙三次大捷消息傳出後，居然會有一些中國人說這是受英美太平洋參戰的影響；而有些人，還公然把鄰邦看作祖國，這真是道地的「文化奴隸」。文化奴隸們是僅僅具有中國人的軀體，而根本實已喪失中國人的靈魂。因此我們從事文化工作者，更應當倍加努力，不僅要珍重和寶貴這「中國精神」，並且還要發

揚光大；拿這聖潔的火燄，去焚化那些醜態百出的民族濇滓。這套「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編纂的動機，由此而起。

我們編纂這套故事集，既不是整理國故，也並非懷古幽思，更談不上復古傾向。它祇有一個目的，就是希望在建國文化的坦途上，貢獻力量，建築小小的基石。我認爲建國文化是建築在兩大基礎上，第一是發揚固有的優良文化，從根救起；第二是吸收最新的科學工藝，迎頭趕上。這套故事集就是第一個基礎上的許多基石之一。

有人說我們發揚固有文化，應當着眼於全社會或全民族，何必要先致力於名人傳記，宣揚這些一姓一家或少數人的事蹟？這種見解，似是而非。要知道歷史上所稱的偉人，也就是代表這個民族文化的結晶；要了解我民族文化的精髓，必先要研究這些偉人的事功學術及其影響。因爲多數人的活動，往往受少數人的感召。如夏禹的治水，孔子的教育，秦皇的統一，成吉思汗的遠征，國父的革命等等，並非一人一姓之功，而是全民族精神力量的總表現。況且我們敘述的方法，也不是爲某一個人作年譜，而是着眼於他對全民族的貢獻。現在我們發揚固有文化，決不是復古運動，而是含有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的重大意義。所以就歷史上選出若干偉大人物，描寫其所以成爲偉人的精神所在，其影響自更可深刻動人。譬如敘述大禹治水，僅僅敘述事實，還不如描寫大禹用什麼精神和力量治水而成功。因爲大禹治水的事實，在今天自然不會全部重演。而像大禹這位民族偉人，有志的青年自都可以「有爲者亦若是」。有了一位大禹，已經能够壯轉乾坤。假使有許許多多大禹，你想中國對世界的貢獻將如何偉大！由此可見本書的任務雖是檢討過去，而實際上未嘗不含有創造將來的使命。

我們一向衡定人物的標準，不外「立德」「立功」「立言」三者。這套故事集也大體上採用此法。有大德於天下，永爲國人頂禮膜拜者，爲民族偉人，列第一輯。有功勳於國家，或其事功人格足以激勵青年者，爲歷代賢豪，列第二輯。學術思想昭耀千古，堪爲我民族文化的結晶或代表人物者，爲學術先進，列第三輯。共凡三輯，都三十冊，如有必要，亦得增冊。如此，分讀可以知我民族精神之所寄托。今讀則可瞭解我民族文化的全貌。爲了普及宣傳，故寫作方法力求通俗，使讀本書者如看傳記文學。爲了節約紙張，各書的內容重質不重量，每冊的字數也以五六萬字爲度。

承各位專家學者熱忱襄助，使我這個志願得以圓滿成就，由衷的感激，實非筆墨所能表達。現既編纂就緒，刊行有日，謹將本人編纂本集的動機和志願，奉告讀者。（重慶出版界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英譯中國抗戰文學編輯弁言 (一九四三年三月一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軍隊在我國蘆溝橋挑釁而後，就發動海陸空軍聯合的力量於八月十三日進犯上海，對我國作全面的侵略戰。日軍殘暴的行動，不惟限於戰場上炮火之慘烈，以及飛機狂炸後方平民之暴虐，凡日寇所到的地方，都市即成灰燼。財物掠奪，人民即遭蹂躪。而婦孺所受的荼毒，尤非人類所能想像。日寇的一切罪行，誠為中外歷史上所稀有。

當我國被敵人進犯之初，全國同胞不論男女老幼，都能立即奮其最堅強的決心誓與暴敵作殊死戰，且坦然忍受戰爭所給予的一切慘禍而無所畏避。中國軍民首舉全世界反侵略的義旗，不但爭取中國領土之完整與主權之獨立，且獲以保障世界之和平與人類之自由。六七年來中國軍民剛毅勇敢之精神，以及悲壯慘烈之犧牲，前方後方無所分別。他們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演出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幾於罄不勝書，實亦為歷史上所僅見。

我國文學作家，當此國家空前患難之時，有的投筆從戎；有的慰勞軍隊。他們直接參加作戰，親見親聞之所及，產生了很多寫實動人的作品。即使沒有機會參加軍隊工作的作家，也都能堅守他們的文藝崗位，努力於抗戰文學的寫作，而為全國軍民供給精神上有力的武裝。在中國文學史上，這六七年來的抗戰，應該造成一個劃時代的抗戰文學時期。

抗戰文學的題材，多為血肉與起火之結晶。加以作家情感之激越，流血故事之逼真，當然足以深深地打動讀者的心坎。國際友人因此常以未能獲讀中國抗戰文學為一大憾事。這幾年間，我因愛讀文藝之故，披覽較多。承董顯光博士之囑，選輯中國抗戰文學若干篇，以供翻譯，作為我國戰時真實情況在文學之反映，以介紹於共同對敵作戰的盟邦。這幾冊書，就是選輯的移譯的成果。

我國抗戰詩歌小說劇本等作品，何止數千百種，現在要就這許多的作品中，選擇若干，自甚不易。深感珠玉滿前，極難割愛。不過全部介紹勢所難能，祇有限制選輯範圍，長篇巨著，盡行捨去，姑俟他日再有機會介紹，而此種僅以篇幅較短者為限。故劇本方面，成績最富之多幕劇，未加採錄，而僅取獨幕劇。小說亦以短篇為主。抗戰詩歌多取白話新體，而其性質類多敘事；此為我國抗戰文學之新收穫，讀者當亦感其新鮮與真實。此外復輯報告文學多篇，其藝術之芬芳或較淡薄，而情況之真實，有非親身經歷所萬不能道者，可供欣賞，當無疑義。

本書選輯之作品，十之七八為名家之作，其餘則為抗戰新起作家之成績。各作家之生平，凡是我們所知道的，都作簡短之介紹。間有一二，未能敘述者，實因在此戰爭期間未易覺得正確材料之故。

當我選輯之際，助我搜集甄審最勤者，則為徐蔚南君。徐君原為中國名作家之一，因自謙之故堅請不以他的作品入選，以示大公。特記於篇末，以誌感謝。（重慶出版界月刊）

抗戰期中的出版界（一九四四年八月）

一

在抗戰第八個年頭的今天，國家一切事業，從被倭寇的蹂躪破壞中，重新千辛萬苦的建設起來。教育、經濟、實業都是如此，文化事業的出版界也非例外。

抗戰以前，我國出版事業，集中在沿海各重要都市。以上海、北平、天津、南京、廣州爲中心，中尤其是上海的出版品要佔全國的百分之七十，所以上海又可說是我國出版事業的總樞。民國二十五年，全國出版圖書合計爲九千四百餘冊。抗戰開始便大減少。據內政部統計，自二十六年七月至二十八年年底，共計出版圖書爲一〇〇一四冊。二十九年到三十年可以說是出版界最貧乏的時候。香港淪陷，往昔出版業大中心的上海也全陷敵手，後方出版業還沒有建設起來。我們只看三十年全國出版圖書降低到僅僅一八九一冊的數目，就可以知道出版事業的被破壞到如何程度，而在這樣一個這樣一個情形中去謀復興，更可想見其怎樣的艱苦了。

二

沿海各省的相繼淪陷，可以說是我國最進步的文化區遭受蹂躪。全國藏書較富的圖書館都集中在沿海各重要城市，如北平圖書館藏書七十萬冊，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書五十萬冊，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書三十

萬冊，南開大學藏書三十萬冊，南京江蘇國學圖書館藏書五十萬冊，都因一時不能運出，大部陷于敵手。上海商務印書館的東方圖書館，則遠在二十一年「一二八」事變時，即遭焚燬。

私家藏書損失也是不可勝算。如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書，天津李氏木齋藏書，以及蘇州的各私家藏書，都是或被掠奪或遭焚燬。這公私藏書的損失，以及出版事業的摧殘，造成了教育文化界精神食糧的空前恐慌。然而，一切破壞都成了建設的刺激，種種蹂躪更引起了發憤的志氣。出版界看到這種情形，知道為文化努力須冒千辛萬苦去奮鬥。所以從三十年起後方各出版書店、印刷店如雨後春筍勃興，沿海各都市的書店印刷店都到重慶桂林昆明等城市恢復。雜誌社和出版社，也在後方各大城市開闢新的園地，尤其是陪都重慶。從三十年到三十二年，全國書店印刷店的分佈可列表如左：

地名	類別		店		店	
	書	印	刷	店	店	店
年度	卅年度	卅一年度	卅二年度	卅年度	卅一年度	卅二年度
重慶	三五	一四五	一四九	三三三	一三一	一二五
成都	一四八	一一二	一四七	一〇五	一〇六	一五三
桂林	三一	六三	八七	五三	四八	六七
陝西		六四	七二		七九	八七
江西	四三	七〇	六〇	六九	九三	八一
曲江	二四	二二	二〇	一九	二三	二七

福建	一一五	一一三	一〇〇	一一八
昆明	四八	四八	五九	
蘭州	一	二六	四三	五一
浙江	一九一	一四四	一〇四	
湖南	三六一	四三五	四五四	
黃陽	一四	一三三	七	
立煌		一三	一四	
恩施		六	一	
西康		五	四	
永安	五		一〇	
西安	四七		二五	
總計	七三四	一、二八六	六二九	四三〇
			一、三〇六	七〇三

上表雖不能十分準確，但亦可見大致的趨勢。因出版機構的日益繁興，出版品的加多，而且一年多也成了必然的事。從三十年到三十二年全國出版圖書可得比較表如左：

圖書出版數量，三十二年已達到抗戰前一年的半數了。雜誌的數量也是每年有增加。二十年全國雜誌五七三種，三十一年是七七六種，三十二年是七八六種。其地域分配重慶佔首位，次為成都，再次是桂林、福建、江西、廣東、昆明、西安、浙江。蘭州最少。本年度從一月份到六月份止，全國出版圖書統計如左：

類 別	冊 數	類 別	冊 數
宗 教 哲 學	九七	社 會 科 學	八〇三
自 然 科 學	五七	應 用 科 學	一二五
文 藝	五七五	史 地	三七九
總 計	二〇三六		

本年度上半年雜誌的總數量是七四五種。各地分佈情形如左：

地 別	種 數	地 別	種 數
重 慶	一〇三	江 西	九四

浙	四	廣	湖	安	湖	河	河	青	綏
江	川	西	南	徽	北	南	北	海	遠
一八	六二	四八	七四	二三	一四	三	一	一	一
廣	黃	雲	陝	甘	山	新	西	寧	
東	州	南	西	肅	西	疆	康	夏	
七四	五一	四七	二九	二三	一六	二	一	一	

從上列各表，我們可以看到近三四年來出版界的逐漸發展和進步。在數量上是一年比一年增加。本

年度出版圖書雖還只有上半年的統計，也已約略可以看到發展的情形。雖或本年度全年出版量會比上年較少，但是相差一定很有限。

三

從量的統計我們已經很清楚的看到，抗戰到了決定需要長期的時候，出版界便逐漸由貧乏而發展到日益進步。如果從質的方面去看，也正是一樣。

抗戰剛開始的一兩年間，出版品的內容可以說非常簡陋空洞，薄薄的小冊子只是一些所謂抗戰八股。沒有遠慮，沒有深謀，從當時出版品中就表現出來。等到太平洋戰爭開始。上海各重要出版家把全力移到內地。同時國營書業如正中書局等也增加了資本，計劃發展業務以後，出版品的內容才提高，學術研究著作才漸漸出版。於是這兩三年來任何方面都有名貴著作問世。

總裁手著「中國之命運」的出版，不但使國人明瞭中國近百年史事和外交，以及革命奮鬥經過，同時指示我們今後建國的方針與準備。

同樣闡揚國策指導建國途徑的書籍，如孫哲生先生的「中國與戰後世界」，汪少倫先生的「中國之路」，彭學沛先生的「建國概論」，等書都是精心結構之作。

在哲學和人生指導方面，貞元三書之出版轉變了抗戰以來出版界的沉寂和貧乏的空氣，其中「新事論」一書並可作為今後社會經濟建設的重要參考書籍。羅家倫先生的「新人生觀」與「文化教育與青年」，給予戰時青年的啓示更是深刻而熱烈。他如謝幼偉先生的「倫理學大綱」、汪少倫先生的「倫理學

體系」，也都是給人以修養的途徑。而本年陳立夫先生的「生之原理」偉著之問世，更爲學術界放一異彩、給人以生活及對宇宙認識的指南。他如熊十力先生的「新唯識論」、柯璜先生的「人生基礎哲學」、劉奇先生的「論理古例」，都是近年出版的哲理方面的力作。

在政治經濟方面，出版的書尤多。起先也都是些小冊子。最近一二年才有比較研究性的著作出世。政治類起先討論國際問題的書比較多，後來才轉到地方自治方面。最近因適需要，憲政方面的書出版較多了。如羅孟武先生的「憲政新論」，呂復先生的「比較地方自治論」，甘乃光先生的「中國行政新論」，陳柏心先生的「地方自治與新縣制」，都是研究地方自治與憲政必讀的書籍。正中書局最近出版的憲政叢書更可供研究憲政者參考。

經濟方面起先以討論經濟統制及物價問題的書爲多，近來才逐漸轉到工業化問題和利用外資問題等。重要著作如張天澤先生的「戰爭與經濟」，吳景超先生的「中國經濟建設之路」，董問樵先生的「國防經濟論」，伍啓元先生的一當前的物價問題」，屈寶三先生的「戰時物價之變動及其對策」，蔣乃銜先生的一最後中國工業建設之路」，趙蘭坪先生的一通貨外匯與物價」，高平叔先生的一利用外資問題」等。

年來合作事業日漸發達而普遍，關於合作經濟的圖書出版便日多。正中書局的合作指導叢書最可參考。

科學方面的書籍出版最少。三十年僅佔全出版量百分之七，三十一年爲百分之七·一，三十二年則更爲百分之三·六。本年上半年則略有增加，達百分之八。按照需要來說，當然這一數量是少得可憐。

的。

抗戰了六七年，國防方面沒有出過一本較好的書，去年楊杰先生的「國防新論」一書，才彌補了這缺憾。

有人說，從抗戰以來，沒有出過一本考古學的書，似乎認為史學研究未免貧乏。事實上近幾年來出了幾部名貴的歷史著作，如張蔭麟先生的「中國史綱」，陳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論述稿」，黎東方先生的「中國歷史通論」，金毓黻先生的「中國史學史」，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鄭鶴聲先生的「中華民國建國史」，都是極精博的著作。傳記之類無論中外名人，出版的很是不少，但都是零星或簡陋之作。比較有計劃，而求深入淺出的，要算今年勝利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一套叢書了。

最後說到文藝，那是近年來出版最多的一類。每年總是佔全出版量的最高百分數，如三十年為百分之二十八，三十一年為百分之四十二，三十二年亦為百分之四十一，本年上半年亦為百分之二十八。但是無論在詩歌或小說，都不曾出版過一部偉大的作品，這是最可抱憾的事。比較有成績的還是要讓戲劇，如曹禺先生的「脫變」，老舍、趙清閣兩先生的「桃李春風」，于伶先生的「杏花春雨江南」，沈浮先生的「金玉滿堂」，吳祖光先生的「正氣歌」等，都是近幾年來出版劇本中的佼佼者。

從上面我們可以知道近年來出版品質的概況了。

復次，自從海口被封鎖後，西文圖書的輸入便大感困難，而舊有的西文圖書隨着各圖書館的被掠奪焚燬而損失。同時因財力的限制，各大學也無力購置。抗戰第二年英國牛津大學教授石博汀博士熱心發起為中國募書。教育部曾經組織戰時徵集圖書委員會徵集圖書，當時曾有三千七百餘冊西書運到國內分

贈各大學圖書館，但是這還是英國未參戰以前的事。此後便因戰起停頓了，要看西文圖書便極端困難了。

在這困難情形之下翻印西書也成爲戰時出版界努力嘗試，如龍門書店便專心在這工作。據這書店負責人說，他們把翻印的書從上海運到內地來要損失到百分之五十以上。但是他們仍舊努力設法運進來。不過這些損失可就計算在售價裡。因此上海翻印的書運到重慶來，仍舊不是一般讀書人所力能購置。最近國際救濟委員會與教育部正計擬翻印西文教科書，共計有二十六種，都是理化、工程、機械、數學、電氣、氣象、動植礦以及水力建築等教科書。雖然預算要一千五百萬的鉅款，但是國際救濟會，美國聯合援華會及教育部共同負擔來實現這計劃，因爲這是迫切的需要。

四

三四年來出版界有顯著的進步是不可抹殺的事實，著作家出版家忍受極度的艱苦，以謀文化學術的發展，實在值得我們的欣慰欽佩。但是從幅員和人口比較起來，區區幾千種書幾百種雜誌是太不夠了。求量的加多，並求各地分配的平均是不可諱言的需要。而在質的方面，第一要更求適應實際與建國必需，第二消閒品的小說的翻印應儘量減少，以節省人力物力，第三多量出版指導生活和思想的著作。這是我們對於出版界殷切的期望。

三民主義的民衆教育（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在今年的「社會教育運動週」中，願略論三民主義的民衆教育。

首先，我認爲民衆教育百分之百的就是宣傳事業。原來「教育」（Education）是從 *educere* 一詞變化出來的，*educere* 的意義爲「指出」或「引出」之；所以教育的意義，我們若引勃爾格門（Paul Bergemann）的話，即是「成熟者指引未成熟者，使之達到與自己同樣狀態的一種作用。」至於「宣傳」（Propaganda）一詞，一般人常解釋爲“The scheme or plan for propagating a doctrine”（一種思維的傳佈的策謀或計劃）。所以，從「教育」與「宣傳」兩詞的表面詞意看來，兩者固似乎有其分野。前者祇求知識的傳授，後者則伴有某種思想體系傳授的成分；但是我們過細的研究，則覺得「教育」與「宣傳」兩者間具着深厚密切的關係，無論怎樣都無法給它們伸引到兩個不同的範疇去。

在中古時的歐洲，有許多研究學術的機關都是修道院。方今最著名的牛津與劍橋兩大學，原先亦是由許多修道院（College）合併而成功的。各學院的研究員（Fellows）與學生（Scholars）都是教徒。換句話說，那時候宗教與學術是不分開的，每一個研究員或學生都得宣傳他們的宗教教義。就是到目前在中國境內的教會大學，一方面在辦教育，另一方面亦以宣傳耶穌教義爲己任。不特西洋如此，即在

我國，自來亦從未將「教育」與「宣傳」分開過。儒家嘗認為「教爲政本」，那末什麼是政治的原則呢？太史公曾述其父之言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學者至今則之。」——儒家「以春秋爲政正之義」是一種政治思想，此種政治思想藉教育而宣傳。孔子以後一千餘年來，一般政治家一直奉行着，至於不輟。因此，國父說：「人民的天性……所以能够變好的原故，多半是由於學習，普通人要學習，便是不知。先覺先知的人要他知，便應該去教。教便是宣傳。」而在民衆教育的意義上說，尤其覺得「教便是宣傳」這句指示的確當。

國父說：「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民國十八年國民政府公布的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亦規定其教育宗旨爲：「中華民國之教育，根據三民主義，以充實人民生活，扶植社會生存，發展國民生計，延種民族生命爲目的，務期民族獨立，民權普遍，民生發展，以促進世界大同。」所以三民主義的普遍宣傳，實爲當今教育的最高標的，而民衆教育自然應該是三民主義的民衆教育。

普及教育，宣揚主義，既然如此重要，而到目前爲止，我國受教育的人雖然日有增加，但是受過中等以上教育的人，真是百不及一。至於我國識字的，根據國民政府年鑑第一回所載：受教育部積極推進的國民教育者，迄三十年代累計統計：「達三千零六十餘萬，佔全國識字人數的百分之六十二弱。」縱令加入此外非因受國民教育而識字的人百分之三十八，約爲一千餘萬人，兩共總計約爲五千萬人。最近三年未見統計，但識字者總數當不致超出九千萬人，僅達我國總人口的百分之廿。西洋人有句俗諺：「Knowledge is Power」（智識即力量），這句話的意思是：「凡有知識的人，他的智力與能力都比沒有智識的人強。」這句話擴大言之，若一國的智識份子多，則國家的力量愈富強。乃我國竟有百分之

八十以上的文言，亦即是我國竟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沒有力量的人。所以從整個國家來看，這是一件極其危險的事。其次，一個國家倘僅少數人有受教育的機會，在社會的倫理上，亦殊所不合。國父說：「圓顛方趾，同爲社會之人，出於富貴之家即能受教育，生於貧賤之家，即不受教育，此不平之甚也。」又說：「因爲民國的人民，人人都是主人翁，人人都要替國家做事的，所以建設一個新地方，首先在辦教育。要普及的教育，令普通人民都可以得到教育，然後人人知道替國家去做事。……讓人人都能够讀書，才可說是普及教育制度。若是不然，便是貴族制度，便是資本制度。」普及教育既是這般重要，但並不是說我們立刻即須將全國的文言，一律都透進中等學校或專科以上學校去。這在事實上也不可能，所以目前最迫切需要的，端在民衆教育。

民衆教育可以分作兩部份來講：一種是國民教育；一種是社會教育。

國民教育的目的在使每一個適齡的兒童，都有入學的機會。自新縣制實施以來，各地紛紛設立中心學校，兒童入學已日有增加。當前，國難孔殷，國庫支絀，所以還沒有做到完全義務教育的程度；但是將來我們一定要做到國父所說「法定男子五六歲入小學堂，以後由國家教之養之，至二十歲爲止，視爲中國國民之一種權利」的境界。

所謂社會教育者，照日本帝國教育會的社會教育部所下的定義則爲：「社會教育是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以外的教育作用的總稱，以備有多樣的教養訓練的設施及機關，使一般國民自由選擇利用爲本旨。上述的社會教育機關，包含凡可以作爲自己的教育手段而繼續均等利用的一切設施，如圖書館、博物館、動植物園、各種展覽會、演講會、講習會的諸設施，自然屬之；其他如以宗教、藝術、道德、智識、

技能、體育、運動爲目的的結社、協會、團體，亦包含在內。」國父所說：「教育少年之外，當設公共講堂、書庫、夜學，爲年長者養育智識之所。」更當然是社會教育的一種。不特此也，即在大學或專科曾經受過相當專門教育的人，亦應常常受社會教育的薰陶。因爲受學校教育是短期的，而受社會教育却是終身的。此外，職業教育或職業的補助教育尤爲社會教育之最要者，使凡「資質不能受高等教育者亦按其性之所近，授以農工商技藝，分送各處服務，以盡所能。」（國父語）

三民主義教育的目的：第一、在普及教育，增進全國民族文化，俾以恢復吾國固有道德及學習西洋科學文明，以圖國內民族的自救解放，進而扶助世界弱小民族，而止於「世界大同」。自推翻滿清專制政府，創立民主共和的中華民國以來，國人對於民族主義漸有認識。七七事變之後，吾國的民族思想益更鼓舞。但是鄉間文盲中，亦尚有毫無民族意識者。所以做民衆教育工作的人，還須要注意到這一點。

第二、三民主義的教育，應使每個國民都能得到受國民教育的機會，期其能够了解怎樣做公民，怎樣自治，怎樣使用四權，以臻於全民政治之境。目前雖已訓政了若干年，但是民權的運用尙未能普遍的打好基礎。政府自然應該加緊民衆教育的工作，社會亦應全力推動民衆的政治教育，以期迅速樹立憲政的基礎。

第三、三民主義的教育，應使每個國民都有職業的技能，做到人人有吃飽飯的地步。不僅如此，更應該使每個國民都知道資本主義生產制度下的貧富懸殊之不當。我們要實行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以達到民生主義真正實現的境界。

本文第一段論教育即是宣傳的認識，第二段論教育宣傳的實踐，第三段論由教育宣傳的實踐而達到

三民主義的實現。我以為這是三民主義教育的程序，也就是三民主義宣傳的程序。而在依此程序以求實踐的努力中，民衆教育自應佔其最重要的地位。因爲，在這個教育的宣傳的程序中，我們不得不指出：我國還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文盲。而我們亦不得不希望：從事民衆教育工作的同志們，須要特別努力，加緊民教工作，使中國真正地完成三民主義的實現！（重慶中央日報）

中國民主政治（一九四四月十一月）

中國國民黨的奮鬥

中國的民主政治，彷彿是一種含苞初放的奇葩。它在近五十年來，由播種而萌芽，由萌芽而成長，儘管風霜雨雪不斷摧殘，而依然能逐漸開花，馴致就可結實。這五千年的古國，專制政體，譬如一株盤根錯節的大樹，久已根深蒂固，而居然在短短的五十年間，經過一大羣有志的先烈，用鮮血，用熱汗，栽培灌溉的結果，使這「專制」的古樹，脫胎換骨，開放民主政治的鮮花，不能不說是世界上最可驚人的一個奇蹟。

回溯這五十年的中國現代史，就是一部中國的民主政治史。而塑造此歷史者，無疑的是中國國民黨。中國國民黨所負的歷史任務，就在推翻專制，建立民國，實現三民主義，制定五權憲法。與中會同盟會的宣言，早已揭舉國民革命的目標，在使「一國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而「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四綱，更顯示着國民革命的目的在建設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戴孝陶先生曾說：「中國國民黨，是信奉中華民國創造者孫中山先生所主倡之三民主義為最高原則，在民主的集權制之嚴格組織訓練之下，集合全國各階級中具救國熱誠的革命份子，造成強固的團結；以革命的方法，取得政權；遵照孫先生所定的三程序，運用政治的權力和方法，完成中國之國家獨立，民族平等；改造中國的政治和社會，完成民主的國家組織；圖人民衣食住行育樂等生活需要之均等的滿足，國民文

化之世界的發展；並爲達到此目的，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以反抗掠奪世界上大多數人類利益，阻礙人羣進化世界大同的帝國主義而消滅其勢力之革命的政黨。」從這一個概括的定義看來，可以確信中國國民黨是先天的創造中國民主政治的一個革命的政黨。沒有中國國民黨，就不會有中華民國的誕生。中國的民主政治也就根本無從談起。所以蔣主席更簡捷的指示：「中國的命運，完全寄託於中國國民黨。如果中國國民黨沒有了或是失敗了，那中國的國家就無所寄託。不僅不能列在世界四強之一，而且就要受世界各國的處分。從此世界地圖上面亦將不見中華民國的名詞了。」

我們試想：如果滿清末年沒有國父孫中山先生倡導革命，一般先烈犧牲奮鬥，中國會有民主政治麼？袁世凱叛國稱帝，如果沒有國民黨幾次三番的舉義討袁，中國會有民主政治麼？北洋軍閥以及封建遺孽，盤據要津，毀棄約法。如果沒有國民黨興師北伐，統一版圖，中國會有民主政治麼？倭寇侵陵，蠶食鯨吞，如果沒有國民黨領導軍民，導致抗敵，時逾七年，愈戰愈奮，中國會有民主政治麼？今天醉心民主政治的人們，大概不致遺忘這五十年的革命歷史，尤其這七年半的抗戰血淚；須知這驚天動地的革命與抗戰，就是產生中國的民主政治的必要過程，而中國國民黨則爲其接產的醫師，爲其撫育的保乳，爲其保護的衛士。中國的民主政治一天沒有充分實現，一天沒有開放燦爛的鮮花，結成甘美的果實，中國國民黨就一天沒有完全盡到它的責任。凡是國民黨黨員都具有這種強烈的義務感與責任心的。

爲什麼國民黨要自覺的去盡這種義務，負這種責任？因爲國民黨之所以組織，就是爲了建設中國的民主政治。國民黨對於所要建設的中國的民主政治，有它的偉大的理想，更有它的完善的辦法。而尤其可以寶貴的，乃是它五十年來堅忍不拔，百折不回，爲中國的民主政治而犧牲奮鬥的決心。有理想，有

辦法，又有決心，中國的民主政治，自然會在國民黨盡義務負責任的辛苦培育之中，一步一步的開花結實。

三民主義的民主精神

國民黨建設中國的民主政治，究竟懷抱着什麼偉大的理想呢？簡單言之，它是要製造出一個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所以三民主義的政治，就是我們理想中的民主政治。國父說：「三民主義就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和美國總統林肯所說的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是相通的」。這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國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國父同時說明我們的三民主義恰巧又與法國大革命時代所用自由，平等，博愛三個口號也是相通的，從這些淺顯的講詞來尋繹，國父心目中的三民主義的政治，實在就是包含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政治，也是爭取自由，平等，博愛的民主政治。若果承認美法二國的政治為民主政治，而故意思否認三民主義的政治為民主政治，在邏輯上顯然是不通。

不但此也，三民主義更有其澈底的一貫的民主精神的。國父在「民報」發刊詞中曾說：「余維歐美之進化，凡以三大主義，曰民族；曰民權；曰民生。……是三大主義，皆基本於民。遞變易，而歐美之人種胥治化焉。……近時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強中國以比歐美。然而歐美強矣，其民實困。……吾國治民生主義者，發達最先，睹其禍害於未萌，誠可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舉其功於一役，還視歐美，彼且瞠乎後也。」在這一段文字中，顯然指出三民主義的政治，乃是「基本於民」的政治，更其是民族革

命與政治革命社會革命舉其功於一役而後所實現的民主政治。故三民主義的民主政治，不但是政治的民主而已，且必須做到種族的民主，經濟的民主，使三者合而為一。美國要直等這次世界大戰，才有羅斯福總統大聲疾呼，喊出「無須恐懼的自由，」「不虞匱乏的自由，」與「信仰自由」「言論自由」相提並論，號稱四大自由。但是若果全世界各民族對外均有種族的民主，那能實行民族主義，換言之，各民族都能自決，並尊重他民族同樣的自決權利，國際間自然會有了「無須恐懼的自由。」「如果各國的人民都能實行民生主義，都有經濟的民主，則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也自然會有了「不虞匱乏的自由，」而少數人豪奢浪費，多數人飢寒匱乏的偏枯之患，當可消弭。因此，可證明三民主義的民主政治纔是最澈底的。

至於三民主義的一貫的民主精神，更不待言。國父曾說：「三民主義的道理，原來是一貫的。」拿什麼來一貫呢？國父說：「三民主義是一貫的，一貫的道理就是在打不平。民族主義是對外打不平的，民權主義是對內打不平的，民生主義是對富人打不平的。」「打不平」的反面就是「平等」，故換句話說，三民主義的一貫性就在「平等」二字。國父曾說：「民族主義是對外國人爭平等的，……民權主義是對本國人爭平等的，……民生主義是對貧富爭平等的。」又說：「民生主義和民族主義民權主義都是一樣的道理，都是用來把不平等的事打倒平等的。」不必再多所引證，我們已經都可確認三民主義的一貫的道理就是平等，而平等則無疑的就是民主政治的精髓。民主政治如果喪失了平等精神，也就無所謂民主政治了。三民主義既以平等精神來一以貫之，也就無異說三民主義是以民主精神來一貫的。

「三民主義共和國」

由上所言，可見三民主義實現以後的政治，是百分之百的民主政治。有人問：既然如此，五五憲草上為什麼不簡簡單單規定「中華民國爲民主共和國」，而必鄭重規定「中華民國爲三民主義共和國」呢？這一點須特別說明。民主不是呆板的，是進展的。歷史上是有不等的民主的。古代希臘羅馬的政治，在名義上也是民主共和；十八九世紀一般的英美式的政制也是民主；二十世紀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專政也是民主。我們混稱「民主」，究指那一種呢？國父常說：「革命民權」或「澈底民權」，又屢次指出後來居上的道理，要使中國的民主政治，「遠視歐美，瞻乎後也」，真正做到「駕乎歐美而上的民主」。可見三民主義的民主政治，決不是泛泛的抄襲一般的歐美式的民主。中國國民信仰，國父遺教，至深且切，自然不願隨隨便便用普通的「民主」兩字來代替其有特殊豐富意義的「三民主義」這個名詞。可是我們決不能因爲用了「三民主義」的名詞，而就不把它認爲在「民主」之列，或甚至漠視它所獨具的澈底而一貫的革命的民主精神。所以，明明有偉大的三民主義來做我們抗戰建國的最高準繩，偏偏擱置不提，而要標新立異，獨倡其「新民主主義」，適足以顯示其淺薄，對三民主義豐富的內涵，可說毫無認識。明明有最適合中國需要的「三民主義」，如果不用它在憲法上來規定我們國家的性質，而偏以爲僅寫上「民主共和國」就儘可滿足，更十足顯示出喪失了民族自信力，祇能隨人俯仰做做尾巴而已，那裏還有絲毫「後來居上」的氣魄！我們必須在憲法上堂堂正正的規定「中華民國爲三民主義共和國」，然後可以使萬衆一心，努力以求此最澈底的最革命的民主政治的實現。

「三民主義共和國」，既由五五憲草在開宗明義的第一條規定為中華民國之團體，我們就得進一步說明這「三民主義共和國」的民主政治之內容。換言之，國民黨想用什麼方法來建設中國的民主政治。照三民主義的理論來講，我們是要使整個中華民族中的全體國民，發動民權，管理政治，保障民族之生存，國家之獨立，滿足全體人民衣食住行育樂等生活需要。用一句話來概括，三民主義的中國所要施行的民主政治，是整個民族用以保障民生樂利的全民政治。我們但看「五五憲草」下面這幾條，就可明瞭其輪廓：

第二條：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

第九條：人民依法選舉，罷免，褫制，複決之權。

第二九條：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者，有依法選舉代表權，年滿二十五歲者，有依法被選舉代表權。

第五條：中華民國各民族均為中華民族之構成分子，一律平等。

第八條：中華民國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第一五條：人民有信仰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限制之。

第一三二條：中華民國人民受教育之機會，一律平等。

第一一六條：中華民國之經濟制度，是以民生主義為基礎，以謀國民生計之均足。

從第二條與第九條，可知由中國全體人民掌握四大政權，以行使其主權，這即是全民政治。而此所謂「全民」，由第五條說，無種族之別；由第十五條說，無宗教之別；由第一三二條說，無教育等差之

別；由第八條說，在法律上無性別，區域，職業，階級等等之別；由第一五條說，只須到達法定年齡，就一律成爲享有選舉權被選舉權的公民。此外，更從第一一六條可以推知，實行全民政治的中華民國，其目的乃在於謀國民生計之均足，而決非僅爲某一階級或某一部分的人謀福利。

革命方略與建國大綱

如上所說，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在中國是要規畫一種最澈底的全民政治。這顯然是一件艱鉅的工作。要完成它，必先有確定的方法與步驟。國父在制定建國大綱宣言中說：「夫革命之目的在於實行三民主義；而三民主義之實行，必有其方法與步驟。……文有鑒於此，故於辛亥革命以前，一方面提倡三民主義，一方面規定實行主義之方法與步驟，分革命建設爲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期於循序漸進，以完成革命之工作。因爲不經軍政時代，則「革命之破壞不能了徹」；不經訓政時代，則「革命之建設不能進行」。惟其如此，國父「積十三年痛苦之經驗」，特爲我們「制定國民政府建國大綱二十五條，以爲今後革命之典型」。並且懇切的指示：「倘能依建國大綱以行，則軍政時代已能肅清反側，訓政時代已能扶植民治，雖無憲政之名，而人民所得權利與幸福，已非藉憲法而行專制者所可同日而語；且由此以至憲政時期，所歷者皆爲坦途，無顛蹶之慮。」由這篇宣言，可以看出建國大綱的重要性；我們簡直可以認定建國大綱就是建設「三民主義共和國」的民主政治所「不可逾越之程序」，也就是國父所說的實行政治的方法與步驟。就法律的觀點說，民國十三年制定的國民政府建國大綱，乃是先天的確定中國的民主政治的根本大法。後來民國二十年五月公布的訓政時期約法，以及二十五年五月五日宣布的憲法草

案：都是根據建國大綱的母法而寫下來的。所以，我們要找出新中國全民政治的制度輪廓，就得先從建國大綱裏去探求，才不致誤入歧途。

建國大綱二十五條的精神，其重要者有如下數點：（一）建設中華民國應以「革命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為本。（二）建設程序須分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三）訓政時期革命建設的進行，須先以縣為自治之單位，擴而充之，以及於省；省立於中央與縣之間，以收聯絡之效。（四）一縣中的人民，必須會受選舉罷免複決四權使用之訓練，完畢其國民之義務，暫行革命之主義者，得選舉縣官議員，始成為一完全自治之縣。（五）每縣必須實行平均地權的土地政策。（六）一省全數的縣都達到完全自治時，始為憲政開始時期。（七）憲政開始時期，中央政府嘗試行五權之治。（八）立法院當本建國大綱及訓政憲政兩時期的成績，議訂憲法草案。（九）全國過半數省分達到憲政開始時期，即召開國民大會決定並頒布憲法。（十）憲法頒布後，全國國民依憲法舉行大選，國民政府則授於民選的政府，這纔算建國大功告成。

可以窺知三民主義的革命建國工作，最重要的關鍵乃在訓政，而訓政最重要的基礎則在於縣自治的完成。必須在縣地方自治的設施中，『努力除舊布新，以深植人民權力之基本』，然後『所謂自治，始為真正之人民自治，……則地方自治完成，而國家組織始臻完密，人民亦可本其地方上之政治訓練以與聞國政矣。』（見制定建國大綱宣言）國父為什麼這樣重視實行地方自治的訓政呢？因為國父認為惟有實行地方自治，方可『移官治為民治』；亦必移官治為民治，『然後民權有所託始，主權在民之規定使不致成爲空文』。『如此，則建設之基礎在於人民，非官僚所得而竊，非軍閥所得而奪』。由此可知國父

心目中的民主政治，是以地方自治為基礎的全民政治，決非僅僅有如民國初年的選議員，開國會，議憲法，而就可囂囂然號稱民主的。有若干淺見的人，不明白國父由痛苦的經驗中所規定下來的訓政的意義，以為惟有憲政才是民主。訓政就不是民主。殊不知國民黨之所以要訓政，為的就是要建設真正的澈底的革命的民主政治。不但訓政時期的訓練地方自治是民主，就是軍政時期的蕩滌舊污也是為了廓清民主的障礙。國父對一般忽視軍政訓政兩時期工作的人們，曾有當頭棒喝的糾正。他說：「第一流弊，在舊污未由蕩滌，新治未由進行；第二流弊，在粉飾舊污，以為新政；第三流弊，由發揚舊污，以壓制新政。更端言之，即第一民治不能實行，第二為假民治之名行專制之實，第三則並民治之名而去之也。」國父在民國初年力主實行他所規定的劃分三時期的革命方略，而一部分黨員竟不守革命信誓，背棄革命方略，走上與舊勢力妥協的途徑，其結果只落得袁世凱稱帝，溥儀復辟，軍閥弄兵，政客誤國，還談得到什麼「民主」？故革命方略是保障實現民主的方略，建國大綱是實行全民政治的大法；凡欲研究中國的民主政治者，首先不可不認識清楚。

中國民主政治的特質

若要說到中國的民主政治的特質，可以約舉最顯著的三點：

第一，主張直接民權與革命民權。我們從國父遺教中，可以尋出許多話是攻擊代議制度的間接民權的。他說：「代議制度還不是真正民權；直接民權才是真正民權。」他認為「民主必須舉『主權在民』之實而這種代議制度於事實於學理皆不足以當此。」況且在英美各國，政權「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

適成爲壓迫平民之工具」，故三民主義的民權，「便不可完全做放歐美」，「須重新想出一個方法」，使民權真能「爲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其方法就是：「（甲）實行普選制度，廢除以資產爲標準之階級選舉；（乙）以人民集會或抗票之方式，直接行使制衡制復決罷免各權。」其次，三民主義所倡導的民權並非「天賦人權」，而是革命民權。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說得最具體：「蓋民國之民權，惟民國之國民乃能享之，必不輕授此權於反對民國之人，使得藉以破壞民國。……凡賣國國民以效忠於帝國主義及軍閥者，無論其爲團體或個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權利。」由此，我們可以認定只要是忠於中華民國的革命的民衆，全都可以直接行使其民權。而在此抗戰時期，舉凡破壞抗戰，動搖國本的漢奸之流，自不應使其在「民主」招牌之下，享受革命的民權。

第二，主張權能分開與五權制衡。國父認爲「歐美對於民權問題，還沒有解決的辦法。」他們一方面希望有一個萬能政府，另一方面却又怕得到了一個萬能政府，人民沒有方法去節制它。於是國父想出了「權與能要分別」的道理：在世界的民主政治上成爲一種大發明。他主張「把國家政治的大權，分開成兩個，一個是政權，……完全交到人民手內，……便是民權，一個是治權，……完全交到政府機關之內，……便是政府權。人民有選舉罷免制復決四種政權，政府有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種治權；『各有各的統屬，各有各的作用，要分別清楚，不可紊亂。』這樣，『政府的威力便可發展，人民的權力也可以擴充，有了這種政權和治權，才可以……造成萬能政府，爲人民謀幸福。』照五五憲草的規定，縣市的人民都依法在縣市範圍內行使直接民權（見第五章地方制度）而在中央則國民大會代表國民行使四種政權。至於五種治權則由五院分別行使，而以總統爲國家元首，（見第三章國民大會與第

（四章中央政府）。關於五權制衡的一點，國父講演民權主義和五權憲法時指示甚詳，最主要的是外國實行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中國古代實行行政，考試，監察三權分立。「我們現在要集合中外的精華，防止一切流弊，便要採用外國的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加入中國的考試權和監察權，連成一個很好的完璧，造成一個五權分立的政府。像這樣的政府，才是世界上最完全最良善的政府。」

第三，主張經濟平等與階級協調。英美的民主，是資產階級操縱的民主，蘇聯的民主，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民主。中國的民主，則是提倡階級協調的民主。國父認為「社會之所以有進化，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不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有衝突。……階級戰爭，是社會當進化的時候所發生的一種病症。」因此，由三民主義中民生主義的觀點來說，我們必須做到全體人民經濟地位的平等，而後經濟利益可以相調和，而後此全民政治之所謂「全民」，才真能包括無分貧富的一切人民，使他們都能享受其應享的一切權利與自由。國父曾說：「人民必要能够治，才能够享；不能够治，便不能够享。如果不能够享，就是民有都是假的。」所以建國大綱第一條就指出「建設之首要在民生」。祇有以平等地權節制資本的方法，實行民生主義，滿足全國人民之生活需要，保障全國人民之生存權利，平均國家財富之分配，防止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然後全國人民才能獲得經濟的平等。亦惟有人民獲得經濟的平等，方可使法律上的自由平等有其真實的意義。忽略了民生主義的實行，則民權主義至少在一部分人看來是完全虛空的。民權主義如不能够使「全民」都確實享受平等的權利，則民權主義是沒有意義的了。缺少民生主義和民權主義，中國何能建設為一個現代的民主國家，而民族主義的成功也就成了問題。故三民主義的全民政治，在理論上在事實上，均必須以實行民生主義以達到經濟平等與階級協調為

其必要的條件。

所以，中國的民主政治，是最徹底而一貫的革命的三民主義的全民政治，而國民黨則是五十年來爲力求實現此三民主義的民主政治而艱苦奮鬥的惟一的革命政黨。國民黨於北伐完成奠都南京以後，卽於十七年十月頒布訓政綱領，二十五年五月復召開國民會議，制定訓政時期約法，使國民黨因國民的授權，而在訓政時期代表國民大會行使中央統治權，積極訓政，以爲實施憲政的準備。九一八及七七事變以來的憲政準備工作，雖迭受日本帝國主義的阻撓，而國民黨依然迅卽制定抗戰建國綱領，以爲抗戰期間全國上下共守的典範，組織國民參政會，以爲抗戰期間奠立民意機關的雛型；積極推進地方自治工作，並次第成立省縣市參議會，以宣達民意，發揮民力；至三十二年九月「十一中全會」更有「國民政府應於戰爭結束後一年內，召集國民大會，制定憲法而頒布之，並由國民大會決定施行日期」的鄭重決議。這些事實，都是國民黨執政期對外抗戰對內訓政而始終不忘實施憲政，以達成完全的民主政治的證明。

最後，須得鄭重聲明兩點：（一）民主政治是成長的，是演進的，決不是固定刻板的。希臘羅馬時代，有希臘羅馬式的民主；十八九世紀以來，英美有英美式式的民主；二十世紀初年，蘇聯有蘇聯式的民主。中國在偉大的國父領導革命之後，自會創造中國式的民主，——卽三民主義的民主政治。（二）三民主義的民主政治，是要使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的民主政治，而決非像清末「維新」派和民初「妥協」派祇是以「憲政」相號召的民主政治；是要完全實現國際平等，政治平等，經濟平等的民主政治，而非像國父所說只知道「一民主義」或「二民主義」那一部分人心目中的民主政治；是要合全民的力量，用革命的政權，「造成萬能政府，爲人民謀幸福」的最徹底的民主政治，而不

僅是徒然「完全倣效歐美」，以步他人後塵爲榮的民主政治。國民黨自必本此認識。排除一切障礙，以培育中國的民主政治；所願全國人民也本此共同認識，團結一致，以扶植中國的民主政治。（重慶華聲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人力經濟學（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二日）

者先生：

今天我買了一本貴刊創刊號，爲「通訊」兩字觸動了一個問題，就是：中國人口衆多究竟作什麼用，就想把這些日子的雜感，也用通訊方法，和先生以及讀者談談。

大家歡喜談經濟建設，其實不論戰時生產或戰後的工業化，都是一件艱巨的任務。我們面臨此種偉大的，有史以來所不能比擬的重荷，真是且喜且懼。

戰時生產，在最近彷彿已成了時髦名詞，但在不久以前，似乎只顧到一味緊縮信用，——目前這呼聲還未停止，不分青紅皂白，硬逼合法組織合理經營的生產工廠幾乎逐漸減產停工，使成千成百的生產勞力擱置未用，這實在是件奇事。世界上任何國家一到戰時，只有加緊生產。惟獨我國必須有勞盟邦專家提醒我們，然後恍然大悟中國亦有人力可用，亦有資本可籌，而當用則用，也決不能單單顧到不許增加開支的。連這樣淺顯之理，也不去思索，太不用我們的智力了！

明明大家的第一件事是目前如何加強生產，却又偏會有許多人躲避現實，專門來討論戰後經濟建設而且討論的文字特別多。有的人認爲：戰後建設非鉅額資本不可，而我國國富未盡開發，資本不足所以戰後經濟建設，以資本爲最重要，而欲有充沛的資本，必須歡迎外資。有的人認爲：戰後的通貨

政策是運用得宜，使消費者的剩餘款項得以儲蓄，由儲蓄而投資，由投資而使業者日衆。如是則經濟可期繁榮。還有的人認爲：當今中國建設，首重工業化，欲工業化端賴最新技術。所以希望盟國能多多幫助我們技術人才。當然，戰後經濟建設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幾乎件件事情都重要，樣樣東西均必需。而且這些重要的事情也並不是要等到戰後纔成重要，即在戰時亦何嘗不如此。不過我們總須從這樣繁複的任務裏，找出一個最重要的經濟原則來。

上面所述的第一種意見雖屬重要，但是歡迎外資外債，要顧及企業的主權問題與利息的負荷問題。外國人到中國企業來投資，總希望自己所操縱的股權能够全部控制該企業的行政。而且總有若干部門的企業，法律上不容許外資經營的，那末這筆大資本終究不能不有一大部份從本國人身上打算出來。所以外資縱然我們十分歡迎，但是不能把全部的希望都寄託在這上面。上述的第二種意見，是根據劍橋學派的最新成就而推論的，在學理上，原屬至美。不過我國的統計工作還沒有做到精確的地步，「國民所得」無法得悉，兼之國人對於儲蓄的習慣尚未普遍養成，如果將經濟建設所需的資金，全在「由儲蓄而投資」上打算，那末其所得到的結果，恐怕是要失望的。上述的第三種意見，看重工業化，建設新技術等原則，是人人都認爲切需的，原無可非議。不過全部希望盟國幫助技術，亦實非正確之念。世界上絕無一個毫不費力而專圖依賴的國家可以永久存在的。

我們要增加生產，要使國家工業化，首須認清我們是一個窮國，一個積弱的國家。縱令因爲我們八年來的堅持抗戰，在政治上有人稱譽我們爲四強之一，可是在經濟上我們要做到配稱強國，那真要積苦任勞，急起以赴，方始可以達到目標的。因此，無論戰時生產或戰後經濟建設，最重要的原則不外真正

使全國人民總動員起來，從事勞動生產，增加國民與國家的財富。決不是僅僅做若干限價讓價等事可以增加生產的，也決不是單在貨幣政策上作應付的盤算，或徒然仰賴他國的援助，作苟安的企圖，就可以使國家走上工業化的大道，大規模增加物資的生產的。這一點，希望國人能澈底認識，莫再因循自欺。

說到這裏，我願提醒大家一句：如果我們不能用盡我們的人力，中國是不能走上工業化的大道的。也許有人以為工業化正是要用機械力代人力，何以說反要先用盡我們的人力呢？要明白這一層，須先說明最根本的經濟原理。

大學，釋齊家治國章有語：「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這是我國最古的經濟學理。倘將「人」，「土」，「財」三者，比之正統學派經濟學者所認為的生產三要素——勞力，土地，資本（或物資），實為恰當。而這三個生產要素之中，最重要者首推勞力。有了勞力，土地才能耕種；有了勞力和土地的產物（原料與糧食），資本方能產生與運用。而「用」財之道，在今天自然要使資本用之於工業生產。不過要「用」財，須先得「有財」。換言之，須先得有足以工業化的資本。這資從何而來？須從人力得來！當今歐美各國工業經濟已有相當基礎，故所有各種經濟學者常常注意到資本的運用這一問題上去。但在我國，資本的積累不豐。誠如國父所說我國人民還是「大貧與小貧」。所以最主要的在研究如何運用人力，創造資本。人力是一切財富的泉源，人力是貧窮國家的珍貴資本。懂得這個道理，則我國擁有那麼多的人口，纔會覺得是有巨大價值。

我說這句話，也許有學者專家會批評我不懂經濟學。其實現在有若干經濟學者，祇圖抄襲歐美的現成學理，而忽略了最現實的祖國。如果，我們展開各國經濟發展史來一讀，在各國興起的當時，沒有一

個國家不注意人力之運用的。當英國民族經濟發展之初，威廉彼第（William patty）就說：「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其後的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大衛里加圖（David Ricardo）等都認為勞動是財富的源泉，是交換價值（Value in Exchange）的惟一標準。甚至辛尼歐（N.Senior）氏認為：資本是由於勞動生產品的節欲（Abstinence）而來的。

「努力第一」既為我們所確認。那末中國目前乃至戰後如何運用努力，實在是一個必得商討的問題。否則，只會說中國人口衆多，而不知道拿來作什麼用，豈非最大的怪事？最先，我們應該使全國努力分配均勻得當。在此，不妨列舉幾個要點：

第一、從我們的經常觀察下，我國的每一個家庭的家長，常有沉重的負擔。往往一個家庭裏有七八口以上的人口，靠一個家長的勞力生活。此種結果，不特使勞「力」的人須東西盤算，而至生產效率降低；並且促致勞「力」的人壽齡減少。一旦死亡，全家瀕於無依之境。所以，政府應嚴密調查，強制動員游手好閒的人，按其情況與能力，施以訓練，參加生產工作。惟有大家全體工作，纔可使每一工作的人不必作過分的勞動，而後人力可以收到保育之效。

第二、值抗戰時有若干淪陷區內遷人民，其生活端賴依親繫故而生活，自己並未參加任何生產工作。其人數在我們大約的估計下，至少有三千萬人。而實際有生產能力者，也當不下千萬人。這一些人，不必等到戰後，政府早應隨時設計安置於生產事業中。此外，在淪陷區內不願替僑方工作而富生產能力的人，為數也當不在少數，政府應予設法內遷，充分利用其努力。最奇怪的，有些人到了目前這樣嚴重階段，還只知道坐待救濟，不能而且不肯作轉業於生產之途的打算。真是坐廢人力，不可救藥。

第三、戰時我國的正規軍與補充員何至一千萬人，戰後除少數常備軍衛戍國土外，其餘自應一律復員，盡量參加生產工作。榮譽軍人中有生產能力的，亦當參與生產。

第四、華僑及一般有志海外殖民勞動的人，政府應協助彼等到國外去從事勞動生產。此次大戰以前，英國始終是一個入超國家，她每年的貿易差額，總是以海外僑胞的勞務 (Service) 所得來彌補的。目前我國切需外資的論調甚囂塵上，僑胞的海外勞務實在是易取外匯和外國技術的最好方法。

其次，「人盡其才」亦是動員全國人力應注意的原則。經濟學中向有熟練勞動 (Skilled Labor) 與不熟練勞動 (Unskilled Labor) 之分。要使不熟練勞動變成熟練勞動，應該對於勞動者的性格、嗜好、環境等等妥為研究，妥為訓練，妥為分配工作。人人到了最熟練勞動的地步，那末又何愁國家不富足，更何致有缺乏資金之虞？因為我們勞力所得的豐沛的生產品隨時可以換取外匯，也隨時可以換取外國技術，所以只有實際的物資才是經濟的內容，而貨幣僅僅是一種形式。實際的物資是由勞力得來的。有了物資，不愁沒有貨幣；單單在貨幣政策上打算盤，抱住了「緊縮信用」四個字，往牛角尖裏鑽，何嘗能增加絲毫的物資？

還有一層我們要注意，我國以三民主義為立國最高原則，因之動員全國勞力政策也必須與民生主義相符合。我國向來以農立國，但是一部份糧食反賴輸入來供給。據民國二十五年中央農業試驗所估計：該年全國糧食除自給外，尚缺少稻二四六、五三八、三〇〇市担；小麥五六、七七八、二二〇市担，須自國外輸入。另一方面我們來看我國的土地利用情形。據巴考 (Baker) 氏的估計 (載東方雜誌第五卷、第一期)，如下：

全國面積：二、四四一、〇〇〇、〇〇〇英畝。

可耕種之土地：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英畝。

已耕種之土地：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英畝。

我國荒地之多竟佔可耕地的七分五強，而每年還鬧着糧食問題，豈非異事？荒地開墾，自是戰時生產以及戰後經濟建設重要政策。然而我們反對有錢人去壟斷開墾，免蹈資本主義的覆轍。倘以全國人口總數以五億計算，其中設有五分之二為老幼及不能生產者，設有五分之一從事工業或其他事業，那末其餘的二億人當可從事農耕。以二億人分配七億英畝可耕地，則每人平均可耕三英畝半土地，約合中國二十九畝土地。再加上科學方法耕種，其收穫可相當的富裕了。一個農業生產者，足可以維持三個人的糧食，和其他必需的生活資料了。問題的癥結所在，是人民苟安圖樂不願遷徙墾荒，而政府方面亦未曾徹底決心去執行墾荒政策。實際上，世間的事都是苦盡甘來的。當年的美國西部豈非荒無人烟，經過了數十年艱苦的西遷運動，現在已經變成了繁華世界。希望我們大家記住華萊士副總統對中國西北部的禮讓，我們也要學學美國朋友開發西部的精神，來發揮我們的勞力。

孟子，滕文公篇談到井田制度，謂「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當時抽什一之稅，這是國家的稅收，同時又是人民貢獻國家義務勞動。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有捐稅的課征。我們倘以勞力的立場言，每人每日工作八小時，若能以其中的一小時勞力，義務勞動供獻國家，那末我想任何捐稅都可以取消了。這種辦法不僅符合於亞當斯密所說的平等原則，且可達到真正節制資本的境界。因為國家握有八分之一的資本，任何一個私人資本家的資本也不能與之競爭。這個

稅率比較什之一稅捐爲高一點，但是我國目前還有百分之卅五以上（如各省通過稅的某種貨物的從價稅）的稅率，所以人民的負擔不至於過重。——這是我對於節制資本的一點小意見。

千言萬語，祇是一句話：「中國是有資本的」，但是的確先要「人盡其才」（勞力）• 地盡其利（土地）！（重慶通訊半月刊第一卷第四期）

論戰時經濟政策（一九四五年三月十日）

論語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其中足食足兵兩都屬於經濟政策的範疇。

茲當戰時，軍事第一，首論足兵。

對於「兵」，在經濟思想史上，嘗有兩種不同的意見。第一種意見是經典學派亞當斯密（Adam Smith）輩所主張的，他們認為「軍隊」是沒有生產效能的，所以國家對於軍隊的支出應該愈少愈好。第二種意見是德國歷史學派的肇祖李士特（Lieser）暨其後的官房學派諸財政學家所主張的，他們認為「軍隊」的保衛國土，有助於生產力的保持與發展，所以對於軍隊支出，實屬至當。在戰時則不論受經典學派思想薰陶極深的英國，或受歷史學派思想充分洗禮的德國，都以國家的全力來支持軍隊的開支，以前的學理上的爭論均已拋之於九霄雲外。

兵在戰時是有他的經濟效能的，他縱令不直接參加生產，但間接確可發生着生產的效能。

兵在戰時是有他的經濟效能的，他縱令不直接參加生產，但間接確可發生着生產的效能。講到「足兵」，用經濟學的術語來說，便是「勞動的動員」。動員勞動，最先應該認識現代戰爭的特性。依據此種戰爭的特性，才可以應付戰鬥的需要。現代戰爭的特性是什麼呢？

第一、十九世紀以前的戰爭是農業式的戰爭，戰鬥者雙方所持的武器是長槍利刃，短兵相擊；戰鬥力的發揮，有一半是靠武器，有一半是靠體力，因此菁力過人的兵士，常常易於獲勝。諸類此種戰爭，

其戰鬥兵員大多可以交給農民來擔任。因為農民體力強，使用武器又不需高深的技術，所以足能勝任戰鬥的任務。事實上，十九世紀以前的戰爭，農民實為最重要的兵員來源。現代戰爭却是工業式的戰爭，戰爭的主要威力靠武器來發揮，而使用武器又同使用機器一樣複雜；放大砲要會算三角術，駕駛機須賴氣象學，開坦克應理解蒸氣力學。這樣複雜的武器，當然不能完全交給農民來使用，尤其不能完全交給尚未工業化的農業民衆來應用。所以我們對於兵員的來源自然要縝密考慮。歐美平日工業發達，一旦發生戰爭，可以調遣勞工服役；而我國的現代化工業，尚在萌芽時期，所以號召知識青年起來從軍，堪稱及時之需了。

第二、現代的戰爭因為武器的進步，威力圈的擴大，戰鬥欲謀減少損失起見，勢必須實行「散戰」。相傳岳飛好散戰，宗澤戒之，岳飛說：「陳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這因為在宋代，還實行着一種農業式的戰爭，所以宗澤與岳飛間還有過如此一番討論，現代的戰術却迫於不得不作「散戰」了。因此「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這八個字更加重要起來。駕駛轟炸機的人，不能完全靠着領隊，萬一高射砲火將隊形衝散了，每一架飛機都得單獨作戰，那時候便須要「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了。是則，兵員的徵集更得注意被徵者的智謀與機靈。

第三、現代的戰爭是一種全民族，全盤性的戰爭，誠如魯登道夫將軍（General Ludendorff）所言：「海陸空的力量在什麼地方開始，民衆的力量在什麼地方終止，在這一一次的戰爭（第一次大戰）裏頭是沒有法子加以區分出來的。軍隊和民衆融合成爲一體了。世界看到真正的「民族戰爭」了。地球上的強國就是靠着這樣集中的力量去彼此較量。不但是在廣大的戰場上和遼闊的海洋而上對着敵方的武力

作戰，同時對於敵國民族的精神和活力也加以攻擊，企圖叫他們消滅和麻痺。」

由於以上的諸種現代戰爭的特性，我們的勞力動員就必須注意下面所列數端：

一、兵員的來源不應完全及於農民，知識份子和工廠的勞工都是極主要的兵源。所以今日的知識青年從軍才算得真正的現代化的建軍。而對於來自田間的農村兵士，也應該趕快加緊短期知識訓練，俾應付現代戰術的需要。所以「整軍」確是迫不及待的事。

二、後方的知識份子，工廠勞工都去服兵役，後方的工業生產自然要感覺勞力缺乏。其補救的方法促使策軍及知識婦女接替工作，並且開設訓練班使沒有工業生產能力的人，逐漸都變成熟練技工。二年前，後方的報章上，有許多學者著文，引用凱恩斯（K. J. Keynes）的學理，大聲疾呼，認為生產已經達到「充分就業的狀態」（Full employment）應該立即緊縮生產。其實這種意見完全是由於靜態經濟學的方法論所引出來的。殊不知勞動到了充分就業狀態，我們為戰爭的必需，還可以加速訓練；反之，在戰時一切生產奢侈品勞力和物資，縱令並沒有到達「充分就業狀態」，也應該加以緊縮。所以「充分就業」的學理，在戰時並不是生產的擴充或緊縮的優良準則。關於這一點，我在當時也會發表過談話，請生產界注意的。可惜當局未必完全有此同感，不分青紅皂白，只顧緊縮信用，乃至緊縮生產，以致到今天大有生產萎頓，生產缺乏的痛苦。

三、目前我國士兵大部分來自農村，農村中的勞力自然減少，我們要鼓勵婦女來從事農業工作。在第一次大戰中，土耳其就有婦女從農的先例。在我國，以往蘇州就有抬轎子的女轎夫，在江西廣東也有下田耕作的女農。所以女子從農並非不可能，不特增進生產，保障抗屬生活，且有裨益於民衆健康。

四、難民、榮軍、退役軍人、以及大戶用的奴隸僕役；都應該導入生產事業，或者從工，或者從農，不應任其游食消費。在戰時，大量勞動者去服兵役，物質生產已經減少了，絕不能使可能生產的人不生產，而專事消費物力。

戰爭是全體性的戰爭，經濟也是全體性的經濟。談「建軍」「整軍」，切莫以為把軍隊整建到像個樣子就算完事。殊不知勞動員是整個的，努力的配備雖重前方軍隊，後方的生產勞動者也應同時補充。如果單注意前者，則無論如何「建軍」「整軍」都不會產生優良的成績。所以大家應認識，「建軍」「整軍」已不僅是一個軍事之問題，而是一個重要的經濟上的努力的分配問題了。

其次，論「足食」。糧食對於軍事，極其重要，克勞塞維支將軍 (General Clausewitz) 在某某著名的戰爭論一書中曾說：「糧食給與之條件，在近代戰爭中，已獲得古來無與倫比之重要性。其理由有二：第一因近代的軍隊，與中世紀比較，不就令與古代的軍隊比較，一般兵數都很大。回顧古代，雖往往也可發見其兵數與近代相等或甚至凌駕而上之軍隊，然這是稀有的一時現象。反觀近代之戰史，從路易十四以來，其兵數已漸漸增大。在近代戰爭中，糧食之重要，其第二理由，却比第一理由更甚，且為近代所特有的。這就因為近代戰爭中的許多事件，乃緊密而相關聯，其遂行之兵力，須不斷為戰爭之準備。反之，古代戰爭之大部份，乃是由到處中斷，毫無連絡的許多孤立的戰鬪而成立。戰鬪與戰鬪之間，在此中斷期，戰爭全然中斷，僅為政治的存在。或兩軍兵力，至少在互相遠隔之地，各自亦無須顧慮敵軍之兵力，祇須按自己之必要來安排。」不惟如此，因現代的戰爭是全民族的全體性的，所以後方民食供給的充沛，亦屬重要。

我國向稱以農立國，但是糧食尚不能自給自足。在戰前我國的糧食缺額是由安南泰國的輸入來補的。戰時受到敵人的封鎖，產地又日益縮小，農村勞力也漸有減少，糧食自當成問題。目前除積極取締糧食囤積和培植農村勞力外，更重要的莫過於糧食增產。對於糧食增產，我有左列各點意見：

一、改良耕作方法：我國農業生產向來墨守成法，一旦災害來臨，便無法加以治療，咸有「靠天喫飯」之感。然則用科學方法不獨可以防災，並且實施加肥，輪種（Rotation），改良種籽，增開水利，還可以增產。

二、開墾荒地：據柏克（Baker）和唐啓字兩位教授分別估計的結果，都認為我國可耕的荒地，比已經耕種的熟地還要多。這些可耕荒地雖有大部份已經淪陷敵手，但是西北一帶，可耕荒地比比皆是，深望同胞能注意及此，努力加以開發。

三、保護土壤（水土保持學）在太平洋東岸的彼國，早已成了一種專門學問；而在我國，聞對於保護土壤的專門書籍，僅有中央農業研究機關裏有的三數冊，而且大部份還是今年夏天由美國副總統華萊士（Wallace）帶來的。我國西北的黃土層，有若干地方已被冲刷得毫無耕作之利，據地質學家的研究：一尺土壤的形成；須賴一千年的風化作用。耕種土壤之造成既如此不易，我們必須用開發水利和造植樹林的方法來好好保護。目前有若干軍隊行軍到那裏，便亂砍樹木，殊不知此種行動間接地影響了他們自己的糧食來源。

「足兵足食」，實在是我國當務之急，有雄師勁旅，才可以打大勝仗。有軍食性糧，才可以士飽馬騰。有前方的捍衛，才可以安定後方。有後方的供給，才可以支持前方。這是全民族的戰爭，這是全體性的戰爭！（重慶戰聞中國月刊）

對美國政府遞交有關美國外交政策的建議書（一九六二年十月十八日）

本月十五日記者應邀出席美國國務院討論全國外交政策記者招待會時，曾遞有英文建議備忘錄一件，茲譯載大意於後：

○美國為自由世界之領導國家，現方面臨全球共產黨之極強力的，機動的，奸詐的挑戰，彼等之最終目的為世界革命與征服。因此，一種美國外交政策之採取，必須從各種角度上審慎考慮，儘可能有助於美國及自由世界之利益。在執行此種政策時，自須克服國內國外的種種阻梗與困難。惟其如此，此項政策不當離開或變更其原定目的，而當秉持勇氣以執行之；否則自由世界對於美國領導地位之信心或將減少而動搖。

○因敵對的力量既屬於世界的共產集團，故美國的外交政策當使世人充分明瞭其為堅決反對世界共產主義，並當分清楚孰執敵。所謂「中立國家」，並非真正中立者。因為聯合國的紀錄業已顯示此等「中立主義者」，對於最重要的議案，幫助共產國家說話時遠過於幫助民主國家者。國際共黨的狡猾政策，即在鼓勵「中立國家」與之合作，以便分化自由國家，結果使美國及其盟邦處於孤立地位。所謂「亞非集團」的建立，即是受中共與蘇聯的影響與指導，而此種趨勢更方散佈於其他各處。

○美國外交政策當繼續以行動及事實補足之，否則祇僅成爲一種口號或標語。例如，美國與中華民國

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均爲保護世界自由民主而作戰的忠實盟邦；二次大戰以後，且曾簽訂互助有利的條約。美國國會更再四宣告美國的民意，反對承認中共及容許中共進入聯合國。然而美國外交官總是斷斷續續與中共代表在華沙、日內瓦、及他處作重要的「會談」或「談判」。此類行動，似乎與美國的政策及宣言大相矛盾。

④經驗昭示吾人，民主國家與極權國家談判時，只要顯示軟弱、含混、猶豫、或缺乏勇氣，便導致侵略，欺騙，與被出賣。在慕尼黑、雅爾達、波茨坦、重慶、北平，及他處的談判都已證明如此。因此，美國對於金門馬祖的政策應當使之明朗，因金馬乃爲保衛臺灣所必要，而臺灣又是在中國內外一切愛好自由的中國人民希望所繫之堡壘。不然，中共或將誤會美國不支持中華民國防衛此等島嶼，甚至可能因此鼓勵中共在該地區採取軍事行動。

⑤中國大陸如未嘗淪陷於共黨之手，中共不致介入韓戰或甚至根本可無韓戰。目前在寮國、越南、高棉，之困擾，均與中共在該地區之陰謀與活動有關。中共政權存在一日，則整個東南亞即無一日之和平與安全。

⑥經過中共十三年之鐵腕控制，中國大陸上人民業已普遍遭受天災——水，旱，饑饉，疫癘之損害。中共祇知集中力量備戰，而絕不顧及人民之福利。此爲衆所盡知之事。中共高級頭目十月間之會議，亦已公開招認「大躍進」運動失敗，糧食及日常生活之重要產品，因之均感缺乏。中國人民由於飢餓所迫，由大陸出奔，就食於香港、澳門、臺灣，在大陸上許多地方也常常發現革命和怠工，此皆彼等對中共不滿之表示。

①中共偽政權之內部分擾不已，民不聊生，極盼中華民國政府能早日予以拯救。且近來與蘇聯已發生分裂現象，故如果中華民國政府對中共採取軍事行動，則中國大陸上人民將起而響應以反對中共暴政，而此項軍事行動如不越過長城，則蘇聯之介入殊可懷疑。美國前任駐蘇大使湯姆遜即曾有此表示。

②由上述局勢觀之，美國此時不當勸阻或掣肘中華民國之進攻中共政權。事實上，中國人民乃真正為爭自由而戰之同志，而蘇聯則並非為中共之忠實盟友。故為解除整個亞洲所面對的共產主義之威脅計，此時確為中華民國最好行動之時機。一旦時機錯過，可能在一相當長期間，此種機會或不會再來。（紐約華美日報）

公展按：本記者遞交此項建議書時，為詹森總統主政白宮時代。他正倡導在國內推行「大社會」政策，欲繼承羅斯福之「新政」，杜魯門之「公政」，以及甘迺迪之「新疆界」，故對外交似有希望與共產集團和解之傾向。況美國輿論姑息氣氛逐漸抬頭，詹森初期援助南越遏阻共黨勢力南侵的政策，很受此輩之評擊，而苦難貫徹。加以共和黨的尼克森標榜「以談判代替對抗」，力主從南越撤兵，詹森又舉棋不定，虎頭蛇尾，美國在越南之失敗，勢已顯然。此項建議書徒供國務院檔案中加多一份參考資料而已。迨尼克森於一九六九年為共和黨競選總統時，已蓄意親往中國大陸「歡迎」中共偽政權進入聯合國。亞洲乃至整個世局之劇變，遂不堪聞問矣。（一九七三年，一二、三一、註）

校讀綴語

陶百川

本書是潘公展先生的言論選集。計分三編（包括一百多篇的時論，回憶錄和專欄著作）。

潘先生的正式服務報業，而慨然以報人自居，且樂為報人而盡其報國的天職，則自其民國九年與陳布雷先生同進上海商報社，襄助廣肇幫商人湯節之進行籌備工作始。翌年，商報開辦，布雷先生寫社論，潘先生則寫每週時事述評一篇，每天另寫時評一則，從此文名大著。

「九一八」後，創辦上海晨報，擔任社長。同時又辦新夜報、兒童晨報、兒童畫報等，風行一時。抗戰勝利後，他回上海接辦申報。來美後，在紐約與友人共辦華美日報，擔任社長兼主筆。數十年來所寫的時論，專論和其他專欄文字，真是汗牛充棟。但除華美部份外，大部份都已散失，一時不易蒐集。而且限於時間和經費，現有的也不能悉數採印。例如五十年前他為東方雜誌所寫的「羅素哲學」約三四萬字，頗為當時青年所愛讀，編在「東方文庫」內，流傳很久，也祇能割愛。

本書的時論，大部分採自華美日報。這本是編印本書的動機所在。原來這裏有兩位僑胞（梅民先生和趙偉文先生），多年來愛看華美日報，愛讀潘先生的社論，首先提議集印本書，並擔任全部印製經費。後來兩位先生知道潘先生尚保存著他在上海申報、臺北新生報、檳城光華日報、菲律賓新聞日報、加拿大新國民報、舊金山國民日報等發表的一部分論文，香港新聞天地雜誌所登的「有涯室夢痕錄」，以

及還有幾篇在抗戰時期所寫的專論，欣然樂意增加負擔，一併集印。梅、趙二先生珍惜斯文的風誼，當與本書同垂不朽。

本年十月是潘先生伉儷的八十雙慶，我們希望本書能在他壽辰以前出版，另外還有兩本詩詞選集，一是潘先生的，一是潘夫人唐冠玉女士的，我們也希望能廣續印行，先睹為快。

我們敬祝潘先生伉儷福如太平洋，壽比喜馬拉雅山！

一九七四年五月於紐約

作者的愧歉和感謝

公展

公展今秋八十初度，殊愧碌碌一生，毫然事功可言。猶憶祖國大陸淪陷，公展輾轉流奔加、美兩國，意欲竭其餘力，繼續再在海外為自由而奮鬥，為光復而呼號，迄今候逾二十餘載矣。所引為深憾者：展近數年來，困於病魔，幾同癱瘓。對未竟之志，自問負疚良深。歲初，旅美僑領梅華民、趙偉文、江楓諸兄，發起倡導醴資刊印公展「言論選集」，以公展近年來在紐約華美日報發表之社論為主，編印成冊；經華美日報項社長定策兄及報社同人之多方鼓勵與推動；並懇請陶百川先生主持「編選」。陶兄不辭炎暑，犧牲渠旅美考察探親及小憩之機會，從數百篇舊稿中選出一百餘篇分門別類，整理成集。復蒙陳立夫先生從臺灣以萬里之遙，不惜飛稿，為本書張目，特撰序文；為公兄在紐約執教之餘，亦抽暇賜序；臺灣蕭光邦兄主持之兒童書局，以廉價承印本書，並親自率同子女義務校閱；項定策兄又作最後審閱工作；此外，港、臺及旅美親友為此書奔走贊助者，均不一一列述。展對各方面友好愛護之忱，感愧交并。謹書數行，藉誌謝意。

一九七四年九月於紐約鮮草地